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ATION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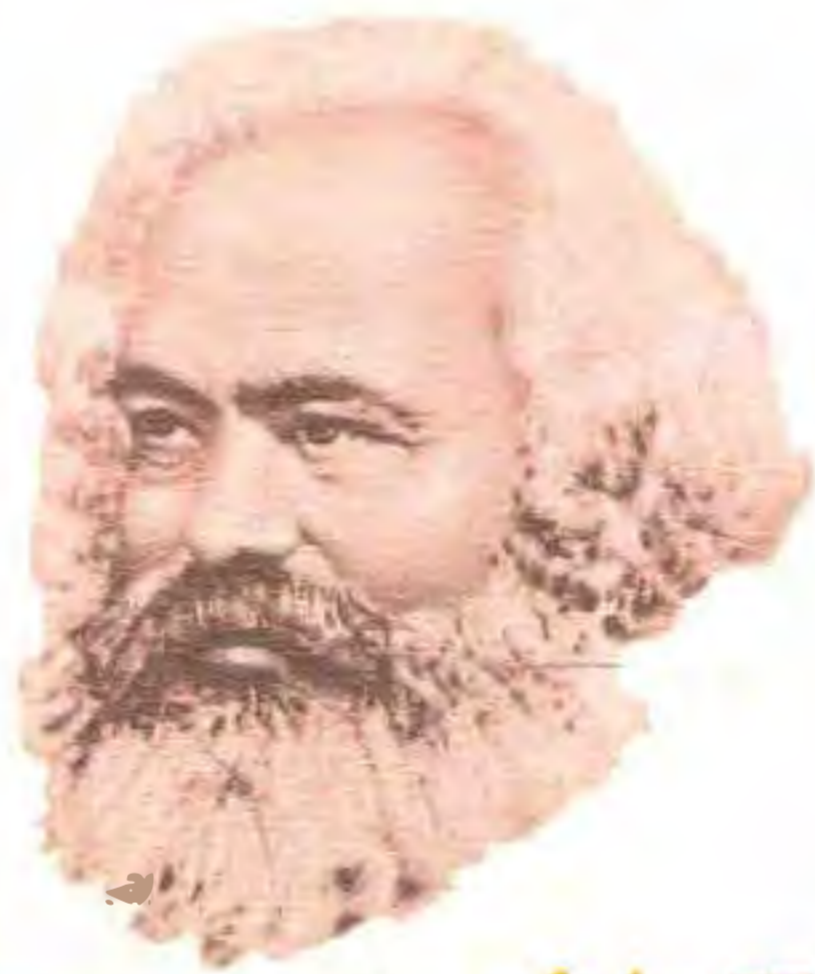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史 (第一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胡文建 李嘉恩 杨达洲 韩宗翔 吴仕康 刘焯星
贾泽林 译 衣俊卿 校



Historija marksizma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Historija marksizma

ISBN 978-7-81129-881-9



9 787811 298819 >

定价：89.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衣俊卿
主编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马克思主义史 (第一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胡文建 李嘉恩 杨达洲 韩宗翊 吴仕康 刘焯星
贾泽林 译 衣俊卿 校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史. 第1卷 / (南) 弗兰尼茨基著; 胡文建等译.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6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881 - 9

I. ①马… II. ①弗… ②胡…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发展史 - 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0089 号

HISTORIJA MARKSIZMA, I, Naprijed, Zagreb, 1978

Copyright© Predrag Vranicki

This book's right of translation abou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deputized by China Written Works Copyright Society.

Telephone: 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翻译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电话:010 - 65978906, E - mail: wenzhuxie@126.com。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

MAKESI ZHUYI SHI (DI-YI JUAN)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胡文建等 译 衣俊卿 校

责任编辑 张微微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34
字 数 453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81 - 9
定 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来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那时的我虽对南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桩心愿创造了条件。1984年至1986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Zdravko Munišić)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①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了本人

^①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勒、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①,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并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30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威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以及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的研究文章。

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2010—2015年,“译丛”预计出版40种,“理论研究”

丛书预计出版 20 种，整个翻译和研究工程将历时多年。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或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并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左翼理论家”等。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来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具体说来，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ć,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 1931—2010)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Agnes Heller, 192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örgy Markus, 1934—)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除了上述十几位理论家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外,还有许多理论家也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Veljko Korać, 1914—1991)、日沃基奇(Miladin Životić, 1930—1997)、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ć, 1930—)、达迪奇(Ljubomir Tadić, 1925—2013)、波什尼雅克(Branko Bošnjak, 1923—1996)、苏佩克(Rudi Supek, 1913—1993)、格尔里奇(Danko Grlić, 1923—1984)、苏特里奇(Vanja Sutlić, 1925—1989)、达米尼扬诺维奇(Milan Damnjanović, 1924—1994)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女社会学家马尔库什(Maria Markus, 1936—)、赫格居什(András Hegedüs, 1922—1999)、吉什(Janos Kis, 1943—)、塞勒尼(Ivan Szelenyi, 1938—)、康拉德(Ceorg Konrad, 1933—)、作家哈尔兹提(Miklos Harszti, 1945—)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霍韦茨(Milan Machovec, 1925—2003)等。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参与度等因素,也考虑到目前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力量的限度,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共

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1948年至1968年的20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

的要件。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1953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划定的十几位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PRAXIS,1964—1974)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vska ljetnja Škola,1963—1973)。10年间他们举办了10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

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2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1981年在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PRAXIS INTERNATIONAL)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一些共同的研究成果。^①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时间点,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

^① 例如, Agnes Heller, *Lukács Revalu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econstructing Aesthetics -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J. Gru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 Essays for György Marku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等。

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遍困境,像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①、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

^①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威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他们的主要兴奋点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积累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悟性。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套尽管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①,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②。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 II, III), 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1988、1992年版。

^②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宣布“放弃了马克思”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20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中毫无疑问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阈中，围绕着人类生存结构、需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有新马克思

^①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

^① Predrag Vranicki, *Socijalistička revolucija—Očemu je riječ? Kulturni radnik*, No. 1, 1987, p. 19.

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①,在我看来,其理论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

^①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4页。

才能达到。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类型。相比之下,20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包括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65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德拉·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35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10篇——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①1970年,弗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生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

^①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①。1974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②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谢尔1978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维奇等10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③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波塔默

① 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ix.

② Mihailo Marković,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vi.

③ Gerson S. Sher, ed.,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1988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5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①此外，一些专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②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③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等人一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④其中，赫勒尤其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的著作十余部，于1981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1995年在莱梅获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奖(Sonning Prize)。

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 Tom Bottomore, ed.,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asil Blackwell, 1988.

② 例如，John Burnheim,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B. V., 1994; 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tic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③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④ 其中，沙夫于2006年去世，坎格尔加于2008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于2009年去世，马尔科维奇和斯托扬诺维奇于2010年去世。

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向^①,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②,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③,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④,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20世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

①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9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飏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52页,即“人名索引”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③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0~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④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锋。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

理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或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比较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理论研究”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理论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我始终相信，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跋涉……

>>> 中译者序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其迅速传播和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从欧洲数国向更多的国家，进而向全世界传播，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理论形态变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再生能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课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研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所展示出的特有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理论课题，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要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把握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们看到，尽管20世纪众多理论家和思想家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以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传记和思想等方面的成果，但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很多。即使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没有什么人推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中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①和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②在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所涵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度、主要代表人物、流派,所涉猎和占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的把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挖掘,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特点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该书第一卷,弗兰尼茨基不仅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而且广泛关注了第二国际时期狄慈根、拉法格、索列尔、拉布里奥拉、倍倍尔、沃尔特曼、伯恩斯坦、施陶丁格尔、梅林、考茨基、卢森堡、库诺夫、潘涅库克、阿德勒、希法亭、伦纳、鲍威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理论。在第二卷中弗兰尼茨基重点阐述了列宁的思想,同时对卢卡奇、科尔施、施特恩贝格、格罗斯曼、拉斐尔、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探讨,还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的理论争论进行了梳理,并且介绍了波兰的兰格、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科西克等人的理论观点。在第三卷中弗兰尼茨基一方面介绍了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科夫勒尔、费舍、列菲伏尔、萨特、哥德曼、加罗迪、阿尔都塞、阿克塞洛斯、马勒、高兹、曼德尔、班菲、德拉-沃尔佩、卢波里尼、陶里亚蒂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如果我们比较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也会发现二者多方面的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把握和叙述方面的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II,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侧重点有差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既包含深刻思想理论逻辑,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的社会历史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总结和阐述往往包含着双重逻辑:一是理论逻辑,二是现实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侧重于从对马克思恩格斯元典思想的把握出发,揭示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和阐述,及其理论演进的逻辑。就现实逻辑而言,重点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命运来把握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发展。毫无疑问,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成果,都必然包含着这双重逻辑。但是,对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虽然也广泛涉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演进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加侧重于一种基本的理论逻辑,而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虽然也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内涵,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历史命运的评价更多地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逻辑,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把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定位于一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史。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写作中,特别鲜明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同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特别是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理论定位与弗兰尼茨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他一直都作为一名学者和教授,但是,他的全部生存经历和体验都与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但是,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这一理论研究领域最为突出。南斯拉夫

实践派著名代表人物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22—2002)生于克罗地亚的班克瓦茨(Benkovac),1939年入萨格勒布大学医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反法西斯战斗,战后重回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哲学,1947年毕业后开始在萨格勒布大学哲学系执教。曾先后担任克罗地亚哲学学会主席、南斯拉夫哲学联合会主席、克罗地亚科学院院士、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1972—1976年间,弗兰尼茨基曾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弗兰尼茨基的著述十分丰富,享有国际声誉,他毕生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研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因此,弗兰尼茨基的主要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1985)都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一、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尽管众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少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基本的哲学立场和价值追求方面,他们是高度一致的,都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东欧地区在历史上饱受东西方帝国列强的征服、瓜分、蹂躏和统治,并且存在本民族内在的阶级冲突和压迫,这些痛苦的历史体验使得中东欧地区许多理论家对于人的自由、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着特别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在这种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又经历了20世纪许多历史灾难和重大事变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把自己的理论诉求定位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也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立场。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一直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来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他关

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和思考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弗兰尼茨基关于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定位和阐发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理论性质的理解上,弗兰尼茨基明确反对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做法。具体说来,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多次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组成部分,更不应从知识论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而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体化特征。

弗兰尼茨基在1970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自己对第二版所做的最大的修改,就是改变了第一版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组成部分来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做法。他指出,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总结方面,“还在第一版中我就对这一部分的结构不太满意,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改写,而是利用了自己的某些过去的著作。因此,这一部分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概况,接着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对于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叙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史,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什么是恩格斯的贡献,不能弄清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存在的差别。因此,我在这新的一版中,把这一部分完全按历史顺序来叙述,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①。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尼茨基反对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做法,不只是为了保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历史发展线索叙述的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这种按照学科划分马克思思想的知识论的阐释方法会消解和遮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的社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

会历史理论所特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弗兰尼茨基强调,他在自己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线索,这是一条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的线索:

我认为这条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质,它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雇佣关系的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的克服。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基本意图,就是创立一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当代的社会过程,以便否定我们有条件地称作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一整个时代。而政治上和经济上形形色色的异化,是这个时代的根本内容和社会关系。^①

这是问题的关键。那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进行知识论和体系化的解读范式,最根本的消极作用就是容易遮蔽和淹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条内在的基本线索,即它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质。弗兰尼茨基还特别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常忽略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所持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立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马克思的宗旨不是建立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构建变革现存的不合理世界的革命理论。弗兰尼茨基指出,“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②。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弗兰尼茨基指出,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作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意义不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反,《资本论》所提供的根本就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1,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7.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75.

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远离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入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

基于上述界定,弗兰尼茨基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扬弃异化、消灭剥削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史》中通篇都自觉地体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一方面,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实践的存在;另一方面,弗兰尼茨基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根本问题是扬弃异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弗兰尼茨基不仅在阐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强调上述思想,而且他认为这一人道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追求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争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所围绕的核心问题。

弗兰尼茨基认为,人的自由和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基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人道主义诉求。他在1961年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所写的第一版序言中就十分鲜明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1,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08.

地强调：“我无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对别人和对自我的批判精神。”^①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弗兰尼茨基同那些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不成熟性的理论家完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他指出：“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天才的关于世界和人的观点已经成熟了。虽然某些明确的论断还没有提出来，但是考察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和范围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以后的著作只是说明，面临的任務主要是：彻底遵循这些基本思想，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存在，更精确地表述各种结论。”^②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到了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已经完全确立了以实践哲学为表现形态的人道主义理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观点是一切其他观点的基础。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生产、作为这一实践要素的生产资料、在这一实践生活形式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关于这一生产的意识等观念。”^③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在于，弗兰尼茨基在解读马克思思想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片面的理解。在他看来，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实践范畴。这种实践范畴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认识的一个环节，从而停留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弗兰尼茨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认识应当是人的实践的内在环节，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展开人和自然的关系、认识和现实的关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某些后期论述，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没有想到，这种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在这种关系中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也卷入了这种关系。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实质上是机械论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把关系的整体分割开来，其实这个整体是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14.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5.

不能这样分割的。在上面所引的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核心和主旨。人们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但是人的全部实践也包含并要求有关于这一实践的思维,即包含并要求创造关于实践和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的一定思想、观点和观念。”^①这样一来,奠基于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就不单纯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而是一种深刻的、彻底的和批判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针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克服了早期的不成熟的人道主义观点的说法,弗兰尼茨基进行了驳斥。他明确地指出: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现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②

在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阐发中,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探讨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与那种强调马克思后期放弃了早期的异化理论的观点相反,弗兰尼茨基认为,异化批判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克服异化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马克思在后期的思想理论中,并没有放弃异化理论,而是不断地使之成熟。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6.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03.

例如,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较少使用异化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当时的唯心主义加以滥用,弄得声名狼藉。但是,这只是用语的改变,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们被禁锢在狭隘的分工之中的片面化的生存状态和人们在机械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中的非创造性的处境的批判,从根本上谈论的都是扬弃异化的问题。^① 关于这个问题,弗兰尼茨基还特别指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别是在他的《资本论》中,对于非人道的、异化的现象的人道主义批判,依旧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特征。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②

弗兰尼茨基不仅多维度、多视角地深刻阐发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本质和内涵,而且还把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为理解20世纪

^①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9.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85.

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和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斯大林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理论缺陷是否定了人的存在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而一些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并且围绕着对当代人类困境和人的生存危机问题的反思而复兴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首先充分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贡献。他特别探讨了卢卡奇对反映论的批判和关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看来,虽然卢卡奇的这些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卢卡奇的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绝不能否认卢卡奇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本质的努力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功绩。弗兰尼茨基指出,“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同时,他是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官方把认识解释成客观反映的做法具有非辩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进行这方面的批评时走得太远了,没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采取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根本的和真实的态度”^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代表人物也自觉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例如,葛兰西实践哲学就把人的问题重新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他通过个人、他人和自然界在实践活动中所展开的辩证关系来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葛兰西把个体的自觉和群众的积极的历史参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05.

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布洛赫特别自觉地“追求马克思的独创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也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②。因此,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精神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深刻批判。弗兰尼茨基充分肯定了布洛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布洛赫在希望的现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他在分析这个现象时,以非凡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们的各种不同表现所包含的,但经常被掩盖的意义。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对‘人’的研究,对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题和任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③列菲伏尔也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一样,坚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异化批判和关于总体的人的阐述,都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做出了贡献。“列菲伏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列菲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马克思所认识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④

弗兰尼茨基也充分肯定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方面所做的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意识独树一帜。“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85 - 186.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47.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5.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21.

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①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即实践出发的,因此,对人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样他就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由于自己所进行的批判的、敏锐的、思想和风格清新的哲学活动,很快就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个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旨和实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和批判方面最感兴趣。”^②另一位著名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重建,他特别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的哲学,并对当代人的普遍异化做了深刻的分析。“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持坦率的态度,使沙夫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解决这些可以阐明人的本质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哲学问题上,迈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步伐。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处在当代人的某些生存问题的边缘上,沙夫也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沙夫早先参加围绕青年马克思以及存在主义进行的讨论时,就已经越来越注意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课题——人的问题。他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倾向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把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截然分开。”^③此外,弗兰尼茨基还阐述了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西克的具体辩证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78.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84.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389 - 390.

法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等理论观点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不仅从理论层面来揭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的演化和命运,而且时时刻刻自觉地从 20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其中既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果的考量和评价,也包括通过这些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反思和检验。显而易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批判理论,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然而,这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众所周知,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历着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进程,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设计和预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至少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很高的历史水准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建立起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主要内涵的自由人的共同体。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生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获得却主要是在俄国、中东欧地区、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因此,人类迄今为止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实验主要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中展开的。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往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差距不小,甚至相去甚远:初步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没有带来发达的个体自由和民主政治,反而由于要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快速构建经济基础而强化国家,集中权力,加强管控。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反差成为困扰着世界人们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难题”，特别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使这一难题带上悲剧的色彩。关于这一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解解读，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这些错综复杂的争论。可以简要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非常极端的或者偏激的观点：一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属于国家主义的集权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第二种观点也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体现和实践后果，因此推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理论；第三种观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持肯定的和辩护的态度，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因此并不需要改革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有一些类似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尽管相互彼此对立和冲突，但是它们都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和辩证的分析，都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之下，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要更为合理和全面。概而言之，在弗兰尼茨基看来，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的揭示，还是对现存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都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和具体的分析。在弗兰尼茨基看来，一方面，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理想化和抽象化，从而根本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应当具体地和历史地分析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和展开的历史背景及客观条件，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实践做出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或者否认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弊端和局限性，必须正视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差距，要创造一切条件自觉地克服国家强化、权力集中、官僚制等妨碍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异化因素,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不难看出,弗兰尼茨基的这一基本理论立场是深刻的和合理的,我们可以简要地展示一下他对于现存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对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探索。

关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是弗兰尼茨基这部马克思主义史的鲜明理论特色,几乎对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每一国度的社会主义实践,他都不会笼统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简单地否定,而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革命形势、实践主体的诉求等做出具体的分析。通常,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发展史的研究著作中,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往往只是一般性的背景,而在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这些内容的分析和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列举弗兰尼茨基对20世纪几次主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分析。

在这方面,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评价毫无疑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列宁对于革命条件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以及关于革命策略和革命道路的深思熟虑。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列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鲜明特点。列宁早在与民粹主义争论时,就对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做了深刻的和具体的分析,“列宁指出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并依据大量的农业统计数字和其他经济著作,第一次分析了农民的发展和分化,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的环境”^①。这一分析和判断十分重要,一方面列宁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俄国与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差别,由此承认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的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列宁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

认为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因此,可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态度上的根本不同:“从理论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诺夫做出结论说,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该轮到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入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释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则是从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提供了对一定形势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的杰出范例,因为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的,它会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受这些因素制约。”列宁承认,“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也就是列宁设想的通过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弗兰尼茨基认为,从列宁关于革命的这些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难看出,那种认为列宁应当为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负责的说法是不恰当和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同列宁的一些做法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量,就会发现二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列宁在革命中采取了许多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的权宜之计和暂时性措施,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以列宁在一定条件下会迫于压力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但是,只要历史条件稍有变化,列宁就会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经济政策”;同样,迫于严峻的形势和压力,列宁会强调党的高度统一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他也始终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9 - 20.

而斯大林则不同,他在完全不同的,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把那些在列宁看来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暂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从而导致权力的高度和国家的强化,以及官僚制的形成。因此,弗兰尼茨基专门仔细分析了苏联模式中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形成问题,他反对那种认为是列宁开创了这种强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的说法。他指出:“许多人认为,这些关键性的时刻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当时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决议禁止成立专门的集团和反对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正确。首先,这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个格外困难的时刻,当时,党内行动上的不统一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垮台。此外,谁都了解列宁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和反应方式,都知道这对于列宁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列宁甚至在这时也认为,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和其他的报刊上继续维护和说明自己的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和正常的。”●弗兰尼茨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过程的真正转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是由斯大林,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推动的。弗兰尼茨基列举了斯大林等人在那时的一些做法:开始实行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开始实行操纵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来确保党的行政机关的胜利;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的民主讨论开始遭到压制;等等。“总而言之,当党的生活和管理的重点从民主制和同志般的(哪怕是尖锐的)关系转为中央集权制和粗暴、不容异见、怀疑心重、污蔑等等时,转折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审判案的悲惨结局中以及在其他党服从官僚化的国际的做法中,如果说没有其逻辑的话,至少有其极大的必然性。这一转折还意味着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一个只有以其广泛的内部民主才能在掌权时作为革命和进步的力量存在的党,变成了一个用团结得坚如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7.

磐石这样动听的话掩盖其内部根本弱点的斯大林主义的党。”●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只有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原则，我们才能看清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本质差别，才能理解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의思想和观念的结构所做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斯大林的解释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问题。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结构同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按照自己理论上的设想行事，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幸的畸变。^②

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弗兰尼茨基也同样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看到了这些实践的成功之处，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并善于结合这些国度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其历史进程。在谈到中国的革命时，弗兰尼茨基批评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不切实际的指令和干涉，强调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弗兰尼茨基强调，毛泽东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7.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77.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0.

的智慧正在于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这些国情,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道路的独特认识,“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弗兰尼茨基认为,尽管中国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后基于赶超的主观热情,脱离历史条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推动革命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②而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欧洲和亚洲不同。弗兰尼茨基认为:“在谈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欧洲的准绳,像不适用于亚洲的现实一样,也不适用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古巴的特点首先是若干世纪以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因此,我们在20世纪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强有力,但同时又存在大庄园主,存在大批贫困的无地农民。尽管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土地问题以及摆脱对北美的经济依附和摆脱北美的剥削,仍然是两项首要任务。”^③弗兰尼茨基认为,古巴的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它的革命极具特殊性,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进步思想家发动的。“但是,古巴的革命也表明,当代解放运动,由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在与自己迄今的殖民者或剥削者的冲突中开展的,它们如果想实现鼓舞着它们的主要的人道目标,就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④在谈到自己的祖国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弗兰尼茨基强调,虽然南斯拉夫是一个属于欧洲文明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1.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6.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4.

④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6.

的国家,但是,它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极其复杂,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具体情况,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才能理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创造性和意义。弗兰尼茨基指出:

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20世纪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属于时代错误的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处于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看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组织所做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组织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变社会结构,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①

基于上述关于20世纪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弗兰尼茨基认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而言,一条重要的思想就是必须充分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坚决反对和杜绝任何依据理想化的和抽象化的理论教条或者给定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剪裁丰富多彩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这种做法。这也是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列宁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虽然他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也坚持强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29.

否定革命道路的多样性。

列宁必然地也同马克思一样,得出了用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与他自己后来的某些信徒不同,他从来不曾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特别在后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①

基于上述认识,弗兰尼茨基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对于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例如,弗兰尼茨基认为,荷兰思想家安东尼·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思想的阐发和关于议会斗争的理解,分析了东西方革命的差异和革命道路的不同^②;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陶里亚蒂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他强调由此形成的历史条件会使不同的革命采取不同的形式^③;此外,中国的革命、古巴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特别是南斯拉夫在革命道路上同斯大林主义的争论和斗争,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应当看到,弗兰尼茨基关于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特殊历史条件,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的思想只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理解的一个方面,这一思想必须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形成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说来,在弗兰尼茨基看来,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而采取了一些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措施时,我们可以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来理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2.

^②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19 - 122.

^③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94 - 195.

解这些实践的客观根据,同时承认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这些具体的实践措施,更不能把这些带有暂时性和权宜性的措施固定化和永恒化。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实践措施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特别要意识到,如果不能根据条件的变化,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克服这些并没有体现,甚至是抑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么社会主义就会面临着最终丧失或者否定自己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危险。要改变这种状况,任何现存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积极地探索和推进改革。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and 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内涵。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除了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之外,还在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成为束缚社会主义发展、阻碍社会主义实现人道主义本质的桎梏。如上所述,斯大林无视列宁反复强调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些措施具有暂时性和局限性,必须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鼓励工人参与管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等措施,来克服这些局限性,最终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斯大林主义非但没有采取列宁强调的这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措施,反而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进一步强化,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进一步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宣布为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严重地阻滞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弗兰尼茨基指出:“列宁经常注意官僚主义问题,并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极大祸害。”^①因此,列宁反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60.

复强调,要让全体人民都学会管理,并且真正参与管理,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

列宁在这里面完全正确地看到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政治上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①

弗兰尼茨基认为,斯大林虽然自称为继承了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引到了相反的方向,即强化国家、否定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因而离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越来越远。斯大林除了关注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强大外,“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对斯大林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②。因此,弗兰尼茨基强调:“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极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解为国家的管理,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解为国家机构进行的分配。”^③这种国家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现存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必须打破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创造一切条件防止权力的集中,防止官僚制和国家的强化,真正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这样的社会主义应当是自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它允许不同国家和地区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59.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71.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82.

采取不同的形式和道路,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实践都必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在弗兰尼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资源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例如,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到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

如上所述,弗兰尼茨基认为,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以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弗兰尼茨基在阐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的思想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条件下逐步消灭等级制和官僚制,逐步使国家走向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形式是生产者的自治,马克思在短暂的巴黎公社那里看到了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雏形。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①

此后,虽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及受斯大林主义制约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权力的集中、国家的强化、官僚制的滋生成为一种重要的演化趋势,但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生产者的自治、自由人的联合体等重要思想依旧存在,而且是他们理解社会主义和推动现存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11.

思想资源。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把关于生产者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线索,自觉地凸显出来。他不仅强调了列宁关于工人监督和全体人民参加管理的思想的重要性^①,而且突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相关思想。例如,弗兰尼茨基阐述了拉法格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思想,在拉法格看来,“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制定规章制度,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入”^②。施陶丁格尔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时,特别重视体现生产者自治思想的消费合作社。“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③潘涅库克一生倡导工人委员会思想,批判斯大林主义强化国家的做法,在他看来,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④。

弗兰尼茨基认为,关于工人委员会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一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坚持。弗兰尼茨基在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在巴伐利亚、匈牙利、奥地利等相继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指出,这些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委员会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

●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57 - 58。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83.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17.

④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80.

的理论和实践的首位”^①，这些革命探索包含着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在这个时期，德国共产党内部还发生了分裂和分化，以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和施罗德等人为核心，还形成了主张以工人委员会为核心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思潮。^②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科尔施，是工人自治的坚定倡导者，“早在1919年写的关于‘社会化’问题的首批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家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意义所在。科尔施主张实行‘工业自治’，实际上是主张由参加生产的人掌权和管理生产过程”^③。意大利是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和实践比较发达的国家，在1920年前后的期间，就已经有占领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就是工人委员会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组织者，这一思想在他的实践哲学和西方革命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④ 列菲伏尔一直关注异化的扬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主张用自治社会主义来扬弃异化，推动国家的消亡。“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这个问题成了他经常研究的题目。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克服当代的异化结构这个过程是作为官僚主义和当代技术至上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机构的必然消亡的过程。在上述著作中，列菲伏尔主张一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并且对迄今存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提出警告，指出他们把国家的革命变革同社会主义的变革本身混为一谈。”●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工人委员会、生产者自治、自治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反复倡导和阐发，为现存社会主义改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92.

②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19 - 120.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5.

④ 参见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177 - 178.

●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133.

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而且从实践上来看,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时期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朝着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方向发展的,即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宗旨。在这种意义上,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家都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高度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经济体制层面,弗兰尼茨基认为奥塔·锡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对于后来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锡克的这部著作,“一方面是同那种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计划并排斥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也必须发展特殊的市场关系,以及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锡克提醒人们,马克思根据他当时的私有制度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要被取消,这并不要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也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去得出结论”^①。而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整体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层面上,弗兰尼茨基高度评价了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在1968年4月制定的改革的“行动纲领”,强调建立以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特征和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正如杜布切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所强调的那样:

今天我们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处于第一位的。

但是我们还要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398 - 399.

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种当代新的人道主义形式,其他制度尽管在技术上成熟,但也不可能向人类提供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应当为人的发展创造比目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正常化,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是目的自身,而是看作争取人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手段。^①

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弗兰尼茨基特别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他本人生活于这个国度,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反抗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国家,在1948年苏南冲突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在铁托的领导下自觉地探索全方位的自治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和改革派政治家共同推动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弗兰尼茨基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最深刻的改革,它不是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这种改革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弗兰尼茨基这样来概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思想:

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统治,而实现对物的统治,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统治。然而人们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们或“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们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即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们才能认识到,才能充分意

^① 引自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416。

识到,他们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级制度的轻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员的自己的集体。●

根据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自治社会主义实践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是限制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强化,反对官僚制,通过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来逐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为自由人的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自治社会主义反对国家所有制,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论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公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资料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为前提的”^②。在政治管理体制上,自治社会主义强调权力下放,实行真正的民主,即工人直接参与和管理的直接民主制。“1952年底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就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实践、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国家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处的雇佣关系的处境,他强调指出,解决办法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职能,而在于加强自治,也即在于使国家职能消亡、实行权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③在新型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上,自治社会主义建立以工人自治、工人自我管理、工人委员会,乃至社会自治的新型体制。南斯拉夫通过立法等手段制定了详细的自治管理体制,从最基层的工厂和企业,直至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行。“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须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56.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p. 257 - 258.

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62.

身,并将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①此外,这种自治的原则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文化领域的自由发展。应当说,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并且不断使相关措施和体制机制法制化和制度化。1950年6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就通过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1953年1月13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又制定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基本法》^②及一系列规章制度,具体规定了从工厂直至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体制机制,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

应当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系统、最为深入,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存在许多矛盾和局限性,对此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也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的角度,应当充分肯定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巨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的、更为人道的关系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不是靠关于人、社会精神和善良的意图的猜测来解决的问题。新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265.

^②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121—151页。

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领域内的解放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当代价值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没有详细介绍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理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人道主义的本质精神的演化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概括总结,来揭示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逻辑的揭示,还是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命运的评价,都是异常复杂的课题,很难三言两语地简单说清楚。例如,我们像弗兰尼茨基一样,对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意义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众所周知,虽然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一度比较活跃和繁荣,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就越来越凸显,特别是出现了分权和集权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下降等问题。而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和国家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减弱,并且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走向了解体和剧变,而自治社会主义也就随之终结。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性和最终的悲剧命运并不能简单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必然走向失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各种矛盾,既有社会主义体制本身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19.

的矛盾,也有南斯拉夫独有的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更有苏联僵化的体制的外在束缚。对此,必须做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不仅如此,南斯拉夫的、波兰的、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即使都是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失败的,其经验教训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应被抹杀。一方面,这些改革本身就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克服异化、不断改变现存世界的开放的进程,这些改革探索确证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改革的许多内容(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完善、工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等)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也有很多启示;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探索通过面对当代世界的矛盾问题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困难,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开放性。正如弗兰尼茨基在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中反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不断直面人类发展困境的人道主义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结语中,弗兰尼茨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说明它始终是当代的基本理论思想。”^①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否定的当代价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一种开放的理论。

在现代世界特殊而复杂的进程中,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径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间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而也成为现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21.

判的。^①

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方位的批判,也体现在对现存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人道化进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关心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永远激励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意识形态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人的,由人赋予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无法预料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和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点伟大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制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含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

※ ※ ※ ※ ※ ※

在对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论定位和逻辑线索做了上述概括后,我们还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该书独特的“翻译史”和参加该书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众多著作中,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是最早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的。

①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22.

②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III, Zagreb: Naprijed, 1978, p. 332.

众所周知,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由于中苏之间的理论论战的需要,我国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文献和资料,用于在国际领域批判修正主义。这些文献就是著名的“灰皮书”系列。由于中苏论战中涉及南斯拉夫的批判,需要翻译南斯拉夫的有关资料,而当时我国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人实在太少。为此,1960年7月至1961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在高级党校内办了一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培训班”,该班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主持,后来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如胡文建、李嘉恩、杨达洲、韩宗翊、吴仕康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外语培训班。由于这些专家都具有坚实的俄语基础,所以培训班只办了半年,这些专家就开始承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大量南斯拉夫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文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版的翻译就是在“灰皮书”系列中完成的。

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主要牵头专家胡文建先生回忆,“1961年南实践派哲学家代表人物,先后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南哲学家学会主席和南科学艺术院院士的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史》。这是一部颇为独特的,甚至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比较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著作。它不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及其在各个社会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论述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还评价了第一、二、三国际时期和当代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上百个代表人物和数百上千部著作”^①。该书出版的消息传入我国后,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中央理论小组要求尽快翻译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我们立即组织了20多位同志翻译,他们是我局南斯拉夫组的江文若、黄良平、钟韵娟、张森和我,中联部毛少英,新华社杨达洲、徐

^①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非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致敬、李黛军、李一，人民出版社尤开元，人民大学李嘉恩、李光谟、乔增锐、韩宗翊，中调部张瑞祥，社科院经济所和哲学所陈长源、林南庆、李鑫南和吴仕康。我们从1962年6月开始翻译，同年11月底译完送交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此书作为修正主义著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灰皮书’形式分上下两册（共728页），标明‘供内部参考’出版。”^①

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展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知之甚少，很多理论工作者是通过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和观点的，它引起人们的思考，并且使人们产生了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强烈兴趣。然而，令胡文建先生和几位译者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弗兰尼茨基这部如此重要，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当时是被作为“毒草”类的“灰皮书”而加以翻译出版的。好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正确对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机遇。据胡文建先生回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学术界深感以往思想理论和文化学术禁锢造成的闭塞和无知，迫切要求开阔眼界，独立思考，了解世界，了解国外学术思想和动态。而人们当时接触不到国外学术原著，许多人也不懂外文，人民出版社便参照以往出版‘灰皮书’的办法，计划出版现代国外政治学术著作，并且，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同志说，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热烈赞同和鼓励。在这一背景下，我从南斯拉夫开会回来后，1983年，人民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尤开元找我，叫我牵头翻译弗兰尼茨基1978年出版

^①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非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的《马克思主义史》第四版共三卷”^①。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翻译工作由胡文建先生牵头,总体负责。由于时间紧张,胡文建先生委托李嘉恩先生与韩宗翊先生共同翻译第一卷;第二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吴仕康先生和刘焯星先生共同翻译(其中刘焯星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德文版进行校订);第三卷由胡文建先生牵头,与杨达洲先生和贾泽林先生共同翻译。1986、1988和1992年近百万字的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令这些翻译家们欣慰的是,新版《马克思主义史》的封面已经由灰色改为以红色为主。

应当说,无论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的篇幅之长来看,还是从这部著作所涵盖的代表人物之多,以及所涉猎文献和思想理论之丰富来看,这项翻译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这些译者是我国最优秀的资深翻译家,他们以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 and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高水平地完成了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的翻译,为我国理论界更加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迄今距弗兰尼茨基新版《马克思主义史》在我国的出版,又过去了二三十年。现在这些优秀的老翻译家还在以高度的理论责任感,关注和期盼着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能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中再一次出版。这是一些为我国翻译事业和理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值得我们敬重和感谢的优秀翻译家,借此书再一次出版之机,我们在这里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参与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翻译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群体,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开平一中、南开大学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2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历任国际共运史研究所所

^① 胡文建:《“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载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现任顾问。

李嘉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1928年生于浙江宁波,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室主任。

杨达洲,新华社记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7年生于上海。195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毕业后回国到新华社工作,曾任参考新闻部副主任,贝尔格莱德分社首席记者。1986—2002年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事研究工作。

韩宗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译审。1925年生于河北丰宁。

吴仕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

刘暉星,中央编译局译审,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5年生于广东兴宁。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室。1958—2000年在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作。

贾泽林,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绥化。曾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

鉴于上述各位翻译家均已是耄耋之年,此次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中译本再版的校译工作由我来承担。我按照该书197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主要做了以下校订工作:把全书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都按照经典著作中最新中译本加以替换;按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翻译规范对于全部译文的文献注释等做了技术规范调整;对于原书中少量中译本没有翻译的章节进行了补充翻译,以保证译本和译文的完整性;根据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的研究进展,对于原译稿中的一些重要术语的

译文做了修改,并且对部分人物的译名做了调整修改。对于校译和校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不恰当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时光荏苒,往事依稀。校订这部译著使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了对30年前倾力翻译这部重要著作的优秀翻译家们的敬意。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曾有幸当面向弗兰尼茨基先生请教,他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我当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感谢这些优秀翻译家当年的高水平翻译工作,使我们今天在系统译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时,可以顺利地出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挥之不去的失落和不安。通过“灰皮书”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初期,虽然年轻的共和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困难境遇,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了不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以及其他很多“小语种”的理论翻译人才,这些理论翻译人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于中国理论建设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视野的开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外交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中青年理论翻译人才队伍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高水平的“小语种”翻译人才了。结果,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理论“翻译路径”和理论知识“引进路径”却日趋单一化,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很多重要的理论文献,我们只能通过英语(以及德语、法语)翻译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干脆从我们的理论视野中忽略掉。这种现象无疑会对于我们提出的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文化竞争力的战略带来许多不小的限制,其消极后果在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将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并非杞人忧天的隐忧。

袁俊卿

2015年5月10日

>>> 第一版序言

我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决定写一部关于当代这一最有生命力的思想的历史,虽然我知道,一些最必要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首先,还没有一部关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可以拿来作为进行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的基础。

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我主要依靠自己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研究和自己的经验,来独立地划分时期,选定人物和问题,并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迄今存在过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观点。不言而喻,我也引用了我所同意的某些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写的批判性著作,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些因素。

需要马上强调指出,这本书既不是社会主义史,也不是工人运动史,而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史本身也要求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第一,要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理,过去坚持的种种论断有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框架内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倾向产生的根源;第三,要有批判性,这是当代最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在这本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对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至今仍然存在着相当对立的意见。我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integralan marksizam),因为我认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唯物辩

8 证法理论家以后,他们在各个阶段上的思想,实质上是统一的和一贯的。因此,我在专门的理论著作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统一的论述,并且明确指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局部的因素,都必然是片面的(不过这种片面性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很明显,在任何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不仅与工人运动、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形势的全局和局部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也与资产阶级的哲学、科学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我认为,特别是在这样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中,没有必要过于细致地叙述个别情况以及做详细的传记,因为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发展的基本路线。重要的是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状况、阶级关系现状,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整个发展概况。

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和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但是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结构中,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往往是完全对立的趋势。因此,每个人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这当然取决于每个人的成长可能受到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的个人品质、智力和才能绝不只是消极的可塑材料。在我看来,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别恰恰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个人所走的道路的答案。我在书中力图说明,某些一定的历史趋势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要从中确定一种趋势,并进一步积极地说明它的表现形式。不过,一个人把历史发展的哪一种可能性看作当时的基本环节,这多半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同样也取决于他发现这一环节和在自己的论点中概括这一环节的智力和才能。

除了指出在当时发展中决定着可能出现的不同趋势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之外,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在理论方面。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的地方阐述和评价那些多少具有国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要素、发展阶段和成就。至于研究其他许多特殊的问题,以及研究那些可能在本国范围内起到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活动并不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的人物,则是不同国别的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

因此,由于这是一部叙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通史,我所提

到的就只是一些基本问题和那些在理论活动中具有某种国际意义的思想家。基于这种要求,尽管本书原来计划的篇幅已被大大超过,但我仍想把全书的篇幅限制为一卷,而这也是有一些理由的。一部比较详细的马克思主义史,不仅要涉及某些国家的许多特殊情况,而且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各个阶段,因而要求有许多卷的篇幅和相当多的人力。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正像在任何一个科学部门中那样,必须对这些内容广泛的问题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这种考察可以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和争论的发展情况来看,我觉得除了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原因以外,这种考察还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提供一幅更加鲜明的批判性的图画,来描绘我们自己,描绘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描绘我们的缺点、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描绘一切促进或阻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因素。因此,必须说明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的任务和要求,以便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符合时代的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历史变动中具有先见之明。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无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的思想。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对别人和对自我的批判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也只能是批判的思想史。如果不以自由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发展的各个时期,要想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是一种幻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为什么近40年来那些至少已经具备写作条件的人至今未能写出这样一部历史。

显然,我的这个尝试不仅是我过去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的综合,而且也是我对于当代主要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个人见解。这些个人见解包括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偏差和谬误的看法,以及对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处于整个历史发展水平上的种种探索和明确的努力的看法,也包括对于臆造出自己的圣徒和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的看法。

要得出这样的看法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考察,除了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了解世界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外,还需要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创造性气氛这一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做恰如其分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现代世界的真正的复兴运动,那么它就必然要求创造出一种能够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况。

个人对于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史问题所持的批判性见解,实际上总是综合了对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检验的批判性历史实践。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迄今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创造性思想,总是以一定的批判性历史实践为前提的。不论某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和概念形成的道路如何复杂,他们总是不仅总结了理论传统和经验,而且综合了他们的历史实践的生活(或历史实践的停滞不前)。

正因为如此,我可以指出,在南斯拉夫的革命运动和十分丰富的经验中,不仅表现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而且表现出他们非凡的创造性,如果没有这些运动和经历,这部丰富、复杂而又常常包含着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的某些重要篇章,对我来说,在很多方面就会是不可理解的,而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想必也是如此。

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需要解决的种种困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若干广泛的理论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迄今的实践本身又极为错综复杂,这些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至于马克思主义迄今存在过的各种流派、各种争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种种变化,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一定的方法论观点,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和思想中的各种问题。但是,为了更明确地强调理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个别科学领域内的运用,就不得不基本上略而不谈。因此,我对于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许多值得重视的方面只是简要提及,因为这部著作的构思和篇幅不允许更多地阐明这种方法在学术史的各个不同领域中的运用。

另一方面,我要强调指出,由于本书的叙述方式,读者只有对本书做全面的研究,才能弄清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或问题,因为某些重大的问题几乎在本书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探讨。

每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分期、对问题和人物的选择以及对所获得的成就的批判性评价。关于分期问题,我认为用专门的章节来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思想,是合乎逻辑的。进而,正如我所断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工人运动发展中几个国际的时期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可能发生的倾向和实际存在的倾向相适应的,因此,我把这一点放在专门的篇章里进行论述。

列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也把它放在专门的一篇里论述。

迄今为止的当代时期的更典型的特点,是理论思想在两个“阵营”内发展,因此,对这个时期也就做了这样的划分。本书有专门的一篇论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不仅我作为南斯拉夫的作者有理由更多地注意我们所做的努力,而且最近20年来南斯拉夫的理论 and 实践的表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因此,我在全面地介绍这一运动时,也概括了南斯拉夫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且比较详细地引证了他们的具有独创性的论点。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这里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而且很明显,对一个这样复杂的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应该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中,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是真正

符合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还应当说明更多的东西:每个历史时期是怎样提出新的问题的,这些新问题在任何一种理论中都不可能具体地预见到;一种复杂的、丰富的和全面的历史辩证法是怎样同时要求有全面的和灵活的思想的;以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开放的思想。

我自己的一切见解和评价,都是以原著为依据的,当然,有时我只能根据译本来了解原著。至于我所使用的我国译文,我经常与原文进行核对,在比较引文时,有时做了一些微小的校正。本书最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仅仅包括书内以某种方式引用过的著作。此外,我力求避免重复提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而是力图在每一著作的后面仅仅注明初版的年代,但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见,参考书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指出了异常丰富的、至少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且也指出了新资料的来源。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尤其是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我基本上通过修订和补充的方式,利用了我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包含的种种问题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的这部著作是在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并且归根到底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年代里完成的,因此,我不能不以这一微小的贡献来纪念所有在我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牺牲的英雄战士,他们在当时世界上艰难的和非人道的形势下,由于自己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对人类的坚定信念,而成为预告未来的使者。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61年4月15日于萨格勒布

本书的第一版发行以来,已经过了将近10年。它是在50年代末脱稿而在1962年2月出书的。现在的这一版是在1968年底完成的。

当我决定对第一版进行比较彻底的修订以准备第二版的时候,不仅要研究这10年里所经历的大事,因为这10年是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1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硕果累累的10年,我也需要使某些问题以及对某些问题的态度适应我自己观点上某种程度的变化,此外还要补充第一版中没有研究的某些人物。同样,我也力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增补大量的章节来论述对读者有用的某些新的因素,或至少是报道这些新的因素。

但是,如果完全不算关于最近时期的新章节,那么最大的变化是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分中。还在第一版中我就对这一部分的结构不太满意,但是当时我没有时间把它完全改写,而是利用了自己的某些过去的著作。因此,这一部分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概况,接着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独立的部分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对于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没有充分叙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史,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区分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什么是恩格斯的贡献,不能弄清他们的观点中有时存在的差别。因此,我在这新的一版中,把这一部分完全按历史顺序来叙述,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也做了更详尽的叙述。

除了这新的一部分以外,还增添了关于下列人物的完全新的章节:弗·施陶丁格尔(F. Staudinger)、安·潘涅库克(A. Pannekoek)、弗·施特恩堡(F. Sternberg)、斯图契卡(P. I. Stučka)、帕舒坎尼斯(J. B. Pašukanis)、E. 瓦尔加(E. Varga)和 E.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 A. Preobraženski);还有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西德(不包括恩·布洛赫[E. Bloch]的部分)、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章节,对于它们,第一版中只提供了一些最概括的材料。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的部分,结构也有了变化,各章的内容都做了扩充,而且与其他部分一样,一直叙述到 1968 年底。

这里用不着再一次论证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一点意见,即这样的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只能着重提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谈到最近时期的时候,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这一规定,因为有必要至少概括地叙述一下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状况和背离,在这里,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我提到了某些人物和著作,主要用来说明当代发展中的基本的和典型的现象。

还需要着重指出,某些人物按其民族成分本来不应该放在某一章节里,但是有的时候我却把他们放到这些章节里。理由是这些人物主要在另一个国家的运动中从事活动(如罗·卢森堡[R. Luxemburg]、安·潘涅库克);或者我没有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他们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如厄·曼德尔[E. Mandel]、恩·费舍[E. Fischer])。第三种情况则又涉及某些德国思想家,他们已经侨居国外几十年了(特别是赫·马尔库塞[H. Marcuse]和埃·弗洛姆[E. Fromm])。我认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现实,特别是法兰克福的环境,是他们的理论观点的历史根源,因此我把他们放入关于西德的一章里。我不能把他们放入东德,因为那里根本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一算上他们就会破坏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谐一致。

我还想着重指出,在 1968 年完成的第二版,在这种情况下,将比

第一版要充实得多。1968年看来在许多方面是转折的年头。老一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度过了自己创作旺盛的顶点。而年轻的理论家则刚刚崭露头角。法国的五月事件,全世界的学生造反,美帝国主义残酷镇压某些国家人民的解放愿望(特别在越南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武力阻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努力,苏联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取得积极成果,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得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成为转折时期。世界能否避免军事国家主义和专家治国论新利维坦^①的暗淡前景,并达到建立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关系的更高阶段,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社会主义所内在固有的,而实现这种关系的一切基本历史前提都已具备,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步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的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和坚决的历史行动。

对本书的读者,在名词术语方面还要提醒一点。我想趁此机会提出自己关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共同标准语的一些想法,同时让每一个作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同义语。在这里我只想提到一个哲学范畴,我对这个范畴的使用,在语言表达上与其他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个范畴就是拉丁文中的 *esse*(存在)或德文中的 *das Sein*(存在),它在我国语言中被译成 *bice* 或 *bitak*。*bice* 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在我国语言中日益具有生物的意思(德文中 *das Wesen* 有一个意思可以译成 *bice*),而 *bitak* 这个术语,我则从来不曾把它用来直接表示它所应该具有的那种内涵。此外,在哲学表达上十分需要的派生词,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合适的(如 *bitkovanje*, *bitkujuće*, 或 *bićevanje*, *bićujuće*)。因此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然决定采用 *bivstvo* 这个术语,及其十分合适的派生词 *bivstvovanje*, *bivstvujuće*。在我国的语言中,*bivstvo* 的概念既用作 *esse*(存在)和 *existentiae*(生存)讲,也用

^① 利维坦是基督教《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怪兽,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论国家》一书中用“利维坦”来喻指现代国家。——译者注

作 *essentiae*(实质、本质)讲。由于我们已经有两个术语 *bit*(实质)和 *suština*(本质)来表示 *essentia* 的概念,而 *bivstvo* 这个术语则原来既表示 *esse*(存在)又表示 *essentia*(实质、本质),因此我决定选用这个更加合适的术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特别在现代哲学中,某些哲学家也在双关的意义上使用 *esse* 这个术语,既用来表示 *esse*(存在)也用来表示 *essentia*(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 *bivstvo* 这个词就能最恰当地表达这样使用的意思。

最后,对于那些我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曾向我提出过意见和给予过帮助的各位朋友,我表示最热忱的感谢。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0年2月于萨格勒布

我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版，是作为第二版的重印本在1975年初发行的，因此没有必要写一个新的序言。这一次的第四版，同时也作为我的《选集》的前三卷，它与第三版的不同之处，在于做了许多较小的增补并扩充了参考书目。主要的增补是新添了一章来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左派共产党人，即所谓“苏维埃共产党人”。这样，贯穿于我的著作中那条基本线索就得到了重要的补充。我认为这条线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理论的实质，它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雇佣关系的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化的克服。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基本意图，就是创立一种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来理解当代的社会过程，以便否定我们有条件地称作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一整个时代。而政治上和经济上形形色色的异化，是这个时代的根本内容和社会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问题，以及斯大林主义问题，就能够得到更加透彻的说明。我在写《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它将作为我的《选集》的第六卷出版）的过程中，根据我的最新分析，特别是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更加精确的定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对本书做了一定的订正。

在许多其他的章节中也做了较小的补充，我也试图利用最新的重要著作来充实这本书。但是，正如我在第二版序言中已经规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对某些重大事件（它们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展和出现的背离）的考察和评述，在那一版中到1968年为

18 止。序言中也说明了理由,而这一理由我觉得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这一本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即一般理论方面的某些根本的转折,在我们这个时期里大概是不能预期的。我觉得,主要是进一步研究、深入考察和扎实分析以各种形式(而且常常是以十分片断的形式)提出的理论问题。这当然不等于说,历史的实践不会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随时提出新现象和新问题,也不等于说,在这方面没有发生十分重大的事件。毫无疑问,例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如果要想真正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官僚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这归根到底会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就必须进一步发展自治关系的制度和形式,发展管理中和整个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在这方面,1974年的新宪法和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等文件,标志着这个过程中的前进步伐。同样,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最新现象,不仅为欧洲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在我看来,它也为在理论中和实践中彻底清算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和做法准备了最后的基础。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日益壮大的争取实现某些基本的公民自由的运动,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现象。

历史实践中当然还充满着各种其他的现象,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智利的法西斯反革命政变,对于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又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在第三世界即不发达国家的广大地区发生的事件,我觉得应当是日益引起马克思主义注意的现象。这些国家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并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力图避免实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殖民主义、民族或种族依附和无权地位的体现。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马克思主义中需要付出大量创造性劳动和进行自由探索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了,但我觉得有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需要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历史分析:第一,进一步从理论上研究自治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自治社会主义目前在
19 南斯拉夫的实践中走得最远。这种研究也包括以批判的态度进一步

揭示革命后发展中的官僚国家主义过程的现象和当时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第二，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革命的可能性，即利用民主的政治多元化和存在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派别来实现社会关系改造的可能性；第三，综合地研究第三世界，主要是不发达国家所做的努力和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或正在摆脱殖民地依附状态，但不想再走“典型的”欧洲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历史实践的所有这些方面，还将发生许多历史性的搏斗、失败和胜利。

我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史》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比较完整地叙述这一革命思想的历史。我希望这一次更加充实的新版，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如此重要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的讨论。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1977年1月于萨格勒布

目 录

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1

中译者序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1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第四版序言 1

导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 1

一、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2

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7

三、19 世纪初的德国 18

第一部分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章 革命唯心主义时期(1837—1843) 3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33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48

第二章 新观点的建立(1843—1847) 62

一、卡尔·马克思(1843—1845) 62

| | |
|--|-----|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 261—313 节) | 63 |
|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79 |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84 |
| 《神圣家族》 | 101 |
|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3—1845) | 104 |
| 伦敦通讯 | 104 |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 107 |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113 |
| 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5—1847) | 117 |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117 |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121 |
| 《哲学的贫困》 | 133 |
| 第三章 《共产党宣言》、革命和流亡(1847—1870) | 140 |
| 一、《共产党宣言》 | 140 |
| 二、革命和流亡 | 148 |
| 三、第一国际 | 158 |
|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 | 164 |
|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 164 |
| 二、略论方法 | 169 |
| 三、资本 | 172 |
|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 175 |
|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 181 |
| 六、资本积累 | 184 |
|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 189 |
|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 193 |
| 第五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 200 |
| 一、《法兰西内战》 | 200 |
| 二、《哥达纲领批判》 | 208 |

| | |
|---------------------------|-----|
| 第六章 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 217 |
| 一、基本观点 | 218 |
| 二、实践的原则 | 221 |
| 三、认识的问题 | 223 |
| 四、辩证法问题 | 227 |
| 五、某些逻辑问题 | 234 |
| 六、必然和自由 | 236 |
| 七、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 | 239 |
| 八、唯物史观 | 245 |
| 九、国家的产生和消亡 | 249 |

第二部分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 | |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 | 261 |
| 一、约瑟夫·狄慈根 | 262 |
| 二、保尔·拉法格 | 268 |
| 三、若尔日·索列尔 | 277 |
|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 283 |
| 第二章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 290 |
| 一、奥古斯特·倍倍尔 | 293 |
| 二、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 302 |
| 三、爱德华·伯恩斯坦 | 303 |
| 四、弗兰茨·施陶丁格尔 | 310 |
| 五、弗兰茨·梅林 | 314 |
| 六、卡尔·考茨基 | 321 |
| 七、罗莎·卢森堡 | 343 |
| 八、亨利希·库诺夫 | 361 |
| 九、安东尼·潘涅库克 | 365 |

| | |
|---------------------------|-----|
| 第三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 377 |
| 一、麦克斯·阿德勒 | 379 |
| 二、鲁道夫·希法亭 | 387 |
| 三、卡尔·伦纳 | 395 |
| 四、奥托·鲍威尔 | 401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 415 |
|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 415 |
|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 417 |
| 主要译名对照表 | 436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书 目

- 1.《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加约·彼得洛维奇 编
- 3.《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匈]费伦茨·费赫尔 编
- 4.《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5.《激进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6.《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7.《卢卡奇再评价》 [匈]阿格妮丝·赫勒 主编
- 8.《超越正义》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9.《后现代政治状况》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著
- 10.《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1.《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2.《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匈]乔治·马尔库什 著
- 13.《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14.《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 [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著
- 15.《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6.《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章》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著

- 17.《历史与真理》 [波]亚当·沙夫 著
- 18.《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阿格妮丝·赫勒,费伦茨·费赫尔 编
- 19.《人的哲学》 [波]亚当·沙夫 著
- 20.《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等 著
- 21.《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 [匈]费伦茨·费赫尔 著
- 22.《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著
- 23.《道德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4.《个性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5.《历史理论》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26.《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27.《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28.《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亚当·沙夫 著
- 29.《现代性的危机——来自1968时代的评论与观察》
[捷]卡莱尔·科西克 著
- 30.《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捷]伊凡·斯维塔克 著
- 31.《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一位南斯拉夫哲学家重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南]加约·彼得洛维奇 著
- 32.《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 [波]亚当·沙夫 著
- 33.《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文集》 [匈]米哈伊·瓦伊达 著
- 34.《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实践——实践派论文集》
[美]格尔森·舍尔 编
- 35.《碎片化的历史哲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 36.《一般伦理学》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37.《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

[南]斯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著

38.《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匈]乔治·马尔库什著

39.《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

[南]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著

40.《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著

导 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 和文化前提

21

23

马克思主义早已是国际性的概念,是进步愿望的象征,但也是遭到形形色色批判的对象。历史进程总是比人们思想对它的理解要复杂得多,在历史进程的旋涡中,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运用。就连马克思本人也被“分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并且又把他同恩格斯分开,把他们两人同许多其他的人分开。而所有这样做的人,直到今天,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忠于马克思的思想。五花八门的历史实践,从斯大林的恐怖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都企图证实马克思的思想和意图!

究竟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存在这种矛盾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究竟是存在一种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也遭到了任何伟大思想相同的命运,即各个时代都结合本身的问题和形势看到这一思想的不同方面,更有甚者,个别人不仅用它来说明时代的现状,而且用它来说明自身的能力呢?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至少应当回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做出说明。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综合的体系,因此最好从它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着手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就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这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总体来说,这也是人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为了揭示和实现一切使他成为人的因素,为了解决人本身产生的一切问题、疑虑、迷惑和神秘化现象而不断努力的结果。人在这种斗争中表现出光明和阴暗的两面。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障碍和困难,人类关于人是创造者的崇高思想,关于人使整个自然发展一体化的崇高思想,关于人的唯一合理目标和乐趣只能是人的生活的崇高思想,终于战胜了一切阻碍人类发展、使人类陷入抽象的幻想、使人类在追求进步中麻木不仁从而丧失人性的不良现象。在这里至少有必要极其简略地谈一谈人类的精神在自我觉醒的长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的那些重大突破。

一、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18世纪和19世纪初,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人的形成,而且是年轻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力图完成改革欧洲社会结构及其意识的长期斗争过程的时期。这种与旧势力的冲突表现得最明显和最激烈的地方,思想也必然最激进。与旧的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是迄今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与旧的宗教相对立的是唯理论,与旧的神学的社

会制度观相对立的是人民主权的思想。^①

18 世纪在法国确实可以称作启蒙运动的革命时代。这一启蒙运动在英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下,继承了本国的进步传统,首先提出了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代表的自然神论和立宪政体。

启蒙运动发展的转折点是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的出版(1751 年),这部百科全书在当时和以后都是人类创造性精神的最重大的创举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德·狄德罗成了中心人物,他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博学的全才,是围绕百科全书的整个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这同时也是当时最激进的哲学派别——法国唯物主义形成的时期。

尽管我们有理由把法国唯物主义称作机械唯物主义,但是它不仅是当时的革命思想,而且它的批判性、激进性和自觉性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实现今后意图的关键。此外,我们不应忽略,他们的著作,特别是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的著作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虽然其中许多因素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假设。拉美特利曾预感到,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思想绝不是荒诞无稽的和耸人听闻的^②,霍尔巴

①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述法国唯物主义时说：“伏尔泰指出,18 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詹森派的争论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可见,人们之所以能用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解释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用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形态来解释的。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Dietz Verlag, Berlin 1962, *Werke*, sv. 2, str. 133 - 13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9 页。——译者注])

② 茹奥·拉美特利用自己的这些观点不仅批判了教会关于人的起源的教条,而且批判了林耐关于物种不变的静止的观点。

26 赫和狄德罗则提出了关于永恒变化的绝对思想^①，——这些思想都从根本上摧毁了千百年来关于世界和人永恒不变的观点。而这在各个方面都是数十年后出现的关于人和自然界的更激进、更深刻、更彻底的观点的重要前提。

也和本体论的观点一样，在认识论中，除了著名的沉思以外，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辩证因素。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存在着关于认识发展的思想，认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甚至实践的某些因素。他们还不能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来考察人的特殊性，并得出解释历史现象所必需的那些范畴。但是他们用自己激进的唯理论和对旧的形而上学和唯灵论的尖锐批判，同样以最彻底的方式为关于人和历史的新的观点清扫了场地，这种新观点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现存世界之外的依据和前提了。这种观点使人立足于自身，人在解决自己的历史存在问题时要明确地指靠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行动。

在历史问题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也标志着一个新阶段。不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研究和观点提出了探索人和历史发展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的问题，不仅他们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结合政权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得出了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其中某些人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关于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的萌芽。

这个问题，在爱尔维修批判孟德斯鸠的地理因素论时，就已经提

^① 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写道：“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不在变化吗？我们自己难道也不在变化吗？……呵，人啊！难道你永远不会领悟到，你不过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动物吗？在宇宙里，一切都在变化；自然里并不包含有永恒不变的形态；而你却一定要认为，你的种属绝不能消灭，一切都遵循着一般的法则改变着，唯独你应当例外！”（*Système de la nature*, Londres 1781, I sv., str. 74 - 75. [参见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而狄德罗说：“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以前的那些动物种类呢？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人类以后的那些动物种类呢？一切都在变，都在过渡，只有全体不变。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Le Rêve de d'Alembert, Oeuvres philosophiques*, Paris 1956, str. 299 - 300. [参见狄德罗：《达朗贝的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2页。——译者注]）

出来了。爱尔维修指出,长期不变的地理因素不能说明社会变革的动向。他指出了国家政体和社会环境的意义。洛克的经验论在这里已经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得到彻底贯彻。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性格。^①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在社会结构和政权的问题上,当时工业、商业和国际经济联系的蓬勃发展不能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发生影响。例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文艺沙龙的成员 G. 雷纳耳(G. Raynal)就已经看到,经济繁荣决定文化繁荣,意大利和荷兰文艺复兴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② 沃尔涅(C. F. Volney)也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影响,并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了阶级的作用,巴尔纳夫(J. Barnave)则继承了雷纳耳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所有制在各种社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我认为,总体看爱尔维修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最深刻,他在《论精神》和《论人》等著作中,已经尝试着做了某些概括,并最接近于唯物史观。大家知道,在《论人》中爱尔维修提出了关于荒岛、人口增殖、采取新的经济活动方式、货币的出现、富裕和贫困等等假设。而在《论精神》中,他得出了下列天才的概括性结论:“所以很明显,假定是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里,文明都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完善程度。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从它的语言中删去以使用我们双手为前提的弓、箭、网等语词,那它在精神方面,就一定大大地不如某些只有不到二百个观念,只有不到二百个语词表达其观念,因而其语言与禽兽一样只归结为五六种声音或叫声的野蛮民族。”^③

① “经验向我们证明,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是随着他们政权的形式而改变的;各种不同的政权可以使同一个民族的性格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善变;有时勇敢,有时胆怯。”(Helvétius, *De l'homme*, Paris 1909, str. 206.)

● 参见《从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移居和经商之时起的哲学和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Paris 1780)。

● Helvétius, *De l'esprit*, Paris 1909, str. 18. (参见克·阿·爱尔维修:《论精神》,《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4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从来不曾通过自己最光辉的代表达到过这样高水平的批判精神、革命热情、历史创造性和思想洞察力。这是新思想和新探索真正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整个18世纪都受到这些启蒙运动者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在一切国家中,在资产阶级准备在人类永恒的历史长剧中起主要作用的时候,都曾起过鼓舞的作用。

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并特别高度评价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这些方面,恩格斯在晚年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①

这无疑是一种变革和革命思想的最充分和最明确的表现,这种思想不仅是改变欧洲的面貌,而且是改变欧洲的精神的种种事件的先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被直接继承下来,并通过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而在历史上发生作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

^① F. Engels,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Berlin 1962, *Werke*, sv. 19, str. 189 - 1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译者注)

者,特别是在历史方面,获得了新的重要的认识。

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在当时的德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虽然方式不同并具有很多特点。当时德国尽管处在极少有可能采取具体的历史性行动的形势下,但也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新的资产阶级的人的呼声和意愿。从中世纪末起,德国的特殊历史、中央皇权的削弱、普鲁士贵族和市民阶级在经济上的竞争、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后果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德国的四分五裂,不存在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存在强大的市民阶级和统一的民族意识。当它的西方邻国已经把革命的思想变为武器的批判的时候,德国的市民阶级还遭受着妄自尊大和原始野蛮的专制贵族的专横统治,因而在这种受压制的环境中和无出路的形势下,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了信心,变得庸俗不堪。^①

29

在18世纪,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各邦君主还在把农奴卖给英国充当到美洲去打仗的炮灰,他们仍然统治城市、任命市政局成员、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毕竟开始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他们不可能对那些在西欧带来了思想自由、经济繁荣和政治开明的历史事件,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① 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的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Pismo P. Ernstu od 5. Juna 1890, K. Marx i F. Engels, *Odabrana pisma*, Zagreb 1955, str. 3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译者注])年老的歌德也有同样的看法,例如他在1828年3月12日同埃克尔曼的谈话中说:“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过早地使我国可爱的青年驯顺,从他们身上驱除一切天性、一切独创性、一切野性,以致最后在他们那里只留下庸俗。”(约·彼·埃克尔曼:《歌德谈话录》[J. P. Eckermann, *Razgovori s Goetheom*, Zagreb 1950, str. 160-161.])

因此在当时德国的文学和哲学领域中,最优秀的人物也同样受到欧洲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哺育。只不过上述情况使得他们的思想在美学和思辨的领域中得到了更高的升华,并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克洛普什托克(F. G. Klopstock)、维兰特(Ch. M. Wieland)、莱辛(G. E. Lessing)、歌德(J. W. Goethe)、赫尔德(J. G. Herder)、席勒(F. Schiller)的文艺创作,不仅包含着对以往的状况、思想和感受的直率的和含蓄的批判,而且以其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而成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中开阔人的思想和克服民族局限性的根本前提之一。

30 资产阶级意识的历史性批判,在法国激进的形势下表现为激进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在德国不发达的情况下则只能表现得更加间接:哲学是测定一定历史气压度数的最可靠的气压表,在这个领域中,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教条主义,建立新的哲学方法——辩证法,抽象地宣布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提出新的伦理原则和关于人格尊严的新观点。在所有这些方面,康德的哲学是报道新时代和新精神来临的第一个使者。

任何代表历史进步的意识,特别是代表革命的意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必然要求具有批判性、认识的确切可靠性和主观的能动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批判性表现于否定整个以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在德国,这种激进性只能在现存的思想体系的内部实现。但是,既然它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意图,那么在各种社会力量公开激烈冲突的形势下,它必然也基本上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同样的思想。

这无疑是康德对英国经验论的相对主义和莱布尼茨-沃尔弗的唯理论的教条主义感到不满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这一教条主义直接进入神学的领域并且成了神学的前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若干重大的特点:它承认现实的客观性(这在经验论那里却是一个问题),它企图确定和证明我们的认识的绝对性(尽管是在现象领域),从而以批判的方式解决哲学中流传千百年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即把这个问题断然移入主观的领域。

康德在解决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时,仍然使主体和客体脱节。而且自在之物、本体,是理性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关于存在上帝的一切传统的证据,在康德的批判中得到了否定的评价。他的先验原理意味着主观领域的能动性,虽然它仍以一般意识为前提,这种一般意识也可能具有某些神学的属性,例如在后来的新康德主义中就是如此。^① 所以他以先验的原理宣告了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的特殊的、勇往直前的、真正惊人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确实是令人赞叹不已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发展的最后和最高代表人物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史中正是强调了康德的这个因素。^②

31

康德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创立的伦理观。尽管康德在这一尝试中仍然使存在和需要脱节,但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用自己的绝对命令提高了人的尊严和人格尊严,从而正是在哲学上反对使人处于人身依附状态和把人当作单纯工具的现实。毫不奇怪,康德哲学的这个因素后来也可以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尽管这种观点同某种精心设想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能结合的,但是在使马克思主义较多地关心历史存在本身这一点上则是有帮助的。

从德国哲学以后的整个发展中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形势是有利于更加突出地强调主体这一情况的。不应忘记,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哲学中几乎一切重要代表人物,都站在美国解放力量一边反对英国统治,同样也都热情地祝贺法国大革命事件。爱好自由和英勇无畏的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在他那里,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获得

● 这特别表现在19世纪末威·文德尔班的著作《序曲》中关于“神圣之物”的概念中。

② “这是康德哲学的伟大的一面。康德指出,思维本身是具体的,具有着先天综合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是从知觉中创造出来的。这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伟大的。”(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ämtliche Werke*, sv. 19, Stuttgart 1959, III, str. 558.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了可能达到的最激进的表现。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原理完全能够论证主体的绝对自由,同时足以得出可能获得的知识的基本体系。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特殊的里程碑,它对整个19世纪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二元论是矛盾的,是对主体的自由和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是多余的前提,因为在康德那里,先验的领域也是本质的、规律性的、普遍的和成型的东西的体现者。因此,费希特抛弃了不是绝对的“自我”所内在固有的一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教条主义,并建立真正的批判哲学。绝对的“自我”成了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上级决定的级别,从而也是绝对的品级。因此,如果需要从绝对的“自我”出发介绍哲学的全部内容,那么除了演绎法以外,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做到这一点。可见,费希特的哲学已经提出了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本质,而这正是思辨方法最伟大的能手黑格尔特别重视的因素。^①从绝对的“自我”出发,通过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得出了逻辑范畴;费希特用概念的辩证对比、相互限制、否定、综合等方法完成了这一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思辨演绎的实质以及辩证法的某些基本要素:否定的原则、在辩证的意义上理解扬弃(aufheben)^②、对立统一的观点、作为否定的肯定的辩证观点等。尽管这些都是在绝对主体的抽象领域中提出的,而且没有经过黑格尔的丰富的现实的充实,但是若没有费希特的这一番努力,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宏伟结构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在哲学向前发

^① “费希特的哲学却有一个大的功绩,他促使我们注意到一点:即须揭示出思维范畴的必然性,并主要地推演出范畴的必然性来。——费希特的哲学对于逻辑的方法至少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说,他曾昭示人,一般的思维范畴,或通常的逻辑材料,概念,判断,和推论的种类,均不能只是从事实的观察取得,或只是根据经验去处理,而必须从思维自身推演出来。如果思维能够证明什么东西是真的,如果逻辑要求提出理论证明,如果逻辑是要教人如何证明,那么,逻辑必须首先能够对它自己的特有内容加以证明,并看到它的必然性。”(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Leipzig 1930, str. 69.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② 例如:“某种程度的限制意味着不是通过否定完全地扬弃,而只是部分地扬弃这种现实。”(约·哥·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J. G. Fichte,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Leipzig 1922, str. 29.])

展的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为客体恢复名誉。而这由谢林来完成了。

费希特完全没有这种打算。他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理所当然地演绎出心理的领域,以便在第三部分即对他来说是根本的部分——关于实践的部分解决“自我”和“非我”的矛盾,即“自我”的存在是完全自觉的,它决定“非我”即客体,它内在地扬弃“非我”,这就构成了经验的“自我”的实质和它的伦理活动。费希特想这样来创立绝对自由的哲学。主体再也不会害怕某种只是它的自身事业的事。它不仅是决定论体系的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是绝对的品级、绝对的活动、绝对的自由。

33

尽管这是唯心主义的极端抽象的哲学,它实质上解决了人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自由问题。虽然费希特在这一设想中远远离开了目标,但是他的哲学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思辨叙事诗,这个方面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历史使命和自由。

在创立某种历史辩证法方面,费希特也是黑格尔的先驱。^①在他所处的不发达的庸俗的时代里,他由于无神论和革命思想等还受到攻击和指责。但是,在被占领下的德国,除了费希特以外,没有别的人在柏林向德国人民发表演说,号召他们争取自由。^②

谢林企图跳出费希特的绝对主体的范围;这也是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综合体系的一个必要环节。费希特的“自我”成了客观和主观统一、现实和思想统一的绝对者。这种永恒作用表现在自然界中的现实方面,由自然哲学来表述;而表现在“自我”、智能和历史中的思想方

① 约·哥·费希特:《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J. G. Fichte, *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 1806)。

② 约·哥·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J. G. Fichte, *Di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7—1808年在柏林发表的演说, 1808年出版。

面,由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来表述。^①

34 自然哲学的根本任务是从自然界出发,在现实的东西中说明思想的东西,从而认清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与理智统一的。先验哲学从“自我”出发,演绎出自我意识的全部内容。在“自我”中,主体和客体最初是对立的,这只不过是两者对立但绝不能彼此消灭这一情况的反映,因为每一方都只不过是另一方的对立面。因此,哲学是具有不同时代的自我意识的历史。

在先验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谢林把各个时代系统化了,以便在实践哲学中演绎出法律制度、国家和历史,在实践哲学中,理智作为意志的自我规定在自身之外发生作用。历史作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绝对者的逐渐表现,本身也分为三个时代。自我意识的全部发展,由艺术、法律的和完善的国家机关、哲学文献来完成,哲学文献也就是观念表现为精神的最高方式。

谢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哲学,存在着许多辩证地观察问题的因素:运动的相对性、作为世界普遍规律的分化规律、对立规定性的统一、质和量的关系、决定论问题等;而他在先验哲学中试图说明作为某个历史时代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谢林哲学的青年阶段对于黑格尔哲学完成综合整个非凡的精神发展过程的意义。

因此,我们最好引用黑格尔本人叙述他过去的亲密朋友谢林的哲学优缺点的意见,然后进而论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起了最大作用的哲学。黑格尔说:“在谢林那里着重提出来的是理念本身,即真理是具体的,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每一阶段在体系里都有自己的形式;最后的阶段就是各个形式的全体。谢林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在自然哲学里,他曾经指出了自然里的精神形式:电、磁都被他看成只是理

^① 弗·威·谢林:《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想法》(F. W. J. Schelling,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797),《先验唯心主义体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 1800),《我的体系介绍》(*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1801)。

念、概念的外在方式。谢林哲学的主要之点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内容是真理,而真理是被了解为具体的。谢林哲学具有一个深刻的思辨的内容,这内容,作为内容来说,也是整个哲学史所从事探讨的内容。思维本身是自由的,但不是抽象的,而是本身具体的:思维把握住自己在自身内作为一个世界,但不是作为理智的世界,而是作为既是理智的,又是现实的世界。自然的真理性、自在的自然为理智的世界。谢林曾经抓住了这个具体的内容。”^①而关于谢林哲学的缺点,他写道:“缺点在于这个理念一般以及这个理念的规定和这些规定的全体(这些是理想的和自然的世界所给予的)并没有通过概念自身予以必然性的揭示和发展。它缺乏逻辑发展的形式和进展的必然性。理念就是真理,一切真的东西都是理念。这必须予以证明,而且理念之系统化为世界,或者世界作为理念的揭示和启示,必须得到证明。由于谢林没有掌握住这一方面,所以就丢掉了逻辑的东西和思维。因此理智的直观、想象力、艺术品便被理解为表达理念的方式:‘艺术品是最高的和唯一的方式,在其中理念成为精神的对象。’但是理念的最高的方式乃是它自己的因素;思维被概念把握着的理念是高于艺术品的。”^②

在这些思想中阐述了黑格尔著作的目的和基本意图。我们已经简略地指出过,黑格尔是这一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天才的实际完成者,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起最大作用的思想家。没有他就不会有大家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但同样,若没有黑格尔以前的一代人在思想上所做的大量努力,若没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和获得的知识,黑格尔的著作也是不可想象的。

^①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ämtliche Werke*, sv. 19, Stuttgart 1959, III, str. 682 - 683.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1页。——译者注)

^②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ämtliche Werke*, sv. 19, Stuttgart 1959, III, str. 683.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1-72页。——译者注)

从黑格尔的神学成见或从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出发来解释他的辩证法,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包罗万象的辩证观点的某些动机和补充因素。辩证观点的根本来源,首先就是德国哲学以往的发展提供的成果和所研究的问题。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已经提出了思辨演绎原则、辩证法的许多因素、自我意识的时代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这是黑格尔体系的基础)的重要因素,事先都曾被研究过,否则黑格尔的著作就会令人惊讶得不可理解。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和社会以最紧密的方式有机地和综合地处于辩证的分析 and 考察中。特别在历史、社会、政治以及历史意图等方面,黑格尔都超过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

在这里,由于导言式的论述和介绍不允许我们做详尽的分析,因此我们将只限于提到黑格尔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过特殊作用的某些重要因素。①

谢林之后,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已经再也不能本着康德的二元论或费希特的主观主义精神来解决。同一哲学的基本思想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没有从它的必然性中推导出来和加以说明。这种认识成了黑格尔的主要努力和主要愿望,即从统一的、原初的、理想的原则(它已经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中得出整个现实世界。这样一来,客观和主观脱节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像在费希特那里那样,一切客观的东西在先验的主体中升华了。从原初的绝对的统一即绝对观念中,应当得出世界的全部根本内容,应当说明这一过程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必然的。

他在《逻辑学》中写道,自然、历史、精神的全部现实性都是“精神的运动”,“概念的内在发展”,辩证法不仅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

① 在马克思主义书刊中,对黑格尔的哲学做了最卓越和最详尽的分析的有:赫·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1948),恩·布洛赫的《主体-客体》(Ernst Bloch, *Subjekt-Objekt*, 1952)。

而且同时也是认识的绝对方法。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很伟大的,它说明,哲学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某种脱离内容的外在的东西,不是某种技巧性的或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这就是说,辩证法是观念以及作为观念的另一存在的一切外在的和对象性的东西发展的同一道路,也是认识的绝对方法。●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和《美学》中叙述了作为精神的绝对的东西表现的全部丰富内容。他在《逻辑学》中,在迄今最广泛和最深刻地概述辩证法和分析“纯粹本质”中,谈了作为逻辑和方法论的辩证法的全部丰富内容。他在《逻辑学》中说:“我在《精神现象学》里,曾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表述意识。意识就是作为具体的而又被拘束于外在的知的精神;但是,这种对象的前进运动,正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一样,完全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粹本质的本性为基础的。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己在途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性之后,就变成了纯知,这种纯知即以那些自在自为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它们就是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它们的自身运动就是它们的精神生活,科学就是通过这种精神生活而构成的,并且科学也就是这种精神生活的陈述。”③

《现象学》是一本意义特别重大的著作,因为黑格尔在这本书中辩

①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ipzig 1932, str. 7.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页。译者注)

● 他在《逻辑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说明:“这个方法就是关于逻辑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意识。”(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ipzig 1932, str. 35.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译者注])他在叙述了自己的否定辩证法的观点并提到他知道他的方法在细节上还有待改进之后,得出结论说,他“同时却也知道它是唯一真正的方法。从这个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看来,这一点是自明的;——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在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显然,没有一种可以算做科学的阐述而不遵循这种方法的过程,不适合它的单纯的节奏的,因为它就是事情本身的过程”。(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ipzig 1932, str. 36.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译者注])

③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ipzig 1932, str. 7.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页。——译者注)

证地说明了各种意识形式(从直接的感性认识到绝对知识)的发展,以统一的方式指出了人的精神和作为其基础的关系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在这一著作中已经提出了人是其本身的活动即劳动的产物的观点,虽然是以抽象的思辨的方式提出的。而这一思想正是青年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因素。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这部著作时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①

黑格尔天才地看到,人的历史是一分为二和异化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这种异化的扬弃,是意识到异化在艺术、宗教,最后在哲学的各种形式中的存在。由于黑格尔最初把人理解为意识,《现象学》是关于意识的这种发展和表现的科学,因此异化归根到底也只是抽象地在意识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Zagreb 1967, str. 320.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中加以扬弃。^① 同样,必然地和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理想的基质、精神性,必然具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的结果,即关于自身是一切运动和发展的基础、本质和实体的绝对认识。“精神的具体存在作为意识具有两个方面:认识 and 与认识处于否定关系中的客观性。精神自身既然是在这个意识因素里发展着的,它既然把它的环节展开在这个意识因素里,那么这些精神环节就都具有意识的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它们就都显现为意识的形象。叙述这条发展道路的科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实体和实体的运动都是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而被考察的。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不外乎是它的经验里的东西;因为意识经验里的东西只是精神的实体,即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但精神所以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而经验则被认为恰恰就是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即是说,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②

39

① 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的基本错误时,指的正是这一点:“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II](见第 XIII 页)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str. 31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3 页。——译者注])

② 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1962, str. 32.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265-66 页。——译者注)

另一方面,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逻辑学,即关于这些“理想本质”(范畴)的辩证发展的学说。书中不仅对范畴做了非凡的深刻的分析,而且发展了辩证思维的一切重要形式(当然包括某种特定的历史实践的形式)。辩证法的原理和规律:否定性、对立性、量和质的关系、总体、否定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缜密的研究,并成为后来在对辩证法做唯物主义解释时可以简单地接受过来的原理。此外,直到今天也没有对这些原理补充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

在这篇简短的导言式的叙述中我们只是提到,从黑格尔的同一哲学的全部观点中应当看到,思维形式并不是对于不可捉摸的自在存在的先验形式,也不是仅仅适应于内容的我们意识的空洞形式,而实质上是内容本身的“灵魂”,是个别中的一般。关于逻辑和逻辑因素的本体论观点,无疑是理解思维和实践可能存在的关系的基础,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深刻和最有思想内容的解释。由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在别的地方还将谈到,现在可以总结说,黑格尔的著作是哲学史上最宏伟的尝试之一。他的体系被后来的发展所超越。对他也可以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指责和批判。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哲学标志着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时代,是说明人类伟大创造力的智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19 世纪初的德国

上述一切都是人类的思想 and 创造力的伟大成果。马克思的研究和努力,如果没有受到这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不考察这些天才的观点和观念,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人类进步的这条道路上,而不是在它之外,也不能绕过它,马克思的天才,经过他青年时期的紧张的努力,才解决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在很多方面对人类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的重大问题。从有关的直接科学基础来看,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就里,集中并进一步发展了欧洲思想的主要进步流派,对于它们我们只是简短地提一提,其中某些流派以后还将谈到。

这种新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全面的理论基础或前提本身令人信服地表明,它们的创造者深切地关注当时人类的根本的决定性的问题。

上述前提的大部分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蓬勃发展和它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的时代由资产阶级人物创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普鲁士的公民,也是在德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日益意识到本身的历史作用,也就是意识到西欧资产阶级在17世纪和18世纪蓬勃发展的时代里曾经轰轰烈烈地和富有“民主”色彩地起过的作用。

但是,在荷兰、英国或法国,由于各种情况的适当配合,资产阶级当时已经统一起来,并且强大得足以反抗过去的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可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初,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仍然感受到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贵族本身的经济竞争(尤其在普鲁士)、德国各邦的长期割据以及拿破仑的占领所造成的后果。拿破仑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性行动的精神和结果,但是他的占领也有其相反的一面。由于这种占领,再加上其他情况,特别是他在俄国的失败,推动了德国群众的起义。1813—1815年人民的这种革命情绪,又被德国社会中最反动的部分即封建贵族所利用,这就进一步抬高了他们在德国人民中的威望。

41

尽管存在这些事实,但是19世纪最初几十年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对德国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施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法令,城市终于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农民开始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虽然只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得到解放,贫苦农民则成了德国容克地主庄园的雇佣工人),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也被迫在

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允诺要颁布宪法。●

正当拿破仑失败后人人期待出现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复兴时期的时候,欧洲的反动势力却赐给自己的臣民一个神圣同盟。在近代,神圣的称号始终是一切反动势力蛊惑人心的装饰品。

普鲁士的封建反动派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诺言。可是,德国的生活已经不再像50年前那样了。资产阶级,特别在莱茵地区,正处在不断壮大的时期。对不久前的往事的鲜明回忆,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使得德国,特别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气氛和思想气氛日益活跃起来。当时封建反动派还相当强大,足以压制一切比较重大的政治示威或政治要求。因此,1817年的瓦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哈集会,都没能获得直接的效果,虽然它们唤醒了沉睡中的德国公民的政治觉悟。

42 特别是在巴黎七月革命(1830年)以后,反对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巴黎事件在德国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它首先受到了德国思想复兴运动的两位倡导者——路·白尔尼(L. Börne)和亨·海涅(H. Heine)的热烈祝贺。

七月革命后他们的巴黎来信和报道,对革命青年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②在他们的影响下,德国文学界掀起了一个名叫“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的新运动,参加者有:卢·文巴尔克(L. Wienbarg)、卡·谷兹科夫(K. Gutzkow)、亨·劳贝(H. Laube)、泰·蒙特(Th. Mundt)等人。他们和以往的作家不同,要求在文艺创作中贯彻政治利益,主张文学与生活相结合,争取妇女解

① 1807年的施泰因法令废除了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但是,农民对封建主的义务并未全部取消,而1811年、1812年和1816年的哈登堡声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施泰因法令。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对于在农村中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开始实行众所周知的特殊的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毕竟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些改革是拿破仑作战时期普鲁士艰难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必终结果。

② 指白尔尼(L. Börne)的著名的《巴黎来信》(Briefe aus Paris, 1832—1834)和海涅的《法国状况》(Französische Zustände, 1833),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

放；而在政治上他们是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白尔尼和海涅对“神圣德意志帝国”及其封建君主的猛烈抨击，以及他们利用种种机会对那些不合政治潮流的、妄自尊大的和不学无术的封建臣仆的指责，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普鲁士反动派是绝不会在国内长期容忍这种思想上的叛逆的。

由于沃·门采尔(W. Menzel)对自己过去的朋友、上述整个文学运动的领袖谷兹科夫进行了告发性的攻击，于是迫害就开始了。德意志联邦于同年即1835年颁布法令，禁止印刷和出售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的作品。

虽然这个运动被这样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一切对那些心中怀着自由、民主和至少是立宪思想的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人在德国日益增多了。

哲学革命及其后果，在德国则具有深远得多的影响。

正如海涅早已天才地预见到的，黑格尔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的哲学生活是在黑格尔著作的影响下度过的。1831年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就分裂为所谓左右两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施蒂纳、科本[C. F. Köppen]、梅因[E. Meyen]、鲁滕堡[A. Rutenberg]、奥本海姆[D. Oppenheim]）和正统黑格尔派（盖伯勒[G. Gabler]、辛里克斯[H. F. W. Hinrichs]、格歇尔[K. F. Göschel]）。

通常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即他的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使得后人有可能或者发展他的哲学的这个方面，或者发展他的哲学的那个方面。的确，正统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体系的全部保守观念，并把它进一步教条化；可是另一派却没有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除外），而是发展了他的体系的一个部分，首先是他

43

① 海涅在其著名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4)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哲学革命结束了。黑格尔圆满地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事业。”《海涅全集》第4卷(*Sämtliche Werke*, izd. Elstera, IV, str. 290)

的宗教哲学。^①

黑格尔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哲学方面进行了特别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因为这个领域对他们来说是理论上最容易入手的,同时也是与他们的自由观直接对立的。此外,通过批判宗教,进而通过对当时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教会组织的批判,可以比较顺利地表述自己的新观点,因为在政治领域,统治势力仍然几乎不允许提出任何批评。而且,黑格尔也为他们批判地考察和分析宗教哲学领域,留下了相当多的材料。

黑格尔对宗教现象的看法,实质上是反对有神论的。在他看来,宗教是认识绝对、认识绝对观念的因素之一,其实也就是对他哲学中这种实体精神要素的绝对自我认识。在这种绝对观念的认识观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唯理论在这里也占着优势,因为他认为哲学的认识比宗教的认识更重要。在他看来,艺术的认识是通过个别来认识绝对的第一阶段,宗教的认识是以已经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形式来认识绝对观念,而只有在哲学中,绝对观念才达到绝对知识的最高阶段。^②

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既综合了斯宾诺莎的因素,又综合了费希特的因素,既综合了作为一切生活和生活现象的实体的绝对观念的因素,又综合了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因素。

黑格尔左派除了借助于抽象的哲学外衣,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

① H. 施图克(H. Stucke)在《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Tat*, Stuttgart 1963)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一切青年黑格尔分子都列为黑格尔死后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左派,也不能把所谓老年黑格尔分子都列为这一运动的右派,因为在前者和后者的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此外,施图克对采什科夫斯基(A. Cieszkowski)的评价,也不同于奥·科尔纽(A. Cornu)和R. 劳斯(R. Lauth)所做的评价。

② 黑格尔明确地指出:“精神本身自为地对象化的形式和方式,就是观念;这一因素是像宗教这样的绝对意识的形式。相反,如果精神不是在观念形式中而是在思想形式中意识到本身,那么这种意识便是哲学。”(《宗教观念》[*Begriff der Religion*, Leipzig 1925, str. 67], 1925年莱比锡版第67页)他还写道:“我们看到,在观念中根本的内容是以思想的形式提出的,但还不是作为思想而提出的。观念对待感性的和映象的东西是消极的,但也不是绝对地摆脱感性的东西,而是在观念上充分地提出这种感性的东西。这是只有在实际思维中才会发生的事情。”(*Begriff der Religion*, Leipzig 1925, str. 115)

自己的进步愿望和思想,因此,他们把全部争论都完全转移到这个领域中,并在哲学和宗教的对立中看到了当代的基本矛盾。

大·弗·施特劳斯(D. F. Strauss, 1808 - 1874)以其划时代的著作《耶稣传》(1835年)发展了前面的这个实体的因素,认为基督教是最初的基督教徒团体的自发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神话性质。

施特劳斯在初版序言中写道:现在已经到了不该再用老一套超自然的和自然的方式考察耶稣历史的时候了,应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神话。但是神学家不能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东西,即“他们没有使精神和思维从内部摆脱一定的宗教和教条的前提,而作者通过哲学研究早已做到了这一点。神学家可能认为,这部著作中缺乏这些前提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而作者却认为,他们著作中的神的前提是不科学的”^①。这里已经流露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以往的批判工作。

施特劳斯在这一著作中以出色的分析证明,《圣经》中的一切信条几乎都是不可靠的和荒诞无稽的,因此他把它们称作神话。从耶稣降世和诞生、魔鬼诱惑、创造奇迹直到耶稣复活——所有这一切都通过机智而扎实的分析被宣布为神话,于是施特劳斯在最后做出结论说:“因此,迄今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破除了基督教徒对耶稣的信仰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部分,消除了基督教徒由上述信仰而产生的一切鼓舞,并夺走了基督教徒的一切安慰。”^②

除了这种无疑是“渎神的”神话理论以外,施特劳斯还对《福音书》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中许多地方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合逻辑的,从而否定了它们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他的这些做法对进步的思想家

45

^①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D. F. Strauss, *Das Leben Jesu*, Tübingen 1840, I sv., str. IV)。

^②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D. F. Strauss, *Das Leben Jesu*, Tübingen 1840, I sv., str. 663)。

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不待说,人们对这两大卷书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而施特劳斯本人也因此失掉了自己的职位。

与施特劳斯的神话论不同,布·鲍威尔(B. Bauer, 1809 - 1882)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批判复类福音和揭露基督教真相中,创立了自我意识哲学,宣布一切福音书都是个人的作品,而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基本动力。^①

早在30年代中期,鲍威尔就已经在《科学评论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35, 1836)上批判施特劳斯,但是在30年代末,特别是同亨斯滕贝格(E. W. Hengstenberg)展开论战后,他倒向黑格尔左派,并很快成了自我意识哲学的创始人。在他那里,黑格尔的观念、实体成了应当批判地消除和克服人在宗教中所处的异化状态的自我意识。在基督教中,人遭到最深刻的异化。自我意识,即批判的批判,应当消除一切传统、信仰、异化,这是人的解放的基本先决条件。鲍威尔彻底抛弃宗教,走向无神论。

由于施特劳斯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观念是实体的观点,因此鲍威尔和施特劳斯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和“实体”争论的形式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后来同鲍威尔的论战中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上述争论的实质,他说:“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

^① 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aptiker*, 1841 - 1842),《基督教真相》(*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1843)。鲍威尔认为,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合而为一,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也是他的哲学的弱点、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鲍威尔认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在于克服这种两重性,他主张或者采用实体因素,或者采用自我意识因素。他说:“或者是自我意识必须重新销毁于实体的火焰中,也就是说必须确立并保存纯粹的实体性;或者必须指明个性就是自己的属性和自己的本质的创造者,指明一般个性的概念本来就要对自己加以限制,然后又消除个性由于自己的普遍本质而加上的这种限制,因为正是这个本质只是个性的内在的自我区别的结果,只是个性的活动的结果。”(布·鲍威尔,《评路·费尔巴哈》[B. Bauer, *Charakteristik L. Feuerbachs*, 1845],转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GA, Berlin 1932, sv. V, str. 6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2页。——译者注)

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立足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鲍威尔立足于费希特主义的观点，两人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他们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要素之中的每一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都由于另一个要素的渗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们使每一个要素都进一步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阐释。——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体系，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①

强调“自我意识”这个因素无疑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在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人士的自我意识日益发现，本阶级已成为国内的主要因素，并正在迎接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他们看到，自我意识哲学无疑要比黑格尔哲学中仅仅作为绝对发展的一个因素的个人意识，能更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地位和愿望。

但是，在30年代末，德国哲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发展和批判地对待黑格尔哲学时，达到了唯物主义。这就是路·费尔巴哈(L. Feuerbach, 1804 - 1872)。他在早期著作《论死与不死》(*Mislina o smrti i besmrtnosti*, 1830)中就已经倾向于对黑格尔的同一哲学做自然主义的

47

^①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str. 14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342页。——译者注)

解释,结果抛弃了关于灵魂不死的信仰。●

费尔巴哈当时就已经流露出生活的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歌颂生活的伟大。这种现实的生活是基础,这是永恒的无止境的生活,是不朽的。费尔巴哈的这个黑格尔阶段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那时他发表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文章,表明他想超越黑格尔和一切唯心主义。在费尔巴哈看来,辩证法并不是思辨同自身的独白,而是思辨和经验的对话;同存在的对立无非是感觉到的存在;只有那种有自由和有勇气对本身表示怀疑的哲学才是没有前提的哲学,而一切最新的哲学都以本身是真理为出发点。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总体的现实的科学,而现实的根本内容是自然界。“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这些自然物,渴望彼岸的幻想的思辨者是踏在脚底下的。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把自然了解成与道德上的自由相矛盾,是错误的。自然不仅建立了平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②

这里也已经包含了费尔巴哈的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的要点。由于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关于自己的无限本质的意识,因此它实质上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

① “灵魂尽管是非肉体的,但毕竟不是没有自己肉体的灵魂,就像主人不是没有农奴的主人,目的不是没有手段的目的。灵魂对肉体的关系,就像火对物质的关系;肉体是灵魂的灯芯,灵魂的食品;没有物质也就没有火;因此可以说,火取决于自己的物质,必然同物质相联系,物质是火的工具;但是,由于火消耗和毁灭物质,火是物质的主人,比物质更有力。但是,当烧过的物质什么也不剩下的时候,火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同样,一定的灵魂、某种特定肉体的灵魂也随同它的一定肉体而消失。”(路·费尔巴哈:《论死与不死》[L. Feuerbach,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Leipzig 1876, str. 57 - 58])

② L. Feuerbach,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1839),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Leipzig 1846, str. 231(参见路·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页。译者注)

的。尤其是因为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心。●

由此可见,宗教作为关于上帝的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这还不等于说,信教的人直接意识到了他的宗教实际上是关于他的实质的自我意识,因为正是缺乏这种意识构成了宗教的真正的实质。可见,宗教基本上是人对自身的关系。上帝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的批判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指出,宗教现象的实质是人一分为二,他的实质对象化和异化,即他的实质具有了神的属性和彼岸的属性。“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人把自己看做对象;不过是作为一个对象的对象,即另一个存在者的对象。在这里就是如此。人是上帝的对象。……上帝是人之特选出来的最主观的、最固有的本质;人不能由自身而行为,一切的善都来自上帝。上帝愈是主观、愈是属人,人就愈是放弃他自己的主观性、自己的人性,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被放弃了的、但同时又重新为人所占有的‘自我’。”②

48

由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现象的全部观点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因此他的同时代人把他的著作主要理解为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而没有想到作者的意图是截然相反的。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写了哲学改造的纲要,以简练的格言式的笔调

● 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费尔巴哈回答说:“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83, str. 36. [参见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2—8页。——译者注])

② 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83, str. 71. (参见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5—8页。——译者注)

更清晰地说明了自己不同的立场和意图。^①

49 纲要的第一条就已进一步阐述了《基督教的本质》中的问题,更明确地表述了费尔巴哈对待宗教和思辨哲学的态度。费尔巴哈写道:“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②

纲要既反对宗教,又反对思辨哲学。应当用来改革思辨哲学的方法,与用于宗教哲学的方法没有区别。这就是所谓把这种哲学颠倒过来,让它脚着地。个别是基本的、真实的,是主语,而思想是谓语。因此,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确定的、真实的。没有有限,无限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因此,以往思辨哲学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是颠倒的。费尔巴哈尖锐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是宗教的最后的理性支柱,并得出结论说:“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语,思维是宾语。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虚无的、无意义的。”^③以上就是这个著名的纲要以及同一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未来哲学的纲要的基本思想。至于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我们

① 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写于1842年,而于1843年发表在阿·卢格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c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中。他本着同样的精神还写了《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

② L.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str. 244. (参见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1页。——译者注)

③ L.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str. 263. (参见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译者注)

在分析马克思的著作时将有机会谈到。尽管存在这种局限性,但它是在当时专制主义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笼罩天空的情况下最先提出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关键因素。虽然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同他所批判的前人比较起来要贫乏得多,但是他批判宗教现象的新因素以及他同唯心主义的断然决裂(尽管有片面性),使他永远成为德国和欧洲的哲学和文化中的重要人物。^①

第一部分

^① 对当时的历史事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长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做了详尽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有:弗·梅林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I—4卷(F. Mehr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 I—IV, 1902),《德国社会民主党史》I—4卷(*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IV, 1897—1898),《马克思传》(K. Marx, 1918)以及关于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研究著作;古·迈耶尔(G. Mayer)的《恩格斯传》I—2卷(*Friedrich Engels*, I—II, 1934);奥·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I—3卷(附有详细的书目)(*K. Marx et F. Engels*, I/1955, II/1958, III/1962)。在我国的著作中可参见我写的《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Misaoni razvitak Karla Marxa*, 1953);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请参见保尔·卡埃吉(Paul Kaegi)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65),大卫·麦克利兰(David Mc Lellan)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Karl Marx,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1973)。

第一部分

卡尔·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章 革命唯心主义时期

(1837—184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这个地区在19世纪初不仅经济最迅速地蓬勃发展,而且在拿破仑占领时期进行了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马克思在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在这个地区可以最强烈地感受到法国革命的精神,农奴制被废除了,城市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对这个地区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施拿破仑《民法典》,这在法律上标志着绵延千百年的封建关系时期的结束。

经济蓬勃发展不仅摧毁了旧的行会,而且克服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状态。例如,正是在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资产阶级使普鲁士全境成为统一的关税区。他们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自己狂热的代言人,并且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在30年代初结成了有德国18个邦参加的关税同盟。

但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艰难处境。因此,正是在德国的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社会批判。正好在马克思的故乡,加尔(L. Gall)在《需要救济什么?》(*Šta treba pomoći?*)一书中提出了抗议,稍后,毕希纳(G. Büchner)和魏迪希(F. Weidig)散发了《告黑森农民书》(*Der Hessische Landbote*, 1834)的传单,但它在当时只得到微弱的反应,并且给作者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毕希纳不得不逃亡到瑞士;而魏迪希则被监禁,备受折磨,在1837年自杀。同年富有才华的毕希纳也去世。

54

此外,如果再加上马克思的父亲是犹太人出身的律师(1816年他改信新教),曾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生活在至少要比德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进步和思想更自由的环境中。

1835年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到波恩学习法学;一年以后到柏林,听弗·卡·萨维尼(F. K. Savigny)、亨·斯特芬斯(H. Steffens)和爱·甘斯(E. Gans)的课。甘斯讲授黑格尔法哲学,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对当时的一代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除了学习法学以外,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爱好读了很多书,研究历史和哲学,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诗,开始参加柏林的学术生活和社交生活。

30年代末的柏林,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青年哲学家小组,即所谓“博士俱乐部”,它同时成了一个新的哲学派别——自我意识哲学——的核心。这个青年黑格尔小组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公认为黑格尔的继承者的布·鲍威尔。在他周围有阿·鲁滕堡、爱·梅因、卡·弗·科本、路·布尔(L. Buhl)、卡·瑙威尔克(K. Nauwerk)、康·施米特(C. Schmidt,即麦·施蒂纳[M. Stirner])、布·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尔(Edgar)等人。阿·卢格(A. Ruge)和泰·艾希特迈耶尔(Th. Echtermayer)在1838年创办的《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是他们的文学刊物。^①

马克思很快就成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成了布·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的朋友，因此他在学习上述各学科的同时，开始努力钻研哲学问题。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柏林，黑格尔是一切哲学讨论和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在各种青年黑格尔派别和正统黑格尔派别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这个最初时期保存下来的东西中，除了诗歌笔记本之外，只有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天才的青年大学生力图冲破当时思想牢笼的愿望和努力，他试图形成自己的观点，克服康德的先验论，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但黑格尔的“离奇古怪的调子”他并不喜欢。他写了一个关于《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Kleanthes ili o izvoru i nužnom razvoju filozofije*)的长篇对话，但这份对话没有保存下来。他在信中说：“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②

55

这个时期，马克思详细地了解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主义，参加“博士俱乐部”的讨论，完成法学的学业，准备和写作哲学博士论文。30年代末，在鲍威尔同亨斯滕贝格发生论战之后，教育大臣和黑格尔派的保护人卡·阿尔坦施泰因(K. Altenstein)在右派的压力下，把鲍威

① 施蒂纳的狂热拥护者J. H. 马凯(J. H. Mackey)在《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事业》(*Max Stirn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989)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自由人(Die Freien)的集团，关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请参见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的《从黑格尔到尼采》(*Von Hegel zu Nietzsche*, 1941)。

② *Marxovo pismo oca od 10. Novembra 1837. God. , Odabrana pisma K. Marxa i F. Engelsta*, Zagreb 1956, str. 26. (参见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译者注)

尔调到波恩大学,并打算在短期内把他提拔成教授。鲍威尔从波恩给马克思写信,谈到当时系里的昏庸麻木和学术上受掣的状况,并劝马克思尽快结束考试,到波恩来任教。但是1840年,在阿尔坦施泰因大臣去世后,神学系解除了鲍威尔的职务。如果再加上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和反动的教育大臣约·阿·弗·艾希霍恩(J. F. Eichorn)上台以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放弃了到大学去执教的任何打算。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一起,投入了当时现实的斗争,并利用最初的机会,在完成学业后,开始了撰写公开政论的活动。

1841年初,马克思还同聚集在卡·里德尔(K. Riedel)和爱·梅因两人周围并出版《雅典神殿》(*Athenäum*)杂志的一群激进的作家来往。这个杂志是由“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创办和主编的,在那里刊登了马克思的《狂歌》(*Wilde Lieder*),这是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56

3月底马克思完成了法学的学业,4月初就提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是理解马克思当时观点和主张的最重要的著作。从序言和以后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属于黑格尔的哲学流派,他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突出地强调了自由的问题。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在设想“他的哲学史……大胆的计划”中的宏伟构思和重大意义,“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①,但在解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对希腊哲学史和希腊一般思想的意义时,他有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

这位为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年轻战士只是在若干年后才在自己的著作中为人类开创了新的境界,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

^①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 1963, str. 5.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向天上和人间的一切神灵宣战并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抛弃了普鲁塔克(Plutarb)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企图,满足于休谟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①

在谈到对德谟克利特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时,大家知道,黑格尔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评价远远高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他认为前一种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辨表述,一(Eins)是对自为存在的确定;而认为后一种哲学是下降到人们通常理性的观点和无思想性。

马克思对这两种哲学的评价则正好相反。德谟克利特把感性现实归结为主观的假象,把哲学所不能满足的东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而把必然性当作普遍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从感性认识出发,认为实证科学不是重要的,并且与绝对的决定论相反,承认偶然性和自由。而这也就是马克思同黑格尔的解释的区別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的观点证明了,他把原子的本质规定性和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ung)理解为摧毁盲目必然性的因素。“这就是说,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

57

^①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d 1963, str. 6.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译者注)

应用的范围。”^①所以,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应该表现出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独立和否定的地方,都摆脱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平静。所以善就是逃避恶,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最后,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一切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仍然追随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论点及其在哲学史中的运用,即把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观念性)理解为原子的本质定义,从而基本上和黑格尔一样把观念性阐释为自在存在,但是他已经完全本着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原则,并前进一步,使自我意识本身客观化。

58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知道原子的物质存在、必然和盲目运动,因而没有看到排斥的观念方面、作为自我规定的形式规定。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同时也是自由活动、实践和人的一般自由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虽然仍本着唯心主义的精神,但是已经叙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的某些基调,他写道:“而事实上,直线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它才是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的,即使这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是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

①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d 1963, str. 23.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译者注)

②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d 1963, str. 24.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215页。——译者注)

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①

马克思通过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首先是伊壁鸠鲁的哲学，企图在各个方面不仅深入到哲学的本质，而且探索自己时代的本质。自我意识的观点，归根到底是自由的观点，它主要不在于具有沉思的意义，而在于本身包含了对现实的态度问题。历史实践的问题，虽然仍然贯穿着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但已经是马克思当时系统考察的问题，并成了他全神贯注的根本问题。这在他论文的附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例如，马克思在一条附注中这样叙述这个问题：“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東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

59

^①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d 1963, str. 25.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①

如果再加上马克思当时已经用自我意识来取代神灵,而关于上帝的证明只不过是存在人的自我意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的:向他当时认为历史上不合理的、限制自我意识活动的种种历史势力展开斗争。而他从事这一活动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

马克思回到故乡后遇到了比柏林更加强烈和更加现实的政治风暴。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人们曾对新国王抱有较大的希望。但是,他在统治的初期做出若干自由主义的姿态以后,很快就以其反立宪政体的措施使资产阶级感到失望。这对于一个深受哈勒(C. L. V. Haller)的著作《国家学的复兴》(*Restauracijom državnih znanosti*)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法学派鼓舞的君主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历史法学派把封建君主制解释为上帝安排的制度。而对于这个学派,黑格尔早已说过,这是一个民族可能遭受的最大耻辱。^②完全可以理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根本不想颁布一部宪法,虽然这样一部宪法是他的父亲在反对拿破仑的战斗中为了得到公民的支持而庄严地答应要赐给他们的。

但是,无论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无产阶级,都没有做激烈斗争的准备。思想总是走在社会冲突的前面;当时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文学中都是如此。40年代是政治抒情诗繁荣昌盛的时期。格奥尔格·海

60

^① K. Marx, *Razlika između Demokritove i Epikurove filozofije prirode*, Beograd 1963, str. 67-68. (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译者注)。君特·希尔曼(Günter Hillmann)在《马克思和黑格尔》(*Marx und Hegel*, Frankfurt a. M. 1966)中,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做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并对过去解释马克思的这个最初发展阶段的许多看法进行了探讨。

^② 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尤·施塔尔(F. J. Stahl)、古·胡果(G. Hugo)、卡·路·冯·哈勒、亚·亨·弥勒(A. H. Müller)。他们全都是自然法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阶层作为有机体的器官各自完成上帝的意志规定的职能,因此这种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是反动的专制主义的理论代表者和一切自由主义倾向的运动的反对者。

尔维格 (Georg Herwegh) 以他的《一个生者的诗》诗集 (*Pjesme jednog živog*, 1841) 获得了非凡的成功, 而被梅林称为德国第一位无产阶级诗人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Ferdinand Freiligrath) 则更加超过了他。此外, 应该特别提到最伟大的诗人亨·海涅, 当时进行活动的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 (Goerg Werth)、弗·丁盖尔施泰特 (F. Dingelstedt)、罗·普鲁茨 (R. E. Prutz) 等人。

在政治方面, 马克思在莱茵省正好碰上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在筹备出版。这就是大家知道的《莱茵报》, 它于 1842 年 1 月 1 日在科伦创刊。1 月中旬以前报纸的主编是 T. 赫夫肯 (T. Höffken), 以后是鲁滕堡。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格奥尔格·荣克 (Goerg Jung) 和达·奥本海姆, 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青年黑格尔分子, 参加报纸创办工作的还有莫泽斯·赫斯 (Moses Hess), 他无疑是这批人中最值得注意和最有才能的人物。^①

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论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原先的书报检查令是 1819 年颁布的, 按照这个法令对书报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查。人们期望新国王会把它废除。可是新政府很快就查禁了《哈雷年鉴》, 于是卢格到德累斯顿去, 继续出版《德国年鉴》 (*Deutsche Jahrbücher*)。而鲍威尔, 我们已经知道, 则被解除了大学中的职务。1842 年发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 对此, 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篇文章, 寄给卢格。由于受到书报检查, 文章在 1843 年初才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后对当时的形势概括如下: “的确, 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 宣布新闻出版自由, 实行陪审审判等等; 总之, 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 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 (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 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 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 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 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 15 个月之后就被查封, 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 1842 年的事。” (F. Engels, *Revolucija i kontrarevolucija u Njemačkoj*, Kultura 1953, str. 23 - 24.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65 页。——译者注])

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ia)中。在这本《轶文集》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著名的哲学改革的纲要。

61 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在这一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一样,本着与博士论文相同的精神,着重要求实现思想自由,但已经公开批判官僚制度。马克思以其非凡的笔调谴责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这当然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本世纪中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似乎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许多论调!):“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①

马克思写道,你们要求人们变得谦逊,却以最不谦逊的方式把人们变成窥测人心的人,变成无所不知的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等,这怎么能提高民族感呢?如果这些人是如此博学多才,而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来提高我们的文化呢?“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

^①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Berlin 1958, *Werke*, sv. 1, str. 6. (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①

马克思也马上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评论莱茵省议会 1841 年夏就出版自由进行的辩论的。当时的议会仍然完全依附于政府。贵族占有半数议席,关于政府的提案,议会只有建议权。只是对本省的市政公用事业才有决定权,而且在这里,贵族占有必要的多数。受到格·荣克和阿·卢格热烈欢迎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以及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都仍然是从革命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写成的。^②

62

马克思作为报纸的撰稿人,并从 10 月起作为报纸的主编,必然会日益碰到和不得不处理当时的迫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实际问题。在 10 月,他就不得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莱茵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指责进行答复。

德国公众在罗仑兹·施泰因(Lorenz-Stein)的书《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cijalizam i komunizam u današnjoj Francuskoj*, 1842)出版之前,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在 40 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关于圣西门主义的书籍和评介傅立叶的文章,而在《莱茵报》上则发表了莫·赫斯的一批文章,他在文章中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维护者。^③

当《莱茵报》发表了魏特林的门徒关于斯特拉斯堡学者代表会议

① K. Marx,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Berlin 1958, *Werke*, sv. 1, str. 20. (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 页。——译者注)

② 这些文章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1842 年 5 月),《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 年 7 月),《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 年 8 月)。

③ 也应当注意到,当时德国已经有了一批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他们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德国工人联盟——“流亡者联盟”(1834 年),领导人是雅·费奈迭(J. Venedey)和泰·舒斯泰尔(Th. Schuster)博士。这个联盟很快就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此后,左派在舒斯泰尔的领导下组成了“正义者同盟”(1836 年)。从“正义者同盟”的队伍中涌现出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家威·魏特林(W. Weitling),以及一批著名的革命家和后来马克思的友人卡·沙佩尔(K. Schapper)、亨·鲍威尔(H. Bauer)、威·沃尔弗(J. Wolff)、奥·艾韦贝克(A. Everbeck)等人。

63

的一篇短文,说那里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时候,奥格斯堡《总汇报》对此进行了攻击。马克思公开指出,对有关最近的社会状况的新闻保持沉默,并不能掩盖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等级的一部分权力和财产这个事实。这在法国和英国是谁都明白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马克思写道,但是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①。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当时对问题的认识)说:“《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②

对马克思的今后发展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他作为报纸的编辑,必须结合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地产分割、自由贸易展开的辩论去研究经济问题。在1842年10月和11月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显示出他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不屑一顾的世俗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另

^① K. Marx,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Werke*, sv. 1, str. 107. (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译者注)

^② K. Marx, *Der Kommunismus und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Werke*, sv. 1, str. 108. (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296页。——译者注)

一种认识和另一种方针。马克思得出了一种对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认识：法和法律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来进行考察，在社会中私人利益被看作最终目的，因此，法必然要体现这一利益，不然就会变成无的放矢。省议会的基础是各个等级，因此一切结论都与此相适应。在这种形势下，私人利益必然要超过公共利益。“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所有者仍然是林木所有者。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①

64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因为“我们的省等级会议已经履行了自己作为省等级会议的使命，但是我们决不是想要为它辩护。莱茵省人应该在省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②。

这基本上就是那些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它们使马克思逐渐抛开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并认识到，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的问题必须争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决，而不仅是在思想上解决。因此十分自然，他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就同自己过去在“博士俱乐部”中的友人发生冲突，那些人当时已经叫作“自由人”，或者按照当时他们所

^① K. Marx,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Werke*, sv. 1, str. 147. (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Werke*, sv. 1, str. 147. (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译者注)

住的雅科布·希佩尔旅馆的名称叫作“希佩尔的自由人”。他们避开强烈的阶级背景,沉溺于自己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中,设想用激进主义、无神论、各种宣言等来解决世间的问题。1842年6月由于《哥尼斯堡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开始发生冲突,而在1842年11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卢格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接着海尔维格也同他们决裂了。马克思当时站在卢格和海尔维格一边,并在11月29日的《莱茵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声明,声明中列举了卢格和海尔维格谴责“自由人”的行为和表现的种种理由。“自由人”通过梅因向马克思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语),对此,马克思在11月29—30日的信中做了尖锐的答复。结果他们就不再为《莱茵报》撰稿。如果我们了解数日之前马克思曾会见弗·恩格斯(他在此以前曾接近这个集团),那么就会明白,他们俩人的第一次会见必然是冷淡的。

65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指出,“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不同意那些人的来稿,而且没有发表他们的几篇写得极其草率和毫无根据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马克思指出,第二个因素是鲁滕堡被解除了主编的职务,因为他力不胜任,可是他却说报纸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采取了另一种立场。第三个因素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同卢格和海尔维格的冲突,因此马克思提到了梅因的信和自己的答复。“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谈了对他们的作品不足之处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更切实地加以讨论。”^①

《莱茵报》激进的方针，卢格在《德国年鉴》中宣扬民主的政论，以及被国王本人指控叛国的约翰·雅科比(Johann Jacoby)被无罪开释——这一切都促使国王和政府设法查禁所有这些报刊(萨克森政府在1843年1月就已经查封了《德国年鉴》)。在1月里就已经做出决定，在3月底禁止《莱茵报》发行。对报纸的查封引起了一定的分化。股东们想通过让步来避免查封。马克思则不抱任何幻想。3月18日《莱茵报》第77号上刊登了一个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②

马克思在政治上的激进观点使得他在此以前就已经采取了反对君主制和拥护民主制的立场。这样他就已经同当时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发展观分道扬镳。另一方面，无神论也使他接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激进无神论观点。使他摆脱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是马克思当时碰到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它们表明，应当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政治中，求得问题的解决。

可以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新阶段的标志的一个决定性的文件(此后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3月初，马克思收到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书中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创办一个新刊物的问题，并谈到同法国进步的 and 革命的思想家合作的新计划，而且已经拟定刊物的名称是《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大家知道，后来卢格采纳了这个名称。接着，马克思谈到他想用一点时间到克罗茨纳赫去看望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并同她结婚，因此在准备几篇打算付印的作品。

^① K. Marx, *Pismo A. Rugeu od 30. novembra 1842. god.*, *Odabrana pisma*, str. 51. (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rklärung, Werke*, sv. 1, str. 2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译者注)

在谈到费尔巴哈的《纲要》时，马克思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①

这样，革命唯心主义时期就结束了。从此以后，马克思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67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也生于莱茵省。他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巴门，这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他幼年时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只不过当地条件和家庭教育不同。恩格斯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在巴门开纺纱厂的工业家，后来又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基尔亨设厂。马克思的父亲是受到法国启蒙学派思想熏陶的人，与此不同，恩格斯的父亲则是一个严格的虔诚派教徒，因此恩格斯带着强烈的宗教信仰从中学走向社会。此外，恩格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过大学。在他中学毕业之前，父亲在1837年1月把他派到不来梅[●]，在友人亨利希·洛伊波德(Leupold Henrich, 萨克森领事和洛伊波德出口商行经理)的商行中学习经商。

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自由市，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不来梅，他可以更顺利地和不受阻碍地观察当时文化和政治中的迫切事件，得到在巴门和普鲁士遭到禁止的书籍，更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文

^① K. Marx, *Pismo A. Rugeu od 13. marta 1843. god.*, *Odabrana pisma*, str. 54. (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恩格斯在1837年9月由于父亲的坚持，离开中学，到他父亲在巴门开设的营业所当办事员。1838年7月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5页。——译者注

化和政治事件。这个年轻人很有文化修养,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心胸开阔,渴望获得知识,他如饥似渴地浏览和钻研当时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兴趣始终是非常广泛的。从他给妹妹玛丽亚(Marija),即他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中最钟爱的妹妹的信中,特别是他给友人神学系大学生弗里德里希·格雷培(Friedrich Graeber)和威廉·格雷培(Wilhelm Graeber)的信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当时的生活。他谈到自己的科学研究、文化生活、看戏、参加晚会、听音乐会、学习作曲、写诗等。恩格斯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和马克思一样,是一首名叫《贝都因人》(*Die Beduin*)的诗,于1838年9月16日发表在《不来梅杂谈报》上,诗中以含蓄的口吻讽刺了科采布(A. Kotzebu),并且用席勒(“我国戏剧的最好的名家”)来同他对比。^①

在这个时期,有两个运动对年轻的恩格斯的发展打下了最深刻的烙印。一个是“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它受到海涅和白尔尼的强烈影响;另一个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特别是黑格尔左派及其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德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以及以往的历史事件都促使恩格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工人群众的困难处境。于是这个还不满十九岁的青年人正是就这些问题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伍珀河谷来信》(*Briefe aus dem Wuppertal*)。文章于1839年3—4月登载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杂志上,其中描述了他故乡的状况、堕落现象、神秘主义和酗酒盛行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

68

^①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环境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的参考书以外,除了迈耶尔写的迄今最详尽的《恩格斯传》(1934)以外,近来出版了霍尔斯特·乌尔利希(Horst Ullrich)的专著《恩格斯的青年时代》(*Der junge Engels*, I sv. Berlin 1961, II sv. Berlin 1966),该书是对恩格斯在1834—1845年世界观的发展所做的历史传记性研究(第2卷的中译本,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注);集体创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I st., Berlin 1970)。南斯拉夫书籍中请参见B.戴贝尼亚克(B. Debenjak):《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 zgodovina in odtujitev*, Maribor 1970)。

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梁。因此,这些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令人反感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首先就出现这样一种说法: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即使其中一个营垒归于消失,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营垒的人都患有肺结核,既然如此,那还会有什么好指望的呢?”^①

恩格斯接着谈到了疾病流行的情况,工厂中学龄儿童的劳动,工厂主的虔诚主义的伪善(他们雇佣幼童,只给很少的工资),虔诚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蒙昧主义(他们禁止读小说、听音乐会等),并在结尾处说:“这就是伍珀河谷虔诚派的活动情况;很难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②

应该提醒,虔诚派作为新教内部的宗派运动是在17世纪产生的,它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要求进行教会改革。虔诚派教徒对世俗的一切都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抛弃科学和艺术,反对一切哲学和启蒙

^① F. Engels, *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Werke*, sv. 1, str. 417-418. (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Werke*, sv. 1, str. 417-418. (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译者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并没有署名。他多半是由于家庭的缘故,对以后的文章,直到1842年底,都只署“弗”或“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因此,人们不知道谁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后来首先猜想它们是巴枯宁写的。为巴枯宁作传的麦·纳特劳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这些文章和巴枯宁的文章在风格上没有区别。以后,符·帕彭海姆和爱·伯恩施坦断定,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应该实有其人。只是经过古·迈耶尔和达·梁赞诺夫的研究,特别是在恩格斯致格雷培兄弟、致妹妹玛丽亚和致阿·卢格的信(在1842年6月15日致卢格的信中谈到这些著作)被发现以后,这个问题才弄清楚。原来弗·奥斯渥特就是年轻的恩格斯。

运动,因而是教会神秘主义的最落后的表现。在恩格斯的故乡,虔诚派具有强大的影响。年轻的恩格斯,虽然仍受到宗教的影响,但由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修养和开朗的性格,不能容忍这种落后和原始的现象。

在这个时期以前,德国哲学对他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1839年4月左右,“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一定是这一派的领袖和《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谷兹科夫的影响的结果。例如,从1839年4月89—日致弗·格雷培的信中可以知道,他认为七月革命是解放战争以后人民意志的最卓越的表现,海涅和白尔尼日益举足轻重,以谷兹科夫为首的新的一代的成长是与他们有联系的,并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同心协力,青年德意志的目标日益明确,这就是他们意识到的‘时代观念’。这些本世纪的观念(奎纳和蒙特就是这样说的)并不像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①

70

恩格斯继续写道,他已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由于本世纪的观念而夜不能寐,每当看到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了自由的精神。但同时他也指出,他远远地避免使用他们的华丽辞藻,如世界性灾难、世界历史因素等。

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转变首先是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在德国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及革命和解放事件的影响下,恩格斯的思想日益发展。这一切使得他更加尖锐地反对教会神秘主义的落后形式以及当时其他不合时代潮流的现象。他在信中公开宣布,他一度

^①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8-9. aprila. 1839. god.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tr. 366.* (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4月8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译者注)

曾是神秘主义者,但从来不是虔诚派信徒,不过这都是往事了。现在他是自由的超自然主义者,但能保持多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志趣必然引导恩格斯去研究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在当时正是在围绕宗教开展讨论的标志下的一件大事。从他在1839年4月到7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①,我们了解到,他从读施特劳斯的著作入手,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伍珀河谷的信仰”表示怀疑,他阅读了亨·莱奥(H. Leo)的书以及围绕他的《黑格尔分子》(*Die Hegelingen*)一书进行的争论,他还读了施莱艾尔马赫尔(F. E. D. Schleiermacher)的书。他日益接受唯理论的观点:只有在理性面前经得住考验的学说才能算是上帝的学说;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是,某人可能因为是唯理论者而受到永世诅咒,斯宾诺莎、康德或白尔尼就可能受到永世诅咒;只要怀疑是真诚的,就存在怀疑权;因此可以期望“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恩格斯在结束此信时写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②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恩格斯艰难地经历了自己的意识和信仰危机。他写信的时候很激动,“眼里流着泪”,当时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心的宗教观中寻找某种差强人意的出路。他在自己的唯理论的怀疑中看到,可以从这种观点中找到暂时的出路:仍然信神(相信“心”),但可以用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圣经》和宗教观念。

但是,在这几个月里他努力钻研青年黑格尔派的论点,特别是施特劳斯的书,结果他接受了黑格尔左派所主张的黑格尔学说。从1839年10月到12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转变已经完成

^① 恩格斯1839年4月23日—5月1日致弗·格雷培的信,4月23—30日、5月24日—6月15日致威·格雷培的信,6月15日、7月12—27日致弗·格雷培的信,7月30日致威·格雷培的信。

^②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15. juna 1839. god.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tr. 402. (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译者注)

了。他在10月8日致威·格雷培的信中就已经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局已定，我是施特劳斯派，我是个可怜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①

完全可以理解，在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影响下，恩格斯日益吸收现代的风格，而海涅、奎纳、谷兹科夫、文巴尔克、白尔尼是他的楷模，他拟订了某种文学创作计划，接着把禁书寄往巴门，并在年底说：“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

从11月起，恩格斯经常为《德意志电讯》和其他杂志撰稿。第一篇是《寄自爱北斐特》的通讯（1839年11月），文中简短地指出，这个地区的状况仍然和他写《伍珀河谷来信》时一样。他写了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关于卡·倍克（K. Beck）、关于奥·普拉滕（A. Platen）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而从1840年7月起为斯图加特的《知识界晨报》寄

72

^①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8. oktobra 1839.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tr. 419.* (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Pismo, Fr. Graeberu od 9. dec. 1839 - 5. febr. 1840.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Berlin 1967, str. 438 - 439.* (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了一批关于不来梅的生活和大事的通讯。●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1841年1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阿恩特是反对拿破仑的老战士,为此不得不逃离德国。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回国。恩格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评述了这次战争。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推翻外国统治,因为这一举就完成了,而是人民不经各邦君主的允许自行起来斗争,而且迫使当权者站出来领导这一起义。简言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那些年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②。

尽管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但是恩格斯没有陷入片面地叫嚷反对法国人,而是直接指出,拿破仑实现了犹太人的解放,实行陪审法院,实施健全的私法以代替罗马法大全。恩格斯批判了阿恩特主张的不加区分的君主制。他问道,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专制君主制?阿恩特及其追随者认为,人民和君主互爱,他们为造福全国而共同奋斗是国家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首先必须在法律上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然后才能确立并且保持亲善的关系。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③

73

恩格斯接着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及其“国家有机体”学

● 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文章有:《德国民间故事书》(1839年11月),《卡尔·倍克》(1839年12月),《时代的倒退征兆》(1840年2月),《普拉滕》(1840年2月),《约艾尔·雅科比》(1840年4月),《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1840年4月);而在《知识界午夜报》上,除了关于不来梅大事的通讯外,还在1840年3—5月连载了一篇长文《现代文学生活》。

●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1. (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269页。——译者注)

③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5. (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译者注)

说,因为它从反动的立场出发为过去和狭隘民族主义做辩护。恩格斯大声疾呼:“主要的不就是人类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①这里表现出了他的开阔的思想境界,这使他能很快地领会到自由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

此外,恩格斯认为重新占领莱茵河左岸是必要的,甚至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已经分离出去的地方的日耳曼化也是必要的。他写道,在这些国家中德意志民族受到压迫,而在东方,斯拉夫民族正在日益兴起和壮大。这里已经表现出他考察欧洲问题(从大民族的立场考察问题!)的某些特点,它们后来在恩格斯评价欧洲近代史和当时事件中也曾反映出来。但是,对于上述这些要求,恩格斯也马上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阿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阿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在此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②此外,文章中也谈到了黑格尔学说发展中的某些现象,认为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而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是当代的旗帜。

从《伊默曼的〈回忆录〉》一文(刊登在1841年4月的《德意志电

^①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27. (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Ernst Moritz Arndt,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31. (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译者注)

讯》上)中,我们特别可以看出,二十岁的恩格斯已经明确地表述了他今后要为真理、为人类的解放和为新思想的实现而奋斗。他认为文学中老的一代已经凋零殆尽,现在一切都期待着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不是驯服听命的,不愿意跟着别人走,而要自己探索道路。对青年的试金石是新的哲学,他应当勤奋努力地掌握它,但不要丧失青年的热情。“谁害怕观念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手持利剑披荆斩棘,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当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去干他想干的事,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①

恩格斯继续说,今天的青年受过黑格尔学说的熏陶,他的体系荚壳中的许多种子已在青年的心田中茁壮发芽。这一切都表明,时代的命运不取决于老年人的胆小怕事的虔诚信念或市侩习气,而取决于青年人的桀骜不驯的炽烈的热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就让我们去为自由而斗争吧;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②

1841年春,恩格斯又回到故乡,从他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准备到柏林去服兵役。10月他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在半年前马克思曾经参加过的小组里,恩格斯明确地变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马上就有机会表现自己对黑格尔和自我意识哲学的热忱赞赏。这一年,普鲁士政府请年迈的谢林用他神秘主义的实证哲学来消灭黑格尔学说中的“毒蛇的种子”。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慕名赶来听谢林讲课。但是,所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都对这个过去某个时候开拓新道路的著名人物的思想堕落深感失望。此

^① F. Engels,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48. (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Immermanns "Memorabilien"*,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49. (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译者注)

外,其中许多人还对谢林对待黑格爾的态度表示愤慨。情绪激昂而富有斗争心的恩格斯,在柏林居住期间,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了两个小册子评论谢林及其讲授的课程。^①

其中最有意義的是第二个作品《谢林和启示》,文中简短地叙述了黑格爾学说发展的阶段。恩格斯认为,黑格爾体系大体上在1810年底已经准备就绪,而在1820年左右这一过程已彻底完成,黑格爾政治观点的形成受到英国制度的影响,并带有复辟时期的明显烙印,因此他不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黑格爾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看来完全不同,“如果他更多地抛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的要素,而更多地从纯粹思想出发展开论证,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无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黑格爾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他的宗教哲学中的所有表现得过于正统的东西,他的国家法中的所有从历史来看表现得过于虚假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往往是受抑制的,甚至是褊狭的。”^②

但是,黑格爾的学生却忠于他的原则。恩格斯提到了卢格、施特劳斯、鲍威尔、青年黑格爾派、同莱奥的论战等,从而断定,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所有这些宗教偏见都被彻底粉碎了。“伟大的变革——上一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只是这一变革的先驱——在思想王国里完成了,它的自我创造实现了。从笛卡儿开始的新教哲学已告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所有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其神圣职责就是把已取得的

^① 1841年12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第一篇文章,名叫《谢林论黑格爾》。其余两个小册子出版于1842年:《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1842年3月);《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5月)。

^②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76. (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译者注)

巨大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使之上升为德国的生活原则。”●

恩格斯也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对谢林的攻击深表愤慨。他在12月就已经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谢林论黑格尔》,批判谢林力图创立“实证哲学”,批判他的下列论断:黑格尔把否定哲学宣布为绝对哲学;同一哲学并不是需要特别创立的存在哲学。谢林企图用实证哲学即用非理性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因此,这种哲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验哲学,它的神学被称为实证神学,而它的法学也许是历史法学。这种结果自然同失败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早在谢林来柏林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对谢林创立实证哲学的企图,恩格斯在上面提到过的第二篇作品中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这是任何伟大哲学的意图。谢林却不承认这些成果,而是否定世界的合理性。“但是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这一点,于是宁肯否认哲学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他就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尽可能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 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 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应当重新创立的‘实证哲学’。”③

这是企图偷偷地贩运对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因此恩格斯反对这种二元论。他以十分严肃的批判态度指出了谢林的企图的经院哲学性质、神话成分和神秘主义成分,断定这种哲学

①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77. (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Schelling über Hegel*,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69. (参见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1页。——译者注)

●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181. (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译者注)

实际上包含了基督教的各种教条：从三位一体、原罪，直到复活和其他因素。这样一来，谢林就从一个过去敢于在辽阔的思想海洋中扬帆远航的坚毅无畏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被神所感召的不知所云的先知。

我们略掉了恩格斯对谢林的下列观念的评述和批判，如潜力、理性、非理性、存在、绝对、实证等等，不仅因为这些观念中提出了一种软弱无力的非理性主义，而且因为它们对于说明恩格斯的观点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反映在他抛弃所有非理性的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文章的最后他热情地维护自我意识哲学上。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哲学带来了新的黎明，于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被揭穿了，自然界向我们敞开了胸怀，一切分崩离析的因素消失了；世界又变成统一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而自然界之骄子——人，在经过了

77

无穷无尽的长期斗争和努力之后，终于获得了自我意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并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却不以为意，因为这顶桂冠是值得付出这番心血的。长期的追求对他来说并非徒劳，因为他带回家的高傲而美丽的新娘对他来说只会更加珍贵。他在长期寻找之后觅得的宝物即圣物，是以走过许多弯路为代价的。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论它的庄严并且宣布它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而且，这种相信观念万能，相信永恒真理必胜的信念，这种即使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永远不动摇、永远不让步的坚定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

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只正在自焚的凤凰吧!让我们不要过分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吗?他们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日子,举行最后决战的日子临近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①

78 我们之所以要引证这些著作,不仅为了说明恩格斯当时坚决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而且为了说明这个青年人为争取实现新的理想和真理而献身的热情和决心。

1842年里(从4月到8月),恩格斯从柏林给《莱茵报》寄了几篇文章,而在10月左右,他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文集中。文集于1843年7月中出版,其中还收集了布·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的文章。意义最重大的是莫·赫斯的文章,这在后面还将谈到。恩格斯的文章当然是本着批判的精神写的,他肯定,普鲁士的舆论越来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代议制宪法,特别是出版自由。后者必须争取,而一旦争得了出版自由,一年以后就会争

^① F. Engels, *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 Werke, Ergänzungsband, sv. 2, str. 220 - 221. (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394页。——译者注)

得宪法。最先出现的结果将是解除同俄国的联盟,那时还可能出现许多重大的事件,因为普鲁士的现状非常像法国革命前的情况。恩格斯就以这种革命的暗示结束了全文。

1842年10月,恩格斯从柏林回到了故乡。途中经过科伦作停留,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当时他结识了莫·赫斯。赫斯在事后不久致友人倍·奥艾尔巴赫(B. Auerbach)的信中写道,恩格斯在和他谈话之后,作为一个激烈的共产主义者而离去。11月底,恩格斯离开老家,动身去曼彻斯特,到他父亲入股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中工作。中途又一次在科伦停留,并在编辑部里见到了卡·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见颇为冷淡,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到达英国后就开始了恩格斯一生的一个新时期。发达的英国的现实对恩格斯的意义,也像不久以后法国发达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现实以公开的尖锐的阶级冲突向富有斗争精神和具有理论修养的恩格斯指出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根源。这就足以使他怀疑并很快抛弃对历史斗争和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解释。

第二章 新观点的建立 (1843—1847)

一、卡尔·马克思(1843—1845)

马克思好不容易才得以摆脱前一段时间同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令人头痛的争吵,并有时间来钻研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既然他想采取革命的行动,那么就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马克思动身去克罗茨纳赫,并在1843年6月19日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他继续十分勤奋地钻研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读了路德维希·兰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书,并重新回过头来向当时在这个领域里也有最深刻的理论造诣的思想家——黑格尔请教。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篇,实际上是

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概括。^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13节)

马克思的批评性札记保存下来的是第三篇第261—313节,即论述国家和国家法的部分,从社会问题来看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黑格尔认为,法哲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既然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学科,它应当从自己的概念中演绎出自己的内容。法的领域是精神的东西,它的来源、出发点是意志,而且是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是法的实体,而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领域。“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80

在黑格尔看来,一切过程都是从抽象到具体、到更有内容的过程,因此,在这里,“自由的理念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法,因为每个阶段都是在其特有各规定中之一的那自由的定在。当人们说道德、伦理跟法是对立的,这时所谓法系单指抽象人格的最初的形式的法”^③。

因此,黑格尔也把自己的法哲学分成三部分:抽象法、道德和伦

● 对黑格尔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存在着极不相同的解释。从19世纪50年代R.海伊姆(R. Haym)的指责起,到斯大林主义把黑格尔解释为贵族对法国革命和唯物主义的反动为止,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持有各种各样的态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运动是以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伟大思想的继承者。在最近时期专门论述这些问题的书,除了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以外,还请参见:埃·魏尔(E. Weil):《黑格尔和国家》(*Hegel et l'Etat*, Paris 1950);约·利特尔(J. Ritter):《黑格尔和法国革命》(*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Köln und Opaden 1957);于·哈贝马斯(J. Habermas):《黑格尔政治著作跋》(*Nachwort zu: Hegel, Polit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1966)。

②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42.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页。——译者注)

③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43.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页。译者注)

理,而国家则是精神在伦理领域的最终客体化。在抽象法中,黑格尔发展了自由意志的领域,自由意志存在于自己的抽象概念中,即存在于直接性的规定中。自由意志本身是主体的单个意志,因此它在自己的否定中,即在外在世界中取得自己的内容。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是人、个人,他构成形式法的概念和抽象基础。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黑格尔研究了人对其外界的关系,人的自由将在外界中和对外界表现出来,而这种外在的东西是物,是某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东西。这样就涉及了所有权的问题,由此就产生了缔结契约的可能性,然后产生了不法行为和犯罪等的可能性,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刑罚理论。

81 在道德阶段,我们具有“这样一种意志的观点,这种意志不仅是自在地而且是自为地无限的。意志的这种在自身中的反思和它的自为地存在的同一性,相反于意志的自在存在和直接性以及意志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各种规定性,而把人规定为主体”^①。因此,道德观点在其形态上是主观意志的法,这种主观意志要表现出来,因而在行为上就是意图和过错。考虑到意志是能动的,所以把道德性仅仅归结为主观性,或者反过来把主观性归结为道德性,都是有局限性的。“论行为而不问其后果这样一个原则以及另一个原则,即应按其后果来论行为并把后果当作什么是正义和善的一种标准,两者都属于抽象理智。”^②

在谈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想在这里至少特别强调一点:黑格尔的非常深刻的伦理观,既表现在克服主观主义上,也表现在克服康德的先验观点上。一方面他强调,追求善的愿望是行为的内容、意志的本质、在真理中的意志的本质。因此,“主张人不能认识真理,而只

^①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95.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0页。——译者注)

^②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01.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能与现象打交道,又说思维有害于善良的意志,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成见,都从精神中取去了一切理智的伦理性的价值和尊严。凡是我的判断不合乎理性的东西,我一概不给予承认,这种法是主体的最高的法,但是由于它的主观规定,它同时又是形式法;相反地,理性作为客观的东西对主体所具有的法,则依然屹立不动。由于这种法的形式上规定,判断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单纯私见和错误”^①。

由此可见,判断善的法和判断行为的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行为是一种变化,它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因而也受到现实世界的规律的约束。可见,谁要想在现实中行动,就必须服从这些现实的规律。所以“在作为理性概念的客观性的国家中,法律上的责任就不应停留在下列几点上:其人是否根据他的理性而行事,他对于合法性或不法性、善或恶的主观判断,以及他为满足其信念而提出的要求等。在国家这一客观领域中,判断的法乃是对合乎法律的或不合乎法律的东西的判断,是对现行法的判断,而且它限于最浅近的意义,即局限于知道什么是合法的,而应在这个范围内负担义务的这类知识”^②。

82

如果再加上直接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的另外几节(例如第135节),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的这些批判和这样提出伦理性的问题,对于马克思考察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沿着费尔巴哈的脚印走是不能超越黑格尔的,因为费尔巴哈过于简单地忽略了黑格尔的一些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同样,马克思在这里也具有充分的根据来克服空想主义,即克服一种可能出现的,而在大部分社会主义学说中都存在的需要和存在之间的脱节。^③

①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10.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134页。——译者注)

②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11.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4—135页。——译者注)

③ 参见 Milan Kangrga, *Etički problem u Karla Marxa*, Zagreb 1963。

法的理念表现的第三阶段是伦理(Sittlichkeit),它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①。可见伦理是理念的体系,所以是理性的东西。“因此,伦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东西,必然性的圆圈。这个必然性的圆圈的各个环节就是调整个人生活的那些伦理力量。个人对这些力量的关系乃是偶性对实体的关系,正是在个人中,这些力量才被观念着,而具有显现的形态和现实性。”^②

由此可见,对于主体来说,这些规律具有比自然力要大得多的权威,同时这对他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因为它提供了主体信任的精神的存在。作为实体性的规定,它们对个人来说是一些约束着个人的义务,而伦理性的东西,如果在个人本身中得到反映,那便是德。伦理精神通过本身要素的不同形式而发展:如家庭(这里解决婚姻、子女教育等问题);作为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这里处理司法、法制、陪审法院、警察、同业公会);最后,是国家,这是伦理理念的直接现实、显示出来的伦理精神、思考和知道自身的实体性意志。^③

83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节开始,马克思写下了自己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的手稿是到1927年才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从中也可以看出费尔巴哈

①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33.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译者注)

②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33 - 134.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③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88节中对市民社会做了如下的规定:“市民社会含有下列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含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Leipzig 1930, str. 158 - 159. [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的《纲要》的影响。马克思首先指出了,黑格尔的观点和结论中的矛盾和二律背反是他的唯心主义演绎法的结果。马克思批判的基本要点可以根据他对黑格尔的下列指责来确定,马克思说,黑格尔“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这里涉及的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特定的观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①。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的要素不是事物的逻辑,而是逻辑的事物。不是逻辑用来证明国家,而是国家用来证明逻辑。●

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作为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提出了民主制原则来与黑格尔的君主制原则相对抗。国家是抽象的,而人民是具体的。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而不是君主制是民主制的真理。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方式,即从属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制度。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③

我们看到,批判还在抽象领域中开展,而且本身就是抽象的。把民主制与君主制对比,犹如把一个原则与另一个本身尚未区分出来的原则进行对比。但是,需要马上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克服黑格尔的思

84

①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13.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译者注)

② 参见上书(中文版)第77、78、105页和手稿的其他地方。

③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30-233.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7页。——译者注)

辨哲学同时也意味着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而也克服了抽象的人。对第277节提出的一种思想,特别说明了马克思当时的看法:“之所以会有这些谬论,是因为黑格尔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与它们对立的東西;但是,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①

我们在后面将要见到,马克思不是通过费尔巴哈,而正是通过黑格尔,还通过莫·赫斯和法国理论家,才进而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批判地考察了国家制度的各个要素,首先是官僚机构。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的国家中高度评价了官僚机构,认为它是体现了国家意识和最高教养的机构,因此这个等级也就成了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

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只不过是同业公会的新制度。“同业公会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在社会中创立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政治。因此,同业公会精神遭到攻击,官僚政治精神也就遭到攻击;如果官僚政治过去曾经为了开拓自己生存的地盘而反对过同业公会的存在,那么,它为了拯救同业公会精神,亦即拯救它自己的精神,现在就力图强行维持同业公会的存在。”^②

黑格尔把官僚机构描述为“国家形式主义”。马克思继续说道,既

●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22.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47-248.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译者注)

然这种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确立起来,官僚机构也就成了各种幻觉的交织,而“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①。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⁸⁵国家的目的变成了官僚的目的。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封闭的同业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信念,对官僚政治来说就等于泄露它的奥秘。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但是,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②

马克思写道,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③

马克思对官僚政治的这一批判,在20世纪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

^①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48.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49.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译者注)

^③ 在谈到防止官僚专权的保证时,马克思对第295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根据第295节,‘要保证国家和被管辖者能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滥用权力’,一方面有赖于他们的‘等级制’(似乎滥用权力主要不是等级制,似乎官员的某些个人罪行完全不可与他们因等级制而必然会犯的罪行相提并论。官员只有犯了违背等级制或犯了等级制认为不必要犯的罪行时,才会受到等级制的惩罚。但是,如果是等级制本身通过某个官员犯了罪行,那么它总是对这个官员百般庇护。此外,等级制不会轻易相信它的某些成员犯了罪)。”(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49.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译者注])

实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不论在资本主义方面,或是在社会主义方面都得到了证实!

86 马克思论述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开的地方,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黑格尔关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脱离市民社会的观点。国家只是通过“全权代表”同市民社会接触;警察、法院和行政,不是市民社会的代表,而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有义务管理国家以对付市民社会。黑格尔曾设想,不仅国家需要这个普遍等级,而且同时要保证使每一个市民有可能献身于普遍等级。马克思在引述这段话后指出:“每个人都有获得另一领域的权利的可能性,这只是证明他本来的领域不具备这种权利的现实性罢了。”^①

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关于克服“政治因素”的思想萌芽和克服作为政权和暴力而与人们脱离并与人们对立的领域的思想萌芽;可以看出坚持自治的思想,在自治制度下,管理将成为共同体本身的一项工作。

黑格尔认为,在当今时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日益分离(这不同于封建社会,那里存在着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这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的这一论点,并联系到人们分散的个体而得出了区分人和公民的结论,这将是不久以后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主题。“普通法是什么,在这里是表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国家公民也是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彼此分离的。这样,他就不得不与自己在本质上分离。作为一个现实的市民,他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处于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国家的即不触及市民及其独立现实性的行政权的外在的和形式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但是,在后一种组织中,他作为一个私人处于国家之外;这种社会

^①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53.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译者注)

组织不触及政治国家本身。第一种组织是国家组织,它的质料总是由市民构成的。第二种组织是市民组织,它的质料并不是国家。”^①

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马克思对贵族阶级的“动物世界观”的十分辛辣的评论(贵族阶级认为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法令、立法权等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成果,而不是天生的个人的成果),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这部著作起,马克思的思想已转向社会和历史方面,认为解决当代之谜的关键和答案就在于此。

在1843年的春天里,马克思、卢格和出版者弗吕贝尔(J. Fröbel)已经决定新杂志的出版地是巴黎。他们全都认为,在德国创办略为激进的刊物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对马克思以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7

但是,在我们进而叙述马克思的生活和发展的这个时期之前,应当提到,当马克思还在德国居住的期间,威·魏特林的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底)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提出了在理想的共同体中解决相互关系的空想主义,这一点是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相同的,但此外还存在一种区别,即它主张采取革命措施来推翻现存的阶级社会。魏特林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无疑是当时德国的最精辟和最尖锐的批判之一。

但是,很有才能的莫泽斯·赫斯(1812—1875)的著作则重要得多。赫斯对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特别敏感。赫斯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可以算是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Tat)的创始人。单是赫斯就在哲学和社会领域得出了许多激进的结论。他著有:《人类的神圣史。出自斯宾诺莎的一个学生的手笔》(1837年)和《欧洲的头三头政治》(1841年)。书中宣布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哲学领域的批判以及从

^① K. Marx, *Aus d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Werke, sv. 1, str. 2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译者注)

思辨转向行动的要求。赫斯认为黑格尔左派标志着从过去的哲学向行动的哲学的转变,在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史学序论》中完成了这一积极的转变。

在第二本著作《欧洲的三头政治》中,赫斯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任务:从过去和现在得出未来。他认为,理论领域对于改造世界是不够的,哲学应当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变为行动,因为贫民和金融贵族的对立在这个世界上仍未克服。这些思想也表现在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特别是在《德国的政党》一文(1842年9月)中。●

88 赫斯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文集《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发表的文章里,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唯一和完全的自由》等文章中,结合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在行动哲学、实践、人的定义等概念中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因而与马克思当时的和稍后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

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赫斯断定,德国走得最远,但只是在理论上。“因此,行动的哲学只能从德国获得自己的原则。它只能在哲学一般地已经达到顶点的地方通过自身而变为行动。此岸性和彼岸性的对立只是在精神中并通过精神而产生,因而在原则上也只有精神中并通过精神而克服。德国的哲学确实已经达到了新时代的原则,并成了行动的哲学;但是我们还只是处于这个重要的精神过程的开端,有勇气把思想之剑的锋芒转向外部世界的人还太少。”②他首先把斯宾诺莎、巴贝夫、费希特、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看作这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

在《行动的哲学》一文中,他也宣传社会主义和自由行动,这种行动不同于不自由的劳动,他指出:“现在精神哲学的任务是要成为行动

① 在《德国的政党》一文中,赫斯写道:“消除贫民和金融贵族的对立,建立国家的统一,是一种愿望,19世纪现在正是在这种愿望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工作。”(M. Hess,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192)

② M. Hess,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198.

哲学。不仅思维，而且人类的全部活动都要提高到使一切对立统统消失的境地。”^①以往的全部历史中对人的诅咒，是他没有把活动当作目的本身，因而总是把享受和活动分开。“由于这种诅咒是同宗教和政治一起进入生活的，因此在宗教和政治的统治结束的时候，在反思的阶段被跨过的时候，在思辨王国和哲学伦理开始包括全部生活的时候，这种诅咒也将消失。——反思之神向人宣布的第一句话，就是一种诅咒，圣经已经在一句著名的格言中转告我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②。相反，自由精神向人宣布的第一句话，是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著名格言：‘善就是帮助活动，提高生活乐处’。‘汗流满面的劳动’把人变成奴隶和穷人，‘欢乐的活动’将使人变得自由和幸福。”●

89

在第三篇文章中有几处地方是在马克思著作出现以前的最精彩的论述。不自由和贫困产生了自我克制和宗教。“宗教对于人的饱受创伤的心是必然需要的，正如甜酒对于他的深感饥渴的胃是必然需要的一样。因此，要求奴隶或绝望的人头脑清醒或精神愉快，那是残酷的讽刺。既然你不能或不想使人民脱离动物状态，那么就让他们保留动物的意识，或者更好是让他们保留动物的无意识。人民已经那么长久地处在实际的奴役和贫困状态中，因此在精神上不可能是自由的；老实说，不幸归根到底会产生宗教的自我克制，但不会产生哲学的意识。”^④

赫斯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独立的自由的活动。如果我们想认真地探索自由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停留于中途。“不要满足于指责这种或那种奴役形式，而要彻底废除和摧毁奴役制度：做一个激进派吧！只存在一种奴役制，同样也只存在一种自由！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动物之处，正在于他的不取决于任何外界强制的自由活动。这种自由也如

① M. Hess, *Pilosophie der That*,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219.

②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译者注

③ M. Hess, *Pilosophie der That*,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220.

④ M. Hess, *Die Eine und ganze Freiheit*,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227.

同人的唯一享受一样是人的唯一生活。由于这种唯一和完全的自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人不是过着纯粹人的生活,而是多多少少过着动物的生活。他或者深感不幸即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苦难,或者坐享不劳动的清福或贪图物质享受,追逐人所周知的醉生梦死的手段,吸食鸦片、信奉宗教、狂饮美酒,从而毁灭了自身的生活志趣,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婆罗门、拉比、僧侣、神甫、虔诚派信徒和教徒散布的理想之中。”●文章结束时提出一种主张:要揭破一切宗教和政策包含的谎言,并阐明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紧密联系。

90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问题、尖锐的社会批判、行动哲学或实践的问题、克服哲学领域自身等,已经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但是莫·赫斯到底对马克思起多大影响,则很难确定。他们两人是朋友,为同一家报纸《莱茵报》撰稿。从赫斯在1841年9月2日致奥艾尔巴赫的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给他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赫斯明确地写道,在马克思的身上,他见到了唯一真正生气勃勃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将战胜以往的哲学,并成为他的榜样。他们两人之间当然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一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赫斯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文集中发表的上述著作看作是有重要意义的著作。②

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的几个月里的心情以及他对当时摆在德国哲学和革命政论面前的各种问题的态度,可以从他致卢格的几封信中

① M. Hess, *Die Eine und ganze Freiheit*,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1, str. 228.

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写道:“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即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K. Marx i F. Engels, *Rani radovi*, Zagreb 1967, str. 1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译者注])此外,评述莫·赫斯的书,除了兹罗齐斯蒂和卢卡奇的以外,还有奥·科尔纽的《莫·赫斯和黑格尔左派》(*M. Hess et la Gauche hégélienne*, 1934)。而战后才出版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文集》(里面有一篇详尽的序言)。一年以后在科伦出版了《莫·赫斯文选》(霍尔斯特·拉德马赫尔编选并作序)。

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来。这些信件后来同卢格、费尔巴哈、巴枯宁的信一起,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在1843年9月的信中断定德国不存在自由,并认为内部的困难毕竟大于外部的障碍。各种改革家之间在目的方面存在着一片混乱,因而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用辩证的观点来考察问题。他认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①。

91

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理论活动的根本纲领。但是实现这个纲领还是将来的事,并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具备卓越的才能。马克思当时就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方法论同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对立起来,而当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方法论。E. 卡贝(E. Cabet)、Th. 德萨米(Th. Dézamy)、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影响。^② 马克思继续说,德国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和政治。应当联系到这一情况而不应当拿某种现成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来和它对立。“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

^① K. Marx, *Pismo Rugeu od septembra 1843, Rani radovi*, str. 50 - 51. (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译者注)

^② 这一观点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原始的共产主义时又一次提到过。

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①

92 根据这个计划,马克思在1843年10月底^②写信给费尔巴哈,邀请他撰稿,并建议他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费尔巴哈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根本不值得写有关谢林的文章。费尔巴哈好不容易才对马克思向他提出的积极建议做出决定;他仍然离群索居于乡村,割断了自己的历史,脱离了他本来应当参与的思想发展进程。^③

10月底,马克思迁居巴黎。如果我们注意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而当时德国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的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法国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法国人的有利条件是他们有比较开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反之,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扎实地掌握了一个哲学繁荣时期的全部成就及其基本成果——辩

^① K. Marx, *Pismo Rugeu od septembra 1943*, *Rani radovi*, str. 52 - 53. (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译者注)

^② 应为1843年9月。(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译者注)

^③ 从这封信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对谢林和费尔巴哈的看法。在信中他直截了当地对费尔巴哈说:“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至于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对手好的一面,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一场异想天开的青春梦,而在您那里则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郑重。因此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而这种模拟像一旦面对现实就会烟消云散。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本身同哲学的想象的斗争。”(K. Marx - F. Engels, *Odabrana pisma*, str. 58 - 59. [参见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译者注])

证法,同时他还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开阔的眼界,这也是顺利地解决人、人的历史和人的解放问题的根本前提。

法国的现实马上向马克思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根据资产阶级的公民民主来解决人的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法国生活中的新的矛盾清楚地表明,必须克服在德国刚刚开始成为现实的那种关系。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对无产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人队伍中已经开始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一些马克思在德国就已经了解了)。流传最广的是圣西门(1760—1825)和沙·傅立叶(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

93

他们是天才的思想家,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庄严地宣告蓬勃发展的初期,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它灭亡的先兆。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很出色的。我们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力图创立关于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统一观点,并且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接近于对这些问题做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肯定,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解释历史中的唯物主义时,具有本身时代的客观局限性。这一点在他们试图解决当代社会的矛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里也发生了作用。他们不是把阶级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杠杆,却幻想将会出现个别的慈善家,他在认识到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使世界得到解放。圣西门早在《新基督教》中就向各位王公呼吁,而傅立叶则期待富有的慈善家出资来建立他的共产主义“法郎吉”。

但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引起了重大的阶级冲突(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以及比较激烈的阶级抗议,工人

① 大家知道,圣西门把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而傅立叶则分为四个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宗法时期、文明时期)。傅立叶所指的文明时期就是当时的充满矛盾的资产阶级社会,那里从富裕本身中产生贫穷。圣西门则相反,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财产和生产力的意义,并对现代工业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

奥古斯特·科林(A. Colin)在183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人民呼声》，分析了革命的结果和当时的阶级形势。1837年，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建立了“四季社”的革命组织，以代替遭到警察破坏的“家族社”。主张采取密谋活动原则的布朗基企图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起义，但失败了。

94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无产阶级非常困难的处境，就可以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路易·勃朗(L. Blanc)之类的社会主义作家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在《劳动组织》(1840年)一书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出路在于组织工人协会和社会工场，而国家应当给予资助。虽然勃朗基本上仍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但是他提出的为了社会制度民主化而开展政治斗争的要求却使他成了一个出名的人物。同样，约瑟夫·蒲鲁东也由于写了一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什么是财产?》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对此回答说，财产就是盗窃！此外，如果再加上埃·卡贝，泰·德萨米，巴贝夫共产主义的继承者，圣西门主义的继承者圣·阿芒·巴扎尔(S. A. Bazard)和巴·普·安凡丹(B. P. Enfantin)，傅立叶主义者维·孔西得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比·勒鲁、费·拉梅耐(F. R. Lamennais)等，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当时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情景，以及马克思到达巴黎后所参与的活跃的政治生活的情景。^①

马克思很快就参加了德国工人的集会，访问了法国无产者的秘密俱乐部，研究了法国革命、当时形势以及大量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著作。当时在同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马克思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样，他在研究法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时，必然会接触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把近代法国和英国的全部发展解释为市民等级同贵

^①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请参见罗·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Les Sources françaises du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948)。

族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那些历史学家。^①

马克思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与卢格一起完成了《德法年鉴》杂志第一期的编辑工作。尽管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盛极一时,马克思和卢格却未能请到任何一个法国人为《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后来写道,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宁可要伏尔泰的学说而不要19世纪德国的无神论。《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约在1844年3月出版。除了经费和销售方面的困难之外,主要的困难在于两位编者之间的分歧。自由主义民主派卢格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经再也不能跟随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前进了。

95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非常卓越的文章。第一篇《论犹太人问题》,看来还是他在德国居住的最后期间写的。第二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带有法国环境和经验的痕迹。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鲍威尔在1843年发表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文而写的。从文中首先可以看出,这两位不久以前的朋友和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人物已经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的错误意图: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宗教在政治解放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

● 指的是历史学家奥·梯叶里、弗·比·吉·基佐、弗·奥·玛·米涅。

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①

96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克服了鲍威尔把问题归结为宗教批判的这种提法，而且意图克服费尔巴哈对宗教现象的人本主义解释。除了这些观点以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的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个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财产和他们利己主义人身的保护。一场革命如果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那么它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市民社会（这里指的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

封建社会彻底崩溃了，只剩下了人，而且是利己主义的人。这种人现在是政治国家的前提。“但是，利己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②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道德的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

^① K. Marx, *Prilog jevrejskom pitanju*, *Rani radovi*, str. 60 - 61. (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译者注)

^② K. Marx, *Prilog jevrejskom pitanju*, *Rani radovi*, str. 80. (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译者注)

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

从最后的这些思想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认为,政治领域作为与人相分离和相对立的领域,是应当通过革命加以克服的异化的领域,由此,人必须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克服政治领域的基本思想,以及关于自治共同体的思想,在这里就已经可以找到理论上的启示。

第二篇文章是马克思的最精辟的短文之一,它更加明确得多地宣布了新观点。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了。他对宗教问题之作为宗教问题,已不再特别感兴趣。宗教是某种应当被消除的世界的表现。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②。

97

由此可见,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中也概括地提到,他把宗教看作历史现象,而不是人的本质、人的结构,宗教的基础和根源在人们之间和人对自然的特殊关系之中;人主要是生活在需要从一定的观念和幻想中寻找慰藉的非人的处境中,这种处境表明人对现状不满,他想哪怕在幻想中超越现状,并以此作为对现状的抗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

^① K. Marx, *Prilog jevrejskom pitanju, Rani radovi*, str. 81. (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译者注)

^②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90-91.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译者注)

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①

98 在这种批判和论断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项任务:要弄清现实世界的真相。“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于是,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因此,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应当恢复人的尊严!

德国不能为马克思历史地考察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基础。德国人当时只是哲学上的现代人,而不是历史上的现代人。德国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已经感受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矛盾的压力。必须从法国和英国比较发达的状况出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马克思的(以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国际的产物。

由于在德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一个等级、没有一个部分感到

●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91.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译者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赫斯在几个月前在《唯一和完全的自由》一文中也写过类似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赫斯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同样回想一下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信中谈到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在人间,随着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那么就可以看出,至少两人在这个时期具有相似的思想发展过程。只是马克思的论点、结论和成果从这个时候起已经超过了赫斯。

②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91.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译者注)

③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99.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有必要和有能力来实现普遍解放,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哪一个阶级将被自己的物质状况和锁链所迫而实现这一解放呢?马克思回答说,这“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①。

99

由此可见,哲学所要求实现的一切伟大的、合乎人性的、全人类的事业,以及批判人的生存异化形式中的重大成果,即通过克服这些异化形式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前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消灭自己才能实现。但是,哲学不变成现实,无产阶级就不能消灭自己,即获得解放。马克思认为,哲学实质上是深刻地合乎人性的,为了把它变成现实就需要超出哲学领域,需要一种物质力量。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可见,理论因素在人类的历史性斗争和努力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思想,开创了当代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哲学,即

^①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104.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译者注)

●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98.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哲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在解决当代根本问题上相互结合的时期。如果当代世界的这两种基本“力量”悲剧性地彼此脱节,那么解决当代问题的历史性努力过去和将来都必然会发生问题,这无疑是确定不移的!

因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①

但是,哲学还没有为解决这一任务提供全部前提。还需要研究和探索有关人和历史的若干根本问题。马克思在以后的两三年内专门分析了这些问题。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人和历史的哲学观点——唯物史观。

10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利用他在巴黎逗留一直到1845年初这一段时间,努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自己以往的研究,特别是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文章,使得他的注意力和兴趣日益转移到经济领域。马克思当时已经明白,撇开这个因素,人的实践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的说明。马克思想在这个时期写一批单独的小册子来论述对法、道德和政治的批判,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并且批判那种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思辨研究的做法。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除了利用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外,还首先提到了魏特林、恩格斯和赫斯的著作。同样值得重视和

^① K. Marx, *Prilog kritici Hegelove filozofije prava. Uvod, Rani radovi*, str. 105.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译者注)

注意的是,马克思当时对费尔巴哈仍然十分推崇。^①

我们在结合这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来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打算探讨得略为详细一些,即研究三个问题:人的问题、异化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因为这部手稿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全部丰富深刻的内容,以及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精辟地表述出来的那些理论前提。这同时也使我们在后面没有必要特别阐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只是把它作为马克思基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件和完整表述而加以引用。

我们在介绍黑格尔的章节中已经看到,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关于人是自我意识的观点出发,并针锋相对地引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对象的、感觉的、自然的、现实的存在物的观点。但是,从马克思以往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分析和观点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的狭隘人本主义的观点。在现在提到的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了更深刻的论据。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

101

^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写道:“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Rani radovi, str. 192.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译者注])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我们在介绍黑格尔哲学时已经做了简要的叙述。此外,这部手稿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Arhive K. Marxa i F. Engels, sv. 3, Moskva 1927, god.)中。德文则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部分第3卷(MEGA izdanju I sv. 3, Berlin 1932)中。

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①。

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是他的生产。“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

102 马克思接着提出一个论断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有自觉的生命活动，因为他把自己的活动本身变成了自己的愿望和意识的对象。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这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同样也“生产”，但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③。

可见，实质上是自由的普遍的存在物，总之是完整的全面的存在物。他全面地对待现实，同样也全面地占有现实。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同这个因素相联系的，并且是从此出发的。总之，人是实践的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32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译者注)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51.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译者注)

③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51 - 252.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163页。——译者注)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才能提出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译者注)

存在物。“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①

我们稍微离题一点说,马克思认为,与这种全面的关系相对立的,是私有制世界内部关系的片面性和荒唐性,在这种制度下,一种对象只有当它被我们所拥有、被我们所占有的时候,即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被我们直接消费等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私有制的扬弃同时也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彻底解放的前提,而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了人的了。“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②

103

对象和感觉的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界和整个现实的实践关系,是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音乐能激起人的音乐感,而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音乐就毫无意义,不是对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9.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0.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译者注)

象。“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①

因此,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界是真正人的自然界。因此,借助于工业而产生的自然界,虽然具有异化的形式,但也是真正人类的自然界。工业的历史,对自然界的感性的对象化的改造,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正因为如此,“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③。

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思想不仅超过了以往的唯心主义,而且超越了以往唯物主义的局限。对于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即主体和客体的关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1 - 282.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译者注)在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中,也包含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五、八、九条的内容。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4.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译者注)

③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6.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系问题,马克思克服了传统的思辨解决方式,以根本不同的方法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客体是人的客体,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而中介就是人的实践。马克思本着这种精神断定:“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

主体和客体之间、自然界和人之间等形而上的僵硬的关系和非辩证的关系,由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外观。凡是脱离人的实践孤立地解释认识问题的各种企图,都只不过是把上述领域割裂开来或等同起来的失败的结果。马克思继续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②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7.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译者注)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2.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译者注)这里也提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八条的思想。

这里我们看到了对那种设想一切矛盾和历史任务都可能和应当在理论上和哲学上解决的“哲学立场”的毫不含糊的批判。我们看到，在这里，马克思的批判和赫斯的批判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比赫斯的分析更加深刻。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实践和理论的联系，而且指出了被理解为人的实践总体的人的历史存在，因此整个所谓思想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不仅是这个总体的结构因素，而且离开了它就完全不能理解。这个观点在下述思想里也表现得特别明确，马克思说：“例如，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受，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①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马克思在某些地方还发展了关于人是需要的存在物的问题，这对于人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人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是具有完善而确定的本质力量、感觉、思维以及需要的“现成的”存在物。人创造自己的世界，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需要，人的世界本身远远超出了直接的生理需要，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世界。人在自己的历史中通过自己的艺术历史实践创造了具有音乐感的耳朵，从而有了对音乐、艺术等的需要，这成了他的人类生存的不可取代的环境。

这样就形成了人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即需要的丰富内容。“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9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①马克思的这些原理对于理解人的解放的观点和对于理解共产主义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为了从马克思的考察和解决中理解这些问题,还需要了解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和异化理论。

我们看到,人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类生活就是生产生活。因此,自由不仅理解为已被认识的必然,而且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根本构成。^②

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实践,是对象的感性的存在物的活动,他在通过自己的实践把握现实中,使自己本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但是这种对象化也不是一般的对象化,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形式的对象化。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在歪曲的变态的形式中,即自我异化的形式中。马克思在分析现代社会时,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4 - 28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5页。——译者注)

^② 考虑到当代关于需要“扬弃劳动”的讨论,有必要强调指出,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已经对劳动和生产做了区别,虽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但是在许多段落中,劳动被理解为异化的生产、异化内部的活动、私有财产的本质。我们举出几处这样的例证,“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300.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300.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译者注])“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30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译者注])但是在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也使用“劳动解放”等提法。

107 发,这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

因此,工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对象化,但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表现为异化。占有对象在这样的程度上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得到的对象越少,而且越来越受他的产品的统治。马克思说,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45 - 246.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译者注)关于异化(Entfremdung)和外化(Entsüßerung)这两个术语,有必要提醒,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整部著作中,几乎始终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

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①

但是，如果这种异化不是生产本身的组成部分的话，工人就可能不以异己的态度对待自己本身的产品，劳动成果就可能不是工人的异化。可见，工人是在作为能动的异化的生产活动中使自己本身异化的。这种生产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使生产者和他的劳动产品相脱离的制度，这种制度使某个其他方面有可能支配工人的产品。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特点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②

这种异己性表现为：某种强制一不存在工人就会逃避劳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了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继续说，虽然这些原始的机能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46 - 247.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48 - 249.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①。

在前面的分析中,马克思从以下两种关系来考察作为人类活动异化行动的劳动:一种是工人对作为异己对象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另一种是工人对生产活动本身的关系。马克思在确定了这些情况之后,进而分析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异化劳动对人的类本质的关系。由于劳动(作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也使人自己的活动、他的类本质同他相异化,因此,劳动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

109 可见,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人的本质要素即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最后,由此产生的第四个特征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的产品不属于我,它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属于某个他人的。同样,使工人失去创造性的生产造成了不从事生产的人的统治,即对生产和产品的统治。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必然得出存在私有制的结论,这种私有制靠异化劳动而不断再生产。借助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49.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译者注)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50 - 251.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译者注)

●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52 - 253.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页。——译者注)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些范畴,可以引申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我们可以确定,每一个国民经济学范畴都是上述两个基本范畴的一定表现。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用一种崭新的观点来考察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基础,后来马克思在批判异化生产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时就运用了这种崭新的观点。

马克思通过分析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需要变形的结果,是使人处于别人控制和统治下的这种需要发展的结果。“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力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110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制度里,在一方造成了丰裕富足和极端讲究的需要,在另一方造成了动物般的野蛮、粗鲁和抽象简单的需要。同样,在异化的制度里,每一个领域都提出自己的尺度,因此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利润,这完全不同于一般道德的要求。“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8.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译者注)

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①

除了上述的社会异化和经济异化之外,马克思还以比早期著作更明确的方式提出了政治异化的问题,但主要不是在这部手稿中,而是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这篇文章于1844年8月发表在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机关刊物《前进报》上,是对卢格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批判性答复。

马克思探讨了赤贫问题,他和卢格相反,强调指出,国家永远也不会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祸害的根源在于和它敌对的别的政党执政,而不在于国家本身。就连比较激进的政治活动家也认为根源不在于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国家的一定形式。马克思问道,国家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呢?他回答说,“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古典古代国家和古典古代奴隶制这两种赤裸裸的古典的对立物彼此的接合,并不比现代国家和现代商业世界这两种伪装虔诚的基督教的对立物的接合更紧密”^②。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问题、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不可能在政治中、在政治理智中得到解决,因为这里谈的是更本质的异化现象。这时,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触及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时指的是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93.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ritičke primjedbe uz članak ‘Pruski kralj i socijalna reforma, Od jednog Prusa’*, *Rani radovi*, str. 178. (参见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译者注)

实际革命的问题,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政治领域。因为工人所离开的那个共同体,就其现实性和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的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因此,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而政治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普遍性,在其最庞大的形式中却隐藏着狭隘的精神。”^①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我们想结合 1844 年这部重要手稿加以介绍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问题。

应该注意,马克思曾接触到和批判地考察了力图改革当时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尝试、空想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状况等。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尝试都仍然保留着私有财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完成。因为物质的财产的统治还那么厉害,以致对这种共产主义来说,直接的实际占有是唯一目的,它想把才能舍弃,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并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这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也就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

112

^① K. Marx, *Kritičke primjedbe uz članak 'Pruski kralj i socijalna reforma, Od jednog Prusa'*, *Rani radovi*, str. 185. (参见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译者注)

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关系转向它同共同体的普遍卖淫关系。”●

在我们当前动荡不安的和存在各种各样共产主义观点的时代里，回想一下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和原理是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当时就已经至少在原则上明确提出了他30年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的观点，即从批判和克服私有财产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和从自己本身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别。因为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即扬弃作为必要历史前提的私有财产，才会产生从自己本身中成长出来的真正的人道主义。

但是，本身感染着私有财产毒素的共产主义，也会导致否定个性，因为它从贫困和迫切需要的角度来考察平等的问题。“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他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②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3.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3 - 274.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4页。——译者注)

处于这种水平的共产主义毕竟已经表现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①，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本质，同时也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的实质表述如下：“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这一段话曾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观点，就可能把这一段话解释成非历史的和空想主义的论断。但是，从马克思对历史过程的明显的辩证观点中不仅不能得出这种片面的解释，而且马克思本人在这部手稿中也驳斥了这种解释，他写道：“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③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活的占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7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译者注)

③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87.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译者注)

114 有,是对明显的异化的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中还原为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宗教的异化只发生于意识的领域,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共产主义与无神论同时开始,但是无神论仍然是一种抽象。因为无神论的博爱(filantropija)只是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是现实的准备直接付诸行动的博爱。在这些思想中,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所包含的内容,因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①。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需要一场革命。马克思在反驳卢格的文章中写道,因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革命。因为它只是推翻旧政权,所以它是政治的革命。马克思说,历史将会带来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且有了超越历史运动意识,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做是现实的进步”^②。

叙述了以上这些思想以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对这部手稿的介绍了。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天才的关于世界和人的观点已经成熟了。虽然某些明确的论断还没有提出来,但是考察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和范围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以后的著作只是说明,面临的任務主要是:彻底遵循这些基本思想,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存在,更精确地表述各种结论。

①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96.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页。——译者注)

② K. Marx, *Ekonomsko-filozofski rukopisi, Rani radovi*, str. 296.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神圣家族》

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从下一本书,即《神圣家族》就开始了,这本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德法年鉴》撰的稿,这标志着两人的真正的精神相遇。此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同样地经过了青年探索阶段,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从此就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和后来的人所共知的友谊。1844年8月底,恩格斯经过巴黎回德国,途中在马克思那里住了几天,两人再一次得出结论:他们在观点和志趣上完全一致。同时决定,对他们过去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做出答复,因为这些人在《文学总汇报》上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的文章。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这几天里,写了约20页,然后动身回德国去,以完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那本书。原稿的主要部分,20多印张,是马克思写的,所以这本书的一切比较重要的章节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全书在1845年2月底出版,名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115

书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的段落,它们涉及到批判思辨方法、分析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等等,但是我们在本书中不得不略而不谈。不过书中最有意义的,正是那些说明唯物史观的形成已经完成的段落。这本书也标志着从《论犹太人问题》开始的同鲍威尔论战的下一个阶段。《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发表以来只过了一年,但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总结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验,并把它们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实践的观点,亦即历史整体的观点已经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而且经济生产也在理论上第一次具有人的生活构成和历史构成的意义。因此,与鲍威尔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这些物质要素的思辨哲学相反,马克思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

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①

从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在理解历史因素时,不能撇开人对自然界和其他人的感性关系,即不能撇开人的生产实践。由于这种观点在以往的任何理论体系中都没有获得相应的位置,因此这些体系都多多少少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马克思特别是在以后的著作中十分强调自己的这一新贡献。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向鲍威尔指出,私有制的消灭是国民经济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取决于而且违反私有者的意志的,这仅仅因为私有制生产出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构成统一的整体,同时都是私有制世界的形式。“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

^①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Werke, sv. 2. str. 158 - 159.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351页。译者注)

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异化,成了商品,成了依附于别人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人不是作为人同别人发生关系,不是以爱报答爱,不是以信任报答信任。在那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合适,具有强大的力量,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则在这种异化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③。

117

无产阶级为了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就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他的意识是受本身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不是受某种偶然性或与其历史存在相脱离的思想演变所决定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因此“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④。

●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Werke*, sv. 2. str. 3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261页。——译者注)

●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Werke*, sv. 2. str. 3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③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Werke*, sv. 2. str. 3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④ F. Engels - K.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Werke*, sv. 2. str. 3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译者注)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不久,法国政府根据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令驱逐德国的几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首先是聚集在《前进报》周围的人。于是马克思不得不离境,并在2月初到了比利时。从马克思在2月1日致海涅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在2月初动身,在他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的离别对他来说是最难受的。^①

这样就开始了马克思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它的特点就是马克思完全形成了唯物史观,并开始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恩格斯则在德国继续住了一段时间。当马克思被驱逐的时候,他正在完成自己的一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名的书。在写这本书之前,他也做了一定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准备并且积累了实际经验。

118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3—1845)

伦敦通讯

恩格斯一生中的新时期,是从他到达英国开始的。离开了落后的德国之后,他感到英国真是一块新天地。他怀着青年人为人的解放而斗争的人道主义热情,在英国的土地上找到了开展这一斗争的十分具体而有效的形式。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修改选举法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同当时统治阶级的第一次历史性搏斗,都向恩格斯展示了为人道主义而斗争的真实基础。在英国社会里,各个阶级的利益明显地反映在各自的政党的存在上。结合着英国发达得多的社会,恩格斯很快就发现自己以往的青年黑格尔派的

^① 马克思告诉海涅,出版商列斯凯(Leske)打算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季刊(《莱茵年鉴》),除了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马克思等人外,建议海涅也为它写稿。信的结尾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中,同海涅离别是最令我难过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您的卡·马克思。”(Odebrana pisma, str. 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译者注])

观点不适合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在来到英国之前同马克思和赫斯的会见,对于他很快地从自我意识哲学不现实的思辨中清醒过来,肯定具有影响。

从1842年12月9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批文章中,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英国革命的问题,并注意到政党的问题。虽然在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以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但他已经断定,在英国,“至少在目前正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①。

恩格斯立即着手分析英国经济,并看到工业使一个国家富庶起来,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商业大危机使他们挨饿,因此,英国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是时间问题。

在恩格斯到来之前的夏天里,宪章派企图用罢工来达到实施自己的《宪章》的目的。执政当局采取了强硬措施,斗争失败了。如果在统治阶级的这种毫不宽容的态度之外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人所共知的贫困状态,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恩格斯得出的结论:在这种形势下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还是有所收获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情况,那就会发生工人在短时期内普遍失业的现象,那时,对饿死的恐惧一定会大于对法律的恐惧。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

119

^① F. Engels, *Die innern Krisen*, *Werke*, sv. 1, str. 457. (参见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译者注)

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当月发表的其他文章中^②,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应忘记,当时正好是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也已经抛弃了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并把理论研究的兴趣转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

我们从恩格斯以后的研究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知道,恩格斯在初步接触了英国的现实情况以后,很快发现了它的根本问题,于是就完全投身于研究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政治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恩格斯看到,发展的基本杠杆是物质利益的斗争,而其政治表现就是阶级斗争,于是他很快地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把1843年初当作恩格斯转到唯物主义的日子。这种新观点已经明显地反映在他后来于5月发表在《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上的文章中。

120 在5月16日的来信中他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在英国坚定不移地和平地发展。各党派及其政策取决于阶级结构:“大家知道,在英国,各个政党都是与社会阶层和阶级相一致的;托利党是与贵族和高教会派中偏执的真正正统派相一致的;辉格党由工厂主、商人和非国教徒,总的说来,由中间阶级的上层组成;中间阶级的下层组成了所谓的‘激进派’,最后,宪章派则在工人,在无产者当中拥有自己的力量。”^③

我们看到,恩格斯当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各政党的政策对社会阶级结构的依赖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关门的政治党派,但它一般在中产阶级下层和无产阶级中间征集自己的拥护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英国表明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

① F. Engels, *Die innern Krisen*, *Werke*, sv. 1, str. 460. (参见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2页。——译者注)

② 1842年12月,《莱茵报》上还发表了恩格斯的下列文章:《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8日),《各个政党的立场》(24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5日),《谷物法》(27日)。

③ F. Engels, *Briefe aus London*, *Werke*, sv. 1, str. 468. (参见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424页。——译者注)

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①

恩格斯在6月9日的来信中相当详尽地分析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激进态度、求实精神、无神论、群众集会等。可见,恩格斯站在当时最贫困的阶级一边,并从此开始为他们的解放斗争贡献自己的全部才能。恩格斯既向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介绍英国的社会状况,又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为英国人写文章,例如在11月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介绍了法国、德国和瑞士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并断言:在德国,共产主义是本国哲学发展的必然得出的结论。^②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最充分地表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这篇文章后来被马克思理所当然地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天才大纲”,它同恩格斯的另一篇评论卡莱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编的《德法年鉴》上。

121

前一篇文章,即《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更加重要得多。首先,文中表述了恩格斯当时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的一种观点:批判地对待以往的哲学,不仅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唯物主义哲学。恩格斯写道:“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

^① F. Engels, *Die innern Krisen*, *Werke*, sv. 1, str. 468. (参见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译者注)

^② 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刊登在1843年11月4日和18日的《新道德世界》上。由于他当时也同宪章派《北极星报》的编辑、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相识,该文略经删节之后,也刊登在同月的《北极星报》上。

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①

恩格斯对那种只是用抽象的唯物主义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只是用作为绝对者的自然界同基督教的上帝相对立的做法的批评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恩格斯已经看到，唯物主义需要有另一种人道主义的尺度，而这正是当时的唯物主义所缺少的。为此就需要探索现代国家的前提，需要探索被政治经济学当作绝对的永恒范畴的私有制存在的理由。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正是要完成后一个任务，而且从私有制的范畴中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其他重要范畴。

122 恩格斯首先指出，私有制的最初结果是商业，商业实际上是合法的欺诈。其次是竞争，劳动的价值也服从于竞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出现了劳动异化。“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②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又一个结果是垄断，而垄断和竞争的结果则是危机。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这种理论

^① F. Engels, *Nacrt za kritiku nacionalne ekonomije, Rani radovi*, str. 107.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Nacrt za kritiku nacionalne ekonomije, Rani radovi*, str. 122.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译者注)

表明,“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①。恩格斯从上述现象中进一步得出了资本集中的结论,并断定,所有这一切如果不导致社会革命,就必然会使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

恩格斯认为,解决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办法在于合理地组织生产。如果生产者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的后果——危机。“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②

在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中,恩格斯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这篇文章中同时也可以看出,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德国哲学对于研究和理解当时情况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应该是人的地方还是英国人。从大陆上的哲学发展中,他们只了解唯物主义,而不了解德国哲学,这正是他们的全部缺点。为了消除国家差别,英国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克服这个缺陷。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莫里逊氏丸,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

123

^① F. Engels, *Nacrt za kritiku nacionalne ekonomije, Rani radovi*, str. 131.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Nacrt za kritiku nacionalne ekonomije, Rani radovi*, str. 124 - 125.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译者注)

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①。

我们看到，恩格斯从离开青年黑格尔派之时起，不到两年，就已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探索当时的各种基本问题。对他来说，以往的哲学观点用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然是完全不能胜任的，同样，那种只是把另一个绝对者（自然界）同抽象的唯灵论对立起来的狭隘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不够的。我们发现，他采取了与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的警句时所采取的相同的立场。毫不奇怪，他们在同一个刊物上共同发表评论使得他们在整个一生中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所以恩格斯传记的作者古·迈耶尔有理由得出结论说：“这个‘未留胡子的不拘一格的青年’在放荡不羁的自由人集团中度过了一段紧张而激烈的生活之后，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些曾在那里见过他的比较重要的人物，现在看到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天才的评论之后，都感到他们发现了一位令人吃惊的奇才。很有见识的柏林医生尤利乌斯·瓦尔德克（Julius Waldeck）博士当时在写给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姑夫约翰·雅科比的信中说：‘恩格斯的思想和风格同他去年的情况相比已经成熟并具有男子汉的气概，他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这个有头脑的观察者并没有看错。尽管恩格斯的莱茵人的气质以后不时暴露出来，但是青年已经变为成人了。而作为一个已经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献身事业的人，现在已经了解了今后的方向，敢于站出来面对多数人，尽管他曾是他们必要的战友，而那些人也曾是他生活中的朋友，甚至是共命运的人。”^②

124 恩格斯在1844年8月至10月发表在巴黎《前进报》上的文章中，继续分析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文中反映出的观点，与他在马克思和卢格编的刊物上表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再一

^① F. Engels, *Položaj Engleske, Rani radovi*, str. 153. (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译者注)

^② G. Mayer, *F. Engels I*, Haag 1934, str. 171.

次看到这样的思想：18 世纪的哲学在反对抽象的主体时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即客观和主观对立，自然界和精神对立，唯物主义和唯灵论对立，抽象的普遍、实体和抽象的单一对立。^①

这篇文章在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一种想法：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目前正面临着尖锐的危机。因为在摧毁封建制度之后，建立起政治自由、利益、私有制的新社会，但仍然是一个社会依附的社会。“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②

英国面临的危机是新的对立的結果。英国全部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形成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制问题。恩格斯在伦敦写的文章的最后问道，这里说的是哪一种民主制呢？“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

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

① 参见 *Die Lage Englands* od 31. augusta 1844. God. (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8 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e Lage Englands* (od 4. septembra 1844), *Werke*, sv. 1, str. 557. (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95 页。——译者注)

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①

我们已经说过,恩格斯在8月底动身回德国。途中他在巴黎马克思处逗留到9月初。恩格斯后来在一篇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文章中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②

恩格斯为他们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写完约20页后,动身回德国去。从他当时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大力赶完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书,并积极参加故乡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他对当时德国形势的估计有点过于乐观。他处处都看到共产主义,甚至巴门的警官在他看来也是共产主义者。他组织共产主义的集会,当然同警察发生冲突。

从1844年11月19日的信中我们了解到,恩格斯从出版商维干德(O. Wigand)处得到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校样,最初的印象要比他在收到马克思的回信后在1月的信中的印象稍为好些。恩格斯在11月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其实,应当从具体的、经验的“我”出发。“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

^① F. Engels, *Die Lage Englands* (od 19. okt. 1844), *Werke*, sv. 1, str. 592. (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585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Prilog historiji Saveza komunista, Jubilarno izdanje Manifesta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33 - 134. (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①

从信中也可以看出，当他不得不谈论“人”之类的抽象观念时，或不得不阅读和写作反对神学或粗陋的唯物主义的文章时，已越来越感到厌倦和恼火。而研究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则使他得到更大的快慰。从其他的信（1845年1月20日、2月22日、3月17日）中可以了解，他同意马克思对施蒂纳的书的评价，还提到莫·赫斯，他和赫斯打算从4月1日起出版《社会明镜》月刊。后来他还谈道：“自由人”小组已经瓦解；他曾写信给费尔巴哈，向他约稿；打算出版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信中也看出，恩格斯已经很难忍受两重性的生活，即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不得不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又要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等待一有机会就动身到布鲁塞尔去探望马克思。

12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动身去比利时之后，在5月底，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了。这本书不仅是社会学领域中先驱者的著作，同时也体现了恩格斯的新的理论观点。书中已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运用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得出的新的历史观。

恩格斯把英国社会的变化同由于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发明而开始的产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考察了技术发明和珍妮纺纱机的发展，以及这一过程引起的后果，并得出结论说，这些生产资料的发展正是进一步增加生产、要求扩大市场、提高工资、抛弃田间劳动和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逐渐消失了，他们变

^① F. Engels, *Pismo Marxu od 19. novembra 1844*, *Odabrana pisma*, str. 75.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

127 成了只靠工资生活的纯织工阶级。“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下面各章加以研究的使英国无产阶级极端不快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一台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构造精密相互配套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①

恩格斯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大部分人生活的悲惨景象,指出,无产阶级是无助的,因为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资产阶级“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②。

恩格斯谈到了存在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必然性,这造成相互竞争,

^① F.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Werke, sv. 2, Berlin 1962, str. 242. (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394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Werke, sv. 2, Berlin 1962, str. 307. (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译者注)

他也谈到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中产生危机的必然性。这一切都引起阶级斗争,这只是自由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但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拥有物质力量、财产、政治国家,而无产阶级则只有用自己的阶级组织来作为斗争手段。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也谈到了英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工厂主欧文创始的,所以它很少涉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对资产阶级关怀备至,而对无产阶级则很不公道。“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①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前者比较落后,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后者比较有教养和有远见,但还没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联盟才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保证。

共产主义是使无产阶级科学地认清自己未来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对立状态,由于资产阶级缺乏远见和不肯让步,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

^① F.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Werke, sv. 2, Berlin 1962, str. 452. (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472页。——译者注)

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

129

当恩格斯在4月初到达比利时的时候,发现马克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形成新历史观的工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所做的分析,以及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天才的提纲,那么会比较清楚地理解恩格斯后来在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所写的一段话:“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②

① F. Engels,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Werke*, sv. 2, Berlin 1962, str. 505. (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译者注)恩格斯后来在本书的德文第2版序言(1892年)中指出,这一论点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统治阶级反对解放事业,工人阶级就应当自己实行社会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Prilog historiji Saveza komunista, Jubilarno izdanje Manifesta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34 - 135. (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3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下一个时期,是明确地表述他们观点的时期。

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5—184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们已经提到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一个特殊的里程碑。它作为一个思想过程的非凡的凝聚结晶,按其思想的深刻性、简练性和重要性来说,是全部哲学著作中独一无二的文献。但是,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内部酝酿和对当时欧洲生活中已经提出的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艰苦地探索答案的阶段。

130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就已经研究了《提纲》中再次概括的新观点的基本要素,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示了《提纲》的各个根本要点。因此,我们在这本如此简要地介绍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书中,就可以不再专门阐释《提纲》,因为简短的说明不可能比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这个时期的其他著作时已做的介绍提供更多的东西。况且其中某些问题我们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还将做较详细的介绍。●

《提纲》第一条和第五条中如此简练地表述的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基本思想,我们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经有机会了解到了。从生活本身的实践方式中得出关于这种实践的意识,以及得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是否具有现实性的论断,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第二条和第八条指出了思维和实践的本质联系,离开实践来谈论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纯粹是经院哲学

① 我们也请读者注意恩·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Das Prinzip Hoffnung*)一书中对《提纲》的精辟的论述和解释。

的问题。

由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因而他也是积极的存在物,所以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环境的创造者。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就是革命的实践本身(第三条)。由此可见,正如我们在介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经分析过的,马克思克服了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抽象观点,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根本的历史的范畴,只能历史地理解。因此,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认为,宗教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克服这种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存在,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此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第十条)。

131 改变和克服资产阶级世界,当然不仅是思想、观念、抽象的事,而是实际改变即革命实践的问题(第十一条)。

对马克思的《提纲》做这样简短的引言性的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并不是想解释这个著名的《提纲》,而只是想再一次指出它同1844年的著作的联系,在这些著作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基本上概括了《提纲》的思想和内容。但是有必要把《提纲》全部引证出来,因为马克思的个别思想和预见在《提纲》中表述得十分精辟和简练。

—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

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132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

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133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提纲》是作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的附录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在《序言》中评介说:“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②

一方面,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介是很有意义的,它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那种认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恩格斯当时不了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此他认为《提纲》是表述新观点的第一个文件。

134

《提纲》过去和现在无论如何都是关于人的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别的经典性的文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居住期间是他们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重要时期。马克思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同出版商列斯凯谈妥写一本关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书。但是,9月初他们得到了最新一卷《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里面刊载了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论战文章。他们马上决定进行反驳,于是开始写《莱比锡宗教会议》。在写作过程中,到年底,决定对这一部分做大的变动,增加关于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部分,因此,到1846年5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2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Werke, sv. 21, Berlin 1962, str. 264.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译者注)

月写出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宣布,这部著作的目的和意图,是要批判地指出仍然只是作为意识领域的批判的德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谬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

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的批判观点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己过去已经深入钻研过的独创的观点。他们说,不能从某些任意的前提出发,而应当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这些个人处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中,但同时也用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创造这些条件。因此,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他们与其他自然界的关
135 系。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

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观点是一切其他观点的基础。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生产、作为这一实践要素的生产资料、在这一实践生活形式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关于这一生产的意识等观念。“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64.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6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译者注)

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产、在这一生产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由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所决定的生产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从中只能抽象地区分开这种或那种关系形式,物质的或思想的关系形式。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它的各个要素,从而也决定意识本身,因为意识始终只不过是这种存在的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②

1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思想中要比他们在以后的某些著作或言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6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0.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译者注)

论中更深刻和更恰当地结合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某些后期论述,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没有想到,这种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在这种关系中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也卷入了这种关系。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实质上是机械论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把关系的整体分割开来,其实这个整体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在上面所引的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核心和主旨。人们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但是人的全部实践也包含并要求有关于这一实践的思维,即包含并要求创造关于实践和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的一定思想、观点和观念。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①。

137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但是这些前提是现实的,因为这些前提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的人,而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一旦描绘出来,历史就不再像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堆积,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基本需要(饮食、居住、衣服)的资料,而这也是一切历史必须经常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二个事实是,满足了一种需要又会产生另一种需要。最后,存在着男女之间的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译者注)

关系即建立家庭。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呈现出“历史”,从而使人们之间的任何宗教的或政治的联系成为多余之物。

人通过各种方式,甚至以受骗的形式,意识到自己的关系。但是意识本身也绝不是纯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意识最初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不可控制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自然宗教就是这种关系的证明。②

这个开始也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仍然带有动物性质。随着生产的改进和增长,出现了分工。但是真实的分工只是从物

138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道:“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6.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脚注、第534页。——译者注])

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时起才出现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①

存在分工就可能使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重新消灭分工。随着分工，出现了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平等的分配，从而出现了所有制本身，因此也出现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后，分工告诉我们，只要社会还处于自发的发​​展之中，只要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

139

●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6–37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5页。——译者注)

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虽然这些话听来有点天真,但其中包含着伟大的思想。发达的私有制社会在相互竞争中加紧发展出一系列历史上不合理的需要,把人们禁锢在狭隘的分工范围内,使人们职业化,并在这种片面性中使人们日益愚蠢。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具有多种价值的总体的存在物,他只有在自己的多种价值的能力获得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完全满足。当代人在毫无创造性的机械的专业化中的处境、感受 and 不满,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益证明,把人的专业化(它本身绝不应当是职业化)的一定需要与创造性地发展他的其他才能和兴趣结合起来是可以做到的——进一步缩短工作日是它的根本前提。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很少使用异化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当时的唯心主义加以滥用,弄得声名狼藉,但是从前面引证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一点在以后的分析中也反映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谈到下述情况的时候:“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②他们认为,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其次,在这一斗争中,力图推翻旧政权的那个阶级必然会把自已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共同的利

●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78 - 379.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536页。——译者注)

140 益。而政权本身即国家,是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同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只有当已经形成了与现存的财富和文明世界相对立的“没有财产”的人民群众时,国家才能消灭。而这两者都以生产力的高度增长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必需的,因为共产主义不能造成贫困的扩大;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了经验的全面的个人以代替地域性的个人。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②

以往历史经验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活动的扩大使个人日益处于异己力量的统治之下,归根到底是日益从属于世界市场。这种情况将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消除,随着历史完全变为世界历史,每一个个人也日益获得解放。个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来摆脱各种民族的和地域的局限性,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以便能获得利用这种全面的世界生产的能力。但是,生产力正在发展为一定的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因此对这种生产力的占有必然带有普遍性质。而对生产力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生产力相适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8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81—382.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译者注)

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一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要做到这一切,当然也需要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使他们的意识发生变化,而这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③。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把国家解释为政治异化的形式,因此在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1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19.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译者注)

③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20-42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译者注)

142 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理和结论,它们提醒必须消除国家这种力量,消除这种只具有共同体外观的抽象共同体。例如,他们在一个地方明确地谈到以往共同体的各种表现形式,谈到国家,指出国家始终与个人相对立而独立存在,由于它是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它对被统治阶级说来不仅是虚幻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新枷锁。所以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①。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和统治阶级时,也要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

●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28.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译者注)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两点需要经常更多地考虑的思想:“从以上我们对费尔巴哈的反驳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从那里也可以得出结论说,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20-42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2页。——译者注])同样,“但是,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420-421.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7—638页。——译者注])

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 and 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

143

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工，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而该阶级的另一些积极成员则很少有时间来进行精神生产和编造幻想。在这一阶级内部，可能发生尖锐的对立，但是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②，任何实际冲突中的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

我们看到，关于历史 and 人的新观点的一切基本要素，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脱稿而最终表述出来了。而且从以上介绍中可以了解，马克思的观点，以及恩格斯的观点，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和最彻底的表述。而且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一观点成熟时期的这些著作中，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解决过去和当时许多天才思想家探索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们的基本观点表达得比以后的许多场合里要更加灵活、更加概括和更加符合基本意图，因为在以后的场合里他们主要是想更清楚和更通俗地说明结论本身。后来关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93 – 394.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94.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译者注)

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关于“意识是反映”等等论断,都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两人(特别是马克思)在天才地从思想上努力揭示和考察人和历史的本质时所得出的观点的最成功的表述。

此外,这部著作也试图把全部观点综合起来,为了同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提出的有名得多的论断进行对照,也有必要把这一综合的观点引述如下:“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

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①

145

《哲学的贫困》

1846年底,马克思与蒲鲁东终于彻底决裂。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俄国政论家P.安年柯夫(P. V. Annenkov)的一封著名的信是第一个文献。信中马克思叙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简略地概括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这封信同时也像是在年底已经开始写的一部批判蒲鲁东的著作的某种序言。信中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既然我们达到了

^① K. Marx i F. Engels, *Njemčka ideologija, Rani radovi*, str. 383 - 38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译者注)《德意志意识形态》大致在1846年夏天写成。5月初第1卷手稿的主要部分曾寄给友人约·魏德迈,由他请富有的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资助出版。但是,后两个人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尖锐批判,因而拒绝出版这部手稿。全书只是到20世纪才发表,第1卷中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于1926年发表在梁赞诺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全文则发表在193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中。还请参见贝尔特·安得烈阿斯(Bert Andréas)和沃尔夫冈·蒙克(Wolfgang Mönke)作序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第8卷(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Bd. VIII, 1968)中的最新资料。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连同相应的政治制度。

146 可见,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以往的活动产物。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的是前一代人留下的生产力,这样就形成人类的历史。可见,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①。人们进行生产、消费、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形式的形式。经济范畴只是这些关系的抽象,因而不是像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永恒的。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②

可见,1846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和整个世界观的时期。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已经成熟的非凡成果,是人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我们看到,这一成果能够获得,是由于有多方面的历史的和思想的影响和前提。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要想得出彻底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以及生产观点(生产是实践的根本要素之一),历史的发展就必须达到“劳动”和“资本”(这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结构)明显对立的程度。

^① K. Marx, *Pismo Annenkovu od 28. dec. 1846. God. , Rani radovi*, str. 433. (参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译者注)

^② K. Marx, *Pismo Annenkovu od 28. dec. 1846. God. , Rani radovi*, str. 440. (参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译者注)

一个用自己的“感性活动”、生产实践、劳动的物化不仅维持本身的肉体生存,而且维持现代“财富”和现代“市民社会”生存的阶级登上舞台,无疑是形成全面而彻底的“感性活动”观点和对现实(即历史发展的基础)进行感性改造的历史前提。 147

由于这个时期,除《神圣家族》外,《哲学的贫困》是唯一得到发表的著作(1847年7月出版),因此只能从这本书中以及从稍后的《共产党宣言》中了解这种新观点的表述。我们可以说,在《哲学的贫困》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表述和阐释。

马克思当时就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部分理论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用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因为在他的整个历史观中,经济起着首要的作用。作为他研究成果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反驳。蒲鲁东不久以前是马克思的好友,在巴黎时,他们曾在好多个晚上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而且马克思力图使蒲鲁东更好地了解辩证法的实质。但是他们对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看法日益发生分歧。蒲鲁东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改良资产阶级国家身上。因此,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著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反驳了蒲鲁东,而在于马克思着手分析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所依据的新的理论观点。这本书按其基本意图,并不是要建立一门科学,而正是要批判为现存制度做某种辩护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

但是为了理解现代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需要分析商品、价值、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结果资本积累等问题。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依据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依据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接受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① 根据这一理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制造产品所必

^① 关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我们在第四章中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将更多地谈到。

148 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价格是某种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 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详细研究价值的各种形式的问题,同时还把劳动看作商品。只是到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才得出一个极重要的结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他付给的只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数额的工资。在这里就找到了理解和说明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规律的关键。

但是,马克思同一切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他的新的历史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他们的价值理论确定了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的自然的永恒规律,因此认为资本主义是非历史的现象,而马克思则为全部观念奠定了新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他在这部著作中写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②

蒲鲁东本人于1844年在巴黎进行的上面提到过的讨论过程中也曾“沾染上”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以蒲鲁东为例,再一次说明这种辩证思辨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因而是故弄玄虚的性质。从哲学范

①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47)第一章第二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117页。——译者注

② 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47, str. 96—97.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613页。——译者注)

畴中演绎出世界,就像从经济范畴中演绎出历史一样是徒劳无功的。149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

从这种理论观点必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结论和历史结论。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革命的被压迫阶级具有最大的创造力;他把这个阶级同现存生产关系的冲突看作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因此,必须解放被压迫阶级,作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前提。马克思在结束这一著作时写道:“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150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

^① 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47, str. 88.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译者注)

阶级统治呢？不是。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①

不言而喻，如果想彻底用这种观点来考察历史和具体社会事件，就必须具体地参与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因此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亲密的友人：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约瑟夫·魏德迈、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路易·海尔堡（Louis Heilberg）、塞巴斯蒂安·载勒尔（Sebastian Zeiler）、菲利浦·日果（Philippe Gigot）；参与活动的还有魏特林。在这群人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核心。他们打算把通讯委员会的联络网扩大到德国各城市，并在德、法、英等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谈判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同乔·朱·哈尼领导的宪章派左翼的谈判进行

^① 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47, str. 135 - 136.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656页。——译者注)

得比较顺利。不过哈尼要求他们同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正义者同盟”进行联系,因为哈尼和“正义者同盟”中的人已组成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不同他们取得协议,他不想参加新的组织。沙佩尔和莫尔(J. Moll)领导下的“正义者同盟”曾经邀请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他们的“同盟”,但由于“同盟”的空想主义性质,两人拒绝了。不过“同盟”在伦敦的一段时期是最有成效的时期,它日益明确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当他们两人请“同盟”建立通讯委员会时,沙佩尔回信说,已经这样做了,建立国际联系是必要的。

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必须同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认为不科学的和损害运动声誉的某些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场冲突是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委员会的会议上同魏特林发生的,并在5月彻底决裂。但是,魏特林得到拥有许多报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由于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在美国进行损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声誉的宣传,1846年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5月11日,布鲁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反对克利盖的决议。在魏德迈从德国寄来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德国关系也很紧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信徒绝不会赞同对鲍威尔、施蒂纳或卢格的观点的批判性清算。

与此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的联系日益紧密。1847年春天,莫尔在布鲁塞尔拜访马克思和在巴黎拜访恩格斯的时候,再一次邀请他们参加“同盟”,由于“同盟”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抛弃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了。同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一部著作,它是19世纪科学政治论著中流传最广的和最光辉的文献之一,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第三章 《共产党宣言》、 革命和流亡(1847—1870)

一、《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之后，参加了同年召开的“同盟”的各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出席了这次大会。像恩格斯后来所写的那样，“同盟”彻底抛弃了“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①，它由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成，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条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②

^① F. Engels, *Prilog historiji Saveza komunista*, str. 140. (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② *Statut Saveza komunista*, čl. 1. Jubilarno izdanje *Manifesta*, Zagreb 1948, str. 1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同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举行了“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提出并坚持了对历史、革命和无产阶级目的的新观点。代表大会一致接受了这些新观点,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

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恩格斯因不满意“同盟”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一份《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了自己的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原理》的提纲。同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恩格斯在11月底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①

154

因为《共产党宣言》里已把这个《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许多观点表达得更确切和更扼要,所以我们只需要举出恩格斯在这个文献中提出的在20世纪引起很大争论的某些看法。对于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回答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

^① F. Engels, *Pismo Marxu od 23 - 24. novembra 1847, Odabrana pisma* str. 105.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23—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①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这个提纲中坚持这样的看法:私有制不可能用革命一下子废除,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恩格斯还坚持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因而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②从当时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能进行的观察中产生这些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这些推测是完全有理由的,而马克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仍旧同意这种看法。然而,历史辩证法及其最富有决定性的因素——人,这一次也表明自己是更为复杂的和不可能完全被预见的,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解释中都未能理解这一点。

这就是《宣言》发表前的简单情况。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宣言》的写作并把手稿寄往伦敦,于2月份在那里以《共产党宣言》为标题而发表。这篇光辉的科学政治文献,是全世界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在当时,它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

^① F.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Werke*, sv. 4, Berlin 1959, str. 372. (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685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Werke*, sv. 4, Berlin 1959, str. 374 - 375. (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他们对历史、资本主义和革命的观点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开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156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②

与过去的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译者注)恩格斯特别在后来的1888年英文版中更确切地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②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19 - 20.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译者注)

就不能生存下去。它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破坏着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共同的财富。作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结果,竞争、争夺新市场的斗争和危机,并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

157 马克思和恩格斯简要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发展的主要阶段、最初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建立、争取解放斗争的开始以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分化,然后做出了在早些时候的著作中已经得出的论断: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28 - 29.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44.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译者注)

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①

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共产党人首先要求：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剥夺资产阶级意味着废除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对其大多数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资产阶级责备说，这会使懒惰之风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动最多的人恰恰是所得最少的人。

当资产阶级谈到所有制、道德、妇女、家庭等等时，它不懂得所有这些范畴都不过是历史的范畴，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如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写道，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158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44.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译者注)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有人责备说,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宗教、道德,从而否认存在着永恒真理这一事实,而这些永恒真理是一切社会制度所共有的。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②

159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这种政治统治,使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在开始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起来,以便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最初,只有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将会是不同的。

由于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进一步发展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③ 因此,克服和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56 - 5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59 - 60.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译者注)

^③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63.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译者注)

消除国家这种人们关系中存在的政治和暴力形式,即一定的异化形式的观点,贯穿于他们当时的全部著作中,只是在后来才明确地表述和确定为国家消亡的理论。

同样,在马克思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看到这种批判),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个人联合体并不意味着个人淹没于联合体之中,恰恰相反,意味着存在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自由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迄今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第四章中,作者确定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因此,共产党人支持一切进步运动,从而也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但同时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工人阶级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的的不同和对立。正如作者特别强调的:“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③

同样,与许多共产党人后来通常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160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63.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87.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译者注)

③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89.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译者注)

调。”^①这一点不仅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作为结束。尽管这个口号到目前为止还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它确实是形成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二、革命和流亡

《共产党宣言》是真正的海燕。首先是法国革命,以后又是德国革命,都向“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历史任务。“同盟”的全体盟员陆续都来到了德国,帮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孕育着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马克思担任了科伦《新莱茵报》的主编,恩格斯也是编辑之一,他后来又加入维利希志愿部队当副官,并参加了失败的革命的最后斗争。

在革命中,马克思支持德国民主派的极左翼。他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捍卫了革命的民主专政。因此,马克思同哥特沙克(A. Gottschalk)及其追随者的“左倾活动”发生了冲突,这些人否认同资产阶级的任何暂时的联合,并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当时,这个革命甚至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都不具备。

但是,当动摇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的時候,当1849年春法兰克福议会停止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联系,而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的义务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都清楚地表明,《新莱茵报》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

当俄国终于入侵匈牙利并扼杀革命时,德国反动派于1849年5月18日查禁了该报。退却是英勇而豪迈的,报纸的最后一期用红色

^① K. Marx i F.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ičke partije*, Zagreb 1948, str. 90.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译者注)

油墨刊印,上面登载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告别诗和告工人阶级书:“《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在这里提一下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和稍后时期发表的某些文章是有益的。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有历史的”民族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论点,当然,当时马克思也是同意这个论点的。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恩格斯认为,一部分民族,特别是斯拉夫民族,没有任何历史前途,在欧洲的“历史上有过的”民族的革命之后,它们就会被同化。

这里不需要更详细地探讨这种观点的来源。从中可以发现黑格尔的影响残余和关于“大民族”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念的影响残余。然而,当时的革命问题和一些民族对革命的态度,是促使恩格斯当时对这些民族做出如此严厉的判断的最主要的理由。由于一部分“奥地利斯拉夫人”和俄国的统治力量反对革命,并在当时大肆镇压革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由于恩格斯看到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进步运动的最大危险,他就简单地断定这些民族的大部分将失去其民族性。

历史彻底推翻了他们当时的观点,并再次证明:历史进程要比人们的理念可能对它提出的设想复杂得多。历史还证明,不能根据一个因素(无论这个因素多么重要)来做出最终判断,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整体做出最终判断。在现代,历史在其令人惊异的进程中同样证明,正是这些“反革命的”和“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恩格斯所说的“革命的”和“有历史的”民族之前,踏上了历史上崭新的道路。如上所述,

162

^① F. Engels, *Marx i "Nove rajnske novine"*, *Izabrana djela*, sv. II, Zagreb 1950, str. 312. (参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译者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观点的发展,请参见 Herwig Förder, *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Berlin 1960。

恩格斯倾向于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加入一些比一种能动的观念所允许的更多的决定论色彩,而这种能动的观点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未曾预料到,一个民族不是始终都能够利用一定时期的客观所提供的一切良机的。

然而,在这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假如恩格斯能够参与当代的革命事件,那么他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只会欢迎在一般说来他未曾料到的,然而正是他本人的思想照亮了历史发展道路的地方的新历史的产生。

由于革命的失败,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又作为流亡者在伦敦出现。为了尽快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使它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个文件也分发到其他国家里。这篇文章篇幅虽小,但很著名。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作者向无产阶级阐释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措施。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具有相对的进步性,无产阶级可以同它结成暂时同盟以反对反动势力。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目的是要尽快结束革命以实行资产阶级措施,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在资产

^① K. Marx i F. Engels, *Adresa Centralne uprave Saveza komunis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83.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译者注)

阶级革命之后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强调要坚持关于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和结成联盟的论点,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要经过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工人阶级则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宣称,工人自己“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综合的典范,文中预见到了阶级关系、阶级变动、阶级对抗和决定性斗争的一整个历史时期。不断革命——对这个问题人们后来做了极为不同的解释——被第一次明确而突出地提了出来。尽管他们当时相信革命会迅速地重新来临,但他们还是完全正确地把不断革命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并准备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非常熟悉法国的历史,而他现在,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些相隔不太远的具体历史事件。

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分析表明了法国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背景,撕掉了六月血腥屠杀工人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假面具。而且,他同样明确地揭露了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其他改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说教的反动性和荒谬性。马克思始终坚持自己过去

^① K. Marx i F. Engels, *Adresa Centralne uprave Saveza komunis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92.*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译者注)

164 关于组织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地做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①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与其他一切关于组织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革命共产主义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更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整个经济和政治运动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前还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如果不发生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5—6期的最后一次《国际评述》中提出了上述观点,正是由于这个观点,他们与维利希、沙佩尔、弗伦克尔(L. Fränkel)和莱曼(A. Lehman)彻底决裂了。这些人狂热地无批判地幻想“制造”革命,筹集供最必要的准备工作之用的款项,并期待美国的贷款,而马克思却严肃地对待革命问题,要求对一切情况和可能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在1850年11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六名中央委员(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J. G. Eccarius]、普芬德[K. Pfänder]和康拉德·施拉姆[K. Schramm])反对维利希集团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了挽救“同盟”,大多数人主张把总部迁往科伦,而到1852年底在有名的伪造的科伦审判案之后,则解散了“同盟”。^②

当时,由于物质上的困难,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在父亲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办事员,而马克思则留在伦敦,继续他业已开始的经济

^① K. Marx, *Klasne borbe u Francuskoj od 1848. do 1850.* Zagreb 1949, str. 63. (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译者注)

^② 这个问题可参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7—536页。

研究。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他还经常为各种报纸撰稿(马克思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为该报撰稿的年限特别长)。

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马克思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中以精辟的分析对这个众说纷纭的事件做了合乎实际的解释。

从理论角度看,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书中第一次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革命中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①

后来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批评,按照这些批评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一切,既决定思想又决定行动,而意识形态和个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只要举出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就足以驳倒所有这些批评了。这篇著作综合地、全面地概括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并对它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的意义,但也没有忽视人类的、个人的因素的意义。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

^① 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96.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译者注)在第一版中,这个地方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尤其是第一版中,有一段话要求无产阶级注意它的实际同盟军:“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96.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脚注。——译者注])

^② K. Marx, *Osamnaesti brumaire Louisa Bonapart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211.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译者注)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的生活很困苦。然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在恩格斯对他的经常的慷慨帮助下,马克思还是于19世纪50年代末完成了他后来的一部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导言。但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也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而且由于马克思在其序言中以他特有的经典式的简练笔调,只用一页的篇幅便概括了自己关于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使它成为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段最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天才的综合,因此把它全文抄录如下:

166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

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167

我在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提到,马克思的这段对自己的基本历史观的卓越综合,后来被人们用一种恰恰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方式,即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做了解释。我们以后将有机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和斯大林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提出的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像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一样,只是做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许多人出于对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传统看法,把这些观点简单地解释为只是反映论的特殊情况,从而或多或少地用机械决定论的精神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我们再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提出的、正好是很不恰当的和非常简化的表述,即马克思强调“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

^① K.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1907, str. LV - LVI.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马克思这方面，也存在着主要以古典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解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推动力。

只要注意到我们在探讨马克思 1844—1847 年的著作时所指出的和当时特别强调的他的观点和分析，就可以结合马克思的本来意图对所有这些地方做出正确的解释。

在这篇著作发表之后不久，1860 年发生了同卡尔·福格特(K. Vogt)的争论。为此，马克思写了著名的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1 年)。^②

168 这些年里，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斐·

① K. Marx, *Pogovor drugom izdanju Kapitala I*, Zagreb 1947, str. LXIII - LXIV.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译者注)

② 梅林和梁赞诺夫对这篇著作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梁赞诺夫这样叙述了这些分歧：“梅林完全忽视了流亡者中间发生的主要争执。他没有看到，在这个似乎纯粹是个人事件的后面，隐藏着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深刻的策略上的分歧，而且正如拉萨尔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危险的动摇。梅林也未注意到，在这本批判福格特的书中，拉萨尔及其伙伴们的一切论据也受到了批判。”(D. Rjazanov, *Marx i Engels*, Beograd 1952, str. 141)

拉萨尔^①开始在工人中进行著名的鼓动,并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种鼓动是以若干基本要求和论点为根据的,首先是以争取普选权的要求和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论点为根据的。拉萨尔断言,这个规律不允许工人的工资超过一定的限额。

由于他的“现实政策”、依赖普鲁士国家的态度和理论上的错误立场与空虚,拉萨尔同过去曾经友好相处的马克思发生了冲突。^②

拉萨尔的这种活动在当时毕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说,必须注意到,拉萨尔从未克服过黑格尔的思辨;而从政治上说,他幻想普鲁士王国能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改革,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甚至导致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声誉。正是这些观点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

169

^①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和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他是一名法学家,创作了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巨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以及法学和经济学著作《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和《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或资本和劳动》(1864年)等作品,是革命后第一个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而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空虚的和政治上无原则的人。去世之前,他曾着手同普鲁士国家和俾斯麦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由于拉萨尔在决斗中死亡,他的这些观点才没有发展到完全败坏他个人和他的有功绩的事业的名声。

卡·弗·布罗克施米特特别着重强调了拉萨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他认为,拉萨尔基本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只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结论,并且是纯粹的理论”。(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1)至于拉萨尔的革命观点,作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生硬的抽象”,(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5),是把革命理解为“像自然力那样迸发出来的一种原则的胜利,因而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宿命论和机械论的”。(K. F.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uttgart 1929, str. 16)他的看法是,拉萨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并更有决定意义。

^② 在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这样说明了他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Pismo Kugelmannu od 23. febuara 1865*, *Pisma Kugelmannu*, Zagreb 1951. Str. 12. [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译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其政策而言,更接近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

三、第一国际

然而,正是在这几年中,发生了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但它能够顺利地克服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则应该首先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从国际建立之日起就热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他认为,这不仅是实现自己的理论理想,而且也是实现现代历史基本任务的唯一可能的实际杠杆。

早在制定国际的章程和纲领时,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人(鲁·沃尔弗[L. Wolff]、约·韦斯顿[J. Weston]、勒·吕贝[Le Lubez]等人)本身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发生了最初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和社会主义者中间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①

170 马克思通过他的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为基础,在不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的条件下,成功地团结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派别。马克思告知在

^① 指奥·布朗基(1805—1881)、约·蒲鲁东(1809—1865)和米·巴枯宁(1814—1876)的观点和学说。我们以前已经指出,尽管布朗基的策略是错误的,但他属于法国革命运动中最光辉的人物之列。他主张并为之奋斗的思想是:必须依靠一批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革命者,用暴力方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批判》(1885年)。约·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著作外,他后来的著作《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年)、《交换银行》(1848年)、《人民银行》(1848年)和《进步哲学》(1853年)也有影响。米·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只从事暴动的组织工作,以图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企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主要著作是《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

曼彻斯特的恩格斯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①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实行的政策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仍应成为国际工人合作的典范。因为工人运动今天还未统一，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而且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却面临着自己的最后斗争和最后进程的决定性时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当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解放、落后国家提高到现代水平的任务以及人类的生存本身还成为问题的时候，今天应当像过去一样，合理地克服很多策略性和纲领性的分歧。

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未能妨碍马克思。为了使工人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争取解放的方式，他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通过制定纲领、章程、成立宣言和许多通告，提出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的看法，从而教导无产阶级学会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和解释它自己的斗争。

这样，马克思得以在国际章程（这个章程直到1871年9月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才被通过）中写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¹⁷¹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

^① K. Marx, *Pismo Engelsu od 4. novembra 1864. Briefwechsel*, sv. III, str. 238.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①

在1872年8月补入章程的第七条(a)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活动中就向工人阶级指出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②。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或在某些信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还能够被人解释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独立政党，那么上面引用的这些观点就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而今天某些社会主义者仍旧这样解释。

在谈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需要强调的其他理论观点时，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问题以及关于合作运
172 动问题的观点，后一问题常常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主义者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等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特别注意的。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在他就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给国际总委员会所做的指示中写道：“我们认为，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

^① K. Marx,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341. (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译者注)

^② K. Marx, *Opći statut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udruženja, Izabrana djela*, sv. I, str. 343. (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歪曲。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就像任何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即: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①

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反映出了他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一。不管这一过程将经过各个什么样的阶段,从人类生产和总的生产力所必然达到的高度成就来看,这一过程只能随着大分工的消除,即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消除而获得最终的解决。特别是在现代原子能和电子学发展的前景下,人将怎样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际技术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在理论上很清楚,终生固定在一种劳动形式上,是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比起他的许多能力中单纯一种能力的部分发挥要复杂得多和丰富得多。

马克思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之一,并指出自由的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联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是有远大历史前途的。他在指示中写道:“但是,合作制度在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靠个人的努力所能为它创造的狭小形式局限之下,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②

173

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因为,只要存在着资产阶级

①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Prv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0, str. 60. (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Prv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0, str. 63. (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译者注)

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就总是不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仍然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个国家机器就会立即行动起来。这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说,任何阶级统治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在他的指示中同样还确定了社会主义对民族问题和工会运动的明确立场。法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坚持这样的论点:民族是“陈腐的偏见”,应当把民族分解为小的团体和公社,再组成联合体,但不是国家。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民族是一种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忽视的必然的产物,他坚持民族自决,而反对任何模范民族的说法。^①

174 马克思在当时关于工会运动的含义、必要性和意义的争论中,坚持认为“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工会和工会在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上的斗争。“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②

在这个时期,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因此,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上,马

^①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次争论时写道:“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Pismo Engelsu od 20. juna 1866, Briefwechsel*, sv. III, str. 408.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译者注])同样,马克思稍晚些在碰到爱尔兰问题时写道:“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K. Marx, *Povjerljivo saopćenje Generalnog savjeta, Pisma Kugelmannu*, str. 127. [参见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4页。——译者注])

^② K. Marx, *Instrukcije delegatima privremenog Generalnog savjeta o pojedinim pitanjima*, str. 64. (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273页。——译者注)

克思终于同蒲鲁东主义者彻底决裂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这个时期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他们中间以托伦(H. L. Tolain)和弗里布尔(E. Fribourg)为首的右翼脱离了工人运动,而以瓦尔兰(L. E. Vorlain)为首的左翼则日益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决议,向工人们推荐在1867年第一次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个时期,国际同统治制度进行了日益尖锐的斗争,而它也碰到了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严重的内部不和。工人运动的多数支持国际。可是拉萨尔死后由施韦泽(J. B. Schweizer)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国际,这是一种少有的情况。然而,1869年倍倍尔(A. Bebel)和李卜克内西(W. Liebknecht)在爱森纳赫创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党,它立即加入了国际。新党成立时,俾斯麦正力图实现其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大德意志的野心,为此,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之后,他需要再取得一次类似的成功。同样,拿破仑第三也想这样做,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俾斯麦的阴谋得逞了。战争在1870年7月爆发,而此后不久,就是色当战役。

马克思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写道,不管战争如何发展,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

马克思一旦领悟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学中去寻求,就对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仅始终注意对这个社会的解剖,而且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更注意把这个社会看作人类阶级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之一。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同样也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有紧密的联系,同变革这个世界的革命纲领有紧密的联系,这个世界一方面使人全面地异化,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自身灭亡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任何忽

视,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意图的片面解释和阐述,甚至弄到连马克思著作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都不理解的地步。这个批判,并不是在指出缺点和纠正错误论点的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的批判,即辩证地扬弃一门实质上是市民社会理论的科学,而基本意图则是克服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是与他以往在哲学上和一般理论上建立一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的阶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若撇开这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我们将会发现,是无法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基本的和根本的意图的;同时,马克思的著作,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分析,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与他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基本区别,恰恰在于他关于历史和人的新的哲学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能够比那些仅仅对市民社会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更深入和更彻底地解决经济关系中某些特殊问题。^①

176

当然,在英国这个经济上较其他一切国家都先进的国家里,探索和研究近代史时期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经济范畴的工作,获得了最大的推动力和最系统的材料。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价值、积累、利润等)的看法,开始在劳动价值论中日益获得解决。在这个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人们关系的领域中,早期的探索和理论突破,从威廉·配第(W. Petty)起,经过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和理查·康替龙(R. Cantillon),而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天

^①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观点,需要从实质上分析他的一些观点以及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迄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分析尤其遭到忽视,因此从整体上考察就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现代有关这些问题的几本比较有价值的专著是,卡·柯尔施:《卡尔·马克思》(K. Korsch, *Karl Marx*, 1938);厄·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Ernest Mandel,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Paris 1967);罗·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史》(Roman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ischen "Kapital"*, I, II, Frankfurt a. M., Wien 1968)。

才研究和综合中达到了顶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自己的成果和论断写入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

177 亚当·斯密在这部著作中,尽管不是完全彻底地,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解新经济制度的基础,并且极为明确地指出了作为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基础的分工的发展。但是,斯密作为一个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社会的理论家,像其他代表人物一样,认为有关人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解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观点是斯密的社会观的基础。卓越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罗尔(E. Roll)在谈到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经济学派(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派之间尽管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思维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它的实质就在于把重点放在自然的东西上,而不是放在人造的东西上。这种思想包含着一种信念,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制度(不问这种制度是如何确定的),它胜过人们创造出来的一切其他制度。这种思想认为,对于明智的社会组织来说,只需要做一件事:尽量按照这种自然制度的原则行动。这里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行动,因此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要求实行的政策,后来看来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宣布自然权利先于人定权利的原则。”^①

斯密也特别强调自然制度的优越性和人定制度的缺陷。因此需要允许个人有自由的进取心,因为它本身就包含在这种自然秩序之中。在年轻的资产阶级要求尽可能多地享受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和要求尽可能少地受到任何社会机关限制的时期,斯密是资产阶级理论的倡导者,而且是著名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倡导者。既然社会秩序和社会机构都只会造成障碍,那么就更加需要限制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满足于怀念自己的伟大的思想先

^① Eric Roll, *Povijest ekonomske misli*, Zagreb 1956, str. 114 - 115.

驱者,满足于看到他们的某些范畴(如财产自由或竞争自由)是在历史上具有相对意义的范畴。然而人的自由和人的个性的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资本主义财产自由和进取心的基础上的。正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更高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阶段的前提一样,资产阶级个人自由在历史上的实现也是社会主义中人的个性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迄今还不具备这些前提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对社会主义自由的曲解。然而,斯密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范畴都看作是永恒的和天经地义的。

178

这种观点也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 - 1823)的经济分析的依据。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时(1817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经过革命搏斗以后,已经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而站稳了脚跟。虽然李嘉图已经有条件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统一地概括劳动理论,但是他也和他的伟大的前辈一样,仍然陷入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制度的幻觉。李嘉图引证了斯密关于劳动是价值基础的观点,然后得出结论:“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因为在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

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①

179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李嘉图的身上达到了最高的理论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职能方面,马克思能从李嘉图的严密分析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同时也不应当忽略西斯蒙第(J. Ch. L. Sismondi, 1773 - 1842)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西斯蒙第曾把生产过剩和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为竞争以及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这导致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决定生产的是资本而不是需要,这个事实造成了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反常现象。西斯蒙第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并且对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肯定产生了影响,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是保守的,因而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同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W. Thompson)、约翰·格雷(J. Gray)、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 F. Bray)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重要,他们从李嘉图的分析中得出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结论,研究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要素,并把英国的功利主义彻底变成消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要求。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 1787 - 1869)是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已经把资本当作一定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并且基本上追随着当时英国和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步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总之,无论在狭义还是广义的经济问题上,马克思都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丰富的思想成果

^① David Ricardo, *Načela političke ekonomije*, Zagreb 1953, str. 8 - 9. (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9 页。——译者注)而关于资本主义范畴是永恒范畴的论断,最好引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话:“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类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David Ricardo, *Načela političke ekonomije*, Zagreb 1953, str. 4 [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7—18 页。——译者注])

来分析这些问题。

二、略论方法

然而,马克思与所有的前辈不同,他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问题之前,曾经过一段内容丰富的紧张的思索时期,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在和当时欧洲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进行极有创见的对话中,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0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在理论上的新贡献,即他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辩证法的观点。在简要地介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时,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不仅对蒲鲁东,而且也对其他经济学家的两点主要责难:第一,指出他们方法的错误,即把历史的东西说成自然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关系理解为自然的关系因而是永恒的关系;第二,指出生产关系也和反映这些关系、利益和目的的观念和范畴一样,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因此只能说这些范畴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产物。

同样,在稍后的时期,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手稿》^①的导言中曾提到:自由的个人,在18世纪的思想家和后来的经济学家看来,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②。

马克思针对系统分析和论述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也使我们能够看出他的辩证思想。例如,他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而在经济学上从作为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初

① 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包含在这些手稿中。——译者注)

②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5—6.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译者注)

看起来似乎是最正确的。然而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这个范畴就是一个寻常的抽象,而阶级又是以分工、交换、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个分析向我们指明,最初的抽象是由越来越简单的规定组成的。如果反过来从这些简单的规定出发,再达到人口的范畴,那么我们这次得到的就不会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因而马克思认为,后一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一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具体的辩证法,即具体是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在

181 黑格尔那里由一种幻觉,即把具体理解为思维抽象综合过程的结果这一幻觉所产生的外观问题。“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

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①

马克思也以“劳动”这个看来十分简单的范畴为例说明了这方面的困难,他提醒说,设想通过劳动这个范畴替人——不论在何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一个抽象的表现,这是不十分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对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样看待,那么这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劳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因而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而这种状况只是最现代的社会的特点,因此这种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

182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1 - 2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也明确地规定了自己方法论的总原则:“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K. Marx, *Predgovor drugom izdanju Kapitala, Kapital I*, str. LXIII - LXIV.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译者注])

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①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以及在阐明经济范畴时,都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在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的是存在的形式,而且常常只是它的个别侧面,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看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然而,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而不懂地租却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②

三、资本

同样,马克思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正是在对这个范畴的理解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辩护性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本质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包含了马克思著作和他的历史批判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再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5 - 26.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953, str. 27 - 28.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译者注)

次提到蒲鲁东,因为蒲鲁东认为,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马克思随即着重指出了理解这个范畴的要点:“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有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忽视了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自由劳动和可能购买这种劳动的人的关系。资本可以从一个资本家手中分离出来,并转交给另一个资本家,但资本家一旦失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可以这样地与个别资本家分离,但是它不能与作为资本家而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家分离。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写道:“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184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176.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译者注)

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①

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也特别强调这个基本区别。他写道,自然界并没有在一方造成货币和商品的所有者,而在另一方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可见,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关系。“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②

185 总之,资本作为—定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现象的基础。由于这种关系的直接表现是商品生产,而每个商品都具有可使用和可交换的属性,因此只有依据对这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才能进一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即表现在一切个性和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的某种—般的形式上。马克思写道,这是截然不同于过去的情况,在过去,个人在家庭中或部落中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③

但是,价值生产造成了某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马克思早在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41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50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 Zagreb 1947, str. 127.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译者注)

^③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4 - 75.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译者注)

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再次做了同样的分析和论证,由此可以系统地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在这些异化现象中,马克思看到了批判雇佣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及在历史上克服这些关系的根本理由。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

186

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①

在同一《手稿》接下去的一些段落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它只有在这种物的形式中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要性表明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和为社会而进行生产，个人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此，像某些改革家所设想的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监督，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187 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克服现代人的片面状态，这就必然要考虑到这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新的更深刻的历史进程的前提。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其相互关系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他们绝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5.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译者注)。从大量的原文中我们还可以引一段：“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357 - 358.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译者注])

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①

因此,简而言之,资本意味着一种异化关系。马克思早在十四年前在自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定的这些异化现象,在现在的这部著作中又提了出来,虽然他没有像在过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对异化现象做系统的分析。但是资本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分为两方:一方是能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是拥有货币资金和生产力的资本家,他雇佣和使用劳动力,以便为自己创造价值,最终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所力图强调的和主张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方式扬弃的,正是这种根本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资产阶级文明中一切非人道的现象的基础。这当然也是《资本论》全书作为基础的观念。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也包含了这一问题。马克思问道:一种可感觉的物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神秘的性质,而货币连同它的全部“怪癖”以及对人的统治也是如此,这种神秘的性质从何而来呢?他指出,这种谜一般的性质来源于采取商品形式的产品本身。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

188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9 - 80.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译者注)

^②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214.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译者注)

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①。

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私人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赋予这些劳动以特殊的性质。于是他们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②。劳动产品只是在交换中才获得脱离其使用价值的价值性质,因而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取得了二重性: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同时必须同另一种私人劳动相交换。它们之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然而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37.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译者注)马克思接着对拜物教的概念做了解释:“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Kapital I*, str. 37-3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 str. 3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①。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是揭示了,而是更加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当一个生产者用自己的商品去换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商品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旦跑到其他生产形式中,这种神秘性就消失了。例如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存在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形式的劳动就没有必要采取与它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②。马克思还以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为例,说明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为了分配就必须确立一种尺度,因而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成为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以及同自己的产品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

同样地,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也简单明了得多,然而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3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下面还说,“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Kapital I*, str. 4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 str. 4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译者注)

190 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①。

综上所述,足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要点和基础。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仅是商品拜物教,而且是这种现象的另一面即人的普遍物化。这种关系的结果同时也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在不断地把人变为资本、垄断、国家、民族等等结构的真正客体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相对立的日益庞大的力量。正如我们所强调过的,只有在这些哲学论据中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以后的全部分析以及他的历史批判的意义。同样也才能把握住马克思40年代的著作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理论联系。因而,正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发现了现代社会反常现象的基础,同样,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强调,他所做的分析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世界的物化问题上,而是放在这个世界的异化、外化和外在化上,即放在不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所有的巨大的物的权力上。马克思同时确定:“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译者注)马克思还把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生产的这种关系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联系起来: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Kapital I*, str. 43-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而不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①

191

在介绍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所阐明的某些观点,如关于人的解放以及克服人的物化存在和拜物教存在的看法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从本质上加以阐明的一些问题,否则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历史局限性。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在解释价值问题时,首先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就连李嘉图也没有彻底解决人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以表现出来的基础所具有的不同性质,更没有解开创造剩余价值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

马克思在1859年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价值理论,他在那里写道:“假定1盎司金、1吨铁、1夸特小麦、20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对象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716.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①

由此可见,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这是这样一种简单劳动,它的性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里是不同的,它是其他任何复杂劳动的基本要素,因为复杂劳动实际上是简单劳动的总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认为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无可辩驳的:世界上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

但是,现在在这里却碰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一个难题。既然一切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那么资本家获得的比他投入生产时更多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交换过程中产生,因为一方如果高于价值出卖商品,那么另一方就要因此受到损失,可是价值的总量仍然是一样的。如果停留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上,以为资本家偿付了劳动,那么又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资本家偿付了工人的全部劳动,那么积累在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此等等。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是由马克思第一个解决的,为此,他正是利用了在前几章中指出的

^① K.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1907, str. 3 - 4.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译者注)

那些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能够生产价值的商品即劳动力。这样一来,物化关系的性质就彻底暴露出来了。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从而也就有权按照既定的劳动日去使用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劳动力的所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正如生产过程中所表明的,工人只要用劳动日的一部分时间进行劳动,就足以生产出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仅仅是劳动日的一部分。

“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①因此,工人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换得劳动力的日价值。但是,对工人来说,只要用一部分劳动时间(比如说半日)就足以生产出维持他的生活,即维持他的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日的其余部分,他实际上是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工人在这部分无偿的劳动日中所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而占为己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发明的,因为在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各个社会中都存在剩余劳动。但是,在那些古代社会中,占优势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从生产本身的性质中还没有产生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1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16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①

六、资本积累

这样就揭开了剩余价值及其各种不同形式形成的秘密。同时也为阐明资本积累的实质,为说明哪些生产要素创造这一积累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他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经济制度的地方正在于: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需要,而是首先用于新的生产。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添置新的生产资料,用于增加可变资本(劳动力)。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187 - 18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扼要地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6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Kapital III*, str. 79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3页。——译者注])

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①。

马克思既科学地说明了资本的产生,又科学地阐明了工人即社会上实际创造物质财富的那一部分人所受的剥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时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成了工人阶级开展斗争和观察未来的基本指南。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构成是以这样的方式增长的,即它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工人)要提高得快,这样经常就有一部分工人过剩,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资本家的竞争所造成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在竞争中都力图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包含价值较少的商品,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进和增添各种机器,以便能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可是这样一来,用少得多的工人操作的更为完善的机器代替了许多工人,从而使一部分工人阶级成为“过剩的”人口。“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②

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还要快。因此,还留在生产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就不断受到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威胁,而资本家则利用这种情况来尽量进行剥削。马克思在结束自己根据1866年以前的事实所做的这一分析时断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547.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 str. 55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196 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①

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K. Kautsky)等人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而不是绝对贫困化;布哈林(N. I. Buharin)则承认工人阶级的处境靠牺牲殖民地而有改善;诸如此类等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最新时期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详细进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对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的,当时上述这些论断完全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得到证实。但是,不能否认,从那时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了改善。当代的俄国经济学家莫罗佐夫(A. Morozov)、格列则尔曼(G. Glezerman)、列昂节夫(A. Leontijev)等人证明,美国或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这是在分析工资的基础上所用的一种最常见的诡辩术(根据工资来确定生活水平就可能出现这种诡辩术,而要想避免得出片面的结论,就必须考察许多因素)。

由此又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驳倒了马克思的结论呢?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57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最后一句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此外均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不断增加、“过剩的工人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经常存在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条件下仍然起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当时他本人并没有分析使这个规律(其他任何规律也一样)发生变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大大地削弱这个规律作用的情况,尽管这往往是通过损害某些其他生产者的方式而实现的。 197

不能忽视工人通过自己的各种政党和工会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斗争。这些政党和工会通过争取提高工人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给失业工人社会救济等等,也使得这个始终力求以最纯粹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本身有所改变。

同样,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首先通过对殖民地的奴役来实现资本扩张和取得超额利润。如果说通过这种方式 and 上面提到的方式可以使某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那么不能否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生活条件就降到了最低水平之下。

另一方面,价值较少的商品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无疑使居于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此外,不应忘记,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生产扩大、生产过剩,以至大量的“过剩人口”,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矛盾之中,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正常的和对社会有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战争和战争灾祸。可见,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常态”,必然需要一种完全非人道的手段。

仅仅对上述几个条件的简短分析表明,存在着许多“使这个规律有所变化”的情况,而且对每一个国家必须分别做出具体分析,因为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可能和另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有相当大的差别。

也不应忘记和上述问题有联系的一个事实(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198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前史,当时对靠自己的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小手工业者的资产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最无耻的和最野蛮的剥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形成的时候,相互竞争的规律、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在它的内部开始发生作用。现在被剥夺的对象已经是资本家本身了。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

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著名的预见性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帝国主义的现代史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为马克思所不能完全预见的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点同马克思的总的论点并不矛盾。马克思证明,竞争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导致了对较弱小的资本家的不断剥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过程直到今天显然还在继续进行。

199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那么就可以看出,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也不能解决在大危机(席卷了这些国家的大危机)中大规模的暂时的贫困状态,同样也不能解决世界性的战争灾祸(这实际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桎梏的表现)。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旧型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经表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恰好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情形那样),国家机关本身就承担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摆脱直接的阶级影响,并力图通过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再也不能适应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凡是工人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的地方(而这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就日益把暂时解决劳资矛盾的责任担负起来。而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这种干预,不能以其他方式发展,只能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直到剥夺私人资本即把整个生产部门国有化的方式而发展。这样一来,旧的资本主义形式被否定了,我们在这一发展

^① K. Marx, *Kapital I*, str. 683 - 68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3—874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中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就其结构来说,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前阶。^①

200 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必然要反抗这种过程。同样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不能在自身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日常的现实,只有国家能够(如果以资本主义的范围为限)以自己的有力的干预来减轻这种后果,并寻找暂时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中,是当前历史时期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跳板。

因为在这个阶段上,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可能性:或者国家机关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强化起来,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成为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障碍,这样就势必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消除这个最后的强大的桎梏以建立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善于利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来加强工人阶级参与管理生产和整个社会过程,这样就能以较小的震动来达到同一目的。因此,今天工人阶级对这一发展采取正确的方针,是它的政策的基石之一。

某些国际历史情况可能在个别国家中引起无产阶级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的直接革命行动,从而缩短这一过程;但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这些国际历史情况。

总之,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正是作为一种趋势,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是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这一趋势的思想。所谓某种发展趋势,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一种发展方向,它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不同的程度、各种不同的阶段为前

^①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布哈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对这种现象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现象当时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在列宁和布哈林之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却完全忽视了这些过程,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提,而所有这些可能性、程度和阶段在理论上是不可能预见的;因此在复杂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当代历史的复杂的发展中的一切因素、一切情况、一切作用和各种偶然性,也是不可能预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对利润和利润率的分析,进一步补充、阐明和论证了自己的这一学说。在那里,他从另一些更为具体的方面说明了上述过程的不可避免性。 201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的增长比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增长要快得多。但是,正因为有机构成发生这样的变化,于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即利润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性而日益下降。

由于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之比,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创造的,可是劳动力同不变资本相比却在不断减少,所以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就是利润率下降。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了许多起着与这个规律相反的作用的影响,它们削弱这个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规律发生变化等等,——因此马克思说的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资本家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表现为利润、利息或地租的剩余价值,必须增加投入运转的资本量。但是,由于资本的这种不断增加是在相对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变资本的增加相对而言要快得多),所以就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经常趋势。资本家首先通过增加总资本量来弥补这一点,这样,尽管利润率降低了,但仍能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总利润量。

马克思断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总的说来,与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相适应的,是二者的绝对增加。我们讲过,

202 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更高或不变资本以更大程度相对增加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 $1/2$,现在只占 $1/6$,那么,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①

所以,资本家不得不尽量增加总资本,以便通过增加利润量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样增加资本和增加生产,实际上却具有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时所见到的那些后果。它引起生产过剩、小资本的破产、危机等等,从而表明,资本主义由于自己内部发展的必然性不能使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于是,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由于自身的下降而延缓了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并引起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灾祸。马克思指出,某些把资本主义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在这里为自己造成了限制。“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②

^① K. Marx, *Kapital III*, str. 188 - 18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II*, str. 206.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译者注)

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如下:“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①

我们打算叙述马克思这部不朽的著作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切成就。我们只想强调指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马克思还全面地阐明了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及关于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而这一切不仅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必要理论基础。 203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现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地方,马克思曾关注一个论点(这个论点直到今天仍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

^① K. Marx, *Kapital III*, str. 812 - 81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5—997页。——译者注)

204

辩护者所津津乐道):即认为自由竞争是人们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由于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基础——即资本的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继续说,这种观念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索然无味的。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种个人自由的历史意义,但它毕竟也意味着取消个人自由和个人受到社会条件的束缚,这些社会条件具有不依个人为转移的现实力量和事物的形式。此外,“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①。

我们看到,这种关系产生各种异化形式,从而也使现实生活神秘化。马克思在当时就以宗教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种神秘化为例,主张建立“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是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产品的“自由结合的人”的表现。马克思始终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就是不仅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求消除任何使生产者和他的产品脱离的关系,以及任何可能使一个社会集团变成统治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既反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反对一切国家主义关系,甚至反对在废除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主义关系。因此,“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②。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1857 - 1858), Berlin 1983, str. 545.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 str. 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为人摆脱以往形式的分工(这对于人的活动方式特别重要)创造条件中,科学和技术随着这个过程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马克思认为,那时财富的创造将不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①

205

劳动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有机地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机器工业极其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生产和财富的基础,既不是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统治,总之,社会个人的发展是这种财富的基础。“**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9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译者注)

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

可见,马克思当时就已经明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人仍然需要用大量的时间从事生产,而科学过去和现在都是最强大的生产力。他写道,因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机器、机车、电报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只是在这种迅猛有力的知识发展过程中,才会具备人类解放的前提。

206 上述所有这些论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引证所有谈到这些问题的地方),都只是告诉我们马克思进行经济研究和他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补充说,主要不是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论述中,而正是从他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它的经济结构和构成这个一定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的辩证关系所做的全部无比卓越的分析中,可以最好地和最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

本着这种看法的精神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曾重复指出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在历史上和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形式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② 同样,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而资本是对抗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未付等价物而从工人那里取走剩余劳动,因此这种劳动按其本质仍然是强制劳动。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始终应当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其他的阶级制度下,具有对抗的性质,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用比以往的社会形态更巧妙的方式榨取这种剩

^① K. Marx, *Grundrisse* 法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7 - 1858), Berlin 1953, str. 593.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译者注)

^② 参见 K. Marx, *Kapital III*, str. 75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页。——译者注)

余劳动。同时,它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同样,它又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①。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处在这种物质生产领域之外。“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②

207

如果把马克思所解释的劳动范畴概括或理解为这样的范畴:它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实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本质,那么可以理所当然地做出结论,从马克思的分析和主张中应当得出消除和克服这种劳动的论点。但是,如果把劳动范畴理解为人对现实,特别是对自然的一种基本关系的表现,即创造物质生活前提的关

^① K. Marx, *Kapital III*, str. 75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Kapital III*, str. 756.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译者注)

系的表现,那么当然谈不上消除劳动这回事。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领域作为必然性的领域仍然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领域。至于它还将在多大范围内作为非自由的领域存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把这个非自由的领域和自由时间的领域抽象地对立起来,也不认为非自由的领域将会变成游戏。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即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的增加,在马克思看来,将会成为最大的劳动生产力,回过头去促进生产过程本身。因此,“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①。

当然,抽象区分这两个领域会得出片面的歪曲的结论。这里毕竟仍然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两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明确的理由可以有充分根据和有说服力地取消两者的区别。

马克思从19世纪的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尽管时间拖得这么长,马克思却没有能在生前出版全书。《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出版的,他为此而工作到1894年。原定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大批手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的标题第一次出版。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入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 Berlin 1953, str. 599.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译者注)

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

马克思花在这部著作中的巨大劳动是不会白费的。他的著作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新的社会力量的科学思想在理论上极其伟大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和能力:它能够在一种社会制度的现状中揭示出它的必然界限、它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从而彻底坚持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辩证观点,即在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发现它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否定。

第五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一、《法兰西内战》

路易·波拿巴妄自尊大的行为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使皇帝本人也被俘的一场真正可怜的模仿剧。

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共和国的“国防政府”,而普鲁士的军队包围了巴黎。局势非常困难,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中向法国工人阶级指出:“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力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

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①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戏剧性地曲折得多。当梯也尔(L. A. Thiers)以新政府的名义企图解除革命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和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时,发生了政府军队与人民以及国民自卫军的友好联谊,并在1871年3月18日宣布公社成立。

巴黎公社社员的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成为马克思以前的一些理论观点的证实,同时又是他以后的一些极有意义的结论和预见的基础。尽管马克思原先发出过警告,却首先欢欣鼓舞地赞扬、欢迎和支持这个历史性的和革命的既成事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在事件发生后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②

在分析巴黎无产阶级的这些英雄举动时,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根本的方面,即公社的精神和性质上。特别是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这篇著名著作的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从封建君主制到

^① K. Marx, *Zweite Adresse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Werke*, sv. 17, Berlin 1962, str. 277 - 278.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Pismo Kugelmannu od 12. aprila 1871*, *Pisma Kugelmannu*, str. 151 - 152. (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353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的本质,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始终是主要的政治杠杆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11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①。

必须注意,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待旧国家态度问题的这些基本思想的正确性。但是,由于我们以后在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时将看到的那些原因,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一个重要得多的任务:通过建立废弃传统的等级制政权形式的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来消除国家组织。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公社的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

在这篇著作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了以前所有国家形式的实质后,还简略地做出结论:“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

^①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36.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译者注)在《法兰西内战》第二稿中,马克思写道:“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Zwei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592.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译者注])

^②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42.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①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②

212

这里第一次表述了“生产者自治”的思想,换言之,即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了20世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斗争的旗号。欧洲现代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标志下度过的,因为,从俄国的苏维埃开始,经过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一直到斯大林的官僚国家主义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努力方向,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一种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共同体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共同体。

所以,马克思强调了公社的另一个特征:“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

① K. Marx,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r. 17, str. 541.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译者注)

②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39.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译者注)

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①

213 其中某些问题,如关于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和公社委员“随时可以撤换”的问题,对于迄今的历史形势来说是十分理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官僚集团甚至不想为粗暴地违反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的行为辩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活动者,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保障。尽管迄今的经验如此,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要求仍然是社会主义变革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在公社里不能一下子实现。他在同一篇《宣言》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

^①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39.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译者注) 在初稿中马克思写道:“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K. Marx, *Erster Entwurf zum: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544.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新社会因素。”^①

从法国无产阶级宣告了历史上新的人与人关系的这些不寻常的革命事件中,马克思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结论。同时,他面对欧洲反动派的一切喧嚣和指责,勇敢地站在法国无产阶级一边,并通过自己的《宣言》为这种英雄举动写下了最美好的、富有思想内容的和十分亲切的献词。马克思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②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形势的特点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俾斯麦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策划了反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叛国案,并判
214
处他们徒刑,因为他们提出抗议,反对战争和俾斯麦的政策。英国的工联日益转向经济斗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法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损失极大。国际总委员会本身也发生了分歧,总委员会委员本·鲁克拉夫特(B. Lucraft)和乔·奥哲尔(G. Odger)不同意马克思的《宣言》而退出了国际。同时,巴枯宁也加紧了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的攻击,这样,在1871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巴枯宁主义的问题成了主要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否认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宣布在革命后必须消灭一切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一次遭到失败。所以,双方为将于1872年9月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同时证实巴枯宁没有解散在国际内部的秘密的“同盟”,就把他和吉约姆(J. Guillaume)开除出

^①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43.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② K.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Werke*, sv. 17, str. 362.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译者注)

国际。^①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歧,对于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具有原则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后果。梅林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说来较为出色的著作中却低估了上述争论,因为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野心或者威信的问题,而是当代“劳动与资本”之间巨大斗争的关键问题。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怎样进行这个斗争和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社会斗争的成果、速度与性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上,放在这些斗争引起的社会革命上,以及放在建立保卫革命成果和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武器——新型国家上;而巴枯宁却坚持秘密小集团的立场,主张暴动,并在这类革命之后打碎任何国家。在这里,前者的立场是要吸引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培养他们为今后的伟大行动做好准备;而后者的立场则是使群众消极被动,从而正好对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毫无准备,这部分工作是:执行社会职能,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必须以生产者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为根源和基础,而不是以专家治国论的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官僚集团为根源和基础。所以,这里谈的是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政治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论方面有重要意义。大会闭幕后,在1872年9月8日,马克思立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演说,他的速记稿刊登在1872年9月15日的《自由报》上。对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过武装革命还是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已经作为二难推论而被非辩证地提出来了),马克思说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指实现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注),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

^①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5—515页;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同上书,第521—540页。

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①

一个意义多么重大的教导！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中，曾多少次提出过这样的对立：是武装革命还是进化？从马克思时期起，经过修正主义到现代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多少次非辩证地确定过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在今天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理论上是多么地不成熟，以致仍然常常看不到这两种解决办法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对于某一个国家，根据它的发展水平，它的内部力量和矛盾、传统和思想觉悟等，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对这一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情况的凑合下，另一个解决办法也可能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把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一种从自己的改革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绝对地排除掉。因此，在某个国家里，仅仅为武装革命培养革命力量，如同仅仅为改良、进化和民主道路而片面地机会主义地培养革命力量一样，会给革命运动带来同样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的历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216

上述事件同时也是第一国际最后的较大的行动。由于在欧洲、在工人运动中和在国际本身中发生的这类错综复杂的事件，总委员会留在欧洲国家中已经十分困难。美国没有这些情况，同时那里强大的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关于把总委员会所在地迁到纽约的动议得到通过。国际又维持了几年，到 1876 年，总委员会宣布国际不再作为统一的组织存在下去。

^① K. Marx, *Rede über den Haager Kongress*, *Werke*, sv. 18, Berlin 1962, str. 160. (参见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9 页。——译者注)

国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的队伍中锻炼出许多革命干部,他们后来担当起了组织工人运动的新任务。第一国际幸运之处是在它的队伍中有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它应当感谢马克思澄清了许多对现代阶级斗争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问题。工人阶级感谢国际,因为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国际性质与国际团结,尽管这个因素至今还没有成为工人阶级行动的坚定不移的基础。^①

二、《哥达纲领批判》

所有这些事件之后,基本上进入了马克思活动的最后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发生了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17 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特别有价值的表现。恩格斯在1870年终于迁居伦敦,在国际中日益代替了马克思。

由于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产生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文件。拉萨尔派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困难而要求合并,爱森纳赫派也表示愿意。在哥达的统一大会上(1875年2月)通过了纲领,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容忍并做了许多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这个纲领。马克思曾为此写信给白拉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②马克思在他对纲领的批注中提出了一些有特殊理论意义的思想。

^① 不妨从马克思进行回顾的上述演讲中再引一个地方:“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K. Marx, *Rede über den haager kongress*, *Werke*, sv. 18, Berlin 1962, str. 161.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译者注])

^② K. Marx, *Pismo Brackeu od 5. maja 1875*; *Iz Briefe an Bebel, Liebknecht, Kautsky und andere*, Moskau-Leningrad 1933, str. 117. (参见马克思:《致威·白拉克(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为突出而准确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即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想。

在研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我认为不应忽视的是: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在最发达的国家普遍胜利的结果。由此得出没有外来的经济压迫和没有军费的巨大经济负担的比较和平地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在上述设想中,取消军队这个多余的机构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马克思在自己的批注中驳斥拉萨尔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偏见时,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顺利发展,这种社会组织在该阶段上将取消商品生产,而劳动也将不再表现为价值。“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①

218

但是,这个社会仍然带有否定的因素和局限性,因为它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

^①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19-20.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34页。——译者注)

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219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这里实质上概括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任何行政措施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而只能使它缓和和不致尖锐化。当经济结构还不能消灭分工,不仅仍然产生着资产阶级权利,而且常常产生着资产阶级关系的时候,任何从行政上宣布这个阶段已被超越和宣布某个社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都只是表明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解得很差。

^①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20 - 21.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35页。——译者注)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哥达纲领批判》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受到了马克思尖锐的批评,同样也受到了恩格斯(在他的一些信中)的批评。在那个时期,这种不成熟是不足为奇的。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它常常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因而可以说,问题的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是当时最贫乏的方面之一。

在同一个时期,即1875年前后,由于首批攻击马克思《资本论》220的人之一、大学讲师欧·杜林(E. Dühring)的出现,这些弱点便暴露出来了。当时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科学领域做出了目空一切的评价,尖锐地批评了黑格尔和整个辩证法,因而在大学生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轰动。只是到1875年,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才看到杜林的观点不仅是混乱的,而且是错误的,便请求恩格斯给予回击。恩格斯并不乐意与杜林进行论战^②,因为他正紧张地研究自然科学问题(后来手稿被收集起来于1925年以《自然辩证法》的书名出版)。对于发表恩格斯关于杜林的文章的问题,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莫斯特[J. Most])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读者对文章没有任何兴趣,建议不要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登载。倍倍尔提出一个

^① K.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Werke*, sv. 19, Berlin 1962, str. 21.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译者注)

^② 参见恩格斯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417页。——译者注)

折中方案挽救了局势。折中方案是：由于文章本身太长，所以不在《前进报》而在它的学术附刊上发表。此后在1878年文章以单行本出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的这一著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虽然文章是论战性的，也就是说，不是系统地分析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问題，但这本书尽管有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扼要概述。同样，这本书在大多数国家里起到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作用。

221 我们不能像人们有时希望的那样，把这本书以及后来写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和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评价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系统化，从而是详尽研究这个方面所有主要问题的努力和结果。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以论战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甚至是硬加给他的（例如杜林硬加给他的）问题。如同以后一些著作中的情况那样，由于忙于一系列其他的政治任务 and 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仅仅提出了他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问题，对某些问题则研究得不够甚至片面化。恩格斯在致梅林、布洛赫（J. Bloch）、施米特的最后几封信中明确地谈到上述某些问题。^①此外，恩格斯不具有马克思那样深湛的天才，常常为了通俗化和由于理论上无可非议的具体情况，而以简单的形式提出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这些著作，必须正

^① 特别请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4、594—601、656—661、667—670页。——译者注）。恩格斯在一生最后时期的这些信中，特别是在致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也叙述了自己对艺术、艺术倾向和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观点。因此这些书信，连同他和马克思就拉萨尔的《济金根》一剧致拉萨尔的信，是研究他们的艺术问题观点的重要原始材料。除了卢卡奇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著作之外，还请参见彼·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P. Demetz: *Marx, Engels und die Dichter*, Stuttgart 1959）。

确地遵循恩格斯的嘱咐和指示——而且要进一步,即克服一定的片面性,根据人类的全部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和哲学发展,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种坚持和努力中,恩格斯的著作也和马克思的著作一样,始终是产生了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新观念的最有独创性和最生气勃勃的文献。

正在这个时候,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1878年),企图以此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严重的危机。党对这个措施没有准备而发生分化,这时,一个由伯恩施坦、赫希柏格(K. Höchberg)和施拉姆组成的小集团企图提出它的机会主义观点,声明反对秘密活动和反对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个所谓“苏黎世三人团”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反对“通过大力宣传争取资产阶级”的观点,反对中间政策,并得出了具有预见性的结论:“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①

必须注意到,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伯恩施坦成为20年后出现的修正主义的主要人物,正是这样的一些人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222

马克思的生命已接近接束。1881年底,他的妻子燕妮去世了,她作为这位社会主义的最著名人物的忠实而贤惠的伴侣,共同经历了一个革命家和流亡者一生的种种艰难和坎坷。1883年初,最后的打击又降临:他的女儿燕妮去世了。大量的工作、斗争以及贫困和疾病使这位不倦的工作者,争取人类新的更合乎人道的关系的战士,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最天才的人物耗尽了精力,他于1883年3月14日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逝世。

^① K. Marx i F. Engels, *Briefe an Bebel, Liebknecht, Braeke und andere od sredine septembra 1879*. God., Moskau-Leningrad 1933, str. 205.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译者注)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人物,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富有经验、最见多识广、理论上最有能力的人。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一件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出版马克思来不及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在履行其他各项职责的同时,忘我地完成这个辛苦的工作。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而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此外,还必须承担与大部分地区革命运动的几乎全部的通讯工作,写新的文章,为某些著作再版写序言,并且写了 he 著名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我们还要简略地分析一篇恩格斯的著作,它被后来的那些自以为代表了恩格斯关于革命问题真正观点的修正主义者当作重要文件和论据。这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篇文章在1895年3月,即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成,因此被称为恩格斯的理论遗嘱。

正是伯恩斯坦断言,恩格斯否认革命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并宣布议会道路是比较适宜的。尽管恩格斯写这篇导言时应允李卜克内西要他“缓和”些的请求,但他实质上丝毫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观点。他仅仅指出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街垒巷战是十足幻想的事情(因为是防御性的和消极的),指出了在那些年代取得了巨大成绩的议会斗争的意义。最后,指出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革命。

必须立即澄清一个被修正主义者掩盖的基本问题:街垒巷战不是革命。革命是进攻、掌握政权和改变社会关系,街垒巷战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由此,恩格斯完全正确地做出结论:“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

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年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①

恩格斯正确地确定了工人阶级由于军队、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巨大进步而面临的新情况。他实际上重申了他和马克思一直主张的看法:革命不是由少数优秀的人们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②

恩格斯对这类工作和议会斗争的好处和效力并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特别强调,必须经常保持社会民主党选民的这种增长势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③。由此可见,恩格斯一点也没有把“决战的一天”设想为友好联谊的节日,而看成是阶级的决战,为此需要发动一切未经发动的力量。“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224

^①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19 - 521. (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547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3. (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550页。——译者注)

^③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4. (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译者注)

唯一权利……。”^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以这些话又一次论证了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立场。

恩格斯直到晚年即在逝世之前,在分析和评价人及其历史活动时,保持了革命的明确性。1895年8月5日,这位当代共产主义的伟大人物与世长辞。

^① F. Engels, *Einleitung zu Marx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Werke*, sv. 22, Berlin 1963, str. 524. (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译者注)

第六章 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现在我们只剩下考察恩格斯晚年时期的理论观点这项工作了。在这篇综合性的评述中,没有必要联系到各种哲学观念来专门逐一介绍这个时期的各部著作(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起,直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止),这首先是因为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和论点,尽管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样,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些著作中每一部都有一些表述方式和对问题的看法,它们提供了对哲学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的论证的可能性。^①

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曾结合辩证法的问题十分努力地钻研自然科学。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当时他虽然很不乐意,但还是卷入了同杜林的论战。恩格斯面临的任务是,坚决保卫辩证法以驳斥杜林的攻击,同时阐明一种新的哲学的原则,这种哲学与唯心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不同,尤其是与当时十分时髦的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

^① 在本章的某些部分,我利用了自己过去写的一篇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和事业》(*Friedrich Engels - čovjek i djelo*),但没有专门注明出处。该文载于南斯拉夫《哲学》(*Filozofija*)杂志1966年第2期。

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任务都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个人几乎难以解决的。

226 在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发展以后,以及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使自然哲学成为多余的东西以后,应该怎样解释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呢?任何一种彻底的哲学思想都不能在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和精神的東西、主体和客体、原则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等问题面前退却,那么应该怎样坚持这种哲学思想的无所不包的性质呢?怎样创造一种哲学,它实质上既是辩证的而又唯物主义的呢?最后,怎样解决一项十分复杂的思想工作,使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哲学观点成为这方面观点的综合的基本部分?

恩格斯当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而只是提供了许多片断,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但是我们要补充一句,这项任务直到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也还没有能全面而系统地完成。因此,如果我们想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开拓新道路的先驱者,那么就更加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自己。

一、基本观点

在探讨哲学问题的所有主要著作中,恩格斯不仅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像黑格尔那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为自己解决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以及一切存在物的辩证性质问题。

恩格斯也从这些前提出发,但当然是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以后才这样做的。既然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是互相脱节的,既然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见到的那样,这种关系以实践为根本特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适用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任何唯物主义都具有的特点,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原则。“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

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①

物质存在的一般方式是运动。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是对于这种或那种运动形式才有意义。“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②

恩格斯力求避免机械论的物质观和运动观,明确地强调指出,“运动应用于物质,就是一般的变化”^③。由此可见,运动的多种多样形式不能归结为最简单的形式——机械运动,因为一般的变化包括了运动和变化的全部多样性,从无机物的变化起直到社会变化和心理变化。这就是说,这个原理以不同质的运动形式为前提,但是每一种变化本身也包括了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位置移动。“这决不是说,每一种高级的运动形式并不总是必然与某种真正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反应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各种主要形式的本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就穷尽了思维的本质吗?”^④

^① F.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Werke, sv. 20, Berlin 1962, str. 4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Werke, sv. 20, str. 354.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译者注)

^③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51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译者注)

^④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51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译者注)

既然运动被理解为一般的变化,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运动的不灭不仅要从量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要从质的意义上来理解。

这就是说,不仅物质的运动不灭,而且物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不灭,物质创造本身存在的不同质的形式的能力不灭。^①同样,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也意味着克服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关于存在某种最后的不变元素或原子的观点,主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辩证性,即可变性。

恩格斯提出了物质和运动客观性的论点,自然把空间和时间理解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

可见,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功能,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没有运动着的物质的空间和时间,只是不符合现实的人的理性抽象。从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着的物质的联系中,也会合乎逻辑地得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以及它们的永恒性和无限性。^③

^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写道:“有人说,物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性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分化,从而展示这种运动的全部多样性,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25.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48.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译者注)

^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维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维。”(*Anti-Dühring*, str. 46.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4页。——译者注])

二、实践的原则

对恩格斯来说,世界统一于物质性,为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和实践的关系奠定了可能性的基本前提,主体和客体都只是存在物的不同要素。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理解为本体关系的一种特殊要素、特殊情况。因此,主体不是在原则上与客体相对立的,但也不能与客体是同一的。

但是,这里根本的一点,即这种关系的历史尺度,也就是实践历史尺度,在恩格斯当时的表述中却常常被忽略了,为的是让实在论的(realistički)认识论观点连同反映论居于首位。正是这种观点后来被奉为不可侵犯的基本观点,以致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固有观点和解决办法被忽略了。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解释的两重性,也就是前后不一,从后面的考察中将马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恩格斯对他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当然没有抛弃,因为这样做就无异于否定对哲学问题的重大贡献。因此,恩格斯当时在解释主体和客体关系时所依据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实践的观点。不管他在自己著作的某些段落里对实践的范畴是怎样表述的,这里应当指出,恩格斯对这个范畴没有做详尽的分析^①,不过他毕竟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

^① 例如,他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尽管是顺便地,却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地把实践解释为实验和工业:“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Werke, sv. 21, Berlin 1962, str. 276.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译者注])

230 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谈到人的产生时也从同样的思想出发。他在引证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思想后,补充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②

恩格斯把人对自然界的感知,即对现实的新属性和新特征的认识,也同人的实践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机体其余部分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98 - 499.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44.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译者注)

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① 231

恩格斯在这里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界的显著变化,把劳动看作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不仅是人的物质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人的精神能力发展的基础。虽然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像他和马克思在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把劳动的范畴同实践的范畴完全等同起来,但他把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自然界现实的明显变化看作是人发展的基础、主体和客观现实之间的重要联结点,因而也是考察这种关系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这个问题的研究时断定:“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②

三、认识的问题

鉴于人们把恩格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反映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一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恩格斯不是思辨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引证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前面提到过的1848年以前的早期著作(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两人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在哲学问题上,恩格斯当时的另外两部著作首先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批驳杜林的那部著作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这本书作为论战性文集,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哲学问题,而主要是提出和保卫辩证方法以驳斥杜林的攻击和观点。而在这种反驳中就可能出现许多表达得不完善或不够深思熟虑的地方,以致个别观点可以被后来的许多

232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46 - 447.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52.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拿来简单地表述反映论等等。

例如,对于什么是意识和思维、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恩格斯回答说:“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①

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保卫的只是古典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如果我们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在实践问题上所说的一切,以及恩格斯在写反驳杜林的文章的同时在自然辩证法问题的札记中所表述的一切都包括进去的话,这里的观点也是不充分的。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强调了古典唯物主义关于实在第一性的观点,他说:“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②

从恩格斯的这些观点里,自然不难得出一种马克思以前的反映论,那种反映论把整个问题完全庸俗化了。恩格斯在上面引过的著作的另一些地方也提供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根据。他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的一个地方得出结论说:“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3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3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译者注)

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①后来,特别是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主义,从上述的形象化的表述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到黑格尔时所用的譬喻也是如此)出发,把事情理解得非常简单和容易: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而已。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整个现实的基础,应当用辩证地发展着的物质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主张做这种解释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由此而得到的只是某种“辩证化了的”18世纪唯物主义。

233

但是,如果我们想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彻底对待问题,则问题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而且非常艰巨。实践的观点不仅克服了思辨的观点,而且带来了根本的历史尺度,而这一点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没有充分强调。但他也从来没有完全忽略掉。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必然性的问题和范畴时,他的批评是针对经验主义和思辨唯物主义的,不言而喻也是针对唯心主义的。他提醒说,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解决办法不能证明必然性这个范畴的存在和现实世界关系的存在,以致休谟的批评和怀疑论在这方面倒变得有理了。人除了考察外部世界,还引起一定的运动,甚至引起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运动,并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休谟的怀疑论也许说得对:有规则的 post 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 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据。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②

^① 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r. 293.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97-498.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483页。——译者注)

在同一页上他明确地提醒：“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

234 在后来的论述社会主义发展的文章的英文版序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上相同的思想脉络。恩格斯批判地谈到不可知论，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观点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但是人们在开始“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②

在接下去的段落中，恩格斯谈到了不可知论关于我们仍然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责难。恩格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是与黑格尔相同的，并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事物本身。这样，对于恩格斯来说，康德的自在之物也就完结了，因为任何本质必然会表现出来，而通过这些表现出来的因素和属性可以理解其本质。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出一种物体的组成成分，并用这些组成成分重新合成该物体，那么我们就完全掌握了这种物体的构成。恩格斯首先以化学分析和合成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只要彻底坚持自己早期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把人同现实的实践关系看作基本的和第一性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思维和认识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97.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Einleitung (zur englischen Ausgabe, 1892)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Werke*, sv. 19, str. 530.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07页。——译者注)

看作历史的产物。“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①

235

四、辩证法问题

从以上的介绍中已经可以了解,恩格斯不仅试图把辩证法概括为“历史辩证法”,即人类历史实践的构成因素,而且试图完全循着黑格尔的脚步和意图继续前进,把辩证法看作一切存在物运动 and 发展的方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30 - 33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译者注)在另一处地方,恩格斯同样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意识的历史性:“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联系还是精神的和历史的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 or 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F. Engels, *Anti Dühring*, str. 34 - 35.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译者注])

236 式,以及思维和研究的方法。既然恩格斯完全知道,在自然界,而不仅是在历史中,可以谈发展的问题,那么辩证法作为最发达的发展论必然适用于存在物本身。同样,只要我们从我们的思维和现实之间可以不存在脱节现象这个前提以及历史经验出发,现实的一定的辩证结构也会与我们思维的辩证结构相吻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本身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和无能为力的。

这无疑是最根本的思想前提,恩格斯根据这一前提,并没有把辩证法的领域仅仅局限于人类的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它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①

由此也产生了恩格斯对哲学的对象和意义的看法。还应该补充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48.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464页。——译者注)

一点,恩格斯无疑受到当时资产阶级哲学中迫切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对辩证法攻击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理论原因以外,这也是一些基本原因,它们使得恩格斯把哲学问题局限为逻辑问题和辩证法问题,其中逻辑问题也包括传统的形式逻辑问题,而辩证法问题也包括传统的本体论问题。

从恩格斯的这个结论中也可以引申出一个思想:哲学的发展表明,它日益从各个局部的领域中被排挤出来,这些领域成了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前面引过的著作中,恩格斯得出结论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①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都表明,对哲学问题做这样的限制是不恰当的。但是,恩格斯在他所理解的辩证法的范围和性质的情况下特别关心辩证法问题的原因,如果考虑到当时哲学的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时毕希纳(L. Büchner)、福格特、杜林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观念在各界广大人士中以及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在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先验论的方法开始复活。

与此相反,辩证法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以往哲学发展的最高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3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译者注)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恩格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r. 293.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译者注])

的革命成就的方法,而黑格尔在被当时资产阶级哲学轻率地鄙弃之后,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最深刻和最全面地发展了辩证法要素的思想家。^①

238 恩格斯后来在概括自己的观点时,从前面已经引过的关于一切存在物具有辩证性的观点出发,承认辩证法的普遍性。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些提法,也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哲学修养较差的后人有可能对哲学问题做本体论的解释,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理论中则被极端地庸俗化了。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②关于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做了更具体的论述。特别是在反驳杜林的文章中,由于首先要说明这些规律应当包含什么内容,恩格斯主要对黑格尔关于这些辩证过程的观点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而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甚至可以说,从理论方面看,这些解释也表现出相当的缺陷。

^① 马克思始终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杜林“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Marxova pisma Kugelmannu, Zagreb 1951, str. 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译者注])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断然肯定:“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K. Marx, Kapital I, str. LXIV.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r. 292 - 293.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译者注)

在有关对立面和矛盾的问题上,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观点,因为杜林认为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相对静止的、各自独立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碰不到任何矛盾,因而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足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

239

在这里以及其他的例子中,恩格斯主要沿着黑格尔的步伐前进。例如,正和负作为对立的两极,我们不仅看到它们对立,而且看到它们不可分离和互相渗透。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想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112.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译者注)

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

否定的否定问题,在黑格尔本身那里也是最具有思辨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没有按照自己的习惯想去深入地进行分析,而是更多地停留在列举个别例子上。而仅限于举例和不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就很容易导致不仅使问题简单化,而且使问题庸俗化。

240 请看,恩格斯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举了下列例子:“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30倍。”^②

无须特别提醒,否定的否定问题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说明,为了弄通这个问题,需要超越黑格尔的解说。但是,为了理解恩格斯赋予辩证规律的意义,在这里需要提到他的一点意见。恩格斯在批驳杜林硬说马克思认为这些规律具有必然性时,特别强调,马克思指出历史过程按照这些辩证规律发展,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过程必然地发展。“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1 - 22.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在《自然辩证法》札记中,恩格斯写道:“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8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126.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译者注)

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①

关于量转化为质的辩证规律问题,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例子,特别是化学的例子,做了最充分的说明。他认为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他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对这一规律的实质表述如:“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② 241

列举物理学和化学领域中的例子,我们就到此为止,只是想再一次强调指出,恩格斯论述辩证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反驳杜林对辩证法的批判和轻视,并指出辩证法的某些原理和规律的意义和内容。辩证法的这些原理和规律是黑格尔确定的而马克思则把它们运用来具体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尽管系统地 and 综合地探讨这个问题并不是恩格斯的本来意图,不过他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125.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49.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译者注)

这样处理却同时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里没有看到人类历史的重要尺度,没有看到历史状况和人类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而辩证法的问题只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中才获得自己的全部意义和说明。可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被后人以这种方式做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解释,尤其是在对它做逐字逐句的毫无创造性的理解的情况下。

五、某些逻辑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也根据黑格尔的分析和观点,涉及到某些专门的逻辑问题。大家知道,黑格尔曾尖锐地批判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并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思维按照这个同一律都是不相同的。恩格斯遵循黑格尔的分析,提出抽象的同一性仅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足够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所遇到的是很小的范围和很短的时间。可是自然科学却一点一点地证明了同一性本身包含着差异性的事实。“但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排除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但它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①

与形式逻辑的判断论相反,恩格斯也接受黑格尔的观点,即任何判断都反映了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也就是对立的统一,因而同时也反映了现实本身的一定辩证关系。“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全书》第1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85.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译者注)

部第 231 页)。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同样,恩格斯以人的经验和科学发展为例,指出黑格尔对判断的分类比形式逻辑的分类更加正确。黑格尔不是撇开这些判断的内部关系和联系把它们罗列起来,而是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判断,使它们互相隶属,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是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恩格斯设法证明,黑格尔关于实在的判断、反省的判断、必然性的判断、概念的判断的分类符合历史规律和具有历史根据。他以热的概念为例,指出如何从关于热的个别经验,从而从摩擦生热的个别判断,经过千百年的科学经验,得出了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的特殊判断。不久以后,迈尔(R. Mayer)就能从这个由他、焦耳(J. Joule)和柯尔丁(L. Colding)提出的定理出发,把上述反省的判断提高到具有绝对价值的判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243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做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第二个判断可以看做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遍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84.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译者注)

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暂时无法来讨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即生命”^①。

这些例子只是告诉我们，恩格斯在解决一门通常只是被看作形式科学的科学的具体问题时，指出人和现实之间的实践关系对于这种科学也具有多么巨大的决定性意义。我们的思维形式、逻辑形式和逻辑定理，也是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千百年来经验和实际证明的公式，因而它们也是属于历史的和全人类的。

六、必然和自由

必然和自由的问题，也同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一样，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主要是本着黑格尔观点的精神来解决的。在决定论的观念中，即使是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观念中，当然是不能谈自由的，因为在必然事件的观念中存在着普遍必然性的统治。恩格斯把必然性理解为普遍的和合乎规律的因素的表现，并遵循黑格尔的分析，认为这种普遍的因素只是通过个别的、单个的事物和现象而存在并发生作用。由于它始终存在于与现象因素的统一中，而这种现象因素并不是普遍因素的无条件的表现（因而不是必然的表现），所以它对于某一种事物或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根本的东西。这些个别的特性不构成种的差异，它们可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种的发展所必需的，但是是无限千差万别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这一观点表述如下：“因此，我们认为，偶然的东就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可能这样存在也可能那样存在的东；而且它是否存在和是这样存在还

^①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93 – 494.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译者注)

是那样存在,不是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某种别的东西。”^①

在这一观念中,偶然现象对于个体的发展主要是非本质的;但是,一定的偶然现象在例如某一个种的发展中,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而是必然的和本质的。整个达尔文主义实质上就是建立在这种由偶然向必然的转变之上,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已经提到了:“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断扩大,以至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突破的近因也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种概念。”^②

此外,这个观点表明,这些个别的属性和偶然性同样也是一定的原因的结果,首先是外部原因的结果,因而也是被决定的。至于我们对于一定的偶然性的决定因素认识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们能够把它们确定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决定性”的概念和“必然性”的概念不是等同的。必然性同样是决定性的一种形式,犹如通常的因果性归根到底也是偶然性一样。

必然和自由虽然不是唯一对立的命题,但是在有关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特别是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的原则,人是自由的实体,具有创

245

^① G. W. F. Hegel, *System der Philosophie*, I dio, Stuttgart - Bad Cannstatt, 1964, str. 326.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8页。——译者注)恩格斯在列举豌豆等各种例子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并得出结论说:“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即使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49.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480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489.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81页。——译者注)

造者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发展和自然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这个矛盾是大多数哲学研究所遇到的基本困难和伤脑筋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事物进程本身和人类生活中存在的矛盾。

决定论者和非决定论者就人的自由问题进行的长期争论，是力求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努力的证明。而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超越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自由观，为阐明这个人类之谜提供了进一步的成分。

恩格斯在自己的晚期著作中没有沿着马克思早期的这些分析继续前进，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论证人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从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更深和更广的基础，恩格斯主要是追随黑格尔的观点，这种观点缩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范围，把它归结为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按照这种较窄的观点，人并不完全是自发发展的产物，他在自己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并不完全是必然性的盲目工具，因为他也能够认识这种必然性，并根据这种认识，利用他原来所服从的各种力量和自发势力等等，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人的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必然性认识的程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

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

可见，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和一切历史因素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对制约着他的规律认识得越多，他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就越自由。人通过发现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决定因素，日益摆脱束缚着他的一系列限制。因为人的不自由不仅在于社会经济领域，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在那里，由于各种形式的异化，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自由的可能性，也没有意识到直接决定自己生活的因素。

七、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

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时，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存在某种不取决于具体的人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独立的历史。正因为如此，说意识形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不够的。

意识形态过程的特点正在于，思想家往往对意识做“相反的”了解，他们臆想，似乎这种思想过程正好是基本的、根本的过程，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每一个思想家都设想，他只是继承以往时代的思想，他的思想具有决定时代本身的创造性，甚至设想他的思想是历史和人的绝对真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使人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识设想为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对现存的关系、实践和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认识。

思想家没有看到，他自己也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没有意识到，他在解决某种理论冲突时，实际上正是在解决着人们历史实践中现存的神突；他没有看到，他为新的社会关系而奋斗时所信奉的“思想”，只不过是对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矛盾和对要求克服这一矛盾的新的现实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认识。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106.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在某一阶级的思想家看来,一切事物都仅仅发生于思想领域中,因此,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在各自的领域中:在哲学、法学、道德、政治等领域中寻求和确定绝对真理。恩格斯在晚年致梅林的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①

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因素,就是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每一种思想,对于这个时代是绝对的,而在人类整个发展中则是相对的。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界限和实践界限,实质上也就是它的理论界限。人类实践每前进一步,都在理论和人们的意识面前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任务。

人们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体现了它的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其中经济方面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影响中,不能忽视思想的影响,因而也不能忽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过程

^① F. Engels, *Pismo F. Mehringu od 14. jula 1893. Odabrana pisma*, str. 318. (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658页。——译者注)

本身的影响。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是抱有自己的愿望、利益、理想和观点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所有这些成分也是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新事物的向往,如果不相信或不了解这种新事物将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那么无论在过去或将来都不会创造出历史来。但是,所有这些向往、信念或知识都得通过人们的头脑,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正如马克思在年轻时所写的,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真正的物质力量。

因此,恩格斯在致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中特别尖锐地提出,要提防某些把他们的观点说成经济主义观点的批评或解释。他在上述致梅林的信中写道:“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①

本着同样的精神,恩格斯也谈到了道德和宗教的意识形态性质。 249

^① F. Engels, *Pismo F. Mehringu od 14. jula 1893. Odabrana pisma*, str. 319. (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9页。——译者注)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F. Engels, *Pismo C. Schmidtu od 27. oktobr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11.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译者注])在同一封信中谈到思想家时,也指出,“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F. Engels, *Pismo C. Schmidtu od 27. oktobr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11-312.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道德问题历来就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思想家注意的中心,因为他们实质上解决着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哲学家把自己的伦理学体系看作自己哲学研究的目的,力图在哲学研究中对有关人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关于善、人道、一般伦理的观念和定义——做出解答。伦理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理论中最充分地反映出哲学家本人的社会立场和意图。

在恩格斯看来,道德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和一切社会关系一样,首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统一的伦理观,因为某一种阶级关系和阶级制度,首先和主要只是对于在该社会中享受一定特权的阶层即统治阶层来说,才是好的。同样,关于人道、剥削、友谊,简言之,关于善和恶,不同的集团和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①

250 对于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恩格斯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他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87 - 88.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0页。——译者注)他在同一著作中还写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87.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译者注])

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写道,更高的即更远离自己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①

因此,恩格斯在这些解释中遵循着自己和马克思的早期观点。宗教现象的根源,应当在社会本身中、在人们克服内部矛盾的程度中,以及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寻找。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人的思维的必然产物。

在原始公社中,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形式,是由于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而产生的(直到今天,处在这种发展水平的社会中还在产生着宗教),当时自然界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东西而与人对立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与此相适应,人们征服自然的水平也极低,这就是说,对自然事件、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的认识也极差。^②

征服自然的水平低下,对不可预测的和尚未认识的自然事件、力量和偶然性的依赖,对这些没有认识的事物的经常性的恐惧,就决定了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人们中间产生各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这里也就是宗教和巫术的因素,以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上和科学上的实际落后

^① 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r. 302.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②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F. Engels, *Pismo C. Schmidtu od 27. oktobr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11.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着重号是弗兰茨基加的。——译者注])

251 状态和弱点。“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与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①

由此可见,这些原始宗教的性质,是与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阶级社会中的宗教根本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本上是取得胜利的民族的宗教,以后是取得胜利的阶级的宗教,这些氏族和阶级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强加于其他氏族和阶级,并以此作为巩固本身的政治地位的形式之一;而在被剥削阶层中间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观念,它们的职能是安抚被剥削群众的困难处境,并给他们带来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仰,虽然这是在完全虚幻的彼岸世界中。被剥削社会阶层的宗教观念是符合他们的现实状况和愿望的。而这些宗教观念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对统治阶层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统治阶级多半把这些宗教观念拿来,把它们改变得适合于阶级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因此,阶级社会的矛盾、社会对抗和无知,是经常产生宗教现象的社会基础,而且只要上述情况未被克服,它们还将是产生宗教现象的社会基础。今天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仍然“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

252 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94.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译者注)

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①。

八、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不仅被人们做了简单化的理解,而且被人们做了十分片面的理解。原因之一,无疑是由于这两位作者本身没有系统地和详尽地介绍这些观点;其次,是由于某些地方被人们主要做了机械的理解,而不是做辩证的理解,关于这些,我们已经提醒过,许多人由于缺乏一定的哲学前提,常常把它们忽略了。总体的观点,把历史问题看作整体,而不是根据这种或那种“因素”来进行考察——这不仅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基本缺点,而且是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基本缺点。

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不得不经常提醒最亲近的友人和同志,他们的理论绝不是教条,也不是能够毫不费事地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例如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

253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95.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译者注)

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恩格斯继续说,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是取得很少一点成绩,但是许多人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

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又十分经常地被解释成某种经济唯物主义,但加上上层建筑对自己基础的反作用这个辩证的“补充”。不过,有的时候连这个辩证的补充也不加,以致整个观点变得更加片面。因此,恩格斯多次感到有必要在书信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和他的首要功绩与其说是发现了经济生产和经济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如说是用自己的这一发现第一次成功地解释了历史事件总体。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

^① F. Engels, *Pismo C. Schmidtu od 5. august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03.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译者注)

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也强调指出,他们始终认为,经济关系只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而不是唯一的基础。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②

博尔吉乌斯认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需要会比几所大学加在一起更能有力地推动科学前进。

因此,应当把历史首先理解为人的活动,当然是在一定环境中的活动,这里既包括自然环境,而更加重要的是历史环境。这就是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根本区别。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

^① F. Engels, *Pismo J. Blochu od 21. septembr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05.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译者注)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同样强调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F. Engels, *Pismo H. Starckenburgu od 25. januara 1894, Odabrana pisma*, str. 320.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Pismo H. Starckenburgu od 25. januara 1894*, str. 319–320.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页。——译者注)

力量在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它们的作用中。“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255 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①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恩格斯同样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

^① F. Engels, *Pismo J. Blochu od 21. septembra 1890, Odabrana pisma*, str. 305.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译者注)

这些规律。”^①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意见,可以弄清考察历史问题的范围。在这方面,当然还存在一系列需要说明的问题。但是,我也像恩格斯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只是想概括地介绍马克思的历史观,至于根据历史本身应当论证的一些现象,恩格斯认为,它们在其他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

这些著作,除了马克思论述法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和事件的著作以外,最重要的一部无疑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著作。恩格斯根据摩尔根(L. Morgan)的卓越的考察成果和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摘要,试图说明人类从最初阶段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考察了家庭的发展。其中最有独创性的贡献,无疑是恩格斯对国家发表的论述以及他关于一般国家的观点。

九、国家的产生和消亡

有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对它的阐明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起源和它的发展前景问题。恩格斯在考察文化和文明领域一系列问题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明确的历史观,特别清楚地体现在对氏族制度(尤其是雅典氏族制度)以及对这一制度由于新的社会组织

^① F. Engels, *L.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str. 296 - 297.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译者注)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F. Engels, *Pismo H. Starckenburgu od 25. januara 1894*, *Odabrana pisma*, str. 321.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译者注])

(国家)的建立而崩溃的分析上。恩格斯介绍了希腊人的氏族,叙述了氏族由于生产发展、财产差别的扩大,从而氏族内部差别的扩大而崩溃,并得出结论说:“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①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考察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基本的解答。国家作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一定的分工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对阶级分化和国家进行偶像崇拜,把它们说成是“历史上必不可缺的现象”。恩格斯则以深刻的历史观点即辩证观点认识到当代发展过程的实质以及像国家这种产物的结局。

^① F.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Werke, sv. 21, str. 105 - 106.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译者注)

恩格斯早在70年代就在《反杜林论》中清楚地看到,现代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其建立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趋势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变得日益不必要的了。^①他当时就已经看到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国家资本主义中,雇佣劳动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形式,因此,历史的冲突并未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②。

恩格斯看到,要想真正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冲突,要想克服当代的大分工和雇佣关系,总之,要想消除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只有“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③。恩格斯当时就已经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才地预见到当代的冲突,并给革命力量指明了道路。这段话这里需要全文引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

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得出结论说:“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59 - 260.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0.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③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0.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①

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上,即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政治机构即国家官僚的全面垄断占了统治地位,在这个大力推行畸形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1 - 262.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298页。——译者注)恩格斯在致菲·范派顿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F. Engels, *Pismo van Pattenu od 18. aprila 1883, Odabrana pisma*, str. 279[参见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07页。——译者注])

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阶段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遭到了打击。斯大林认为,在俄国的环境里,批评列宁这位俄国革命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就间接地、通过批评恩格斯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也抨击了恩格斯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抨击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对一般的人、特别是对当代世界的人的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认为,为了实现这一深刻的历史过程,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美好的意愿,而且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即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发展水平,以便使上述过程真正能够实现。“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①对此,他还补充说,“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②。

260

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方向,是要克服以往的分工,从而消除阶级和国家的存在。恩格斯十分概括地指出,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国家作为国家而采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从此以后也就决定了它的命运——消亡。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299页。——译者注)

^②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3-264.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译者注)

从其他的地方^①也可以看出,对于恩格斯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开始组织新社会,但是,正如列宁后来也特别强调的,工人阶级需要的是正在消亡的国家。恩格斯彻底坚持关于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新人道主义的观点,他也像马克思和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完全不认为加强这个阶级的政治机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被否定了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存在相应的政治组织,因为正如我们见到的,劳动人民对于这一组织同样可能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即处于异化状态中。

这个天才的预见今天正在实现中。而且我们可以说,实现这些历史要求构成了一整个历史时代,毫不奇怪,它艰难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经常被迫后退和遭到挫折:从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创举起,经过列宁的工人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直到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得到第一次持续不断的和富有历史成果的实施。

为了实现所有这些要求,恩格斯也认为,人有能力合理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实践,从而合理地控制历史实践。这就是说,人也有能力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归根到底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和前途莫测的境地。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的一段话,恩格斯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说

^① 恩格斯也把这一思想清楚地表述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致菲·范派顿的信中:“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F. Engels, *Pismo van Pattenu od 18. aprila 1883, Odabrana pisma*, str. 279. [参见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译者注])

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262

这里的重点，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首先放在“社会占有”和放在组织这种生产的人们身上，而不是放在国家或任何政治机构身上。^②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今天不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都得到了证实。资本主义作为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已经再也不能单单让盲目的供求规律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加干涉的旧政策来支配自己的经济运转了。

^① F. Engels, *Anti-Dühring*, str. 264.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译者注)

^②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写道：“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F.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str. 324.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正如我们从迄今为止的经验中所看到的,仍然处在商品生产的阶段上。商品生产,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国际环境中,还不能取消。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避免资本主义直到目前仍然经历着的种种灾祸,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要受到有计划的考虑、指导和协调的遏制和引导。

263 在这方面只想谈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根据上面叙述过的恩格斯的思想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有一个: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应当把计划机关由国家机关(即政治机关)变为社会机关。应当由社会,而不是国家,来调节越来越多的相互关系。而为了进行这种调节,为了越来越自觉地管理和合理地解决各种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也必须建立综合的、完善的和有强大科学力量的社会机关——各种委员会、研究所和类似的组织,它们将成为根据科学分析和情报提供的大量可能性对本身的业务过程做出共同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过程,恩格斯认为,除了自由的思想交流以外,不能设想其他方式的思想交流。他和马克思一起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尚且有可能自由地表述自己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对他而言,社会主义力量本身的书报检查当然完全是荒唐的和不可想象的。所以他在晚年于1891年2月23日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说明,有必要在《新时代》上妥善地发表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党要想进步就必须允许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恩格斯并且联系到相反的观点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

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①

最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有了如此众多的不愉快的教训之后,也有必要强调指出,恩格斯的最后一个行动,也和他毕生所做的那样,致力于反对任何偶像崇拜和神秘化。他的遗嘱决定把他的遗体火化,并把骨灰罐沉入他生前休息时十分喜爱逗留的伊斯特勃恩海滨的海里。他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因而可能想到有人会对他以及对马克思搞个人迷信。

正如我们看到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他的名字同一种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以及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过程的观点的诞生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成了这样的一位人物:欧洲和世界现代史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最有才能和最有思想的志士都从他的著作中获得鼓舞力量。

像恩格斯这样的人物,只有根据他一生的全面情况,对他做全面的考察,才能进行评价。在他多方面的历史性的活动中也具有一些薄

^① F. Engels, *Pismo K. Kautskome od 23. februara 1891, Odabrana pisma*, str. 315. (参见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605页。——译者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其他材料中,至少有必要再引用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致格尔桑·特里尔的一封信。他在谈到特里尔由于批判机会主义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丹麦社会民主党时说:“至于中央执委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做法,在1840—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在奥康瑞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密组织’中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自从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以后——恐怕都不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F. Engels, *Zbornik Druga internacionala*, Beograd 1951, str. 108—109. [参见恩格斯:《致格尔松·特里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译者注])

265 弱方面,一些片面的和过早的结论和观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毫不奇怪的。他曾针对着自己,同样也是针对着每一位思想家说过,每一个人在客观上始终受到人和历史整个发展的一定阶段的限制,而在主观上始终受到他所具有的能力的限制。

恩格斯是19世纪中能够给人们和历史指明方向的罕见的人物之一。他曾经说过,他的思想始终是对最高尚和最合乎人道的愿望的一种鼓舞。在那个个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职业化的时代里,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和哲学思想家,他虽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但毕竟独立地推进了人类思想和创造的许多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历史领域的发展。我觉得,恩格斯的这个特点说明,在当代日益按专业分化的世界里(这种专业分化不仅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总体性,而且威胁到必要的交往),必须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正是由于具有这些特点,成了人类过去和将来在智能上最迫切需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光辉形象。

最后,马克思是一位以自己的深邃的才智超越众人的人物,而恩格斯则是一位以自己的渊博的文化知识、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智力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唯一能够与马克思并肩站在一起的人物。

无论是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为当代世界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仅遗留下他们光辉的思想,不仅遗留下革命的前景,而且遗留下欧洲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各种前提和欧洲文化发展过程的丰富内容,而没有这些前提和内容,当代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和文化复兴将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部分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第一国际的年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开始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传播的时期。应当注意,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还无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哲学观点,因为某些早期的手稿已经湮没无闻,而另一些,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放在抽屉里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或者根本不打算付印了。只有批判杜林以及后来论费尔巴哈的几篇著作,阐述了某些基本哲学观点,但对其论述的方式却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批判经济学观点,主要靠《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传播开来,但这个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此外,如果再加上当时最优秀的革命力量正忙于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那么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丝毫不会奇怪,为什么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出一批能够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发展他的全部学说或其中某些部分的卓越的理论家。

在德国,当时斐·拉萨尔、弗·阿·朗格(F. A. Lange)、阿·埃·弗·谢夫莱(A. Schäffle)、欧·杜林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而通过其中某些人的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及其在社会事件中的运用仍很

流行。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威·李卜克内西仍然是主要的理论家之一,虽然大家知道,他本身并不是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而奥·倍倍尔则在 1874 年还在《人民国家报》上像评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那样地评介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①

270

一、约瑟夫·狄慈根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自学成才的哲学家约

^① 有关这个时期,除了前面已经引过的著作外,在较新的著作中还可以列举:卡尔·弗里德里希·布罗克施米特:《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Karl Friedrich Brockschmid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cialistengesetzes*, 1929);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和危机》(Wolfgang Abendroth,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64);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尔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党的意识形态)》(Hans-Joseph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I Weltkrieg)*, 1967)。关于 19 世纪最后 10 年的著作有:格尔哈德·阿·利特尔:《威廉帝国中的工人运动(1890—1900 年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Gerhard A. Ritter,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und die freien Gewerkschaften 1890 - 1900)*, 1959, II izd. 1963)。关于工人运动通史的较新著作有:沃·阿本德罗特:《欧洲工人运动的社会史》(W. Abendroth,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65);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前书记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大部头著作《国际史》(Julius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I sv. 1961, II sv. 1963);威尔纳·霍夫曼简要评述了《19 和 20 世纪社会运动思想史》(Werner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1962, II 968);乔治·豪普特的著作《第二国际(1889—1914)》(George Haupt,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 - 1914*, Paris - La Haye 1964)。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巨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久前出版的集体著作《德国工人运动史》第 1—8 卷(*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I - VIII, 1966),它包括从工人运动的开始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时期。

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 - 1888)^①。他未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一开始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后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终于独立地得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论点。这样,他就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辩证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之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出罕见的哲学才能,当然,由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这种才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现象统一的问题。^② 狄慈根尽管持有彻底辩证的观点,认为现象不是孤立的,不应当把自然界理解为现成事物的体系,而应当理解为一个过程,可是他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不确切的观点,这就使他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转向斯宾诺莎主义。狄慈根在他的著作的好些地方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思维是脑的活动,正如走路是腿的活动一样”^③,可是在另外许多地方,他在解决这个关系时却写道:“唯心主义者迷恋观念,旧唯物主义者迷恋物质,前者和后者都是狂热之徒,在这一点上都是形而上学者;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过分地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不论前者或后者都未能提高到认识

271

① 狄慈根于1828年生在科伦附近的布兰肯堡。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制革工人。狄慈根在两度侨居美国之后,于1864年前去彼得堡,担任一家制革厂的技术指导。1869年他回到德国,并发表了第一篇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1884年他第三次去美国,在纽约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1886年他到芝加哥和儿子住在一起,同年在该地写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就》。他写给儿子的一些论述逻辑学的书信,后来由他的儿子欧根汇集出版。狄慈根于1888年在芝加哥逝世。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在南斯拉夫的出版物中,波·舍希奇写了一本关于狄慈根和狄慈根主义的大部头专著《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B. Šešić, *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Josepha Dietzgena*, Beograd 1957)。

② 狄慈根经常以不同方式强调自己的一个基本观点:“万物都是大的,又都是小的;万物都处于空间中,又都处于时间中;万物都是原因,又都是结果;万物都是整体,又都是部分;因为万物正好就是万物的内容,因为万物寓于宇宙之中;万物是彼此相似、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作为绝对者的万物的概念,它的内涵由无数相对性构成;作为普遍真理(它遍布于种种现象之中)的万物的概念,是概念科学的基础。”(*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895, str. 76)

③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59.

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程度、认识自然界包罗万象的程度,自然界并不是非物质即精神的,而是既物质又精神的。”^①狄慈根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也致力于探索这一问题,并且违背了自己过去对许多哲学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狭隘的唯心主义者硬说一切事物都是思想,而我们则想说明,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个类概念下的两个种概念;由于它们的共同本性,并从正常的逻辑着想,我们应当在它们各自独有的名称之外,还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族系名称或一般名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只不过是字眼上的争论而已”^②。

除了这个重大的缺点之外,狄慈根的哲学著作还有经常重复、不够严谨、叙述混乱的毛病,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水平在思想上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狄慈根看来,“一般本性和绝对真理是同一的”^③,关于这种绝对真理的知识“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是与意识一起获得的”^④,等等。

272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确切和不严谨的毛病,狄慈根还是看到了现实中某些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并表述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十分明确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下列基本原理:如“任何原因都是结果,而任何结果又都是原因”^⑤,又如,除了无意义的矛盾之外,还存在有意义的现实的矛盾:“静止的运动和运动的静止——这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⑥狄慈根相当清楚地看到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尽管他对思维这个一般问题做了片面的抽象的解释。他同样地强调了我们的认识的辩证性质,并提出了一些后来无疑对列宁产生过影响的论点:“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个原子,

① J. Dietzgen, *Ekскур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Odabr. fil. Rad., str. 203.

② J. Dietzgen,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r. 76.

③ J. Dietzgen, *Ekскур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193

④ J. Dietzgen, *Ekскур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195

⑤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91.

⑥ J. Dietzgen, *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str. 100.

都是不能被彻底认识的。每一种事物的秘密都是无穷尽的,就好像是不可逾越的、不能突破的一样。然而我们终究能一天一天地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懂得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精神所不能达到的。人的精神在发现秘密这一点上是没有极限的,它在获得新发现方面是没有止境的,同样它也有着无限广阔的余地来对个别和一般进行无止境的和无法估量的认识。”^①

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见解:他正确地把唯心主义看作是在一定问题上的片面性和夸大等等,而不看作是绝对的荒谬;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我们认识中的一般性和必然性的性质的明确主张。他写道:“唯物主义者否认精神的任何自主性,认为应该借助经验来找到原因,对于他们,我们应当回答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必然性和一般性,不能在经验中获致。另一方面,也应当告诉唯心主义者,虽然理性可以探求原因,但是不可能同时认识原因,因为这种探求毕竟不是先验的,而只是经验的,它只能在经验提供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固然只有精神能揭示出非感性的、抽象的一般,——但这只限于在感性现象的现有范围之内。”^②可见,狄慈根已经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通常的经验论对于说明人类认识是不够的,正像唯心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否定经验一样。

273

由此可见,狄慈根的著作并不是前后一贯的和没有矛盾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掌握;他在许多领域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他的唯物主义常常是不确切的、不彻底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狄慈根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留下一个鲜明的形象,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具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辩证思想的哲学家。

狄慈根死后 10 年,在修正主义流行的年代里,有些人试图拿狄慈

① J. Dietzgen, *Ekскур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str. 225 - 226.

② J. Dietzgen, *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Odabrani filozofski radovi*, Zagreb 1958, str. 96.

根的哲学来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认为他的哲学是更深刻、更完备、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哲学。在这种“狄慈根主义”的最著名的卫道者中,居于前列的是他的儿子欧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潘涅库克,恩·翁特尔曼(E. Untermann),奥·伊·海尔方德(O. J. Helfond),狄慈根著作的俄译者巴·格·达乌盖(P. G. Dauge),以及罕·罗兰-霍尔斯特(H. Roland-Holst)。^①

所有这些人的主要论点是,狄慈根比过去任何人都更为深刻、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狄慈根的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狄慈根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详尽得多、深刻得多,因此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人特别推崇狄慈根的地方,正是他背离彻底唯物主义的地方,是他错误地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地方——即把它们视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的不同存在形态。这样就势必会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对相反的命题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274

恩斯特·翁特尔曼在他的那本近七百页的巨著《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中做出了保卫狄慈根主义的最大规模的尝试。他精心写作这本书,首先是用来反驳普列汉诺夫,而同时也反驳梅林、考茨基等人。但是他的全部辩驳冗长烦琐、含混不清,较之约·狄慈根的机智敏锐相去甚远。他叙述了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主张,而他的观点的实质则可以用他的下述论断来概括:“我们的方法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样称呼是要区别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正如我

^①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欧根·狄慈根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并专门出过两本书,《狄慈根传略》(*Dietzgen-brevier*, 1915)和《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参照《约·狄慈根的认识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Materialismus oder Idealismus? Ein Lösungsversuch gemäss J. Dietzgens Erkenntnislehre*, 1921);潘涅库克也在《新时代》(1903—1904)上发表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和宗教的文章;翁特尔曼写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1910);罗兰-霍尔斯特则发表了一本名为《约瑟夫·狄慈根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浅释》的著作(*Joseph Dietzgens Philosophie gemeinverständlich erläutert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Proletariat*, 1910)。

们已经提到过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与种种自然一元论的倾向相反,主要是社会辩证法,即关于社会的科学,而我们的包括社会发展在内的辩证法,主要是世界辩证法(Weltdialektik),即关于世界的科学。在我们这里,‘第三者’已不再是黑格尔那里的‘概念’,也不是‘各民族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说法,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而是世界的全部自然联系,即实在的宇宙。”^①

在20世纪初,梅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立即起来反对这种夸大狄慈根哲学的意义和创立新学派——狄慈根主义——的企图,他们一方面承认约瑟夫·狄慈根的声望和才能,并且基本上也承认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狄慈根的哲学,就其水平、准确性、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某些思想上,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的一定充实,但不能作为他们的哲学的补充或代替。至于“狄慈根主义”一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把它视为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新路线的企图。^②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欧洲大陆上这一蓬勃发展时期的开端;他曾经诚恳地提出建议来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同样他

275

① E. Untermann, *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München 1910, str. 15.

② “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妄自尊大,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根·狄慈根和——十分遗憾!——帕·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企图不根据约瑟夫·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有许多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条路线!”(V. I. Lenin, *Materializm i empiriokriticism*, *Sočinenija* IV, sv. 14, str. 234 - 235.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译者注])

工作。三年以后,这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第一名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上述时期的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推进,这样,无产阶级也就大量地形成和组织起来。

法国经历了它的六月事件^①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五月流血周,在它的革命高潮中涌现出一批非凡的革命家,他们将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中自我献身、英勇无畏和人道主义的榜样。菲·邦纳罗蒂(F. Buonarroti)、奥·布朗基、路·瓦尔兰、古·弗路朗斯(G. Flourans)、沙·德勒克吕兹(Ch. Delecluze)、泰·费雷(T. Ferré)、拉·里果(R. Rigot)、路易丝·米歇尔(Luisa Michel)以及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许多多知名的和无名的战士,将作为新世界和新人诞生的标志留传后世。

二、保尔·拉法格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里,也成长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1842—1911)。拉法格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曾受到蒲鲁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在1865年当他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生的时侯,就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法国所有的大学拒于门外。1865年拉法格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同马克思的几次谈话,使这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并使他的思想发展出现了深刻的转变。1866年拉法格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两年后他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参加了波尔多的革命活动,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

然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在70年代中期,加入工会的工人就在巴黎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代

^① 指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为反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举行的起义。——译者注

表大会(1876年)。三年以后,布朗基被大赦,公社社员陆续从流亡生活中返回本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领导者是茹尔·盖得(J. Guesde, 1845 - 1922)——法国工人党的最坚强的组织者和创始人。他担任《平等报》的主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在这一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的工作。^①

盖得和拉法格在1880年一同到伦敦去拜访马克思,商讨工人党的纲领;马克思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就这个纲领向他们做了指示,纲领同年在哈佛尔通过。然而两年之后,在圣亚田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分裂。早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初露端倪的集体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内部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导致了1882年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有机保·布鲁斯(P. Brousse)、让·阿列曼(J. Allemann, 所谓的可能派分子)和贝·马隆(B. Mallon, 主张劳资结合的社会主义者)。

这样,拉法格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活动就集中于阐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加以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A. Millerand]、维维安尼[R. Viviani]、白里安[A. Briand]、饶勒斯[J. Jaurès])在1893年建立了单独的党,而且米勒兰在1898年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形势就格外明显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德雷福斯(A. Dreyfus)案件以后,在饶勒斯的有力影响下,成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5年),社会党由于有了饶勒斯这个显要人物而获

277

^① 盖得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基本原理》(*Essai de catéchisme socialiste*, 1878),《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Collectivisme et socialisme*, 1879),《阶级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État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lasse*, 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盖得出任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从而背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得了很大的声望。^①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一时期,拉法格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和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他的主要力量用于写作一些精辟的评论和论战性文章。虽然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原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是他始终独创地、机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各个不同领域。形势的复杂性看来好像正好投合他的敏感的性格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的作品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内部争论的各种批判文章,还有对于唯物史观、所有制、宗教、语言、达尔文主义、托拉斯、交易所等等问题的探讨,在所有这些方面拉法格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理论评论家和辩论家之一。

他的大量论著中最著名的有:《懒惰权》(1883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革命次日》(1887年),《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1892年),《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895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

拉法格并不是一个善于对某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做详尽分析和系统概括的人。他的独到的辩证法思想以其特有的优雅姿态掠过各个领域和各种事实,到处都留下作者的鲜明痕迹。拉法格尽管在某些论点上278 有片面性、考虑不周,甚至浪漫色彩,但不失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少有谁能像他那样高明地把马克思的卓有成效的方

^① 让·饶勒斯(1859—1914)在各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他曾经是一位哲学教授,写过许多历史和政治著作,是《人道报》的创办人。他在理论上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主张唯心主义和进化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正义观念的实现;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他表现为合法主义者。他是一位争取和平和争取德法友好的伟大战士,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反对战争,在大战前夕被一名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请参见沙·拉波波特写的饶勒斯的详细传记。饶勒斯的主要著作有:《感性世界的现实性》(*De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 1891),《德雷福斯案件》(*Affaire Dreyfus*, 1898),《社会主义行动》(*L'Action socialiste*, 1899),《社会主义研究》(*Études socialistes*, 1902),《1789—1900年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01—1908年)(*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789 - 1900*, 1901 - 8)等。

法应用于生活和科学的各个不同领域。

这里我们只能举出个别的例子,它们在当时或者代表着一种独到的见解,或者至少是一些新的启示。

例如,拉法格十分确切地规定了自然环境和人之间相互的辩证影响,看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因素:人的能动的改造活动。他在自己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中写道:“人以自己的活动不仅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在各方面创造人的或社会的环境;后者虽然不能使他的机体脱离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大大缓和这种影响。不过这个人为的环境本身对于它从自然环境中接收过来的人也要施加影响。就象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一样,人也受到来自两种环境的影响。”^①

然而,拉法格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理解某些人为环境和现象的相似性的重要因素,这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的正确分析才能得到解答。他写道:“人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彼此之间在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不过处于同样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的各个环境,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论它们是哪些人种创造的,也不论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人们一方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自然力量的改造作用,同时也受到各种相似的人为环境的影响;这些人为环境缩小了人们的各种差别,发展了人们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精神气质。无论如何,相似的自然环境,比方说位于相同纬度和相同海拔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那里的植物和动物产生类似的亲化作用。这些动物和植物具有类似的区系和群落。相似的人为环境也可以使那些被不同自然环境分为各个大

279

^①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32.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小种族的人们趋于联合。”^①

拉法格根据自己的这种见解,在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著作里,对灵魂的起源以及到基督教产生为止的信仰发展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他在这个题目上把问题简单化了,将灵魂观念产生的原因只归结为反思的因素(梦的解释等等),但是他对于灵魂、地狱、天堂、上帝这样一些概念的演变所做的考察,却有许多独到之处。拉法格说明了关于死后共同住所的观念是怎样随着氏族的解体而衰微的,关于死后惩罚的思想是怎样随着古代世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重新出现的。他说:“但是,如果说对死者的惩罚重又出现的话,那么它已失去了个人复仇的性质而获得了集体复仇的性质,即被称之为公众惩罚的阶级复仇的性质。个别的人不再实行复仇,而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联合体来实行复仇。这种从个人复仇到集体惩罚的转变,是在个人主义已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确认之后实现的,因为在古代城市中燃起的阶级斗争,已经把单个的人集合为两个敌对的阵营。”^②

拉法格在分析作为古代宗教、秘密神教和哲学在当时发展的结果和混成物的基督教时,清楚地看到了它的两重性。“基督教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甚至也没有杜撰任何荒诞思想和幼稚迷信,不过它却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高明手段,这是秘密神教和奥菲士教^③所不曾具有的;它可以满足广大平民的各种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需求、愿望和欲念。它善于迎合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又会安慰富人:把改变命运的不公道、奖励行善、使机遇和幸福平等化等等都推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基督教

^①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32.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②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191.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③ 奥菲士教(orfizam)是古希腊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主张肉体是罪恶和灵魂不灭。——译者注

已经抛开了它初期的爱煽动的作风,成了有产阶级的安全阀。”^①

尽管在这个分析里存在着片面性,特别是当拉法格试图单纯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来断定资产阶级必然信教和无产阶级必然不信教时表现了机械论的思想,但是拉法格的这段分析却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开阔性和独创性。

拉法格在探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别因素时,极其敏锐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现象和典型特征。他确切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对待科学的两面态度。技术科学的发展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资产阶级也就容忍技术科学所必需的各种决定论的观念;可是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却限制这种自由,因为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问题中也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性质本身。^②

正如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以及后来谈到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著作中所做的某些分析一样,拉法格也深入探讨了资产阶级世界中思想结构的一些基本因素。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对社会制度的愚昧无知,正像野蛮人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一样。人们对于整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既不知其原因,也不知其规律,这就助长了人们的迷信和神秘感,误以为一切都决定于偶然性。“另一些日常的经济现象,在资产者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信念,认为存在着某种脱离一切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只举一个例子来看,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很少有联系,这样就在资产者的头脑中产生一种

^①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Izbor iz djela*, Zagreb 1957, str. 207.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② 关于这个问题拉法格在同一著作中写道:“哲学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科学家自由地研究自然力的作用;资产阶级当然想要认识这种作用,因为他们要利用自然力来生产自己的财富。可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同样的自由给予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而这些人也就不能把哲学决定论带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基于同样的理由,天主教会过去曾经禁止人们自由地研究自然界,所以为了建立自然科学,就有必要推翻天主教会的社会统治。”(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str. 214.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不依赖于物质的力量的想法。这一小块纸片,如果没有魔力,人们就不屑于把它从地上拣起来,可是它却能给占有它的人带来最现实的、在文明世界中最令人向往的东西:面包、肉食、美酒、房屋、土地、骏马、女人、威望和荣誉等等,给人以肉体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上帝也未必有更大的法力。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①

281 拉法格虽然只是用自己的话转述了经典作家的著名论点,但他却做得很有才气,十分传神。^②

拉法格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智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掌握多种知识领域的巨大能力。在他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也留下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著作。他在论语言与革命的著作中,一方面阐明了抽象概念从具体概念中产生的过程^③,另一方面也精辟地分析了语言风格和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的演变和变化。拉法格在这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迹。政治和社会现

^① P. Lafargue, *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str. 220. (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② 举例来说,拉法格在阐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的著名论点时这样写道:“这种对劳动成果的掠夺,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大集市,那里一切都有人出卖:不单是人的劳动产品,而且包括人本身。体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肌肉的能力;脑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大脑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是工程师、化学师、农艺师,是因为他们有组织才能或指挥才能。生产的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抗,贬低了人,使人退化,把人变成商品,把社会——再重复一遍——变为一个大商场。”(*Komunizam i ekonomska evolucija; Izbor iz djela*, str. 272)

^③ 例如在他论述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篇演说中就注意到:“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法权)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Idealizam i materijalizam u shvaćanju historije, Izbor iz djela*, str. 244[参见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页——译者注])

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拉伯雷的法国语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只有文人学士能懂了;可是作为挪威、瑞典和丹麦土语之母语的冰岛语言,却在冰岛几乎保持原状。”^①

拉法格在他关于雨果(V. Hugo)、都德(A. Daudet)、左拉(E. Zola)等人的文学评论中,也不失其革命学者的本色,力图阐明资产阶级文化的含义和结构。他从社会学的视角,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解释艺术,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像他的导师一样,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阶级分化的因素,这一点对于上述解释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除去一些尖刻俏皮之处外,还存在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一些精彩思想。拉法格在一处谈到代表作问题时断言,作家也必然受到自己的社会环境约束而无法摆脱,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如象雨果所说,是‘上帝的宝鼎’,而是魔术的熔炉,其中凌乱地堆积着当前的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回忆;在那熔炉中,这些混杂的成分互相遇合、互相混淆、互相归并、互相搭配,借以产生口述的、书面的、绘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比助它形成的那些因素,更富于优良的品质,也正是如此,合金和组成它的各种金属相比,反而具有另一些特性”^②。

在拉法格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贯穿着机械论、抽象性、浪漫主义等等观点,然而这些因素并非主流。拉法格对各种事件都反应敏锐,同时在理论上也跻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列。他的功绩在于:他是最早指明托拉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及其作用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在《革命次日》(*Neposredno*

^① P. Lafargue, *Francuski jezik prije i poslije revolucije; Književne krtitike*, Beograd 1949, str. 4. (参见保·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② P. Lafargue, *Porijeklo romantizma, Književne kritike*, str. 82. (参见保·拉法格:《浪漫主义的根源》,《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210页。——译者注)

poslije revolucije) 这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即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治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完全被忽视了。尽管在这些分析里, 他有时沉湎于幻想, 过早地预言了各种具体措施, 但是他所强调的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中最根本的东西, 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一致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因而新的革命政权应当粉碎资产阶级的制度, 依靠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 奠定新制度的初步基础: “不要让国家来继续充当邮电事业的主人, 铸造钱币, 管理它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管理着的铁路; 不要由国家来担任纺纱厂和织布厂的主人, 担任各种工厂的经理等等——像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革命政权应当做到让工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自己的企业主, 自己的经理。”

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 制定规章制度, 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 相反, 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 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入。这里我谈到收入问题, 只是因为革命的次日还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 可是在未来, 我们将要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那里, 工人们将不再领取工资, 也不取得个人收入, 而是平等地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然而在革命的次日, 国家将通过革命政权把生产资料交给生产者支配; 将委托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定每一个企业应当上缴的数额, 即应当偿付向企业提供的劳务的款项, 以及折旧费、修理费和改进技术装备费的提成额, 还要规定向社会基金缴纳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衣食住之用的数额。”^①

前面已经着重指出, 拉法格也有一些不够深刻的地方, 或者说还有一些机械论的解释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观点, 甚至有过一些错误的结论, 如认为在现代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这些缺点丝毫也不能抹杀这位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 他不仅毕生始终如一地永远站在战斗岗位

^① P. Lafargue, *Neposredno poslije revolucije; Izbor iz djela*, str. 400 - 401.

上,站在争取新人的斗争的前列,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创造性地应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①

三、若尔日·索列尔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法国,与德国的修正主义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佩路提埃(F. Pelloutier),特别是若·索列尔(G. Sorel, 1847 - 1922),就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家。索列尔研究了已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和米勒兰内阁主义的教训,继承了佩路提埃的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独特体系。

索列尔在90年代初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同保·拉法格、加·杰维尔(G. Deville)、阿·崩纳(A. Bonnet)等人一起为《新纪元》和《社会进步》杂志撰稿。索列尔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频繁的接触,通过他的介绍,在《社会进步》杂志上发表了安·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贝·克罗齐(B. Croce)、阿·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等人的许多论著和文章。可是很快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以及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理论分歧。索列尔根据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议会斗争的经验,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得出结论说,为这种政策进行辩护的种种理论,都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点。

于是索列尔就开始批判地对待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当从种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拯救出来。索列尔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结构和规律做过深刻研究的人,而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论著中归根到底并没有留下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是在反对正统派思想的斗争中标

^① 关于拉法格的生平,请参见米列·约卡:《保尔·拉法格》(Mile Joka, *Paul Lafargue*, Beograd 1974)。

新立异。然而他对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问题所做的探索和考察,毕竟是值得注意的。

索列尔对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设想社会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相信议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由于注意到知识分子出身的许多领导人特别热衷于这种政治策略,索列尔不仅反对议会主义,而且反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领导和指导作用。^①索列尔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克服了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并指明了阶级问题和阶级的重要性。由此索列尔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在于工人团体的自主发展”^②,在于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对阶级斗争的了解和领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组织新的政党,从而必然继承资产阶级的各种特点,而在于引导工人阶级“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掌握各种手段,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能够摆脱统治者;在于说服工人阶级绝不能效法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始终不渝地坚持绝对革命的观点的话,就不应当同政党纠缠在一起,不论是怎样革命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得不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从事活动,适应选举情况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其他一些拥有同样选民的团体妥协”^③。

由于这些原因,索列尔的“新派别”,即革命工团运动,并不指望成立新党,而是希望领会运动的本性。这个派别摒弃来自空想主义或来自布朗基主义的一切公式,并且认为,应当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东西,以捍卫它的精华。^④

索列尔对任何类型政党一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党会导

① 正因为如此,他激烈地反对饶勒斯,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饶勒斯时说:“这个左右群众的老手所做的各种努力,结果只是表明了那种道德复兴的幻想的幼稚性”。(*Mes raisons du syndicalisme*, u knjizi *Matériaux d' 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Paris 1919, str. 284 - 285)

② G. Sorel, *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s*, u djelu *Matériaux d' 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str. 133.

③ G. Sorel,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8, str. 56 - 57.

④ G. Sorel,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8, str. 59.

致作为基础的阶级同抱有建立国家组织的目的的领导人互相分离；因此索列尔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成为组织在自己的革命工团之内的阶级，要求他们采取革命暴力——因为这不仅是革命变革的主要杠杆，而且也是导致道德复兴的道德要求。“无产阶级的暴力不仅能保证未来的革命，而且也是使沉溺于博爱主义中的欧洲各民族重新获得当年的旺盛精力的唯一手段。这种暴力将使资本主义只发挥其物质的作用，并要求资本主义恢复它曾经一度具有的英武气概。日益成长并坚定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可以迫使资产阶级保留它在工业生产斗争中的热情；资产阶级一心向往的是掠夺和发财，与它相反，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要站起来，就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它历史上的完善地步。可见，无产阶级的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素。再补充一点：只要运用得当，这种暴力可以导致取消议会社会主义，使它不能再成为劳动阶级的统治者和秩序的维护者。”^①

在索列尔看来，无产阶级的暴力是为文明的根本利益服务的阶级斗争的单纯表现。尽管阶级斗争可能不是获取直接的物质权势的最适当的方法，但“它能从野蛮中拯救世界”^②。因此，索列尔也把暴力问题看作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③

索列尔认为这种革命暴力的基本杠杆就是总罢工。在他看来，革命工团主义者应当从总罢工中看到全部社会主义。正像他的工团主义观点受到蒲鲁东的强烈影响一样，他想要在柏格森关于创造性进化是不可分的整体的思想中，寻找关于作为最后变革的总罢工仅仅是局部罢工的结果和最终目的这种观点的论据。总罢工同时也是“孕育着全部社会主义的神迹，是一套能够本能地唤起各种情感的构图，这些情感符合于社会主义为了反对现代社会而进行的战争的各种表现。罢

①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49.

②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57.

③ 索列尔在上述著作的最后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老实说，社会主义有责任赋予暴力以高度的道德价值，并借助这些道德价值来拯救现代世界。”（*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253）

工在无产阶级当中激发了最高尚的情感,激发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最深挚、最富有主动性的情感”^①。

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一行动,与议会斗争和党派斗争不同,它不是以一个国家代替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一批领导人代替另一批领导人而告终,而是以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完成。因此索列尔把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词区别开来,认为“强力的任务在于强迫建立某种社会秩序,其中某些少数人进行着统治,而暴力所要求的则是摧毁这种秩序”^②。

索列尔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主张工人应当牺牲一切,以便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组织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把那些向他们庄严地保证要为人民而斗争、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人送上台去执政。“新派别的看法与此完全不同,它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效法资产阶级;新派别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一种起码的、可疑的结果,即为了更换一批统治者,满足思想家、政客、投机分子以及一切崇拜和觊觎国家权力的人的私欲而去进行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凡的革命。”^③

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的政党和国家作用的想法相反,索列尔表述了一种直接消灭国家的典型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把过渡到没有统治者的企业和自由生产者状态的问题当作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④

作为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索列尔的所有这些论点使他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领袖;这个运动在法国,而更多是在意大利,有着大量的信徒。尽管索列尔对待正统派思想采取了极其尖

①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95 - 96.

②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152.

③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158 - 159.

④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str. 237.

锐的批判态度,但他始终未能深刻地领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且他的批判意见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懂马克思的历史观。因此,他批评马克思过分相信黑格尔所主张的历史发展“受神秘的宇宙精神力量影响”^①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评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索列尔站在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马克思“把社会机构主要不看作是经验提供的东西,而看作是神秘的历史力量的作用;而在对过去所做的科学研究揭明了宇宙精神的现代作用方式(但并未确定这种作用方式是否持久)之后,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得到验证的东西”^②。

288

在索列尔的全部著作中,都表现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观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著作是受到形形色色影响的大杂烩,实质上是折中主义的东西。有蒲鲁东的互助论和工团主义思想,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观点,也有柏格森的有机整体的进化观,以至尼采的对民主制和凡人主义的批判——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索列尔的作品中找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索列尔本人在晚年曾以激动的心情论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虽然这次革命是与索列尔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产物和结果。^③

尽管人们对索列尔的著作必然会持上述的保留意见,尽管他的理论观点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应当承认,他强调阶级的因素和提醒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本身区分开,这是很有意义的。索列尔清楚地看到了完全陶醉于议会斗争的社会党所存在的危险,因为议会斗争的种种权术会把它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之一。无论前一点或

① 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III izd.), str. 373.

② 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III izd.), str. 375.

③ 参见《进步的幻想》(G. Sorel,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1921, str. 382 - 384)。以及《论暴力》(*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法文第4版,在这一版里补充了对列宁的辩护。关于索列尔,请参见伊尔文·路易斯·霍罗维茨:《激进主义和反理性的叛乱,若尔日·索列尔的社会理论》(Louis Horowitz, *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Georges Sorel*, London 1961)。

是后一点,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同样,索列尔坚持总罢工的观点,也表明他比其他许多顿足捶胸地表示自己效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加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和行动能力。

289 在佩路提埃和索列尔的影响下,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是与组成任何一种类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相对立的。1907年4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工团主义的一些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于贝尔·拉葛德尔(Hubert Lagardelle)、维克多·格里福斯(Victor Griffuelhes)、阿·拉布里奥拉、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鲍里斯·克里切夫斯基(Boris Kričevski)。会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登载了这些人的报告要点,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同索列尔论点的一致性。阿·拉布里奥拉对工团主义做了如下的概括:“1. 政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机器,它是某种不同于阶级的东西;2. 社会主义的发展沿着另一条道路,而不是议会制和民主制的道路。如果好好考虑一下,整个工团主义就是这样。”^①拉葛德尔、米歇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正是由于批判民主制和议会制而背弃了索列尔的某些基本思想,很快就倒向了法西斯主义。

^① *Syndicalisme et socialisme*, Paris 1908, str. 13 - 14. 在同一本小册子里,于·拉葛德尔以下述方式表述了这种看法:“如果阶级斗争就是全部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全部社会主义包含在工团主义之中,因为在工团主义之外就没有阶级斗争。”(Ibid, str. 3)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一本论述马克思的书中也按照索列尔的精神断言,社会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高踞于阶级之上,而不是从属于阶级。国家,而不是经济,成了它主要关注的中心。社会主义已被国家主义所代替,因而社会党本身也成了国家主义的党。(Karl Marx, *L' Economiste, Le socialiste*, Paris 1923, str. 249 - 256)所以“可以预见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将被工人和国家的对抗所代替。阶级斗争并没有因私人资本家工厂的没收而结束,它继续存在于工厂之外,并在生产者同时不是工厂的占有者和主人的整个社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L' Economiste, Le socialiste*, Paris 1923 str. 260.)罗伯特·米歇尔以同样的工团主义精神写了一本书,谈论现代党派中的官僚主义和寡头主义倾向和过程(*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Leipzig 1910)。关于工团主义运动,特别是关于F. 佩路提埃和维·格里福斯,请参见爱德华·多兰斯(*Edouard Dolléas,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eier*, Paris I - II, 1939)。同样还请参见欧根·纳伊夫(*Zur Geschichte des französischen Syndikalismus*, Zürich, 1953, str. 43 - 83)。

意大利的革命工人运动是从第一国际时期开始的。尽管在巴枯宁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和在当局的残酷迫害下,这一运动却逐渐积聚了力量,到19世纪末,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强了,而且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89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在1893年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党。在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下,意大利社会党很快就分裂为:极右派(列·比索拉蒂[L. Bissolati]、伊·博诺米[I. Bonomi]、卡奈帕[J. Canepa]),无政府工团主义派(阿·拉布里奥拉、费利[N. Ferri])和中派(菲·屠拉梯[F. Turati]、特雷维斯[K. Treves])。墨索里尼和他的党羽组成了一个左派,这一派在大战开始时由于采取干涉主义的立场并同意大利帝国主义合作而被开除出党。^①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正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法格一样,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队伍里造就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

作为罗马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如下:最初信奉康德的先验哲学,后来接受了海尔巴特(J. F. Herbart)和黑格尔的观点,到90年代初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研究之后,勇敢地同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决裂,成了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十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写出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1898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25年)。

恩格斯在一封信里提到拉布里奥拉时,称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

^① 关于到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概况,请参见罗·米歇尔:《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R. Michels,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in Italien*, 1907),书中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

思主义者”^①。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论著的特色,就是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问题做了全面而独特的研究。拉布里奥拉通过这一工作向意大利的广大社会主义者大量介绍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291 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也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拉布里奥拉跟第二国际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采取了唯一可能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1891年2月23日)里,谈到有人主张《新时代》杂志应当受到检查的时候,曾经用讽刺的口吻指出:这种绝妙的想法是要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把它置于一个由党的领导自己炮制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②与此相似,拉布里奥拉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论著中写道:“我承认同志们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哪怕是专制的态度。但是,有的同志却想在科学问题上充当权威和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志……而表示迁就;在科学的问题上永远不能靠投票来决定,即使在所谓未来的社会里也是如此!”^③

可以说,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于历史发展的总概念的运用不仅是准确的,而且具有某种微妙的特色(但这并不始终是微妙的特色),他看到了对综合的历史现象做出唯物主义的有效分析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环节。

当时曾出现过一场争论——究竟是要伦理社会主义还是要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新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把康德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粗暴方式。拉布里奥拉在这场争论中毫不动摇地指出,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3页。——译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605页。——译者注

③ Antonio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94.。

题：“今后，伦理学和理想主义就是要使科学思维为无产阶级服务。如果这种伦理学在那些十分敏感而又常常是神经质和愚蠢的人看来显得不够道德的话，那就让他们到伟大的传教士斯宾塞那里去借用利他主义吧。他会给他们含糊其辞而又枯燥无味的定义的，这样就该满意了吧！”^①

拉布里奥拉特别有成效地批判了因素论，并强调指出，这是经验论者的观点，他们注意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某些因素，并认为其中个别因素是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相反，“社会是一个综合的整体”^②，它具有多种形式和发生过多次变化。有人认为，一方面把握住经济的形式和形态，另一方面把握住诸如法、政治、习惯，这样就够了。其实这些人是在抽象地研究事物。对待历史，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社会有机体来了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生活的统一整体。经济本身融合在这个过程的巨流中，它表现在多种多样形态的阶段上，在这些阶段里，经济是一切其他现象的基础。所以，问题并不是像我们的论敌所设想的那样，从抽象孤立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其他各种因素上去，而是首先应当对经济做历史的了解，并通过经济的变化来说明其他各种变化。”^③

在上述分析中，拉布里奥拉以独到的见解强调指出了—一个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有重大意义的方面。首先，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在社会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因果关系、决定者和被决定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更不属于个人心理学的主观决定论的范围内。其次，问题决不在于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

^①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 Histoire*, Paris 1928, str. 78. 这个文集中编入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②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 Histoire*, Paris 1928, str. 79.

^③ Antonio Labriola, *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partie communiste, u knjizi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 Histoire*, Paris 1928, str. 91.

纳入经济范畴,而仅仅在于一切历史事实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要借助经济结构来说明。^① 第三,“为了从一定历史的基本结构转到其整个外部表现形式,我们就需要借助于一套复合的基本概念和认识,即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缺少其他专门术语的情况下——社会心理学的东西。同时,我并不设想有某种臆想的社会心理的存在,也不设想关于所谓集体精神的杜撰,这种集体精神按其规律似乎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也不依赖于他们的可以确定的物质条件,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并得到解释。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这种社会心理学,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的规则,因为在多数场合下,它只是描述出来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思想家迄今看作和理解为自己研究和探索的特殊对象的东西。鼓动家、演说家、思想宣传家都援引并依据这种心理学,它是人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意识。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实际社会条件的结果、产物和后果;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形势下按它所行使的职能、按它保持的从属关系、按它所行使的权力而具有的东西;因此,阶级、义务、从属和权力的前提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某种特定形式,即特殊的经济结构。这种社会心理学按其本性而言始终是受到制约的,它并不是所谓人的精神的抽象过程和一般过程的表现。它始终是特殊条件的特殊产物”^②。

拉布里奥拉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因素论,特别是归结为经

^① 参见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Beograd 1958, str. 28。

^②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str. 29 - 30. 他在同一著作中就这个问题写道:“在任何企图把第二性的产物(如艺术和宗教)归结为它们所理想化的社会条件的做法中,都应当很好地了解那种面貌改变了的特殊的心理学。全部关系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这些关系总体的另一种叫法就如埃及世界、希腊世界、文艺复兴精神、支配思想、人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阶级心理学。当这些关系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接受某种意图、某种信仰方式或想象方式的时候,古老的传说所流传下来的思想就需要具有表现形式。这样它们就表现为与新事物相对抗的力量,正如这种反抗表现在言论、著作、论战、迫害、不能容忍异说上一样,新旧社会条件之间的斗争也具有思想争论的形式。”(*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str. 94)

济因素论的那些人的片面性,同样,他在批判马萨里克(T. Masaryk)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标成各个不同学科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学说。^①正因为如此,拉布里奥拉不能接受用达尔文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做庸俗的解释。19世纪末在生物社会学中特别流行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人的发展。对此,拉布里奥拉写道:“历史是人的业绩,因为人可以创造和改进劳动工具,并用这些工具创造人工环境,而这一环境然后又以其错综复杂的后果作用于人本身。在人逐渐变化了以后,原因同样也就成了他发展的条件。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作为人的业绩的历史归结为纯粹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虽然完善并改变动物的器官,并在一定的情况和一定的方式下促使新器官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毕竟不能产生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持续的、传统的和日益完善的运动。不应当把我们的科学和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在我们的科学中不宜再一次号召采用任何形式的宿命论,不论是神话形式的、神秘形式的或是借喻形式的宿命论都不行。如果说历史首先建立在技术发展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如果说由于工具的不断发明引起劳动的逐渐变化并随之引起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或长或短的持续存在构成了所谓社会机体的根本特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下列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些工具的发明同时是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抽象概念中来把握,则可称之为愿望、智能、理性、思想等。人逐渐创造各种社会环境,即一步一步地创造新的人工环境,同时也就改变着自身。这就是思想家用各种虚幻的设想和各种逻辑结构创造人类精神进步的概念的真实本质、具体理由

294

^① 参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A propos de la crise du Marxisme,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 Histoire*, str. 290)。该文发表于1899年,是同托·哈·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社会问题研究》(*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 Studien zur sozialen Frage*, Wien 1899)一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观点的论战。

和实际基础。”^①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比当时许多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P. 295)并对各种事件的辩证性具有更深刻的感受。许多人不具备拉布里奥拉所具有的条件:首先他不仅具有突出的才能,而且熟悉德国古典哲学,而不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不懂得黑格尔,就很难深入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

不过拉布里奥拉在某些地方也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尽管他并没有特别坚持。例如我们可以见到,他对未来历史的决定性做这样的解释,并对人类计划的合理性抱有这样的信念,以致设想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将消除任何偶然性。他在自己的一篇最有名的文章中写道:“在这个社会中,有调节的生产将从生活中排除那种迄今在历史上表现为侥幸事件和不幸事件交错发生的偶然性。但这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在和过去的事。”^②

拉布里奥拉是杰出的历史思想家,在这方面他同恩格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对恩格斯非常景仰。他在致若·索列尔的信中(这些信在克罗齐的鼓励下以《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的书名出版),满怀激情地提到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反杜林论》,认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真正的“精神良医”。^③拉布里奥拉首先关心人的因素和历史因素,正是在这些信中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④,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马克思

^①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str. 34 - 35. 参见第 85 页关于庸俗经济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部分。

^② 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str. 54.

^③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52.

^④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14.

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①

拉布里奥拉的所有这些努力和著作,使他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十分深刻而熟练地掌握了唯物史观,并使它成了自己的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② 296

① A. Labriola, *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Bari 1953, str. 58-59. 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他提出一种论断:“就这样,最近两个世纪伟大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期,使得这样两个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日益成熟:一个是在历史事实中过程的内在性和经常性,另一个是以客观的社会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学说。”(A. Labriola, *O istorijskom materijalizmu*, str. 58.)

② 同拉布里奥拉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活动的,还有略为年轻的阿·波基(A. Poggi),可是他同巴拉托诺(A. Baratonno)、弗·魏斯(F. Weiss)、克雷斯皮(S. B. Crespi)在《社会批判》(*Critica sociale*)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唯心主义的修正。贝·克罗齐在从事理论活动的初期也曾受到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不言而喻,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来源,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对安·葛兰西,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章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和修正主义

俾斯麦实施了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处于非法地位的党,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德国的民族资本也蓬勃发展,这使德国迅速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德国必然渴望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分得一定的地盘。

在这同一个时期,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国际。正值世界博览会举行之际,有两个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一个是可能派召开的,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前者垮台了,而在后者的会议上成立了第二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在一切问题上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直到1900年还没有建立常设的中心。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有义务按照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贯彻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到了1900年,才在布鲁塞尔设立社会主义国际局,但是,就连这个机构也不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当时的主席是艾·王德威尔得[E. Vandervelde],书记是卡·胡斯曼[C. Huysmans])。

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如此波澜壮阔、分

支众多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过程中,不可能由一个中心来实行权威的领导;另一方面,无论是他或是马克思,都从来不曾打算充当无上的权威来一贯提出种种现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议,他们总是想在各国社会党人争取实现历史发展内在趋势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成为他们真诚的同志和顾问。

刚才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更加壮大了。70年代末,党在选举中已经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候选人是由各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提出的,而不是由党提出的,因此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党员可以成为议员。 298

由于本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同意继续延长反社会党人法令,1890年1月25日该法令没有得到重新通过,而到同年10月1日被彻底废除。党在80年代末在选举中已获得50多万张选票,而在1890年2月则获得近150万票。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10月14—20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起草的著名纲领。此外还有两个草案:一个是由奥艾尔(I. Auer)、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是由马格德堡反对派(保尔·康普夫麦尔[Paul Kampffmeyer])提出的。但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草案取得了胜利。

爱尔福特纲领后来多次成为争论的对象,特别是因为许多人把它看作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后来采取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劳资结合政策的基础。但是这种政策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这个纲领,因为纲领提供了党进行各种活动的可能性。投降政策是由许多其他情况决定的,关于这些情况以后还将谈到。

纲领的第一部分是原则性的,由考茨基起草,第二部分谈党的直接任务,出自伯恩施坦的手笔。第一部分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生产资料的垄断化,小生产者受到排挤和破产,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一发展,对于无产者以及日益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保

障,意味着他们遭受贫困、压迫、屈辱和剥削。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日益激化。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及把商品生产变为由社会管理和造福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实现把生产资料变为一切人的财产。”^①

使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具有自觉的和统一的斗争的形式,并指出这一斗争的必然目标——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①

由于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一切其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一致。党不是为某种新的特权而斗争,而是为消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而斗争,为实现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党反对对某一个阶级、政党、性别或种族实行任何奴役和压迫。

从这些原则出发,在纲领的第二部分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要求,其中有:凡年满二十岁的人都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行使;由人民直接立法;国内、省内和区内人民实行自决和自治;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消除一切国际争议;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宣布信教是私人的事,取消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公共资金;国民学校的世俗性、义务性和免费制;法律保护 and 卫生保健的免费制;实行累进税;最后,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立法。

不能否认,纲领没有提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的要求,即没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纲领也没有把这一斗争看成

^① 《爱尔福特纲领》(*Das Erfurter Program*),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255)。

政治斗争,没有为这一斗争提出夺取政权的目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已经在口号中和行动中存在一种愿望,即不要以比较彻底的方式破坏合法的界限,这种愿望在后来表现得十分强烈。因此,纲领中没有明确地提到必须废除君主制的国家主义结构以及行政机关的特权,没有特别强调每一个阶级的革命权,而对工人阶级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权。纲领中原来设想作为当前要求和直接行动政纲的第二部分,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几乎变成了整个纲领,因为如果撇开上面引过的第一部分的某些原则,第二部分包含了采取改良主义行动的相当完备的政纲。

可见,十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分裂,在这个纲领中已略现端倪。

在那些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场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异常器重的革命运动老战士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但是他多年的积极工作,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在伦敦流亡期间是马克思的好友,后来同倍倍尔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工人党,并且都是该党在德国帝国议会中的第一批议员。李卜克内西是《前进报》的主编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1872年),《论土地问题》(1876年),《法国革命史》(1890年),《罗伯特·欧文》(1892年)和《回忆卡尔·马克思》(1896年)。

威·李卜克内西是真正的人民喉舌,并同倍倍尔一起,是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

一、奥古斯特·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更大的影响,他在各方面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著名的政治领导者、杰出的

演说家和彻底的革命者。除了《德国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沙尔·傅立叶》(1888年),《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和《我的一生》(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尔还写了一本在工人运动中流传极广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倍倍尔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这样,德国的一个党通过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彻底消除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的要求。

当修正主义一露头,倍倍尔就尖锐地反对伯恩施坦的论点,并结合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指出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倍倍尔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这里有必要至少谈一谈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被弄得混乱不清,而且被弄得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意图截然相反。

首先,倍倍尔十分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他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和所谓个体资本缩减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倍倍尔援引了马克思完全相反的论断,并得出结论说:“可见,这里又十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企图长期压迫工人阶级的趋势遭到了回击,工人正在组织起来,并在共同的斗争中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①由此可见,倍倍尔所坚持的这种明确的观点,不仅不与马克思的分析发生矛盾,而且符合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状况,即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在改善。倍倍尔得出结论说:“的确,大部分工人的状况有了改善,绝对地说,同过去相比有了提高;这种改善同统治阶级过去和现在的状况相比,是否也有相对的改进?对这个问题,若不做进一步的探

^① A. Bebel, *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Izzbornika *Markx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364.

讨,不能到处都做出肯定的答复。”^①

因此,现代斯大林主义思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顾大批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仍然教条主义地坚持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

倍倍尔在这场争论中做了出色论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自由的问题。当时某些修正主义者大叫大嚷地指责宗教裁判和教条主义,倍倍尔对此发表了一种无论在夺取政权阶段或是在革命胜利后的阶段都能促进社会主义运动顺利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主张。他写道:“实行宗教裁判必须先要有教条。然而,如果说有一个党不存在教条,那么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说有人坚决反对并从我们的头脑中坚决清除教条主义,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也就是今天在某些方面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称作教条主义代表者的人。可见,在我们这里没有教条,因而也不存在宗教裁判。如果一个党按照纲领,把要求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取消限制思想发表的一切障碍当作自己的首要要求之一,可是它向现存社会提出的这种要求竟不适用于本党同志,这岂不是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批评的权利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认原则。批判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愉快的。受批评永远是不愉快的,因为无论是人或是政党都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自己的观点。这里,必须先出现一系列的情况,然后才能纠正个人的意见,甚至广大群众的意见。批评自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②

请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前提,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竟被修正和抛弃到了什么地步!那种认为政治中心的观点在一切政治、学术甚至艺术问题上都是不可动摇

^① A. Bebel, *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Izzbornika *Markx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367.

^② A. Bebel, *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Izzbornika *Markx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338.

的决定的主张,竟根深蒂固地成了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证据”,同时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以自己的活动郑重宣布了未来的自由个性的人们——党性原则的最高表现!

303 此外,当人们宣布武装革命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原理时,他们也是在坚持一种与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伟大的革命家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相反,倍倍尔表述了辩证的革命思想。他在上述同一著作中写道:“设想在我们党内有人企图制造革命,以便能更好地、更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是荒唐的。并不是革命者在制造革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反动派在制造革命。伟大的歌德就曾向他的埃克尔曼说过,如果爆发革命,那只能怪政府。我可以从作家那里给你们举出数十处例证,直到引用老蒙森(Th. Mommsen)的话,他在罗马史中曾非常精彩地说明:当某一政府表明它已经无力解决有关大部分公民利益的任务时,爆发革命便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过错不在于起义者,而在于暴力挑衅者。党内的同志们!在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始终从这一原则出发的。”^①

通过倍倍尔的这一场论战,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19世纪末是修正主义滋生的时期,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和通常其他现象一样,是多方面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上升时期。在许多国家里,特别在德国,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本身也日益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处于合法地位的党也越来越适应于议会的政治斗争方式。合法的大党拥有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专职人员、议员、大量发行的报刊的编辑,以及人数众多的工会工作者,党具有越来越多的新特征。所有这些党的官僚和工会官

^① A. Bebel, *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Izbornika *Markx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377.

僚“不再想为工人运动效劳,而是想从工人运动中捞一把”^①。也和所有的官僚一样,他们为组织职能获得尽可能完善的发挥而骄傲,尽管他们的政策收效甚微。“但是对他们来说,运动的组织已由行动的杠杆变成了目的本身;在他们的思想中,目的和手段已经不知不觉地换了位置。在这个阶层看来,群众的任何积极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可能越出‘合法的范围’,威胁运动的合法性,或者甚至使例行的常规发生问题。”^②

环境大体上可以使人们或者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小资产者,而当时的整体环境在较长的时期里使人过着相对和平的和经济上小康的生活,并在议会中取得成绩,就必然会对上述阶层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心理产生影响,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改良主义幻想。这样,劳资结合政策的实际体现者就在一个革命政党的内部产生出来,而这个党通过自己的最优秀的老战士,继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

^① W. Abendroth,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5, str. 71.

^② W. Abendroth,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65, str. 71. 在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著作中,阿本德罗特把 20 世纪初轮廓已经比较清楚的这一过程表述如下:“这样就出现了劳资结合思想的实际体现者,即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是由党内的官僚(包括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和工人委员会(首先是工会和合作社委员会)中的官僚所组成的。它只关心按现有的生存方式继续管理党,并在这一任务范围内保守地思考问题,不想也不能从思想上突破当时的现状。于是很自然,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制度必然或应当比它原先具有的思想更为重要(不是由于主观的利己主义的动机,而是由于对制度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开始窃取在组织内开展民主讨论范围的决定权。”(W. Abendroth,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 am Main, 1964, str. 39 - 40) 布罗克施米特的论点是,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是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唯一恰当的表现,而且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按其整个性质确定为小资产阶级的党”。(*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is zum Fall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str. 107) 关于这个时期,还请参见卡尔·埃·肖尔斯基,《1905—1917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分裂的发展》(Carl E. S.,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ss. 1955)。

口号。^①

305

这一政策的最初鼓吹者,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提出以议会斗争代替革命斗争和把无产阶级革命党变为改良主义党的要求。正如我们下面将见到的,虽然他们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人物那里遭到了有力的回击,但是到20世纪头十年末,前面提到的过程终于战胜了那些看到和感觉到不能用官僚的劳资结合政策而只能用革命的政策来解决面临的危机的人。

现代社会的结构,它的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实现某些局部性目的多种可能性,而局部性目的可能掩盖当时运动的真正的基本的趋势——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客观上可能使人们对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同理解的因素。至于某一个人主要倾向于修正主义观点还是倾向于革命观点,这当然不仅取决于客观影响,而且取决于他在该社会的主观状况,即个人的经历、品质,在一定时机明确地区分主次、区分历史发展的主要关键和权宜之计的能力。这一切也就是伟大的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政治家的那些主观品质。

306

没有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避免这一场论战和内部的原则分裂。法国的可能派和饶勒斯派(他们同时都支持内阁主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右派和墨索里尼左派,英国的费边社和工党

^① 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8月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目光敏锐的饶勒斯在同倍倍尔就1903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谴责了修正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不支持参加联合政府的社会党人)进行的一场著名的辩论中,完全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未来,是进步世界最高尚和最光荣的党之一,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饶勒斯问道,在外表上的政治实力和采取具体行动的实际能力之间,难道不存在惊人的矛盾吗?而且选举中的实力越是壮大,这种软弱无力看来也变得越是厉害。饶勒斯把这种情况同德国不存在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同德国党和工人阶级不是在巷战中争得普选权,而是由上面赐给普选权联系在一起。对于自己争得普选权的人,很难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对于由上面赐给普选权的人,则剥夺普选权要容易得多,例如在萨克森“红色王国”中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思想上软弱无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仍然存在一种反动的君主制,在那里议会只是半截的或几乎是有名无实的议会,因为执行权不在它的手里,它的决定只是一种愿望,国王政府可以任意废弃。(参见J.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sv. I, Hannover 1961, str. 284 - 290)

分子^①，德国的伯恩施坦分子，俄国的别尔嘉也夫(N. Berdjajev)、司徒卢威(P. Struve)、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 J. Tugan-Baranovski)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和内部矛盾的同样条件的反映。不言而喻，坚持上述的社会主义论点和上述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的主张，就必然会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几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和把马克思的哲学同康德的哲学结合起来的要求，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以独特的方式包含的、经过提炼的黑格尔的因素。“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个口号，实际上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偏见之一。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康德是可以被用来表达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意识的十分理想的哲学家。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蓬勃上升的乐观时期，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经受到他们在数十年后即在社会大震动后所饱受到的、深感本身孤立和自己的社会没有出路的那种内部危机。与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胜利(哪怕是妥协的胜利)和相对稳定相适应，资产阶级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习惯于产生自满的感觉。他们的“自我”，他们的自我意识，早已从1848年不光彩的日子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也没有明显的客观理由要对这种自我意识产生重大的疑虑，或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初期的信念发生动摇。

虽然当时他们就已经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对于自己的先驱者所夸耀的人道主义伟大理想，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① 费边社是以维伯夫妇(S. Webb 和 B. Webb)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在1883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参加者还有萧伯纳(B. Shaw)和赫·乔·威尔斯(H. G. Wells)。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同时企图把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的边沁主义、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们作为工党运动中的一翼，始终是一个人数较少的排他性的集团，但对工党分子的改良主义政策和观点起着重大影响。英国社会主义者亨·海德门(H. Hyndeman)、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Bax)、威·莫里斯(W. Morris)后来都采取了类似的、主要是修正主义的立场。当时由凯尔·哈第(Keir Hardi)、拉·麦克·唐纳(R. M. Donald)等人领导的工党运动，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但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合乎理想的发展,再也不能沿着黑格尔哲学的路线前进了,因为黑格尔直接引出了马克思。另一方面,自从黑格尔建立起精心设计的体系之后,要想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继续彻底发展辩证法,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给它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则又意味着不再处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之内和否定本身的社会基础。

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其典型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意味着要在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社会界限和思想界限,而至多只是提出一种十分理想的要求:通过加强国家的作用,使国家作为某种“中立”的因素而负有解放的使命,以缓和阶级矛盾。当时,这种倾向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A. Wagner]、古·施穆勒[G. Schmoller]、路·布伦坦诺[L. Brentano]等),他们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根据以上种种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60年代李普曼(O. Liebmann)的号召不能是“回到黑格尔那里去”,而只能是“回到康德那里去”。康德在发展哲学知识中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无可争辩的,他是一个在主观方面、思想方面,甚至社会方面仍然合乎要求的理想人物。当时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把康德的哲学看作是万宝全书,是唯一的科学基础,是“哲学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革”^①,在康德之后,哲学家“原则上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②,——这就是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创始人以激动的心情所写的话。

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对于修正主义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柯亨(H. Cohen)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伦理学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以唯

① W. Windelband(文德尔班), *Was ist Philosophie, Präludien I*, Tübingen 1911, str. 22.

② W. Windelband, *Kritische oder genetische Methode, Präludien II*, Tübingen 1911, str. 100.

物主义为基础,而应当以伦理学唯心主义为基础,因此,康德由于创立了伦理学和绝对命令而成了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鼻祖。如果考虑到先验唯心主义观点,那么得出上述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先验唯心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规律性是先验意识的规律性,因此,社会规律性不能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意识本身(那托尔卜[P. Natorp])。这一学派的信徒鲁·施塔姆勒[R. Stammler]、弗·施陶丁格尔、卡·沃伦德尔[K. Vorländer]等人直接以康德主义的先验原则为基础,力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从而给马克思涂上唯心主义的色彩。^①

不能否认,其中某些人曾进行重大的尝试,企图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树立新的人性,并且企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这一工作中所持的哲学立场和思想立场,直接否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历史趋势,是现代历史矛盾和人的积极活动的必然结果,这样,他们也就必然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

这实际上也就是修正主义本身的基本社会纲领和思想纲领。

在德国,格·福尔马尔(G. Vollmar)1891年在慕尼黑的“黄金国大厅演说”,康拉德·施米特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

^① 特别详尽地叙述这一思想的著作有:赫·柯亨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一书所做的《带有批评性补充意见的前言》(*Einleitung mit kritischen Nachtrag*, 1896),以及《纯意志伦理学》(*Ethik des reinen Willens*, 1904);保·那托尔卜的《社会教育学。意志在共同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Sozialpädagogik. Theorie der Willensbildung auf d. Grundlage der Gemeinschaft*, 1899),《社会唯心主义》(*Sozialidealismus*, 1920);鲁·施塔姆勒的主要著作《从唯物史观看经济 and 法》(*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896),《社会主义和基督教》(*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 1920),在后面这本书中,他认为基督教具有更大的意义;而弗·施陶丁格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见到的,特别坚持一种改良主义的论点,认为消费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在卡·沃伦德尔的著作《康德和马克思》(*Kant und Marx*, 1911)中,可以看到对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十分精彩的观点和分析。沃伦德尔这个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马堡学派的信徒,力图从这种立场出发,把康德和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问题上的观点,融合在一起。除了上述著作外,他还发表了《康德和社会主义》(*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1900),《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Marx, Engels und Lassalle als Philosophen*, 1920),《从马基雅弗利到列宁》(*Von Machiavelli zum Lenin*, 1926),以及康德的传记(1911年)和马克思的传记(1929年),在后一本书中,他对马克思的为人,一般说是深表敬仰的。

观》一书的著作和评介姆·克朗能堡(M. Kronenberg)的论康德一书(1897年)的文章,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实际上已经开始提出了修正主义。这些著作和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康德是科学的和批判的哲学的最伟大的代表,因此确实有必要用康德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抛弃黑格尔。

309

二、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提出类似论点的,还有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 1871-1907)。他在《道德意识体系》(1898年),《达尔文理论和社会主义》(1899年),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一书中,竭力想把康德、马克思和达尔文捏合在一起。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声称,他的这本书标志着回到康德那里去,因为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思维过程的观点符合康德的观点,而不符合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的更为接近。沃尔特曼在这本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深入研究,除了使我确信在科学方法问题上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更加接近得多以外……还使我深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是意味着回到康德学说那里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原则联系。”^①

这样,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外部的表现方式,至于内部的思想潮流,实际上是康德的。“但从这些研究中同时可以看出,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比以前所设想的要接近得多;如果从另一方面来探索黑格尔哲学遗留给马克思思想领域的东西,那么这种残余几乎只涉及外部的表现方式,而内部的思想潮流却

^① L. Woltman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üsseldorf 1900, str. 296 - 297.

完全贯穿着批判的和自然科学的方法。”^①

沃尔特曼基本上把康德的和马克思的解决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方法完全混淆了。他没有觉察到康德的立场和马克思的立场在理论上是不能混同的,他也没有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进行批判的实质,因而他完全不能懂得马克思对人和历史所做的解释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沃尔特曼仍然始终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瓦解马克思主义,把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因为康德的伦理学首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可见,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论证,对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某些理论家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爱德华·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创办了新的《社会主义月刊》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相抗衡。当时聚集在《社会主义月刊》周围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还有爱·大卫(E. David)、沃·海涅(W. Heine)、保·康普夫麦尔、库·艾斯纳(K. Eisner)以及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而得名。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紧接着在

^① L. Woltman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üsseldorf 1900, str. 296 - 297. 他在一年前出版的关于达尔文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一本书中就已经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从书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学院派哲学同这种观点的联系。“因为我认为,现代社会主义从黑格尔哲学中取得的逻辑手段早已不够了,此外,社会主义只有像学院派哲学早就做过的那样在自己的思想前提上回到康德那里去,才能在科学的力量上取得胜利。”(L. Woltmann, *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er Sozialismus*, Düsseldorf 1989, str. 3)还请参见最新的研究著作:于尔根·米施:《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政治哲学》(Jürgen Misch, *Di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Ludwig Woltmanns*, Bonn 1975),1975年波恩版。

其信徒的怂恿下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上彻底地叙述了自己对整个运动的主张。

伯恩斯坦的奢望无疑超过了他的理论能力,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基础即哲学问题上,更是如此。伯恩斯坦同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为了想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公设,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他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下了不正确的定义,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的错误的根源。

他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³¹¹“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①伯恩斯坦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后期改变了这种观点,使思想、意识、意志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伯恩斯坦由此得出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不能重新回到他们的早期阶段,并对全部观念做一元论的解释。他没有分清“决定性”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竟断然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②

伯恩斯坦的这种解释,没有看到决定性并不等于绝对的必然性和宿命论。他利用这种解释,除了批判辩证法之外,还企图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根本因素以及有关当代历史发展的结论。

伯恩斯坦认为,阻碍彻底科学地分析历史过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

^①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35.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9页。——译者注)

^②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45.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9—60页。——译者注)

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①。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伯恩斯坦对于黑格尔在资产阶级哲学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的看法,完全是随着时代风尚人云亦云。某些哲学家也推崇黑格尔,主要是因为他的体系宏伟完备,他的分析精辟细致等等,但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即他的辩证法,却被他们一致抛弃了。他们都用康德的批判的方法来对抗黑格尔的辩证的方法。因此,伯恩斯坦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中的上述歧义和矛盾,“根源最后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②。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由于对辩证法做刻板的了解而使得问题庸俗化和公式化。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这种过错的原因都不在于辩证法,而在于那些人没有充分领会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把辩证法用来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遍公式和泛泛空谈。无论是这些人,或是辩证法的反对者,以及伯恩斯坦都不了解,直到今天,辩证法仍然是对事物(包括思维)的现实过程的最深刻的领会和认识,是任何先天的先验的方法或任何分析的方法所不能取代或替补的(所谓分析法只不过是任何方法的一种必要因素)。因此,可以毫不奇怪地,而是理所当然地得出下列形式逻辑的推论:伯恩斯坦在面对着改良还是不改良(即革命)的选择时,只是确定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是前一种可能性。同样,他还认为,由于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使用,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是前后不一的、矛盾的。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种表面的“妥协”和

312

①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59.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5页。——译者注)

②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57-58.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3页。——译者注)

“二元论”，并不是运用某种人为的辩证公式的结果，而正是历史实践本身的“二元论”在思想上的真实反映。^①这也使伯恩斯坦片面地宣传改良主义。既然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放弃它才作出的”^②，那么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伯恩斯坦本人之所以犯种种片面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不了解现实的辩证法的深刻意义。

313

不能否认，伯恩斯坦曾敏锐地觉察到了某些因素，特别是有关当时经济问题的某些因素，并反对了如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小行业和中小私有者绝对减少等论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防止某种片面夸大是有意义的。但是，倍倍尔、考茨基等人曾明确地向他说明，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此伯恩斯坦是在无的放矢。

但是，伯恩斯坦没有从这些事实中做出相应的有关革命斗争策略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却利用这些分析来证明：由于财富的增加和组织的严密，资本主义已经能够避免其主要的祸害——经济危机。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该章结尾部分的观点上：“如果不是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导致一个普遍的危机——如前所述，这是任何一天都能发

^① 伯恩斯坦特别在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趋势的分析中看到了这种表面上的二元论。他写道：“对我来说，这一章（指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一章。——弗兰尼茨基注）不如说是说明了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并且也在其他地方以比较不那么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222 - 223.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53—254 页。——译者注]）罗莎·卢森堡对此做了正确的答复，她说：“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与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二元论——即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309. [参见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2 页。——译者注]）

^②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69.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87 页。——译者注)

生的——，那就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可以根据纯粹经济的原因推论这样的危机会立刻到来。地区的和部分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组织和扩展、特别是在食品生产的巨大扩展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后一现象对于我们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许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地租和食品价格的下降那样对缓和营业危机或阻止它增大作出贡献。”^①

伯恩施坦的主要批判者，特别是罗·卢森堡，已经充分地指明，而且历史实践本身也最终表明，伯恩施坦的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对现状的分析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伯恩施坦在理论上比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和“妥协性”究竟超过了多少！

鉴于上述这些理由，伯恩施坦附和当时的工会活动者和合作社会主义者的主张，特别强调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②这种观点整个说来归根到底当然是号召改良，而革命则只是一种不成文法，它只有在放弃呼吸的自然权利时，才不再存在。伯恩施坦认为，觉察到这一点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

314

^①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120. (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43页。——译者注)

^② 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指出过，工会和合作社活动者等的改良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面貌的改变起了多么大的影响。格·利特尔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对此做了透彻的说明，他说，“修正主义”只是各种各样改良主义实践的微弱的反映。他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人，不是席佩尔、伯恩施坦、海涅、卡尔韦尔和希尔德布兰德，而是福尔马尔、奥艾尔、克洛斯、列金、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不是《社会主义月刊》中的修正主义学究，而是地方上的政客、工人组织中的书记、工会领袖和议员。(参见 Gerhard A. Ritter,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Berlin-Dahlem 1963, str. 187)

更加大得多。”^①

根据以上种种论点,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伯恩斯坦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当代历史斗争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从人类存在的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在答复罗·卢森堡对他的批评时断定:“尽管她的论证表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混乱并且结果竟非常武断地把唯心主义同空想主义混为一谈,但是她在这一点上毕竟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②

不仅如此,伯恩斯坦在当时,即在德国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而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 20 万党员的时候,还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可以取得政权。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工人并没有像工人运动发展初期那样地赤贫化,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偏见和弱点。^③ 实际的缺点和困难,始终是应该估计到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掌握政权尚且为时过早,这只能使革命力量

^①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209 – 210.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39 页。——译者注)紧接着这一论点之后,伯恩斯坦又补充说到有关革命的论点,他认为革命是思辨的权利,结合着他对改良的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权利只不过是空洞的宣言,“问题不是在于发誓放弃所谓革命的权利,这一纯粹思辨的权利是任何宪法也不能把它写成条款,世界上任何法典也不能加以禁止的。如果我们放弃了呼吸的权利,自然规律就要强迫我们死亡,——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革命的权利就将存在。这一不成文的并且无法规定的权利不会因为人们站在改良的立场上而受到影响,如同防卫的权利不会因为我们制定了调整我们的个人争执和财产争执的法律而被废除一样。”(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210.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39 页。——译者注])

^②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224.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55 页。——译者注)

^③ 参见 E. Bernstein, *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Zagreb 1958, str. 230. (参见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261—263 页。——译者注)

解除武装。

尽管伯恩斯坦提出了个别正确的见解,但在所有根本问题上他是错的。他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不能从一个较短时期所特有的某些个别过程中,看出它们的总的线索。他在理论上没有弄清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只看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现象,以致在理论上被这些困难和复杂现象弄得束手无策、混淆是非,并倒向改良主义。

当时所有起来尖锐地批判伯恩斯坦这些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确的。其中站在最前列的有: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梅林、倍倍尔、考茨基等。伯恩斯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然意味着回到其他的哲学体系上去,首先是回到康德的体系上去,并用这些哲学体系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在这本书中尚未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论述哲学观点,但是这一工作已由他的门徒根据当时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理论予以彻底地完成了。

这个过程从沃尔特曼和施米特起,经过鲍威尔(O. Bauer)和阿德勒(M. Adler),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

在革命实践方面,伯恩斯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有关国家消亡的全部问题,以致正好是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的酝酿时期,起了瓦解革命力量和破坏革命过程的作用。伯恩斯坦主张一般的民主主义并要求抛弃“布朗基主义”,可是他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从而使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和一种社会主义政策遭到了

空前的破产,他的行为也帮助了德国反革命的胜利。^①

316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德国修正主义,特别是伯恩施坦,也就具有国际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德国修正主义的出现也遭到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潘涅库克都对它进行过批判。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倍倍尔以外,当时特别突出的两个重要人物是梅林和考茨基。

四、弗兰茨·施陶丁格尔

317 在我们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家的基本思想和活动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谈一谈弗兰茨·施陶丁格尔(1849—1921)的理论观点,他在当时的理论探讨和论战中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他基本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在最初的一本关于自由规律的大部头著作中明确地认为,康德是他的超乎一切其他人之上的导师^②,

① 当代企图为伯恩施坦的路线和观点进行辩护和论证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彼得·盖伊(Petar Gay),他写了一本书《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Das Dilemma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Nürnberg 1954. 该书英文版为1952年纽约版)。盖伊认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的难题是:民主道路还是暴力?这是典型的非辩证的提问题方法,因为选择任何一方都会陷入一般的空论。正是这种提法使得伯恩施坦、考茨基及其同道对德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做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历史的评价。盖伊最后认为有必要订正修正主义的某些不够明确的原理,如它的哲学基础(因为战争和大危机动摇了它的乐观主义)和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基本上是民主议会制的,但并不是始终都很明确),其实他提出的是早已解决了的要求。从类似的抽象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写出的大部头专著还有: Pierre Angel, *Eduard Bernstein et l' Evolution du Socialisme Allemand*, Paris 1961。最近的著作则请参见 Bo Gustafsson,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E. Bernsteins Kritik des Marxismus und ihre ideen geschichtlichen Voraussetzungen*, I. II. Frankfurt a. M. 1972。伯恩施坦到后来仍然坚持他当年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和下列专门著作中提出的观点。这些专门著作有:《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Der Revisionismus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Amsterdam 1090), 论述阶级斗争中的法和伦理学的《工人运动》(*Die Arbeiterbewegung*, 1910)。一般说他后期发表的主要是历史著作和回忆录,如《柏林工人运动史》(*Die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 I - III, Berlin 1907 - 1910);《我被放逐的年代》(*Aus den Jahren meines Exils*, Berlin 1917);《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Sozialdemokratische Lehrjahre*, Berlin 1928)。

② Franz Staudinger, *Die Gesetze der Freiheit* (I. Sv. *Das Sittengesetz*), Darmstadt 1887, str. 139.

直到后来的论述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①中,以及在《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中,施陶丁格尔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是有缺陷。马克思主义在把社会过程解释为符合决定论的因果过程时,始终能用自己的科学方法来纠正某些错误。但是一旦提出有计划地改造现存事物的要求,它就不能在这一因果过程中,而只能在理性原则中寻找这方面的标准。这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康德的批判主义。同样,如果现实生活的规律不作为基础,那么有目的行动的规律只是空洞的公式。而这种认识必然会把一个康德主义者导向马克思的学说。^② 施陶丁格尔认为,自由主义同样会合乎逻辑地导向社会主义,正如康德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必然导向科学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一样。

他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和消费合作社的书中^③,对消费合作社以及一般合作社做了理论考察和实际分析。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而这在消费合作社(Konsumgenossenschaft)中就已经具备和存在。他认为消费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因为它使产品价格低廉并通过本身的节约成了促进生产的手段^④;消费合作社的主要意义在于社会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方面,它包含着摆脱对资本的依附的内在趋势。^⑤

在道德方面,从消费合作社的性质中产生出的道德,是与从资本主义竞争中产生出的道德相对立的。因为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

318

① Franz Staudinger, *Ethik und Politik*, Berlin 1889. i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Jena 1914.

② Franz Staudinger, *Ethik und Politik*, Str. 159.

③ Franz Staudinger, *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 der Moral*, Darmstadt 1907. i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Leipzig 1908.

④ 参见 Franz Staudinger,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str. 16, 31.

⑤ Franz Staudinger,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str. 35.

于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活动的方式，也植根于我们的思想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并带有几乎不可磨灭的痕迹。由于这些活动是有组织的，因此这对于人对人的关系是不完全一致的。”^①

施陶丁格尔回顾了合作社运动的历史发展，考察了合作社活动的不同领域和组织，指出了它发展道路上存在的内部和外部困难，认为合作制不同于使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资本主义强迫制，它具有解放的职能，使劳动符合需求和消费，使人免除一切赋税，但是应当向共同体（国家、较小的共同体等）缴纳的赋税除外。^②

施陶丁格尔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论述政治的文化基础的书中，系统地叙述了自己独特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关于合作制的思想。书中高度地概括了他的观点：单用政治手段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平等的世界；由群众来掌握经济实力，并通过消费合作社来掌握经济实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施陶丁格尔认为，消费者中蕴藏着巨大的实力，因为他们实现着剩余价值。如果消费者不购买，全部生产都是徒劳的。“购买者实现剩余价值，他分配利润，他安置和解雇工人，他创造和消灭资本的价值和地租。因此，他本人是资本的创造者，他作为购买者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全部经济实力。可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的命运变得十分恶劣时，只能绝望地徒然挣扎。”^③

319 虽然他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合作制才能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期目的^④，但他主张，集体的原则应当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最高要求。“这是今日的最高文化要求。如果我们把创造和保证这种关系

① Franz Staudinger,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str. 35 - 36.

② Franz Staudinger, *Die Konsumgenossenschaft*, str. 130.

③ Franz Staudinger,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129.

④ 在同一本书中，施陶丁格尔写道，仅仅停留在合作制上，也和任何“仅仅到此为止”一样，是一种片面性。但是，“应当强调指出，没有它则任何其他道路都不能走向胜利”。（*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str. 157）

的全部努力称作文化政策,那么很显然,在今天若不建立合作制,则任何引导人们向上的文化政策都不能存在。由此就很清楚,进步的文化工作的成绩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共同体成长的现存条件。因此必须十分断然地肯定,无论道德或法、无论科学或艺术、无论教育或政治的任何进步,而首先是概括这一切的一种内在信念的进步,如果没有合作制的同样程度的进步,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同样应当断然地强调,反过来说,这种经济进步若不与其他文化力量协同动作,也是不能实现的。”^①

只是随着合作制的发展,自治和监督所必然要求的思想也会发展起来,因为“在真正的监督中体现出民主”^②,最后体现出从自己的理智中产生的纪律,即自由的道德纪律。所有这些论断必然使施陶丁格尔也放弃阶级立场和革命立场,接受改良主义,甚至接受原始的空想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因为“合作制面对着的是处于竞争中的资本世界,而不是处于阶级斗争中的资本世界”^③,所以他赞同维尔布兰德(R. Wilbrandt)的观点,后者在杜宾根召开的福音派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断言,合作制把各阶级联合到共同的消费利益中,从而导致今日的阶级分裂的消灭。^④

施陶丁格尔企图把康德的善良意志伦理学和行动准则,与马克思

320

的人的意识和感觉随着人的历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统一起来。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走向了错误的改良主义的空想主义。他认为,

① Franz Staudinger,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str. 160 - 161.

② Franz Staudinger,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str. 168.

③ Franz Staudinger,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str. 186.

④ 在这本书的结尾,他重复了同样的断言:“只有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人民群众很快取得了必要的、既是经济的又是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和进行了这些方面的考察,他们才能作为购买者极其迅速地把自己的巨大的经济实力的手段联合起来,并通过把自己的大量无息资本积聚起来和有目的地使用,使自己作为生产者而得到解放。否则他们将很快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厄运。群众具有权力,他们不要求执掌权力,而只要求取得和组织权力。所缺乏的只是观察、意志和训练。权力问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全部文化和政治任务。”(Franz Staudinger, *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 I - II Jena 1914, II sv. str. 246 - 247)

当代历史实践的根本要点是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展活动,消费合作社将把各阶层和各党派的利益集合于一身。这样,他就抛弃了马克思对当代历史问题和解决当代历史矛盾的途径的根本观点。但是,施陶丁格尔强调消费者,首先是劳动人民自行组织起来的要求,从而预感到这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了革命变革以后,也需要以自治的民主形式来改变人的意识和进行教育工作,这是社会主义能更顺利地发挥职能的重要前提。

五、弗兰茨·梅林

像弗·梅林(1846—1919)这样具有高度的文化、渊博的知识、开阔的思想、正直的人格、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尚的风格的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中,都是少见的。梅林诞生在波美拉尼亚一个为普鲁士王朝服务的官吏的家庭里,他在耶拿学习哲学和文学史,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梅林与同时代和同境遇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早期埋头研究普鲁士王国和容克地主的历史和文化古籍,从而接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老战士——约·雅科比、格·魏斯(G. Weiss)、保·辛格尔(P. Singer)及其刊物《天平》(*Die Wage*)。

德国特殊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来自上层的”革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妥协,同时也使自由派遭到破产。只有一个党代表着历史的前景,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曾企图用反社会党人法来阻止它发展,但最后不得不认输。

事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使爱好自由的、学识丰富的梅林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梅林在80年代末就已经为《新时代》撰稿,1891年参加了编辑部。这样就开始了梅林工作的新阶段。他很快成了德国的以及世界的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学领域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之一。

梅林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理论方面,而是放在历史方面。他的精辟的历史见解、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熟练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产生了非凡的成果。他的雄劲有力的笔法和优美流畅的文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研究了普鲁士历史、普鲁士反动的容克地主阶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文学史和哲学史。他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解释上述这些历史现象的最有价值的依据。

《莱辛传奇》(1893年),当然是梅林最成功的科学分析之一。书中对莱辛本人以及他在当时德国和欧洲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做了相当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书中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而在文学运动,特别是在当时莱辛的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各种矛盾和特点。必须着重指出,梅林在这本书中以及在他的专著和研究中(如关于席勒、海涅等人的专著和研究中),都首先着重解释这些文学现象,而不是分析作品的风格,因为后者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任务。但是,对风格的分析,如果它不是单纯形式上的和形式主义的分析,就必然需要以梅林顺利地完成的准备工作为先决条件。^①

梅林的另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篇幅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共四卷(1897—1898年);《到中世纪末的德国史》(1910—1911年)。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评述这些时期的基本资料。

梅林特别精通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因而能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遗产》(共四卷,1902),并写了序言和做了精辟的分析研究;他还写了《马克思传》(1918年)。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善于根据丰富的内容,以坚定的笔调,几乎独具一格地概述了当时各种错

322

^① 梅林的文学研究著作后来汇集出版,名叫《文学史论文集》(*Zur Literaturgeschichte*, Berlin 1930)。第一卷从卡德龙到海涅,第二卷从赫伯尔到高尔基。

综复杂的历史事件。

在其余的大量著作中,还应该提到他写的篇幅较小的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文集,以及哲学史的论著。

毫无疑问梅林存在一些缺点,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同当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比较起来他的缺点要少得多,他所写的大量文学评论著作,将永远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之一。要知道,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各种必要的条件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还处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不仅每时每刻会提出一些必须直接完成的任务,而且往往使马克思主义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遭到牺牲。^①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已经指出过的,梅林在历史分析中,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为人和活动做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俩人的态度似乎过于严厉,因而认为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他们的名誉。后来所发现的拉萨尔同俾斯麦的通信以及有关巴枯宁活动的文件都证明,正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梅林。

323

梅林在研究哲学问题和分析哲学本身时,陷入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社会学观点。他反对那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哲学家和天才人物的主观创造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对哲学同社会结构之间的某些关系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如对古代、康德、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但他对哲学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把它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梅林主要只是坚持“每一种哲学都是从某一民族或某

^① 因此1916年卢森堡在梅林70寿辰时给他的贺信中对他的生平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她写道:“您从资产阶级阵营中为我们挽救了过去资产阶级文化的宝贵财富中留传下来的遗产,并把它交给被剥夺社会继承权的人的阵营。您的著作和文章使德国无产阶级不但同古典哲学,而且同古典文学,不但同康德和黑格尔,而且同莱辛、席勒和歌德发生紧密的联系。您的神奇之笔所写的每一行字,都教导我国工人:社会主义不仅是生活问题,而且是文化运动,是伟大而自豪的世界观。”(转引自R. Lindau, *Franz Mehring zu seinem 100 Geburtstag am 27 Februar 1946*, Berlin, str. 11)

一时代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需要的深刻根源在当时经济的生产过程之中”,哲学一旦产生,“它的思想不是由于本身的吸引力,而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生作用,历史发展本身又是由经济的生产过程所决定的”^①,由此,梅林很自然地得出了关于一切哲学终结的结论。也就是说,既然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附带表现,是人们意识到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之一”,那么在梅林看来,正如在没有出现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存在哲学一样,“阶级斗争一旦消灭,历史上的那种哲学也将不再存在”。^②

梅林主要是埋头研究历史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样他虽然片面地,但是着重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其他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区别。他在那本保卫马克思的观点、反驳巴尔特的攻击和歪曲的著名小册子《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虽然也是大错误,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没有看到,人不仅生存在自然界,同时也生存在社会中,不仅有自然科学,而且也有社会科学。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不能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自然界中有意识行为的生物,但它却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是怎样决定的。因此,它一到了历史的领域,就转变为它的极端反面,转变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相信伟大人物的精神的魔力,相信这种魔力能造时势;我们可以提到毕希纳对腓特烈第二的崇拜,还有海克尔一方面可笑地痛恨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对俾斯麦的偶像崇拜。这种唯物主义根本只懂得人类社会内部的观

324

① F. Mehring, *Demokrit und Epikur,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31, str. 42.

② F. Mehring, *Wesen und Zeitbeudingtheit der Philosophie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31, str. 25. 本文最初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标题发表在1904年的《新时代》上。

念推动力。”^①

但是,另一方面,在有关一般哲学观念的问题上,梅林错误地认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基本上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因此,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②

但是,梅林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更好地理解或直接“领会”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意图,这特别清楚地反映在他对某些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具体研究中。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地方,谈到任何社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以及思想力量时,他十分有分寸地强调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他们怎么样创造他们的历史呢,这在每一各别场合,就要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认识的事物的物质关系是多么清楚,或多么不清楚了”^③。梅林继续说,因为思想不是从无中产生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所以一种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以多大的精确程度反映这一过程。“人类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是就在历史发展之中,它由物质生产中产生,靠着物质生产发展,并且与它一道成长。”^④应当强调指出,梅林的后一种思想的

^① F. Mehri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31 str. 284. (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页。——译者注)梅林的这一著作是作为《莱辛传奇》的附录而出版的。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著作,信中对于解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缺点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61页。——译者注,以及本书关于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的一章)。

^② F. Mehring,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10),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31, str. 337. 因此,梅林才会对考茨基论述伦理学的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参见 F. Mehring, *Sozialistische Ethik* (1906)。

^③ F. Mehri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31, str. 291. (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译者注)

^④ F. Mehri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str. 292. (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译者注)

表述方式最接近于我们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看到的那些表述方式。

完全可以理解,梅林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他用自己对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见解,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同样,尽管梅林的著作中存在种种缺点,但这些缺点在他具体分析各种人物、理论和时代时却很少表现出来,同时他对正确地评价这些现象发表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对理论中和实践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企图始终做出正确的反应。

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站在战斗的前列。同样,他也正确地认清了“狄慈根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梅林虽然已处于晚年,但仍毅然决然地站到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的一边,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为此,他在70高龄时被捕入狱。他十分英勇地站在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唯一真正革命的派别“斯巴达克联盟”的前列。

梅林的最伟大的贡献,正如已经说过的,是在历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卢卡奇在他论述梅林的一篇卓越的文章中,虽然过于尖锐和过于苛刻地强调了梅林理论观点的某些局限性和错误,但在全面评价梅林本人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也和一般现象一样,梅林带着自己的种种错误和缺点处于第二国际活动的范围之内。虽然他对美学原理、文学史方法论原理、文艺批评原则及其运用的解释包含着不少十分严重地脱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梅林的阶段标志着一个只能批判地超过,但不能逾越或抹杀的发展阶段。梅林的高度的文学修养,他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同德国革命传统的联系,使得他的著作成为每一个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认真研究德国文学问题的人的必读参考书。此外,我们在论述过程中曾一再指出,梅林在对当时工人运动中错误的机会主义派别表现出正当的感情和做出客观上正确的反应的同时,如何得出了许多不正确的结论和论点,这些结论和论点尽管

326

有错误,但包含着一种比同时代的德国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高明得多的观点的因素和趋势。梅林的革命能动主义,他对艺术中革命的主观积极因素的强调,都标志着我们的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批判地吸收梅林著作中大量有价值的遗产,才能真正克服这个发展阶段的缺点。因此,具体而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梅林的全部观点,既包括他的方法论,也包括他的个别结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对于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具体地研究本国的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以往相当忽视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批判地克服梅林的缺点,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文学理论和德国文学史。梅林作为第二国际德国支部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作为向国际工人舆论界阐释德国文学发展的人物(不管这种解释包含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永远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人物。”^①

327

梅林尽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他对历史现象所做的马克思主义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他对一切研究的现象所持的独立见解和批判态度,使得他过去和现在始终成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榜样。这一点在今天更加需要强调,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自诩的国家的非民主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思想工具。

^① G. Lukács, *F. Mehring, Prilozi historiji estetike*, Kultura 1959, str. 363 – 364. 汉斯·科赫(Hans Koch)写了一本篇幅巨大的叙述梅林的文学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著作《弗兰茨·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Franz Mehring Beitrag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 [Ost], 1959),他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卢卡奇对梅林的评价。一般地说,他是以前一套的反映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的。其他介绍梅林的书籍,请参见:Thomas Höhle, *Franz Mehring. Sein Weg zum Marxismus*. Berlin (Ost) 1956; Joseph Schleifstein, *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 bis 1919*. Berlin (Ost) 1959; Walter Kumpmann, *Franz Mehring als Vertreter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Wiesbaden 1966。

六、卡尔·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这个运动的繁荣昌盛同考茨基的声誉大震联系在一起,同样,这个运动的衰微没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领袖的破产。这个运动的理论成就和重大缺点,都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的身上。

考茨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著作。^①和通常一样,我们在这方面感兴趣的,是那些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或损害马克思主义思想声誉的理论观点,因为它们始终具有广泛的理论或政治意义。

考茨基在70年代初就接近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伦敦担任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创办《新时代》(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刊物),并主持这一刊物直到1917年。考茨基具有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丰富的文化知识,他做了大量工作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把它运用到许多科学活动领域,首先是历史和经验领域。他在活动的早期所写的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1789年以来的阶级矛盾》(1889年,此书以后再版时改名为《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最后这部著作主要对16世纪以前早期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上这些著作表明,考茨基善于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他所研究的各种现象上。

328

但是,在理解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考茨基以及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

^① 参见 Werne Blumenberg, *Karl Kautskys Literarisches Werk. Eine Bibliographische Übersicht*, Gravenhage 1960。

究,而是从当时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进化论的发展观在考茨基的观点中占有如此牢固的统治地位,以致他兴奋地说,道德的作用可以从动物的社会本能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茨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强调要尽可能准确地把马克思的观点和达尔文的观点区分开,但是无论是这个时候或是以后,考茨基都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没有避免对历史发展做简单的肤浅的解释。不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当时,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十分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特别有力地宣扬了对黑格尔的体系,尤其是对他的辩证法的“厌弃”,新康德主义丝毫不了解黑格尔思想的丰富内容。虽然考茨基没有像他的那些修正主义伙伴那样把黑格尔看作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革命的轻举妄动”的罪魁祸首,但是不懂得和不理解辩证法是考茨基的理论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329 联系到他后来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强调指出,考茨基活动早期阶段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他后来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变革所做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解释的某些理论前提,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考茨基在他的那本非常著名的对爱尔福特纲领的通俗解说中,正确地解释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并强调他并不认为仅仅通过改良就可以克服生产力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之间的日益增大的矛盾。“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与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者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

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①

考茨基接着说,当我们说到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发展的时候,当然设想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愿望和欲念等,并力求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使用自己的能力。现存所有制关系中的这种变革,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不一定同暴力和流血联系在一起。社会革命也不一定就能一举成功。“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被参加下进行的。”^②

在以后的论述中考茨基还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严重后果,是任何改良都不能制止的^③,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取消商品生产,用为需要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④但是,考茨基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在当时就已经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认为国家是具有相当广阔的活动场所的现存社会组织,可以用来发展它内部即现代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共同体。^⑤他在另一个地方把这一点表述如下:“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

330

^①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01.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页。——译者注)

^②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03.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页。——译者注)

^③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06.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7页。——译者注)

^④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10.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1页。——译者注)

^⑤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15.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4页。——译者注)

发点。”^①他认为,这还不是说,任何国有化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也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不需要作某种改变而通过普遍国有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②

331 如果注意到考茨基在对社会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中的理论缺陷,注意到他仍然没有充分有区别地分析国家和革命的关系,注意到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的整个形势,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考茨基的这本著作中以及在他早期的全部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他后来抛弃一切革命政策和在政治上完全失策的因素。

考茨基的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土地问题》(1899年),一般地说,也属于这个时期。考茨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先全面地研究这个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的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形形色色截然相反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兰克福(1894年)和布勒斯劳(1895年)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能得出一致的看法。修正主义者格·福尔马尔和爱·大

^①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24.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1—102页。——译者注)

^②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Hannover 1964, str. 125. (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2页。——译者注)这种对国家和议会制的指望(它后来完全超过了革命的观点),在关于《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出版一年后发表的论述议会制和民主制的文章中,叙述得更加明确。文中断然肯定:“只有政治上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断言,即使在普选权的统治下,代议制仍旧保障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为了推翻这种统治,必须首先取消代议制。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如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样,这在现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消代议制,而是破坏政府对于议会的权力,但同时也是通过平均地划分选区、保护选举秘密、短期议会、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完全自由、而尤其是通过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已满二十岁的国民来给无产阶级进入议会开辟一条尽可能广阔的道路。”(《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参见《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4页)在稍后还写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对社会发展满怀信心,对自己本身满怀信心,因而不怕任何斗争,也不怕同优势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只要一个可供他们自由地显身手的战场。民主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战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可以在选举上首先开展最后的决战。”(参见上书,第125页)

卫认为,马克思忽略了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没有看到工业发展的规律与农业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工业发展的规律导致集中,而在农业中,小生产同集中的大生产相比,占着优势。

考茨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基础来开展研究工作,他认为工业发展的规律已经为马克思所解决,而农业发展的规律毕竟不同于工业发展的规律。

考茨基根据大量资料,经过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原理,这也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贡献。首先,他得出结论说: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落后的原因,不在于这个经济部门的经济因素,而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质;农民小地产之得以保存,并不证明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或显得更加经济合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地产的利益的特点所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社会中大地产要消灭小地产或完全排挤小地产是谈不到的。我们已经看见在土地所有权集中进行得很远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趋势,国家和大地主自己都帮助它,如果这种趋势碰到太大障碍的话。

但正是大地产的这些意图证明给我们,没有再比那种意见更错误的了,那种意见认为小经营的保存是它比大经营有更稳固性的结果。小经营的保存勿宁说是小经营已不是大经营的竞争者的结果,已不是大经营和它们一同生产的那些农业生产品的出卖者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大经营和小经营一同发展起来的地方,小经营已不能起着农业生产品出卖者的作用。这里小经营从生产品的卖者变为大经营‘生产得过多’的生产品的买者;小经营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正是大经营所特别需要的那种生产资料——劳动力。

332

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地方,大的农业经营和小的农业经营,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像资本家和无产者一样,——而且小农业经营者也就更加具有后者(无产者)的性质。”^①

^① Karl Kautsky, *Agrarno pitanje*, Beograd 1953, str. 159. (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99页。——译者注)

在谈到大农业经济还是小农业经济具有优越性的问题时,考茨基在分析中得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大经营必然高于小经营。”^①他同时也得出结论,认为大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大经济优越性的发挥抵不上它由于面积辽阔和距离遥远而受到的损失;因此,任何超过这个界限继续扩大土地面积的行动,都会减少它的赢利。^②

333 考茨基肯定,农业正日益依附于工业,而且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所生产的技术设备正在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他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说,这个过程将消除工业和农业的脱节,农业必然会随着更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但如果在原始的农民经济内,农业在经济上是一个决定的和居于领导的要素,那末在现时这种关系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统治着,而农业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必须适合它的需要。工业发展的方向成为农业发展的指标。如果工业是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那末农业也一定要照着那条道路走。”^③

① Karl Kautsky, *Agrarno pitanje*, Beograd 1953, str. 114. (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4页。——译者注)

② 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一般说来,我们很难正确地规定发生收入减少情形的那些界限。对于不同的技术及土质条件以及对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它们就各不相同。继续进化就有一种趋势把这些界限冲破;在这一方向内,例如,汽力及电力或轻便铁道当作动力用就有这样作用。反之,其他倾向则表现出缩小地产的最大限度的趋势。一种经营,和它自己的面积大小比较,需要人或力畜愈多,肥料、土地生产物、机器及笨重工具等重物的移动愈频繁,则远距离的影响亦愈易感觉到。我们可以说,经营愈集约,投入同等地面的资本愈多,则地产之最大限度的扩张——超过这个限度,他的收入就会减少——亦愈小,但是这个规律时时为技术的发展所破坏。”(Karl Kautsky, *Agrarno pitanje*, Beograd 1953, str. 142 - 143. [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179页。——译者注])

③ Karl Kautsky, *Agrarno pitanje*, Beograd 1953, str. 289. (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49页。——译者注)考茨基在后面接着明确地指出,农业不能从本身中发展出必要的力量来消除那种控制和长期束缚农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其中的某一部分不能朝着与其他部分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大工业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因此“那末它就替社会主义征服那些不能从自身中产生出这种变革的前提条件的领域,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它必须为着自己本身的利益,为着社会团结一致和协调的利益而这样做”。(Karl Kautsky, *Agrarno pitanje*, Beograd 1953, str. 290. [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51页。——译者注])

考茨基从以上的种种分析中,也得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对待农民的态度结论。社会主义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破产是无法阻挡的,长期保持分散的个体土地所有制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工业中的社会主义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了农业发展的道路。不过根据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公式,考茨基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剥夺农民,而只能承认他们是现实的有益的劳动力,他们应该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合作制是他们最好的前途。

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以外,考茨基还以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作为依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就农民问题断然地肯定:“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①

334

考茨基在这一著作中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分析。他的这本书完全有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像罗·森堡那样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批判伯恩斯坦,但毕竟是参加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人之一。紧接着这个时期之后,考茨基出版了两本也很著名的书,一本谈的是伦理学问题,一本谈的是基督教起源。

^① F. Engels, *Seljačko pitanje u Francuskoj i Njemačkoj*, Marx-Engels, *Ibabrana djela II*, Zagreb 1950, str. 406. (参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译者注)如果根据这些原理来考察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实行的集体化原则,即对农民进行剥夺,并坚决地把这种剥夺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原则,那么,尽管历史经验不无值得慰藉之处,然而结论是十分清楚的。

《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的少见的著作。考茨基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虽然是十分擅长的能手,然而哲学理论问题却是他的最薄弱的方面,这几乎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人物的通病。

一般地说,值得注意的突出现象是,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因此,在哲学方面反修正主义的那一部分工作,迫于形势,不得不落到萨·贡特尔(S. Gunter),即新康德主义者弗·施陶丁格尔的身上。于是,凡是试图对某些问题做哲学分析的地方,都不得不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进行研究,而在这个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有主要的发言权。^①如果注意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很自然就会更加突出地强调格·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他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能够在理论上胜任愉快地同康·施米特、爱·伯恩斯坦、彼·司徒卢威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进行哲学论战的人。

考茨基对伦理现象的分析,确实抱有一定的企图,他打算一方面超过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无论在前一方面或是后一方面,他都没有成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艰巨的任务中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去克服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许多局限性,这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但是考茨基

^① 下面这个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例子(约发生在1907年),清楚地说明了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哲学意图了解得很差。当时有一个俄国工人写信来问马克思主义和马赫主义的问题,考茨基对此回答说(这封回信后来被弗·阿德勒刊登在1909年的《斗争》杂志上):“您问道: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我个人在马克思和狄慈根的观点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重大差别。而马赫是非常接近狄慈根的。(引自德波林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1927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第18页)在同一封信中,考茨基在回答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地解释了马克思的哲学这个问题时说:“如果您问我,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地援引马克思的哲学?我应该回答说,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至于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精通马克思学说的人,那是无可争辩的。”(同上书,第19页)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却仍然受到生物学派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这一著作，也和达尔文、斯宾塞、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对道德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一样，非辩证地把动物的某些本能特点和人的道德观念等同起来。考茨基断然肯定“道德规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①，“道德规律具有与遗传本能相同的性质”^②。这些观点是片面的、达尔文主义的。

但是，考茨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比达尔文主义者前进一步，他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整个社会的社会本能的减弱和阶级内部社会本能的加强。但在这些问题上，考茨基没有能明确地把伦理的社会现象同动物的本能现象截然分开。例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就同动物的本能现象完全不同，因为根据一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分化情况和性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由于领会的不同，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们不是作为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作为明确的社会范畴在人们的正常关系中发生作用。 336

考茨基出色地论述了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的特殊现象，这里也包括道德，因为道德也对产生它的社会基础本身发生反作用。

考茨基认为，只有道德理想不能来自社会本能。“道德理想无非是由于不满现状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是战胜现状的有力杠杆。但是，代替旧社会而出现的新社会的状况，不取决于道德理想的表现形式，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水平、自然环境、邻国性质和现有社会的前身等等。”^③

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现状的抗议，因而它不是目的，而是社

①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10, str. 63.

②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10, str. 67.

③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10, str. 138 - 139.

会中生存斗争的力量和武器。“道德理想是特殊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①

考茨基对伦理学问题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这一尝试,既受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派和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学派的影响。这一尝试虽然没有涉及伦理学领域内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作为最初的、尽管是没有打中要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337 但考茨基缺乏缜密的理论和哲学分析,因而不能有力地克服生物学派和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考茨基关于基督教起源一书的意义和价值则要大得多。他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原始文献,对帝国时期的罗马和以色列的历史情况、阶级分化和各阶层的状况,第一次做了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考茨基也详细分析了早期基督教公社,论述了基督教公社组织的发展和其内部教阶制度的形成,并且一直叙述到基督教被确认为国教。他研究这一重要现象后得出的结论如下:“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却是掠夺无产阶级和统治无产阶级的祭司阶级的胜利;我们更见出基督教的胜利,不是一种颠覆现存制度的势力的胜利,而反是保守势力的胜利,是一种压迫和掠夺的新支持者的胜利;它又不仅不消灭帝国的权威,奴隶制度,群众贫苦,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它反而令这些条件得以长存不朽。基督教的组织,教会,所以获得胜利,完全由于它抛弃了它的原始目的,而反拥护它的反对方面的缘故。”^②

对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问题,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如下:“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

^①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10, str. 141.

^② K. Kautsky, *Porijeklo kršćanstva*, Beograd 1954, str. 398. (参见卡·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68页。——译者注)

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①他同样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已经进入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的时期,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使政权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变化。考茨基也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要采取同日益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在取得实际的政权以前,要想参加国家政权,就只有“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缔结卖身契的议员罢了”^②。

338

但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过的,考茨基在这里也闭口不谈革命后的国家,而这个问题恰好是革命行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潘涅库克就这个问题同考茨基进行了论战,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是考茨基一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退却,成了他后来变节投降和把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思想的基础。

但是,正当考茨基写这一著作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开始日益扩大和加深。修正主义派成了公开的改良主义派,他们同工会领袖一起,日益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策略上日益倒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种情况,联系到第二国际内部围绕总罢工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规模争论,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早在90年代初荷兰社会党人多梅拉·纽文胡斯(D. Nieuwenhuis)建议用工人阶级的总罢工来回答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提上了日程。1893年和1902年在比利时,1902年在瑞典,接着1903年在荷兰,1904年在意大利,都发生了工人阶级总罢工,更不用说1905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了,它标志着一

^① K. Kautsky, *Der Weg zur Macht*, III izdanje, Berlin 1920, str. 65. (参见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页。——译者注)

^② K. Kautsky, *Der Weg zur Macht*, III izdanje, Berlin 1920, str. 111. (参见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页。——译者注)

整个革命时代的序幕。这些罢工都要求各国社会党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的方针。第二国际在好几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这个题目,最后在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委员会里多数人赞同罕·罗兰-霍尔斯特提出的把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区分的建议,并向代表大会提出了群众性罢工是工人阶级必要的斗争手段的提案。多数人赞同并投票通过了这个建议。^①

339 但是,德国工会在1905年6月的科伦代表大会上断然否决了关于群众性罢工的提案,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和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关于群众性罢工只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的防御武器的结论,则正好表明党对工会以及党和工会官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投降。

同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修正主义思想也日益滋长。有人抛弃了过去几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的坚决反殖民主义的方针,而是呼吁要采取“更现实的”殖民政策,这实际上要求为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辩护,只不过不主张采取他们的各种野蛮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及其许多同道(麦克斯·席佩尔、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等)同英国的费边派站在同一立场上。萧伯纳在关于费边社和王国的宣言中表述

^① 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当时出版了一本论述总罢工的巨著(*Generalstreik und Sozialdemokratie*, Dresden 1905),书中提出了上述方针。一年后出版了爱·伯恩斯坦的《论罢工》(*Der Streik*, Frankfurt am Main, 1906),书中认为,可以把政治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适当形式,但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后政治斗争将成为多余的了。这个时期里还出版了一本伊丽莎白·乔治(Elsbeth Georgi)写的学院式论著《现代工人运动中总罢工的理论 and 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s Generalstreiks in der modernen Arbeiterbewegung*, Jena 1908),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表了卡·考茨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群众性罢工讨论经过的评述》(*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Massenstreikdiskussion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14)和亨利希·劳芬贝尔格(Heinrich Laufenberg)的《政治罢工》(*Der politische Streik*, 1914)。据我所知,约有50名各种派别的社会党人研究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一场讨论和论战的规模有多么大。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和以后将要提到的某些人以外,还有如:赫尔曼·戈尔特(Hermann Gorter)、鲁道夫·希法亭(R. Hilferding)、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威廉·科尔布(W. Kolb)、斐迪南·特尼斯(F. Tönnies)、菲力浦·屠拉梯等。

了类似的观点,在宣言中费边派支持英国并吞布尔人共和国。^①

为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和中派的这种堕落行径,由罗莎·卢森堡、弗·梅林、卡·李卜克内西、克·察特金(C. Zetkin)等人组成的左派终于分离出来,最后在大战中组成了单独的革命的“斯巴达克联盟”。

1914年8月4日,德国议会中111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全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②

战前的形势和战争本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时期的态度问题,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上,第二国际遭到了彻底的破产。^③ 对于另外两个问题,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照旧主张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当1918年欧洲无产阶级确实面临革命

① 1907年8月在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伯恩斯坦、大卫、万·科尔(van Kol)、麦克唐纳等人的机会主义方针被否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尖锐地谴责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因为它导致奴役和杀戮殖民地人民,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吹嘘的文明人的使命,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的征服和剥削意图的遮羞布。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各族人民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化。除了上述社会党人之外,就这个问题写了文章的还有:卡·考茨基:《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 Berlin 1907)、安·潘涅库克、格·累德堡(G. Ledebour)、亚·帕尔乌斯(Parvus)、古·诺斯克、格·希尔德布兰德等。

② 15名议员,包括卡·李卜克内西、格·累德堡、胡·哈阿兹(H. Haase)、保·连施(P. Lensch)反对军事拨款,但受到党纪的约束。12月,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拨款时,只有卡·李卜克内西一人起来反对。后来,1915年3月,奥·吕勒(O. Rühle)同他站在一起;而1915年12月,又有18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出来支持他。

③ 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的会议和1916年4月在昆塔尔举行的会议,都谴责了第二国际的这一方针,并郑重宣布了对待战争的革命态度。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季诺维也夫(G. E. Zinoviev)和拉狄克(K. Radek)的领导下,要求会议反对国内和平的口号和采取国内战争的方针。这同时也是左派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当权派机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参见霍尔斯特·拉德马赫尔:《齐美尔瓦尔得运动。记录和报道》(*Die Zimmerwalder Bewegung. Protokolle und Korrespondenz*. The Hague - Paris 1967);尤利斯·洪贝尔特-德罗兹(J. Humbert-Droz):《战争和国际。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Der Krieg und die Internationale. Die Konferenzen von Zimmerwald und Kienthal*, Wien-Köln, 1964)。

时,考茨基写了几本小册子,这些书只能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而实质上是赞成艾伯特-谢德曼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叛卖行径。正当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这个联盟杀害了德国最革命的人物时,考茨基却认为有必要把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问题当作时代的中心问题,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性行动。他写道:“因此,对于我们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而且也是社会组织的民主化社会。这样,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①

但是,考茨基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对民主的概念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没有揭示它的阶级内容,而是仍然停留在一般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即从形式上和法律上对这个概念下定义,这当然使他得出了毫无革命气息的结论。在考茨基看来,民主意味着“多数的统治,但也是保护少数”^②。如果说民主的含义在这里还表述得不够清楚,那么考茨基在一年后出版的这本书的删改本中对此则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反对专政,认为专政在德国是用不着的,并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将要而且必须牢牢地坚持民主制,坚持我们已经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选举权”^③。

这是考茨基陷入中派歧途的结局,这条歧途,正如卢森堡正确地看到的,在战前就背弃了正道而倒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在这个时期则又具有自由主义的民主色彩。考茨基用法律形式上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定义。其实,任何民主,从政

^① K.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Wien 1918, str. 5. (参加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页。——译者注)

^② K.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Wien 1918, str. 15. (参加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页。——译者注)

^③ K. Kautsky,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Berlin 1919, str. 46. 在内容提要上竟称这本书为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权的实质来说,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可是考茨基却把它解释为普选权。很自然,他的最后结论必然是否定革命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议会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为,既然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而民主又意味着“多数的统治”,那么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占多数,就不能夺取并保持政权。而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占了多数,他们就可以通过选票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不仅将继续保持这种民主,而且要扩大民主,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无产阶级本身占着多数。所以,武装革命应当抛弃。^①

342

全部问题都被归结为政治和法律问题。民主的实质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专政则被视为一种“状态”,如果它成为一种“政体”,就意味着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取消选举权,取消集会和协商自由;因此,在这种政体下,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或一党专政。所以必须把它抛弃。^② 不仅如此,而且在这种专政下,反对派只能有一种选择——国内战争。因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应当把发生国内战争归咎于本身的专政!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暴力革命、严厉的专政、取缔反对派等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的和必不可免的道路和手段。这一革命可以开展得“更加民主”得多,甚至通过议会的方式。但是,正当本国和别国的革命事态蓬勃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在一国取得政权的惊天动地的日子里,宣布那样理解的民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并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就

① 此后,考茨基于1920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Der Weg zur Macht*)一书的第三版序言中,还做了一种估计。他说:“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坚持:英国和德国将是最先达到某种现代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无产阶级得到满足和解放。这两个国家今天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必要因素。”(*Der Weg zur Macht*, III. Izdanje, Berlin 1920, str. 13)考茨基连同他的议会选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历史本身、首先是他的祖国德国的历史本身是最好的证明。

② K.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str. 21. (参见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26页。——译者注)

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并成为叛徒。^①

343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又出版了一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书中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做了分析,但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往著作中的那些论点。考茨基污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只是在日益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变为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才得以保住政权^②;他发现在城市中形成了三个阶级:第一,从前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还持反对的立场);第二,雇佣工人;以及第三,官僚。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过错在于建立专政,而这在考茨基看来只是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具备,而且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内战争。“既然我们面临的抉择只是:民主或者国内战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凡是社会主义还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凡是多数居民还不接受社会主义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刻一般地说还没有到来。可是布尔什维主义却认为社会主义应当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结果就只能发生专政和国内战争。”^③

对于这一本书,列·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驳考茨基》(1920年)一书中给予了严正的回答,他尖锐地驳斥了考茨基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这一批判,考茨基在《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一书中又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认

① 对于考茨基的这本书,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中给予了十分尖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有根有据的答复。书中通过尖锐的批判指出,考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发生思想蜕化,例如:民主和专政的定义,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评价等等。正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考茨基坐在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顾问的安乐椅上(这个政府杀害了最优秀的革命者、以前党内的同志),指手画脚地就民主和普选权问题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倒是很轻松的!而这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其他例子中还将看到的,乃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共同立场。

② K. Kautsky,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Berlin 1919。“他们以要人自居,却牺牲了自己的原则,从而成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目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可是社会主义现在在那里已经遭到了失败。”(str. 133)

③ K. Kautsky,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Berlin 1919, str. 145。他在这里仍然坚持原先的民主观点,认为没有“根据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产生的人民议会”就不可能存在民主。(str. 150)

为“国家奴役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的终点”^①，布尔什维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它将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污点”^②。

略为详细地谈一谈考茨基对当时的这些重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考茨基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整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纲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强迫工人阶级“实行民主”，却把行使暴力和专政的特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即使处于少数，也可以等待时机通过选票重新取得胜利。

344

必须注意，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新“理论”，正是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即在布尔什维克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提出的。考茨基认为时机已到，不仅在理论上反对这些唯一能履行自己的国际和国内任务的共产党人，并且亲自出马到格鲁吉亚去支持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反对苏维埃政权。^③

革命力量的领导人不能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出发来处理一场真正的革命事件，我们知道，就连资产阶级对这些规范的适用性也是极不相同的。一次武装革命，不能从它对待议会民主程序的态度着眼来进行评价，尤其是当这场革命是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发生的时候。虽然在这种条件下也需要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着想，强调民主的问题，但同样也应当马上强调指出，这个问题

① K. Kautsky,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klaverei*, Berlin 1921, str. 122.

② K. Kautsky,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klaverei*, Berlin 1921, str. 127, 128.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鉴于考茨基的这些功绩，在他70岁生日时出版了一本祝寿文集《活的马克思主义》(*Der lebendige Marxismus*, Jena 1924)，并称这个阶段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阶段。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奥·鲍威尔、阿·克兰诺德(A. Kranold)、奥·耶恩森(O. Jenssen)、考茨基的儿子等。同样，鲁·希法亭的《社会》杂志也为考茨基的生日出版庆祝专号《马克思学说的保卫者和发展者》(*dem Wahrer und Mehrer der Marx'schen Lehre*)，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卡·沃伦德尔、路·布丁(L. Boudin)、维·切尔诺夫(V. M. Černov)、爱·伯恩施坦、特·唐恩(Th. Dan)、鲍·尼古拉也夫斯基(B. Nikolajevski)等。关于考茨基；还请参见埃里希·马蒂亚斯(Erich Matthias)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第二册：《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Kautsky und Kauskyanismus*, Tübingen 1957)。

不限于政治民主或思想自由领域的民主(一般地说这种民主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具有更加深远的特性。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劳动人民不仅直接决定自己的产品和劳动成果,而且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各种形式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行使职能,从而真正克服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真正的民主关系和自由关系的根本基础。考茨基当然没有理由挥舞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宪章来指责一次革命行动,何况是在当时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一革命行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会完全克服在一般民主问题概念上的缺陷。这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所遭受的暂时的历史性挫折以及退化,正是过分强调政治领域的作用——国家和国家机构的作用——的结果,是忽视“直接生产者自治”思想的结果,而对于这一点,考茨基本人也是理解得很差的。

考茨基在这个时期,除了写一些小册子以外,还企图在《唯物史观》^①一书中概括自己的社会观,并总结自己的全部理论活动。

对于这部书,可以概括地说,它无论在总的题材上或是在各个专题上,都是迄今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概念的最宏伟的尝试之一。从问题的理论方面来看,这部书的缺点是论述得不够深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阐述得不够深刻,这个缺点,也像在考茨基过去的某些理论著作中那样,必然会反映在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论述上。考茨基的理论生活的道路,是从达尔文主义开始的,而且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也像我们在谈到他的伦理学一书时所强调过的那样,在理解以后的某些其他观点时(如龚普洛维奇[L. Gumplowicz]关于国家起源的暴力论),也一贯把达尔文主

^① 该书第一版印于1927年,第二版印于1929年。两卷合计超过1700页,因而我们无法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书中涉及的一切问题。书的内容无疑包括甚广,除了某些传统的社会学问题如阶级问题、国家问题等以外,他还试图论述社会共同体的起源、人的本性问题(遗传,人是一种利己的、社会的、有性欲的生物,对自然界的适应,种族,技术,经济,历史的意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意志和科学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在这里,我只是试图对这部书做最概括的评价。

义进化论的有限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混为一谈。同时,不言而喻,他始终依据自己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所提出的那些论点来解释现代的国家 and 革命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部书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它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和一系列很好的见解。但是在理论方面,它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在许多地方具有折中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

346

尽管这部书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以及很好的见解,但是我们有必要至少用若干篇幅来谈一谈考茨基贯穿于全书的理论上的模糊观念。考茨基直到当时仍然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观念。“所以可以说,唯物史观并不依赖于某种唯物主义哲学。它同每一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都有联系,或者至少不与它们处于互不相容的矛盾之中。”^①设想能存在某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本身却不是唯物主义性质的世界观,这只是说明作者不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他在同一页上竟然得出结论说,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②。

在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考茨基也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他从来不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不了解每一种过程内在的辩证矛盾和对立的实质,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其实这只是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任何适应过程的出发点是有机体、‘我’。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肯定、‘正面’、‘正’、‘正题’。

与它相对立的是它所处的周围世界,即‘非我’、有机体的否定、它的‘反面’、‘反题’。最后的出路是克服矛盾,否定之否定,通过适应

①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 Bd., str. 28.

②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 Bd., str. 28.

而使有机体重新得到肯定,即‘合题’。”^①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设想恩格斯犯了错误,因为恩格斯认为运动和发展不是由两个因素(个体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一个因素的运动,即个体本身内部的运动;从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既寻找反题,又寻找正题”^②。因此,考茨基竟想纠正恩格斯在分析辩证法时所存在的黑格尔的残余,却没有发现在他自己那里存在着的,而在恩格斯的观点中已经克服了的机械论。

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考茨基也认为需要纠正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而应当接受龚普洛维奇的更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征服论。实质上,考茨基在这里也不理解使国家组织(不是部落组织等)得以产生,并使征服之类历史现象能造成建立国家的结局的这一过程的内在辩证法。这里也表明,考茨基不理解辩证法对于正确解释某些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的决定性意义。

考茨基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希法亭的后期分析上。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机会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他实际上是用这种理论来掩饰帝国主义的实际命运,抹杀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考茨基以前曾提出一种主张,认为对金融资本来说,更有利的是消除相互斗争和竞争,为了剥削全世界而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这样就能消除战争和破坏,并为掌握政权而进行民主的斗争。考茨基现在在这部著作中又得出结论说:“也许金融资本接受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用这种方法来扩大剥削地盘未免过于冒险。在这种增加利润的愿望的支配下,整个资本的处境过于危险,因此,更有利的办

^①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 Bd., str. 130.

^②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 Bd., str. 132 - 133.

法就是实行超帝国主义,即各国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结成卡特尔。”^①

在这部书中,考茨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全部观点,和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后所写的那些著作中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不仅对民主问题,而且对革命力量的整个斗争,他都仍然持抽象的观点。他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形势。他机械地认为,凡是存在发达的无产阶级的地方(英国、德国),多数必然将取得民主的优势,从而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这些成了考茨基十分着迷的设想,以致他根本不考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使这一发展过程转入完全不同的轨道。他似乎已经完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动向和阶级斗争的策略。所以他才会以如此自信的口吻和忽视政治的态度,就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发表预言说:“法西斯分子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具有很大的数量,譬如在拥有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他们占了将近五十万。在德国,要想达到这样的比例,他们必须纠集大约一百万人。在一个工业国中,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想凑够如此大量的信徒,即使在最好的年头也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力量对比对于法西斯主义特别有利。”^②

348

这段话就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之前四年说的!

同样,考茨基在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时,提出了一大套糊涂观念。他说,设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来缓和阶级对立,这必然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事业。这

^①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I Bd., str. 146. 列宁早在1915年就已经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但刊印于1924年)以及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揭露了中派的这种机会主义论点。他在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中指出,金融资本联合的种种趋势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即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资本主义早已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了(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页。——译者注)

^②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I Bd., str. 477.

349 样,他就势必要承认,自己毕生的工作全是白费的。“但是,毕竟不无令人宽慰之处。因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达到无产阶级完全解放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我们今天只看到一种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反之,如果在当前的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也可以同样办到这件事,那么这就意味着,可以比我们社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更容易地、更简单地,并付出更小的代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①

在这里无须再做任何评断了,因为这种观点同他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制度的崇拜是完全一致的。

这部书是年迈的考茨基的最后一番努力,他不仅总结了自己对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论点,特别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论点,并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首先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尽管这部书包含大量丰富的材料和资料,尽管书中有许多精彩的历史分析,尽管这部书是在1926年完成的,但它在思想上仍属于战前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范畴,因为它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其他几本书一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考茨基也和德国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缺乏对历史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和缺乏革命实践的某些根本前提。由于不具备特殊的革命传统,他们追求学院式的系统性,并对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抱有小市民式的恐惧和敬仰心理,这一切就足以使他们白白放过以往的一切革命形势。此外,他们还缺乏法国社会主义曾在历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篇章的那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经过黑格尔深入探索历史因素的本质,经过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而在马克思的革命人道主义中得到了最光辉和最深刻的反映。

^①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9, II Bd., str. 563.

七、罗莎·卢森堡

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盛衰,而罗莎·卢森堡(1870—1919)则不仅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最杰出的光辉形象,而且是这个时期的否定。她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充满革命热情,站在德国和波兰社会主义队伍的最前列。不仅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并取得议会胜利的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向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屈膝投降的日子里也是如此。那帮人由于屈膝投降而保全了生命和地位,而卢森堡却在第一批牺牲者中遇难。但是她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最伟大最光辉的革命家的行列中,他们的思想也和他们的事业一样是永垂不朽的。^①

卢森堡是波兰人,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参加了当时被分割的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久被迫出走,侨居于瑞士,在那里结识了一群著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P. Aksel'rod]、维·查苏利奇[V. Zasulič]),她主要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卢森堡同利·约吉希斯(L. Jogiches)、瓦尔斯基(Warski,即米哈尔科夫斯基[Michalkowski])一起,在90年代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杰出革命家,并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1897年,她迁居到德国。此后,直到她牺牲,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

^① 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活动,请参见下列传记: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öhlich):《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事业》(*Rosa Luxemburg, Gedanke und Tat*, Paris 1939, III izd. Frankfurt am Main, 1967);罕·罗兰-霍尔斯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Zürich 1937, Rotterdam, 1935);J. P. 奈特尔(J. P. Nett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I-II, London 1966);安奈利斯·拉席察(Annelies Laschitzka)和君特·拉德聪(Günter Radezún):《罗莎·卢森堡。她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Rosa Luxemburg, Ihr Wir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Ost) 1971];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 Badia):《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Paris 1975)。

主党左翼里活动。她的文采、禀赋和决心,使她很快就崭露头角,居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不应忘记,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解释者。

但是,与此同时,修正主义也正好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的各种反修正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卢森堡的著作是最光辉和最有理论价值的。

卢森堡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898—1899年)为标题,一下子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她在该书第一页就指出,这样提问题是不辩证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①

卢森堡精辟地分析了与这一论题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指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以为通过它就能按某种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最常见的改良主义幻想。生产过程正在日益社会化,而国家监督正在日益扩大。私有财产日益变为赤裸裸地剥削他人劳动的形式,而国家监督则日益渗透阶级利益。国家和所有制关系日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合法改良和革命不仅是或多或少具有好处的行动,而且是根据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活动的因素。“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象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动,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

^① 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271. (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译者注)

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方向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树立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①

卢森堡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当伯恩斯坦因国家通过了许多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法令而满怀希望时,卢森堡指出,这种希望建立在对现实过程的不正确的观察之上。因为“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国家本质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社会发展的利益担任了各种普遍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的发展的利益,是同整个统治阶级一般利益相符合的,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才担任了这些职能”^②。

352

在社会主义到底是伦理理想还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上,卢森堡也保卫了马克思的唯一科学的观点。而且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地,这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因此,她驳斥了伯恩斯坦企图否认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的种种假设。同样,她正确地解释了恩格斯在1894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序言中所表述的原理,这篇序言,很多人认为是恩格斯在理论方面的遗嘱。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修正主义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恩格斯放弃了革命,建议以议会斗争作为取得政权的道路。

卢森堡坚决驳斥了这种解释,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

^① 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319. (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页。——译者注)

^② 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291. (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23页。——译者注)

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斯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①

修正主义者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不仅他们,而且许多当时并不主张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一直担心发生“过早的”革命。这帮人在发生革命搏斗之后总是抱怨说,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卢森堡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任何请求和发誓,都无助于防止过早的革命。理由是:“第一,象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

^① 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291. (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8页。——译者注)

决定的。”^①

在这个时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1903年以后对党的纲领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卢森堡批评了列宁在这个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指责了列宁坚持她所说的那种“极端集中”的主张。^② 这里无疑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它在后来的适用过程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列宁的观点是,坚决强调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良好的党,这个党同时将是具有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基本核心。可是列宁的这个主张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粗暴的集中主义。与此相反,“卢森堡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自发性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低估了组织因素的首要意义。

354

但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以后发展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巩固的、有纪律的组织,使中央委员会具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使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机关,——这确是事实。卢森堡则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列宁也很清楚),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在历史上要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都更有价值得多,更有效得多,——这同样也是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结合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来看,列宁是正确的。卢森堡所警告的那种领导官僚化的危险,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甚至变成了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列宁当时的原则

^① R. Luxemburg, *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u zborniku *Marksizam i revizionizam*, str. 325-326. (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0—61页。——译者注)

^② 罗·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Organizaciona pitanja u ruskoj socijaldemokraciji*, *Neue Zeit*, juli 1904)一文中批评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主张。对此,列宁在1904年9月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做了答复。(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6页。——译者注)

的过错,而是那些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新形势下照老样子贯彻这些原则的人的过错。

另一方面,卢森堡的主张所包含的危险,就是过高估计自发性和群众的创造作用,其实,群众若没有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很容易错过关键的时机。在这一时刻里若不存在一个精干的党,很容易使革命失败,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卢森堡在著文谈到群众性罢工和党的问题时,已经能克服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并接近列宁的正确观点。“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有文化和最有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它不能也不应像宿命论者那样束手坐待‘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时时刻刻应该努力促进和迎接事态的发展。”^①

在这一著作中,卢森堡对群众性罢工做了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她既不幻想可以简单地通过一纸命令掀起群众性罢工,又不机会主义式地抱怨流血牺牲,她把群众性罢工解释为富有成果的长期革命斗争时期的总结。她把群众性罢工同群众示威游行等区分开来,并得出结论说,群众性罢工只有在革命高涨时期才能发生,它主要是革命形势本身的表现,而不是革命形势的原因。她在结束自己的分析时说:“其实,不是群众性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性罢工。”^②

除了上述同列宁的意见分歧以外,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坚定观点相反,她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且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民族独立

^① R. Luxemburg, *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erlin 1951, Bd. I, str. 224 - 225. 同样,她在著名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也写过相似的话:“如果说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就像人不能超越他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人民的运动,它的目的和历史使命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加入人的自觉意识、计划思想,从而也就是加入自由意志。”(*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d. I, str. 269)

^② R. Luxemburg, *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erlin 1951, Bd. I, str. 204.

和民族自决。^①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卢森堡回到波兰,领导波兰起义。后来被捕入狱。获释后,到了德国。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党校。卢森堡同弗·梅林、鲁·希法亭(她接替了他)、亨·敦克尔(H. Duncker)、阿·施塔特哈根(A. Stadhagen)、艾·武尔姆(E. Wurm)、古·埃克施坦(G. Eckstein)、H.海奈曼(H. Heinemann)一起担任教员,她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她搜集资料,写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1913年)。

在这本书中,卢森堡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最根本的问题:能否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到底资本主义能否无限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能够,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是一种具有无限前途的制度。卢森堡并没有满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所做的分析,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总资本积累的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并没有给予答复。她在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S. N. Bulgakov]、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进行论战时,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理由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投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那里可以容纳它的产品。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

356

^① 在《民族问题和自治》(*Nacionalno pitanje i autonomija*, 1908 - 1909)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些论点。对此,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做了答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相应的地方还将谈到。

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①。

按照卢森堡的论点,一部分用来投资的剩余价值,不能在内部市场实现,而只能在外部市场即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中实现。因此,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不仅囊括全球,而且“排挤一切其他经济形式、不容任何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倾向的经济形式。“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②

357

卢森堡的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只有存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国家也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国际无产阶级到那时还没有举行起义来摧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将直接开始崩溃。

卢森堡的论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此,她在《反批评》中做了答复,并再一次对自己的理论做了明确的概述。她在序言中写道:“从19世纪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资本也随同这些方法从欧洲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在那里,在新的地区,在旧的家庭生产形式的废墟上,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了一群新的购买者,从而也找到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性。

这样,资本主义由于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和国家相互作用而日益扩展,并且依靠它们而不断积累,同时又一步一步地排挤它们,以便取而代之。参加攫取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愈多,还可以让资本实现世界性扩张的非资本主义地区愈少,则资本争夺这些积累地区的竞争也就愈激烈,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也就愈陷入经济和政治灾难

^①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Beograd 1955, str. 279. (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鼓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9—290页。——译者注)

^②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Beograd 1955, str. 368—369. (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鼓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译者注)

的绝境：世界性危机、战争、革命。

资本通过这一过程，却为自己准备了灭亡，其方式有两种。第一，资本依靠侵占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不断扩展，它不顾一切地奔向末日，到那时，全人类实际上只由资本家和雇佣无产者组成，因而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扩展，从而也不能进行任何积累了。同时，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资本也加重了阶级对立，加重了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取得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之前，它必然会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①

卢森堡的论点所引起的争论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假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问题解决得不够明确。有一些人，如奥·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是由于它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由于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动摇的原理，它必然会导致革命，这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成了官方的理论。其实，这种论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荒诞无稽的。

358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时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利率下降的趋势和扩大再生产的日益发展，这些情况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激变，这种激变已经为迄今的历史所证实。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在自己内部导致古典资本主义的否定，因为它无法避免和解决这种激变，同时导致国家干涉的日益加强，而国家干涉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就连资本主义也实际上已处于一定的过渡时期。

卢森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

^①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ili što su epigoni učinili od Marxove teorije*, *Antikritika*; dodatak *Akum. Kapitala*, str. 386.

首先是考茨基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后,社会民主党投降,卢森堡是最先起来严厉谴责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人之一。^① 1915年,她就同梅林一起创办了新的《国际》杂志,这个杂志的撰稿人还有:克·蔡特金、奥·塔尔海默(A. Thalheimer)、凯·敦克尔(K. Duncker)、普·朗格(P. Lange)和亨·施特勒贝尔(H. Ströbel)。

在战争期间,她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监狱中,但在短暂的获释期间里,例如在1916年初,她同激进的左派代表——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恩·迈耶尔(E. Meyer)、尤·卡尔斯基(J. Karski)、利·约吉希斯等——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左派组织“斯巴达克联盟”。

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她的著名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这本书在当时,除了列宁的著作以外,是对战前形势和对第二国际破产的最尖锐和最卓越的分析。书中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国际内的作用,它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具有威望,当时毫无疑问,不是他们赞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相反,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意他们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严重堕落、破产和变节,揭露了它所鼓吹的关于德国人负有文明使命、社会民主党继续朝气蓬勃等等理论。

卢森堡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问题不是像社会民主党党团声明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生存和自由发展,也不是像社会民主党报刊所登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文化;而是关系到德国银行今天在土耳其属亚洲地区的利润,关系到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将来在摩洛哥的利润,关系到奥地利这个‘以哈布斯堡君主国为名的组织涣散的集团’,(如

^① 应该指出,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1907年)、哥本哈根(1910年)和巴塞尔(1912年)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决议的补充部分是根据卢森堡、列宁和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牢固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引自 M. Beeru, *Opća historija socijalizma in socijalnih borbi*, Zagreb, 1933, str. 491. [参见《三个国际的历史》,李潞等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9页。——译者注])

《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所说的)的生存和反动制度,关系到匈牙利的猪和李子,关系到第十四点和弗里德曼-普罗赫的文化,关系到维持‘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法西斯政权和‘巴尔干的反革命’。”^①

因此,卢森堡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下列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只在和平时进行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论调,从1914年8月4日起,直到媾和为止,阶级斗争就被宣布为不存在了,克虏伯的大炮在比利时一轰鸣,德国就变成了奇迹般的阶级团结和社会和睦的国家了。

卢森堡写道,然而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任意废弃而发明出来和自由创造的东西。阶级斗争的存在要比社会民主党早得多,而且在战争中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阶级斗争不再存在的变化。大炮的轰鸣并没有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任何变化。^②

360

卢森堡虽然提出了卓越的批评,阐明了历史形势,但她根据这场战争是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冲突这个正确的论断,过于匆忙地得出了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战争的结论。她写道:“由此可见,这始终是目前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它决定了各国战争的性质,由于这种环境,今天

^① R. Luxemburg,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Junius-broschüre)*; *Ausgewählte R. u. Schr.*, str. 325 – 326.

^② 参见 R. Luxemburg,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Junius-broschüre)*; *Ausgewählte R. u. Schr.*, str. 343 – 344。

根本不能再存在民族自卫战争了。”^①

列宁的十月革命,卢森堡也是在监狱中获悉的。虽然她对革命过程有过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她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批评是在1918年秋写的,当时她没有获得一切必要的文献,也没有必要的直接接触。^②

361 卢森堡的批评意见并没有否定这个如此光辉的历史行动,而是首先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清楚不过地驳斥了考茨基之流的下列学究式的分析和论断,诸如: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俄国工人运动的激进派把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犯了错误等。卢森堡再一次指出,考茨基的论断是同俄国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唐恩等人要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主张完全一致的。卢森堡写道,战争期间考茨基在理论上论证的和谢德曼在实践中所做的完全一样,即用自己的每一个主张来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圣殿的正式守护者从战争开始就宣扬第二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宣扬民族主义,宣扬各民族结盟,最后宣扬民主而不宣扬社会主义。

^① R. Luxemburg,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str. 367。列宁同年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热情地欢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首先,书中没有足够明确地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没有彻底贯彻用国内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理,同时得出了一个过于一般的,因而是错误的结论: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和解放的战争。列宁考虑到这本小册子写得十分精彩,因而特别着重指出,这些疏忽一定是偶然的,是对当时战争的本来正确的估计过分强调的结果。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对事物始终应该做具体的考察,而且做辩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Lenjin, *O brošuri Juniusa; Sočinenija*, sv. 22, str. 295. [参见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译者注])

^② 卢森堡的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22年由保尔·勒维(Paul Levy)编辑整理,以《论俄国革命》(*Die russische Revolution*)的标题出版的。我在写本书第一版时,只看到我国的译本:载于《外交政策文献》1951年贝尔格莱德版。现在我引用奥西普·克·弗列希泰姆(O. Fleichtheim)编辑的最新版本: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II izdanje),并据此做了若干补充。

卢森堡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的历史功勋是，从一开始就以坚定而彻底的精神宣布并奉行唯一能够挽救民主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策略。全部政权只能掌握在工农群众手里，只能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这确实是革命处于困难境地的唯一出路，这是大刀阔斧地排除万难的一次打击，它使革命走出了死胡同，并为它畅通无阻地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唯一能在初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是能引导革命前进的革命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是奉行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唯一的党。”^①

布尔什维克宣布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它当作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措施。这是他们的历史功勋。^②

布尔什维克用所有这些措施解决了关于“人民多数”这个“有名的问题”，而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就面临的应当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痴呆症”的产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议会中的天真想法，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取得多数的想法，也搬到革命中。“在革命中也同样首先要取得‘多数’。可是现实的革命辩证法却把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议会格言颠倒了过来：不是取得多数而后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的策略取得多数。”^③

362

卢森堡的责难首先是在对待农民的策略方面。她认为，把土地分给农民，把有组织的大地产分散这一类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是不必要的，它们会在今后的发展中造成一系列的困难。在她看来，社会主义

^①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51 - 52.

^② 在提出批评性意见之前，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做了如下的评价：“一个政党在历史性的时刻所能表现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革命的远见和彻底性，在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的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革命气节和行动能力，在布尔什维克的身上都反映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55）

^③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54.

应当把所有权交到民族的手里,或者(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下交到国家的手里。“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不这样做就没有社会主义。”^①

但是她马上就补充说,不能在如此困难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里短的时间里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尤其是前面列举的那个问题,因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她认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即使在最良好的环境下啃这个坚硬的核桃,也会弄得齿折血流。

接着,卢森堡又一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认为它是可以被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一个错误。^② 同样,她也不赞成布尔什维克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认为把它解散以及取消社交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只对政权的拥护者实行自由,只对一个党的党员实行自由(尽管党员的人数可能很多),这不算什么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指具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对‘正确性’表示宗教狂热,而是为了使政治自由中一切有教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因素都建立在这种实质之上,并在‘自由’变成特权的时候指出自由的作用。”^③

卢森堡继续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唯一代表者以代替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表机关。但是,压制政治生活也必

①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56.

② 这段话的全文如下:“但是——这样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种民族主义论调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性正在于此,因为在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中,在极端尖锐的对立时期,它只会变成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布尔什维克通过本身受到的极大损失和革命受到的损失应该得出教训: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有民族自决可言;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民族内部的每一个阶级都‘追求’,按不同方式来‘自决’;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民族自由的原则已经完全让位给阶级统治的原则了。芬兰的资产阶级,以及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话,则宁可受德国的暴力统治,也不要这种民族自由。”(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61 - 62)

③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73.

然会使苏维埃的生命逐渐遭到窒息。“没有普选制,没有出版和集会的无限自由,没有不同思想的自由交锋,任何这种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死亡,存在的只是生命的假象,而且官僚成了唯一活跃的因素。公众的生活逐渐消沉了,几打具有无限精力和无穷理想的党的领袖进行着管理和统治,其中实行领导的其实只是一打非凡的人物,而劳动人民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则不时被召到议会中,为领导人的讲话鼓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议;由此可见,这基本上是一场闹剧,它当然是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①

卢森堡的批评始终是很尖锐的。她认为批评是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和保证。但是,有关俄国发展情况的许多资料她在囚室中无法得到,因而她对情况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她责备列宁和托洛茨基非辩证地提出专政还是民主的问题,责备布尔什维克对待政治自由和立宪会议的态度,但是这些责备是不恰当的。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时,她就确信列宁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② 她同样也认为,如果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和处于战争、德国占领和其他种种困难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会基本上做到她所设想应做的一切;上述种种困难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政策的最

364

^①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3, str. 75.

^② 例如,1918年11月她在《开始》一文中写道:“它(指革命政府。——弗兰尼茨基注)召开了立宪人民会议,从而创立了一个与工农代表机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机关,把革命纳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用魔法取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开始》[*Der Anfang*], 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参见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erlin 1955, II Bd., str. 596.)她在1918年7月20日《红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国民议会》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今天谁倾向于国民议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谁就或者是隐蔽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Die Nationalversammlung; Ausg. R. u. Schr.*, str. 606.)她在下列文章中也都表述了这种观点,1918年12月17日《红旗报》上的《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Nationalversammlung oder Räteregierung?*)和1918年12月23日《红旗报》上的《国民议会的选举》(*Die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

良好的意图和最美好的原则发生变形。

她在文章中继续说,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必然造成的,其根源也在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和失利,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占领。^① 尽管有种种保留和批评意见,卢森堡毕竟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非凡的英勇的革命事件,并本着这种精神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德国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高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只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讽刺。如果说这种统治过去和现在是这样一种讽刺,那么这只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所持态度的结果,因为这种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讽刺。我们全都服从于历史的规律,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不应当希望他们创造奇迹。因为在一个被世界大战弄得疲惫不堪、遭到帝国主义扼杀并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的孤立国家里,进行典范的无可非难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奇迹。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区分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和偶然性的东西。在这个最近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决战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实干能力和争取整个社会主义威力的意志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及其战友最早以

^① 卢森堡在《斯巴达克联盟通信》第11期上谈到同一问题时,再一次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遇到的困难和所犯的错误首先要归罪于国际无产阶级,尤其要归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卑鄙行径。她得出结论说:“今天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状况,是对德国工人和士兵群众荣誉感的最后一点火苗的激动人心的呼吁。他们冷酷地让俄国革命被分割成碎块、被包围和挨饿。至少要在最后时刻让它避免最骇人听闻的后果:道义上的自杀和同德帝国主义结盟。解决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帝国主义的背后起义,德国举行群众性的政变作为在国际上以革命方式结束各民族之间的大屠杀的信号。挽回俄国革命的光荣,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等于是挽回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光荣。”(《斯巴达克联盟》第11期(1918年9月),见《斯巴达克联盟通信》[*Spartacusbrieife*, Berlin 1958, str. 460])

实际榜样走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直到今天仍然只有他们可以像胡登那样地说‘我敢于这样做!’

这一点就是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坚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着不朽的历史功勋,因为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实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问题等方面,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从而大大加快了劳资清算的日子的到来。在俄国,问题可能只是提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未来到处都是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①

卢森堡在狱中几乎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1918年11月9日的革命,使她和许多其他左派社会主义者获释。当时工人阶级和军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可是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不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相反,他们在准备反革命。对当时的形势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社会民主党内以艾伯特、谢德曼、列金、大卫为首,以考茨基的中派为顾问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主张事态的“民主”发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反革命。

366

形势变得复杂化了。军队逐渐集结起来,并日益处于政府的支配之下,而一部分工人阶级也武装起来了。卡·李卜克内西废寝忘食地在群众中工作,宣传斯巴达克派的主张。除了卢森堡以外,他无疑是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最最杰出的领袖。^② 斯巴达克派终于能在1918

^①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r. 79 - 80.

^②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法学家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他属于极左派,是德国左派的最革命和最彻底的领袖之一。1916年由于反对战争而被捕。他是斯巴达克联盟的创始人,是卢森堡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这样,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就消灭了德国的两位最有才干的革命领袖。卡·李卜克内西的主要著作有:《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年),《反战的阶级斗争》(1919年出版),《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研究》(1922年出版)。

年11月18日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红旗报》，并在年底建立了共产党。^①

367

但是，反革命势力在组织起来。1919年1月初，政府把反革命力量的指挥权交给古·诺斯克。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是在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刚被免除柏林警察局长职务(1月4日)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的领导机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就号召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1月5日，在工人和士兵顺利地进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之后，柏林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代表决定武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由33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坚决地采取行动，起义者也没有能把德国大多数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而“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却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卢森堡虽然不同意这次行动，但不想背离起义者，而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到1月12日，起义在柏林被扑灭了，宣布了戒严。反革命恐怖十分猖獗，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领袖的搜捕。1月15日，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和威·皮克(W. Pieck)被发现而遭到逮捕。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立即被害，接着库·艾斯纳、利·约吉希斯和许多其他同志也相继牺牲。当代革命运动中最有

^① 从卢森堡起草的斯巴达克联盟的要求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她坚决而彻底地提出了关于苏维埃和直接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个宣言的第二点中，卢森堡联系到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要求“解散各级议会和地方委员会，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及其委员会和机关来接收它们的职权”，以下还有：第三点，“在德国全境，由城市和乡村工厂中的全体男女成年工人选举工人苏维埃，由军队的成员(不包括军官和投降派)选举士兵苏维埃，工人和士兵有权随时罢免自己的代表。第四点，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推选代表出席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中央苏维埃，中央苏维埃选举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的立法和行政权力机关。第五点，目前中央苏维埃的会议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每次选举新的代表)，以便经常监督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并在全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群众和其最高管理机关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地方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有权随时罢免和撤换自己在中央苏维埃中的代表，如果他们不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的话。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更换人民代表以及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官吏”。在经济措施方面，除了剥夺工业和农业中的资产阶级以外，卢森堡在第七点中特别强调，要“在一切工厂中选举工厂委员会，由它同工人苏维埃协商后来经管工厂的内部事务，调节劳动关系，监督生产和最后取得工厂的管理权”。(转引自O.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 M. 1948, str. 242-244)

才干和最热情奔放的人物之一卢森堡就这样献出了生命。

列宁在晚年曾对卢森堡做了极好的评价,他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①

八、亨利希·库诺夫

368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及在与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论家走着大致相同道路的德国理论家中,亨利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 1862 - 1936)是很出名的,至少在世界经济史方面他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在德国修正主义出现的时期,库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他是梅林、考茨基和当时其他反修正主义者的战友。在这个时候,他的科研兴趣就已经贯注于经济史、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1912年出版了他的《原始时代的技术》一书。但是,这个时期,库诺夫就已经在这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日益变成右翼,后来在大战期间,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

^① V. I. Lenin, *Zametki publicista; Sočinenija*, 1951, sv. 33, str. 184. (参见列宁:《政治家札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3—644页。——译者注)

他在《党的毁灭》(1915年)一书中宣传了一个著名的机会主义论点,认为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阶段。按照他的主张,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并没有到来,而帝国主义又是必要的阶段,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便变得毫无意义了。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和经济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企图根除资本主义就好像从前工业发展的初期企图消灭机器一样。不仅如此,而且连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也是必要的,从而通过这种战争来建立大国也是必要的。所以民族自决是一种常见的天真想法。

他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第1卷1920年,第2卷1921年)中有着更详尽的发挥。对于库诺夫,也像对于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能说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正好在某些有关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上,他表面上似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完全抛弃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几乎可以说,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遭到了破产。库诺夫也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希法亭、伦纳(K. Renner)、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栽了跟斗。库诺夫同考茨基一样,一口咬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过无产阶级可以在构成多数以前取得政权;而一旦构成了多数,就没有必要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方法,而应当采用民主的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時候,才能取得政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在取得政权后不采用民主的政体。”^①

库诺夫在批评列宁时所依据的一种论断是:硬说列宁“不理解马

^①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erlin 1920, I Bd., str. 329.

克思关于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思想”^①。所以布尔什维克设想可以通过组织、军队和暴力来超越一定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他们就把经济发展的理论变成了心理发展的理论,并陷入了巴枯宁主义。因此,库诺夫认为必须保卫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以防止列宁的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可是他却闭口不谈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即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已经达到了足以实行革命变革的水平。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这一变革将首先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如英国、德国和法国),这在当时是最合乎逻辑的设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庸夫俗子那样以愤懑的心情来对待其他国家实际发生的事变进程,也没有把历史首创权始终只给发达的本国民族。

库诺夫反对革命,着重强调了国家的职能。这也是大战期间聚集在帕尔乌斯(格尔方德)主办的《钟声》杂志^②周围的一群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观点,这个杂志基本上具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例如,伦纳(后来曾任奥地利总理)就曾解释说,国家代替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成了社会主义的杠杆。因此,根本用不着任何关于摧毁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的理论,而是需要巩固和整顿国家,以便通过它来实行社会主义。库诺夫认为,否定国家的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关于国家起着发展要素作用的思想正在日益深入人心,这也就证实了拉萨尔关于国家的联合、组织和进步职能的论断。

370

库诺夫根据自己的“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原理,硬说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似乎他们两人从来不曾承认过民族自决权。这样,

^①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erlin 1920, I Bd., str. 331.

^② 格尔方德博士(帕尔乌斯)曾参加1905年的俄国革命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也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蜕化为机会主义者和变节分子,并在大战期间靠金融投机而发财。聚集在他所办的《钟声》杂志周围的,除了库诺夫以外,还有哈恩尼施(K. Haenisch)、连施、海尔曼(E. Heilmann)、伦纳、普伦格(J. Plenge)。

他当然也就不去正确解释经典作家有关爱尔兰、波兰等问题的各种观点了。库诺夫写道：“文化落后的小民族的国家独立，相反地，一般不仅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也违反以兼并和同化‘残存的民族’、‘孱弱的民族’和‘衰落的民族’（恩格斯使用这些名词，指的是文化落后的各小民族）而告终的社会发展一般方向。即使这些民族一般有可能取得国家独立，但这样产生的小国绝大多数的生命力不强，无法朝着建立大型的国家 and 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发展。”^①

既然这些小国仍然继续依附于大国，而且归根到底失掉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大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种优越性，那么，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学和美学上的虚构。

看来，几乎再也不能提出更妙的论据来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做辩护了。况且这种论据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哩！

库诺夫在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中也对某些问题做了在一般的意义上有益的分析，批判了某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巴尔特和托·马萨里克，但同时他也反对恩格斯和摩尔根的家庭发展观等。战后，库诺夫成了柏林大学国家学的教授（1919年）和民族学博物馆的馆长，从而他的观点也得到了传扬。

371 库诺夫的最伟大的贡献，无疑是四卷本的巨著《经济通史》，书中广泛地考察了从原始农民经济和原始村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② 这部书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如此重要和如此悠久的历史时期，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书中的反映也要少得多，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几场论战，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方面，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彻底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竭力想证明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虽然他曾举例说明每一个部落共同占有土地！），同时他超越了奴

^①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erlin 1922, II sv., str. 37-38.

^② H. Cunow,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v. I-IV (1926-1931).

隶占有制社会经济时期(在他的发展体系中不包括奴隶占有制时期),——这就是我们至少需要提到的他在这些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地方。

九、安东尼·潘涅库克

安·潘涅库克(1873—1960)是荷兰人,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因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讨论而成为国际著名人物。20世纪初,他同罕·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一起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在1909年由于反对过分强调议会主义,而同戈尔特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同戈尔特创立了新的左翼政党,这个党在1918年以后发展成由威·拉维斯泰因(W. Ravesteijn)、戴·怀恩科普(D. Wijnkoop)和J.塞东(J. Ceton)领导的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他作为政论家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活动,并曾担任柏林党校的教师。当时发表的关于伦理学和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国家、关于工人斗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著作,是他在工人协会中的讲稿或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如《工人斗争》一文),主要是通俗性的小册子。^①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潘涅库克当时赞同前面提到过的狄慈根主义者集团的主张,并出版了狄慈根的某些著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斗争问题及其理论概括具有非常开阔的思想和实际感受。

372

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当时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路线。他把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看作是考茨基对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要求,但它们“同时也开辟了社会

^① 这些著作有:《伦理学和社会主义》(*Ethik und Sozialismus*, Leipzig 1906)和《未来国家中的革命》(*Umwälzungen im Zukunftsstaat*, Leipzig 1906)、《工人斗争》(*Der Kampf der Arbeiter*, Leipzig 1907)、《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Marxismus und Darwinismus*, Leipzig 1090)。

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和平发展的道路”^①。

但是他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而认为必须把它摧毁,这使得他在当时就已经同考茨基和其他中派分子(更不用说同修正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后他同考茨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上面提到的《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他已经指出,现代国家绝不是人民团体的代表,而是有产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非常愿意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改造社会,但这是幻想。有产阶级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政权,因此暴力革命是必要的。^②

在关于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的文章中,他更详尽和更深刻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巧妙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之一。潘涅库克在开头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辩证地概括了改良(即进化)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这只是统一的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发誓只偏重一个方面,而应当注重整个过程;这种观点是使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要点。^③

373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别,它们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的观点糅合在一起”^④。潘涅库克继续说,可以更正确地把它们称作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因为大资产阶级对现状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小资产阶级则始终是一个对现状表示反抗的不满的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是变得日益野化的

① A. Pannekoek, *Umwälzungen im Zukunftsstaat*, Leipzig 1906, str. 31.

② A. Pannekoek, *Der Kampf der Arbeiter*, Leipzig 1907, str. 38 - 31. 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同样也可以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它具有多种含义。它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国家或团体是唯一的企业主,因而可以按照需要调节生产。另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地方是建立在剥削之上。(*Der Kampf der Arbeiter*, Leipzig 1907, str. 26)

③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59.

④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60.

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是变得日益驯化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①。

关于议会斗争,潘涅库克更加尖锐地强调指出,它对于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打算通过议会制掌握政权,那是空想。“议会制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正常形式”^②,资产阶级始终会竭尽全力用各种选举法或甚至限制选举权来使无产阶级无法取得胜利。“可见,这就表明,统治阶级拥有足够的手段,把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制民主原则变成民主的幌子。通过选票可以掌握政权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荒诞无稽,以致工人只有在资产阶级允许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执政。”^③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组织。但是直接管理国家的人不仅利用国家为统治阶级谋利益,而且也为自己谋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政权在一定限度内成了自主的政权,那时看来好像是独立的。官僚成了具有自己利益的独立阶级,甚至企图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贯彻自己的利益。”^④但是官僚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可见官僚也是一个剥削阶级,因此他们的利益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的。

潘涅库克在上述这本书中对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有关工会的争论中,以及在谈到当时德国工会执行的彻底改良

374

^①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61. 在后面的论述中他对修正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修正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的利益以及受过教育的工人贵族的利益,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126 - 127)

^②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68 - 69.

^③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73.

^④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86.

主义的政策时,潘涅库克首先断定,这些工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尽量限制剥削而斗争。它们的这一任务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①。

但是这只是工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工会不再成为保守的机构,并放弃中立性,同政党发生最紧密的联系,在工人阶级总的斗争范围内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们终于成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重要因素。“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上述目的和任务之外提出其他新的目的和任务,而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特殊任务和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能够更好地完成。并不是自觉提出的目的或纲领,而是现实本身,使它们变成了革命的机关。这又一次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同日常的实际斗争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并且是怎样从这一斗争中产生出来的。”^②

当时潘涅库克已经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同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以及自己的同胞赫·戈尔特、罕·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进入革命的阶段,因此,群众性罢工的问题应当用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它的特点是,过去积累下来的强大的力量和高涨的热情将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场最后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虽然在议会制时期是各自独立的、相互对立的,现在都联合成统一的整体了。群众性罢工,在议会制时期是日常的策略手段,是‘革命的演习’,是不现实的轻率行动,而现在成了强大的现实了。”^③

^①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90.

^②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92.

^③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104.

如果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政治活动,那么群众性罢工是强迫统治阶级接受工人阶级意志的唯一的适当的手段。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目标的对立在这里已经消除了。工人阶级这时应当统一地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说,与自己的工会统一行动。工人应当“运用工会武器和罢工,作为反对国家政权的群众性行动,以达到政治目的。在群众性罢工中,无产阶级斗争的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政治考虑和工会纪律就像是一个统一的战士的善于思考的头脑和健壮有力的双手”^①。

潘涅库克对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连同知识分子的分析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他指出了他们的地位和心理,以及对待这些阶层的社会主义策略。^② 在该书最后,他简短地分析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是在思想上反映一个阶级的生活关系和生活目标的各种观念、观点和目的的体系,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思想也将被资本所统治和奴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因此“社会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而反对任何压迫、奴役和专制主义。由此就产生了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同情”^③。

完全可以理解,潘涅库克由于具有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不仅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同中派,首先是同日益倒向

^①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105.

^②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105 - 121.

^③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str. 123. 在后来出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Klassenkampf und Nation*, Reichenberg 1912)一书中,他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他是针对鲍威尔论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文章而写这本书的。书中在解释和解决民族问题上坚持了彻底国际主义的和阶级的立场。民族因素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有传统的意义,它的实际根源在于过去(str. 35)。民族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并将随着它而消失(str. 36)。我们的策略就是要向工人指明他们的真正的阶级利益,从而使他们始终关注当代世界的现实。“这时,旧思想本身将会消失,它们在不产阶级的生活现实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营养物质。”(str. 43)

修正主义政策的考茨基发生冲突。大战爆发以前,他同考茨基在群众性罢工、议会制和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① 大战期间,潘涅库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上支持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彻底贯彻执行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宣布国内战争。他和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在大战期间出版了《先驱》杂志,刊登了欧洲左派社会党人的许多文章和评论。

战后,潘涅库克作为德国共产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党参加选举和工会运动的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意见。^② 他当时的观点详尽地表述在一篇论述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的文章中,该文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杂志上。潘涅库克继续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经济崩溃是对革命的最重大的影响,而当时欧洲一切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处于这种经济崩溃之中。这就要求明确地划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界限,不容许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方法变成第三国际的策略,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已经开始露出苗头。^③ 尽管议会活动和工会运动是第二国际时期必要的和合乎规律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革命阶段的时刻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议会制的必然趋势是阻碍群众自己进行革命所必需的积

① 潘涅库克在这方面的观点,表述在1912年《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群众性行动和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一文中,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群众性罢工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等观点。对此,考茨基在同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做了答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前面介绍过的关于国家和议会制的论点。

② 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这篇光辉著作中,做了专门的论述。

③ 卡尔·拉狄克在柏林的监狱中写了一篇文章《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任务》(*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Aufgab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其中批评了左翼反对派对议会制的观点。潘涅库克称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极性”^①。议会制加强领袖对群众的权势,因而起反革命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毁了领袖。群众的觉醒和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是分阶段前进的。“在这条独立和自我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就是废弃议会制。”^②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国内战争,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策略基础。只有群众性行动才能摧毁帝国主义。但是,正如“议会制代表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精神实力,同样,工会运动决定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物质实力”^③。如果说工会运动在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自然的组织,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革命的时代,工会就会与无产阶级对立。^④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应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让“群众自己经管自己的事——管理社会和生产,因此这时任何不让群众自己进行统治和管理的组织形式都是反革命的和有害的;所以它应当由另一种能够让工人自己积极活动和决定一切的革命形式所代替”^⑤。

潘涅库克认为,这种形式就是俄国革命创造的苏维埃制度。潘涅库克由于自己的这些激进的左翼观点,而同戈尔特一起,成了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理论领袖。1919年10月,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左翼反对派的这种倾向而把北部、西北部、下萨克森、柏林和德

① A. Pannekoek,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Parlamentarismusdebatte*, Berlin 1968, str. 35. 首次发表这篇文章的《共产主义》杂志编辑部在附注中指出,这篇有价值的评论同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有一定的抵触。虽然杂志是共产国际的刊物,但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围绕共产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中听取不同的意见。参加这一场关于议会制讨论的还有:格·卢卡奇、L. 鲁达斯(L. Rudas)、P. 弗里德兰德(P. Friedländer)、赫·戈尔特、奥·吕勒等许多人。

② A. Pannekoek,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Parlamentarismusdebatte*, Berlin 1968, str. 37.

③ A. Pannekoek,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Parlamentarismusdebatte*, Berlin 1968, str. 38.

④ A. Pannekoek,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Parlamentarismusdebatte*, Berlin 1968, str. 38-41.

⑤ A. Pannekoek, *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s Kommunismus; Parlamentarismusdebatte*, Berlin 1968, str. 40.

累斯顿的整个党组织开除出党。被开除的左翼在1920年4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潘涅库克是新党在理论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原先提出的观点成了新左翼活动的基础:反议会制,反工会活动,按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组织无产阶级,从各个工厂组织、经过它们的代表、到州的组织和全国组织。虽然新党当时被第三国际接纳为“有发言权的同情者成员”,但是党的领导却日益脱离列宁对欧洲革命今后进程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共产主义左翼的一章中还将谈到。

但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部也很快发生了分裂,而潘涅库克当时已有50岁了,也日益回过头去从事自己在天文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1925年他成了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而在1932年就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正式教授。他虽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但并没有与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割断联系,直到他漫长的一生的晚期,仍然坚信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特别是关于工人委员会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必然会以十分严峻的批判态度来评价当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退化,他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第一批重要的批判者之一。对这种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和他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时,潘涅库克责备列宁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想过的东西(如否定客观现实、唯我论)强加在他们头上,以便易于开展他的批判。总的说来,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时,潘涅库克清楚地看到,当时列宁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许多哲学问题的,因

此列宁是“借助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观点”^①来驳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念。

潘涅库克在对斯大林主义这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进行有根据的尖锐批判和驳斥时,有时对列宁也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客观的,而且是矛盾的态度。例如,他在书的一开头肯定,从1917年俄国革命来看,“列宁和他的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和最成功的代表者”^②,可是他在同一段中却要列宁对后来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负责,他甚至指责《国家与革命》,可是大家知道,列宁在这本书中最激进和最彻底地坚持了工人委员会和国家消亡的原则。在另一个地方,潘涅库克也同他前面的说法陷入了矛盾,因为他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神话”^③。

379

潘涅库克和另外几个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家的一项伟大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撇开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对苏联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发生和出现的事件做出回答。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潘涅库克由于彻底坚持委员会(Räte)的思想,因而能比当时大部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和更深刻地看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根本的思想,倒是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潘涅库克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到官僚的统治,官僚是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甚至称作共产主义);生产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引下由国家官僚组成。这种国家官僚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直接支配产品,从而也支

①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6. 在第一批祝贺潘涅库克这本书的人中有卡·科尔施(K. Korsch),他为P. 马提克(P. Mattick)在芝加哥出版的杂志《活的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篇书评,名叫《论列宁的哲学》(该刊1938年11月号)。

②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9.

③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3. 同样,他在另一个地方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4)

配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则像打短工那样受到剥削。”^①

380 潘涅库克认为,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由于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制定的,因而对欧洲是不正确的。他和其他的左翼同志一起抛弃了关于在新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中应当由特殊的党和领袖来领导驯服的群众的论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向欧洲共产党人提出过革命方案,而且正好在批评当时的“共产主义左派”(潘涅库克就属于这个“左派”)的文章中明确地强调在探索各国的道路时必须尽量采取辩证的态度,可是潘涅库克却把斯大林以及后来第三国际领导在这些问题上的实际所作所为强加在列宁的头上。在已经知道了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和的情况下,硬说列宁主张欧洲发达的国家也采用同样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因为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只是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所了解的社会革命只是推翻大地主和沙皇的专制政体”^②,——这种说法至少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潘涅库克的批评却正好打中了斯大林和他的才智平庸的官僚,他们假借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玩弄具有深远历史后果的骗局。潘涅库克根据他过去的观点,认为进行欧洲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掌握生产,掌握自己的生活来源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这是真正废除资本主义。如果工人阶级无知地和满怀信心地跟随一个作为深谋远虑的领导者的党的指引,那么单靠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工人阶级本身、整个阶级、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观察中知道应该做什么,从而懂得和看到斗争的条件、关系和手段,那么他们就能达到目的。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

^①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8 - 119。在此以前不久,赫尔穆特·瓦格纳(Helmut Wagner)在《布尔什维主义论》(*Thesen über den Bolschewismus*, 1932)中同样也得出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和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论断,这本书是他为左翼激进集团“红色战士”写的。曾在苏联旅居多年的法国工人M. 伊冯(M. Yvon)在《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演变》(*Ce qu' est devenue la Révolution Russe*, Paris 1937)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②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4。

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①。

最后在谈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潘涅库克认为它是“对党的历史的非常精彩的评述”^②,它为俄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形式。在革命以后,那里把“列宁主义”推崇为国家的官方哲学,而在潘涅库克看来,列宁主义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结合。“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那些满怀激情把自然科学和技术看作他们所管理的生产的基础的新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众——连同还信仰宗教的原先的农民,他们唯一的反抗力量——是一种真正地道的学说。新的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辽阔的王国的新统治阶级,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广阔的前景。”^③

381

直到晚年,潘涅库克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书,把苏联的发展看作是革命向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蜕变。他认为这一过程早在1918—1919年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工厂中厂长的管理取代了工人的管理。可是后来,当国家资本主义牢牢地扎根,技术上、政治上的领导人发展成强大的官僚,变成新阶级和整个生产机构的主人的时候,对立就更加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工人,就像一百年以前的欧洲那样,在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重轭下呻吟。“此外,他们没有任何求得发展的权利,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可能,没有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自己的报刊,从而没有任何通过反对新主人的斗争以冲破现状的可能。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比西欧的老资本主义更加沉重的奴役。”^④

①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9 - 120.

②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6.

③ A.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Frankfurt a. Main 1969, str. 116.

④ A. Pannekoek, *Die Arbeiterräten*, Amsterdam 1964. 转引自弗里茨·科尔(Frits Kool)编辑并且作序的《左派反对党的权威》(*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Olten und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0. str. 568)。

潘涅库克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超出了第二国际的水平。特别是在稍后时期,他没有接受第三国际的原则,而是以自己的反对任何议会制、反对工会、反对把党变成当代环境下的领导力量的激进的左翼观点,在革命斗争的策略方面,与自己的同志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他们必然脱离政治斗争的主流而处于孤立状态。但是,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实质的观点,也使他超出了第三国际后期的水平,而成为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参与当代斗争和代表当代愿望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第三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派。该党内曾经出现一些当时颇为重要的理论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和他们的德国同志们类似的观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经历过几个相当困难的阶段。早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警察和国家官僚的专横镇压,它的领袖们被逮捕判罪,而它的组织则被解散。

另一方面,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其邻国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一样,受拉萨尔思想影响的一派(领袖为亨利希·奥伯温德[Heinrich Oberwinder],1846—1914)和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而主张毫不妥协地反对统治阶级的一派(领袖为安德列阿斯·肖伊[Andereas Scheu],1844—1927)发生了冲突。这两派冲突的结果是两个头头都流亡国外,而党的领导权,特别是激进派的领导权则落到了约瑟夫·波伊凯特(Josef Peukert, 1855—1910)的手里,这个人的思想一直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的强烈影响之下。80年代初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发生了好几起谋杀事件,为此执政当局多次宣布戒严,审判了相当多的党员,并取缔了党组织。

在80年代的后半期,工人运动开始得到整顿,但这时温和派和激

进派之间的争执还继续存在。试图使这两派相互和解的几次努力都落空了,但是后来终于由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 1852 - 1918)成功地解决了争执,而且于1888年的最后一天在海因费尔德使两派联合起来并通过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坚持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也没有放弃争取改善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改良的利益。在这一反对政府、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争取普选权等等的斗争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384

至于文化方面的气氛和影响,那里的情形在许多方面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相似。所不同的只在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民族问题在那里也以比在德国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所以奥地利的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也就特别重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领导成员中出现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其中特别有名的有: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其他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弗·阿德勒和古·埃克施坦。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是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相同的。弗·阿德勒是接受马赫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从马赫主义的立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他的《马赫战胜机械唯物主义》这部著作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就是说,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正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传播得特别广泛,而且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曾与之进行过理论论战的那个修正主义派别。

以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在麦·阿德勒身上表规得最为明显。但所有这些人在对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上,基本上又都是一致奉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特别是该党“中派”的路线。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聚集在《马克思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期刊)的周围。这个刊物是1904年由麦·阿德勒和鲁·希法亭在维也纳创办的,它曾经刊登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两篇

主要的理论著作：鲍威尔的论民族问题一书和希法亭的论金融资本的著作。

一、麦克斯·阿德勒

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在阿德勒(1873—1937)的著作中具有最完整的哲学形式。阿德勒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首先是1904年在《马克思研究》上发表的《为科学而斗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随后是1909年和1921年分别发表的论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以及他在维也纳任大学哲学教授时出版的《唯物史观读本》(第1卷1980年，第2卷1932年)，一贯主张以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做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其所以坚持这种立场，是为了创立一种特殊的、经过精心加工的“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种“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决定性的倒退和修正。

385

阿德勒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序列问题。在这里也像在一切情况下一样，只有从认识批判论的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问题”^①。而这种认识批判论的观点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原理之上：心理的东西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因此，那种在阿德勒看来属于心理关系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从物质条件中产生出来。“心理的东西从来不可能从物理解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

^①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 1913, str. 1.

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①

因此,阿德勒从物质和观念分离的唯心主义前提出发,进一步力图表明:社会过程由于是某种人为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精神的而绝不是物质的过程和关系。这是他直到20年后总结自己的唯物史观时仍继续坚持的一个观点。

“既然经济关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就是精神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②阿德勒企图用这种论点来摆脱由唯物主义所造成的全部困难——即难以解释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既然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精神的东西,即社会关系就是精神性质的关系,那么观念对社会关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的东西对另一种心理的东西的关系。甚至连生产力(这毕竟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也显然转化成了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转化成了精神的东西,因为事实上这种自然力只有当它们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成为生产力。^③由于阿德勒已经把涉及人的一切东西都归结为精神的东西,从而他就使事物发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实质变化,即物质的自然力量和自然事物一卷入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就把它们变成纯粹精神的东西。在阿德勒看来,它们都成了劳动力,因此“正像经济关系就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④。

阿德勒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马克思主义只有

①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 1913, str. 3.

②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Berlin 1930, str. 157.

③ 阿德勒写道:“只有这样,这种自然力才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只有这样,自然力才成为社会的力量,而且只有这样,自然力才同时成为人的力量,因为自然力既受到人们的意志和目的的自觉的控制,从而也就成为他们的即人的生产力。”(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Berlin 1930, str. 162)自然力只有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力只有在人的关系中才是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然力并不因为这一切而丧失其物质的特性以及作为物质客体而具有的一切特点。

④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Berlin 1930, str. 163.

抛弃了唯物主义,才成为科学的、认识批判论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在阿德勒看来,唯物主义是荒谬的。从物质运动中产生活的东西和产生意识,是不可思议的。这话可以说,但不可理解。为了使这一切说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断言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说法取得一致,阿德勒企图证明:“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反对唯灵论才提出来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现实主义的实证论者。“其实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它是实证的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往往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点。”^①

非常明显,这完全是用康德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阿德勒试图说明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一切言论中都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至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提出了他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把费尔巴哈从本质上一分为二,说他同时既有唯心主义的一面,又有非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一面,而阿德勒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自然也是做了完全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理解。阿德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由于它只承认客体,即只承认物质的联系,因而没有给人的活动留有余地,这样,唯物主义也就可能把一切精神的东西仅仅看作是某种从外部可以觉察到的东西,仅仅看作是物质的产物,而不能从其内在的主观活动方面来理解这种精神的东西。”^②

^①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Berlin 1930, str. 100. 但是这种毫不含糊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当谈到“现实的”或“实际的”(wirklich)东西的时候,都把它理解为物质的东西,或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明确地把它同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可是阿德勒却反过来企图证明: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只能理解为“实际的”、现存的、实证的、既成的东西——这种观点同唯物主义的特征是不相干的。

^②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Berlin 1930, str. 92.

在这里,问题当然根本不在于“内在的主观活动”,因为这是在马克思以前很早就存在的一个十分常见的唯心主义论题,在这个论题上,马克思与他的哲学前辈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论题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必然是主观的、内在的活动,但是这个论题是片面的。人的本质问题绝不仅限于此,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不仅限于此。

整个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被颠倒了过来。既然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那么人之所以是社会性的,就不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而是因为人能够生活在社会上,因为人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中已经直接是社会性的了”^①;因此,阿德勒认为,把历史过程划分为物质的因素和观念的因素,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所以最后不仅应该摒弃唯灵论,而且应该摒弃唯物主义,但应该坚持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这种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Erkenntniskritische Bewusstseinslehre)“根本不可能提出被恩格斯认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那种问题:精神是第一性的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相反的,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却是从那种毫无疑问的是第一性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而它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经验。由于除了经验意识过程之外,经验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对于真正的批判思维来说,只有经验意识才是它的发源地。因此,只有在我们意识的内部才能区分出‘精神’和‘物质’。我们的经验当然最初不是从精神产生的,但同样也不是由自然界产生的,而只有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并且只有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各种形式才能体验到这种区别”^②。

无须特别强调指出,阿德勒本着新康德主义的精神,不仅得出了意识第一性的结论,而且实际上把现实的全部内容都混杂在意识的规

①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

② M. Adler, *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Bd., str. 120.

定性之中。^①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一切形而上学,阿德勒特别坚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问题就是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因此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规律、关于经济范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是一种新的正确的社会学说的开端,是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开端。”^②但是这种科学本身与任何世界观都毫无固定联系。相反的,正如考茨基所主张的一样,阿德勒也认为唯物史观既可以同唯物主义世界观相通,也可以同唯灵论世界观相通,还可以同泛神论或无神论的体系相通。而且不仅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以任何哲学作为基础。“应该把话说得恰恰相反:不仅必须摒弃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世界观等同起来的做法,而且也必须摒弃因某种哲学必然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依据从而就把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哲学联系起来的一切做法。”^③

虽然阿德勒这样从实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唯物史观,用他的话说,也就是归结为可以以任何哲学做基础的科学,并且对唯物史观做了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解释和论证,但是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的根据方面,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如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等,是有所不同的。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以及追随他们的伯恩施坦及其同道者,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伦理学公设,因而把康德也追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而阿德勒摒弃了这种解释。阿德勒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运动,因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然,不是物理性自然现象,而是社

389

① 在上述著作第141页上写道,“思维作为人的思维,即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来说,没有大脑是不可能的,但是意识作为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基本规律性来说,没有大脑不仅可能存在,而且用其他方式也不可能进行理解,因为连大脑本身都是意识的内容,意识的思想规定性”。

②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3.

③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64. 阿德勒到了晚年在他写的《社会之谜》(*Das Rätsel der Gesellschaft*, Wien 1936)一书中,又一次把他根据认识批判论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做的论证做了系统的发挥。

会性自然现象。因此,应当把这种现象本身看作事实,而不应当看作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看来只是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做因果上的论证,所以任何伦理学的论证都意味着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说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论经验观点和实践经验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①。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伦理学不是科学,那就不能用伦理学来补充或论证马克思主义。

可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德勒流派,在使马克思主义康德化方面,几乎走得最远。它贯彻了认识批判论的一切逻辑推理,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归结为认识批判论的唯心主义,把它的社会学方面归结为用唯心主义解释的马克思的范畴。

另一方面,麦·阿德勒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团结而斗争的原则,因此他站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立场上。所以阿德勒也是早在1914年底就起来反对战争的最初的一些人士,同时也是罕见的一些人士之一。当时他尖锐地谴责了社会党人同那些将世界推向新的灾难的反动政府的勾结,谴责了当时德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那种充满民族主义的热情奔放,已经使他们以前在自己著作中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原则暗淡无光。

阿德勒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年)及《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两书中所表明的政治理论观点,和我们在后面将要作更多的分析的鲍威尔的观点有很多共同点,因为鲍威尔在政治观点方面是战后奥地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上面提到的阿德勒那本

390

^①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r. 143. 最近时期出版了一部关于阿德勒的理论观点的专著,即彼得·海因特尔(Peter Heintel):《体系和意识形态》(*System und Ideologie*, Wien-München 1967)。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我国书籍中可参见拉多斯拉夫·拉特科维奇(Radoslav Ratkovi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čka teorija austromark-sizma*, Beograd 1965)。在其余的著作中,特别应参见贝奈狄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奥地利社会主义中的思想流派》(*Geistige Strömungen im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ismus*, Wien o. J.);库尔特·谢尔(Kurt L. Shell):《奥地利社会主义的演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ian Socialism*, New York 1962);诺尔伯特·莱泽尔(Norbert Leser):《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Wien 1968)。

论述国家的书,同凯尔松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论著展开了广泛的论战和讨论,在那本书中阿德勒坚持要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区分开。他认为社会民主就是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完全民主,因此他说:“我们把那些一般也称之为民主的其余一切形式都叫作政治民主。”^①由于政治民主永远是一定的阶级统治形式,所以政治民主根本不可能离开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情,无非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虽然采取的是政治民主的形式”^②。阿德勒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专政和民主并不是对立物,不应该有这种错觉,因为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任何政权都是专政的一定形式。

可见阿德勒比考茨基清楚得多地看到了“多数原则并不是民主制的原则,而是共同利害的思想”^③,而且看到了政治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错误已昭然若揭,因为它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的”^④。同时阿德勒还着重指出,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是拾了资产阶级批评的余唾,尤其是在德国,正当觉醒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专政谋取越来越大的利益时,社会民主党却成了民主制的热情捍卫者。虽然阿德勒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有产阶级对非有产阶级专政的性质”^⑤,但是他得出的认识却只是:专政和政治民主并不矛盾,和社会民主却是矛盾的。这些区别毕竟没有妨碍阿德勒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地对俄国革命持否定态度。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阿德勒在1926年林茨党代表大会上才能够和他的大多数朋友相反地拥护这样一条纲领:即任何政治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因此党必须使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保卫共和国,而且有能

391

①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str. 126.

②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str. 191.

③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17.

④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59.

⑤ M. Adler,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str. 92.

力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也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是专政,因为多数人的决定具有强制的性质。阿德勒认为,在任何一个“非团结一致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和阶级社会相同的)中,议会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决议也同样是使用强制力的。^①但是阿德勒也和他的许多社会民主党朋友一样,没有理解历史因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重大意义,他在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时竟表现出:他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定历史事件不是具体地、历史地进行评价,而是按照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进行评价。

阿德勒同意鲍威尔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善生活状况,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谋求物质利益,而且也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正像鲍威尔所主张的一样,争取自由的思想成了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思想,而不问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在这方面,阿德勒尤其欢迎鲍威尔于1919年在奥地利建立合法的工厂委员会的创举,并且认为这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可是工人本人尚未充分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②在这里,他又一次过高地估计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推行个别社会主义措施的作用,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在于他们不理解,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措施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能冲淡革命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说,革命政党绝不会坐等革命形势来找自己。

^① 参见战后发表的阿德勒遗著《团结一致的社会》(*Die solidarische Gesellschaft*, Wien 1964),这一著作应当作为阿德勒《唯物史观读本》第2卷的第二部分。

^② 阿德勒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写了《民主制和议会制》(*Demokratie und Rätssystem*, Wien 1919)这一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以及在1919年7月召开的奥地利工人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德勒都主张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应该对政治事件具有强大影响,但不干预共产主义的一般策略。

二、鲁道夫·希法亭

在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中间,鲁·希法亭(1877—1943)所留下的著作,几乎具有最长的保存价值,他的著作也像考茨基在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初期的著作一样,同他后期的政治活动是互相矛盾的。

希法亭在医学院毕业以后,直到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而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和阿德勒一起创办了著名的《马克思研究》期刊;1906年他已经参加《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工作,1907—1915年他是《前进报》的政治编辑。在这个时期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后来和考茨基一起渐渐转入中派;在战争期间他和考茨基一起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工作。

除了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论文以外,他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的《金融资本》这本重要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的丰富。

希法亭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和列宁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点,他的观点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金融资本是流通过程发展的结果,也就是信用体系发展的结果。因此,这部著作一开始就谈货币理论,分析信用,阐述和研究股份公司的创立——即银行的作用——到最后才分析金融资本。

虽然希法亭对货币的分析,像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不够充分、不够恰当的,可是他在后面的几章中却做出了非常恰当的、有创见的和有成效的分析与结论。无须特别强调,他的整个著作一方面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事实和趋势为依据。

希法亭通过对建立股份公司的问题,也就是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对它们做过研究)的分析,得出结论说:“随着股份公司制度的推广,经济的发展就摆脱了在财产变

动方面的个人的偶然性；财产的变动只涉及股票的命运，而不涉及股份公司的命运。因此，企业的集中可能快于财产的集中。这两种变动各有其特殊的规律。但是都具有集中的趋势。只不过在财产变动中，这种趋势带有较多的偶然性和较少的强制性，并且实际上往往为一些偶然因素所遏止。这种表面现象使某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股票实现财产的民主化。把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和财产变动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就只应遵循不以个人财产规模为转移的技术经济规律。工业的集中并不是财产的集中，因此必须把这种集中与那种由于财产变动而和财产同时出现的积聚和集中加以区别。”^①

希法亭认为，由于财产转化为股份财产，财产所有者的权力就变小了，他只有权获得剩余价值，而无权对生产过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另一方面这又使大量股票的持有者对少量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于是有权支配生产的人越来越少。通过分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希法亭对于防止利润率的平均化和由此产生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银行事业走向集中，集中起来的银行系统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它促使资本主义的集中达到最高的阶段，即组成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这些卡特尔和托拉斯又对银行系统起什么作用呢？卡特尔或托拉斯是资本实力极其雄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决定这些企业究竟谁附属于谁的，首先是资本的大小。已经发展起来的卡特尔化，在其向前发展中势必使银行也进行合并和联合，以免受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由此可见，卡特尔化本身加速了银行的合并，而银行的合并反过来又加速了卡特尔化。”^②

394 希法亭在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新因素时得出结论说，卡特尔化意味着使参加卡特尔的企业收入更有保证，更加均衡。它排

^①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Beograd 1958, str. 152.

^②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3.

除了竞争,提高了这些企业股票的行市,增加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稳定性。“这就使银行得以扩大工业贷款,从而较之过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业利润的分配。这样,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卡特化而变得更加密切,同时,工业投资的支配权日益转入银行的手中。”^①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对银行的依赖也日益加强。工业中愈来愈多的资本不再属于工业家,而另一方面银行也需要把愈来愈多的资本投入工业,从而银行日益变为工业资本家。“所以,我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叫作金融资本。这种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经常保持着货币形式;他们把这种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也就是以能带来利息的资本的形式存入银行,并且随时能够以货币形式收回这种资本。但是这样存入银行的资本,绝大部分实际上都转化为工业资本,即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与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在工业所使用的资本中,比重愈来愈大的是金融资本,也就是归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②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发现,希法亭最后得出结论说,在这里出现了上述两种资本的融合,即出现了资本家的人事联合。随着财产集中的发展,“支配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愈来愈和支配工业的资本的所有者合而为一。而且,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支配虚拟资本的权力日益落到大银行的手里。

我们看到工业愈来愈依赖于银行资本,但是这绝不是说,工业巨头也依赖于银行业的巨头。相反地,正像资本本身在其最高的发展阶段上成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即金融资本家,也通过控制银行资本的方式,日益把支配全国整个资本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在这

395

①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5.

②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5 - 266.

里资本家的人事联合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希法亭结合着卡特尔化和垄断化而考察和分析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资本输出的现象。卡特尔化就是意味着形成许多特殊的超额利润和将大量的资本集中在银行里。同时卡特尔也意味着放慢投资速度,因为参加卡特尔的工业都限制了生产,而未参加卡特尔的工业由于害怕利润率下降也不那么愿意进一步增加投资。“因此,一方面供积累的资本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在减少。这个矛盾需要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在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本身并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大大地加剧了这种矛盾,而且使资本输出的问题更加迫切。”^②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政策本身以及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政策企图: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领域;第二,利用保护关税抵制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把这种经济领域变成本国垄断组织的经营活动领地。“但是这种思想是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不希望有自由而希望加以控制;它不主张使个别资本家独立自主,而主张束缚住他的手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规模愈来愈大的竞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保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用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来为它保障国内市场,并使它便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强

^①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66. 在同书第 345 页希法亭也同样指出了这种联系:“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联合。原先分为各个部门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现在都处在上面的大金融资本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工业家和银行家们通过密切的人事联合来与这些大金融资本家保持联系。这种联合本身所依靠的基础,就是通过庞大的垄断性联合会来消除个别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当然,资本家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②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274 - 275. 希法亭所说的只是下列情况下的资本输出:在外国使用的资本仍归资本输出国支配,因而这种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也仍归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支配。(*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61)

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自己的贸易政策中用不着考虑其他国家的敌对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保证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受到重视,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威力迫使较小的国家签订优惠的订货合同和贸易协定。它需要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到处进行干涉,以便使整个世界都成为本国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的国家。归根结底,金融资本需要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其实力足以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和吞并新殖民地的国家。”^①

希法亭对于上述整个社会经济变动所产生的后果做了非常明确而又生动的描述。与以前的自由主义相反,今天资产阶级力求扩张、掠夺和鼓吹强权。要求推行扩张政策的愿望改变了整个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不再是爱好和平和主张人道主义的了。从前为自由贸易而斗争过的人,曾深信自由贸易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时代的开端。而金融资本早就抛弃了这个信条。它根本不顾及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一致,它知道竞争越来越变成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和平的理想日益淡薄,人道主义的思想为国家强大的理想所代替……今天的理想是保证本民族对世界的统治:这种愿望就像资本追逐利润的愿望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前一种愿望是由后一种愿望产生的。资本成了世界的征服者,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它就达到了一个应该逾越的新境界。这种愿望成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落后都会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还会使较小的经济领域不得不向较大的经济领域进贡。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愿望,后来又以明显地歪曲民族观念的办法来从意识形态上找根据,这种被歪曲的民族观念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都享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已不再反映在民族范围内所有各种人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相反地,垄断组织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却表现为本民族应享有的特权地位。于是这个民族就成了高踞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特等民族。

397

^①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86 - 387.

由于征服别种民族是靠力量,也就是靠极其富有天赋色彩的东西实现的,于是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统治民族是靠自己独具的天赋特点,即自己的种族特点而享有这种统治权力的。这样一来,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对金融资本追求权力的企图的论证就披上了自然科学的外衣。金融资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乎自然科学的,是必要的。在这里一律平等的民主理想为寡头统治的理想所代替了。”^①

希法亭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金融资本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意味着对生产建立社会监督,但是这种社会化却存在于对抗的形式之中,因为管理社会生产的权力仍保留在金融寡头的手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这种专政势必和其他国家资本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势必日益严重地触犯那些饱受金融资本剥削并被迫诉诸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希法亭最后断言,一定会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将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②。

希法亭虽然有某些错误观点,在分析金融资本方面这些错误观点尚未特别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他的这一著作是一项重要的理论成就,这一成就已被列宁在他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多方面地加以利用。

我们看到,虽然希法亭把金融寡头的权力看作金融寡头的专政,看作必须经过冲突才能得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局的国内阶级对抗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自己著作的某些地方却提出了近乎这样的设想:通过金融资本的发展来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他还设想在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缓和危机。这些观点在《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中还不是主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却愈来愈坚决地提出关于实行

^①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387 - 388.

^② R. Hilferding, *Financijski kapital*, str. 427.

计划经济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主张。阶级斗争的结局就在于通过议会多数取得集中的国家权力。

战后,希法亭在关于“苏维埃”问题的历史性辩论中,主张既要苏维埃也要议会,主张它们进行合作,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家观念,即把国家看成是根据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意志结合而成的。由于他有这样一些观点,以及关于在形式民主和实际民主之间没有差别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无危机地”发展等提法,希法亭便和其余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从根本上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是没有准备的,始终是手无寸铁地面对着国社党的野蛮的进攻势力。同时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直到政治总崩溃以前,斯大林关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一直都占统治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纳粹主义下所经历的各种悲惨事件,主要是由政治上的一种极大的盲目无知造成的。^①

希法亭只是在侨居国外期间才在自己的《布拉格宣言》(1934年)中认识到了上述错误,并提出了用革命办法推翻法西斯主义的要求。但是这再也不能得到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信任,而且后来在战后制定社会民主党纲领时也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希法亭晚年时由于对法西斯主义暴行以及斯大林主义制度有了深刻印象,所以在他论述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的文章中和在他死后才得到发表的一份手稿中曾试图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② 他不同意英国一位社会主义者 R·L·沃雷尔(R. 399

^① 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32年8月27日—9月12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还把社会民主党人叫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向德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德国”的任务。而这只是真正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四个月的事情!(参见“*Das EKKI über Fasch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1932],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Hannover 1966, str. 258 - 265)

^② 鲁·希法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State Capital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1940年刊于俄侨杂志《社会主义者信使》);《历史问题》(*Das historische Problem*, 1954年刊于《政治杂志》)。

L. Worrall) 的看法,因为沃雷尔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法亭认为,在国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并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市场和价格机制就完全被摒弃了,从而也就把经济规律的能动作用摒弃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极权主义的。在这种制度中,暴力、政治领域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高踞于经济之上。希法亭用极权主义国家这一个概念,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概括进去了,从而就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在分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希法亭为研究阶级觉悟和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一错综复杂而过去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意见,在这里他试图把阶级概念几乎完全溶化在社会集团的观念之中,这就又一次使他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方面走得过远了。^① 同时这也是这位奥地利和德国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最后一次试图弄清楚过去他并非经常都予以极大注意的历史曲折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法亭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这一派曾针锋相对地反对该党的左派,反对季诺维也夫在哈雷代表大会(1920年10月)上的干涉(即要该党加入共产党和第三国际)。^②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之后,希法亭和该党的少数人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但是当时他做的估计,大大地落后于他在自己的论述金融资本的那一主要的和最好的著作中所提供的分析。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来说,特别是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伦纳和鲍威尔)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他们都明确地指出了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如希法亭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趋势,但是在消灭生

^① 可参见 Wilfried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in der Lehre von Rudolf Hiferding*, Berlin 1962.

^② 参见希法亭的演说:《革命政策还是权力幻想?》(*Revolutionäre Politik oder Machtillusionen?*, 1920)。

产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缓和危机、消除垄断组织的竞争等问题上,以及在今后阶级斗争进程的问题上,他们也都同样地做出了过于草率的结论。因此他们都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这样到了决定性关头他们必然要遭受惨重的失败。希法亭最后流亡在法国,法国投降后他在那里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就死在那里。

400

三、卡尔·伦纳

除了鲍威尔和希法亭以外,伦纳(1870—195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对该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他由于奉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而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并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为这些观点和行为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还在20世纪初,伦纳就以他关于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这本书直到今天几乎仍然是唯一的一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法律问题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伦纳特别研究了法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与库诺夫和连施一起,为帕尔乌斯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这清楚地表明他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是站在右派的一边。他早在1917年就在《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

^① 伦纳认为法和经济在历史进程中是矛盾的,并得出结论说:第一,“社会可以在不同时改变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得到改造”;第二,“法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三,“经济中的变化不会直接地和自发地使法发生变化”;第四,“社会的基质就其本身来说没有破裂和飞跃,只有进化,而没有革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看出,法律上层建筑是受另一种规律支配的;我们还可看出,在规范的领域内革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此革命就可对基质发生反作用”。《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Socijalna funkcija pravnih instituta*, Beograd, 1960, str. 135, 136)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见叶·布·帕舒坎尼斯(J. B. Pašukanis)的名著《一般法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Opća teorija prava i marksizma*, 1942)。亚库斯·汉纳克(Jacques Hanak,)写了一本关于伦纳的详细传记:《卡尔·伦纳及其时代》(*Karl Renner und seine Zeit*, Wien 1965)。

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信条,他后来在其他许多著作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都曾经在这本书中提到过。

401 伦纳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派别,它彻底地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试图创立一种关于把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其他某些组织形式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理论。其中某些思想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合作制的业已陈旧的思想,而另一些思想也同样是陈旧的,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出现和披上新的外衣而已(如把国家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杠杆的问题,拉萨尔就曾经提出过)。

在伦纳看来,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存在。问题不仅在于使一系列的经济部门国有化,而且还在于“使国家组织渗入私人经济的骨髓”^①,从而自觉地对它加以限定和指导。这种通过一系列法律的和经济的措施实现的国家领导,必然每天都要和资本家的私人意图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就必须对资本家进行强制和强迫,进行越来越大的排挤,最后取而代之。“国家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②,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就等于使国家政权摆脱资本的统治。像通常一样,伦纳在这里也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虽然他从来不愿意谈到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这方面,列宁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的真正继承者,而伦纳和他的其他同道者则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伦纳的进一步的论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虽然正确地认为无产阶级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可能掌握政权的,可是他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迅速地破坏和改变制度,利用群众的政治冲击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幻想。伦纳在这方面主张采取“经济社会主义”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渐进途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伦纳由于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国家大力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即他称之为“全面国有化”(Durchstaatli-

①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

②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28.

chung)的现象,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战争期间作为直接的和非常的措施而采取的日益加强的经济国有化,使得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关系成了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①

但是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而是企图日益从某种超阶级的意义上,把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萌芽说成是一种统一的机体,似乎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机体本身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伦纳和当时的另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看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问题。伦纳写道:“今天的国家从经济上来看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在地面上所占的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一个单独的经济领域,而它在自己界限内所管辖的那部分人,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民族。”^②从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伦纳则认为“国家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这一领域为达到统一而形成的一种合法组织”^③。

毫无疑问,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者对时代的主要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伦纳不是根据实际存在的情况明确地教育无产阶级仍然必须把现代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机构,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把国家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由于国民经济日益国有化,我们必须随之越来越具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一致的。”^④为了证明这一点,伦纳引用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情感,这就是指工人阶级不仅感到自己是人民,而且感到自己也是国家。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把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和作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samtheit)的国家加以区别。

①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34 - 35.

②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7 - 128.

③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128.

④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 str. 379.

但是,伦纳的观点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根据自己的内在规律自行走向社会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希望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中得到所期待的一切,这是严重的错误。资本是不会完全自行消失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按照内在的规律性而转化为社会主义的!”^①

403 伦纳也像几乎所有其余比较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抽象地在理论上主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两种可能性:和平的和革命的。对第二条道路,伦纳虽然也着重指出了,但这正像我们在后面从奥·鲍威尔那里所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书面上的宣言,而且是把它当作防御性的和最后应急的措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总是要遭到失败的。伦纳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这种突破,在这一个国家里可能是不通过暴力革命就达到了,而在另一个国家,也许是在大多数国家,则只有通过旧制度的代表进行暴力冲突才能达到”^②,二者必居其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者必须经常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而首先是要经常准备实现第一种可能性”^③。

这在理论上无疑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彻底辩证的观点。但是根据上述分析和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其他某些观点,伦纳实际上是在竭力设法使工人阶级的活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走向改良主义。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即指积聚、集中、国家的影响等等)。因此在伦纳看来,打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理解的。而是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要把现有的卡特尔和康采恩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目前还没有康采恩的地方,要由国家建立起这种组织。”^④伦纳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产阶级相信,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

^①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0.

^②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0-371.

^③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1.

^④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tr. 373.

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因此对国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一个极为有害的错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捏造出这种国家“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借以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及他们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合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对国家的虚无主义观点,所以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

伦纳在他后来的著作《实现的途径》中走得更远了一些。把国家的概念扩大为“合作社国家”、“工会国家”、“经济国家”等等,这样一来,任何比较广泛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了这种特点和性质。在前面提到的著作中,伦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本身,并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走向社会化的道路,为此首先必须靠国家的行动;而现在他研究的是另外一些途径,即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社会主义主要体现者: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社会保险机构、消费联合会等等。“看来,一个民主的经济国家正在全面地成长: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旧世界的卵翼下发展起来。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直是方向模糊的,只注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周期性的运动,并期待着将来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经过突然转变而降临人间。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也耐着性子考虑了我们作为经济民主所指出的每一个别现象,但是它至今没有考虑过这些现象的总体。这种理论尤其是忽略了这一现象:还在这种社会运动内部,走向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发展就已一步步地伴随着资本。”^①

404

因此,在伦纳看来,既要避免那种由于过分地只指望经济过程的自发作用而产生的政治无为主义,也要避免那种只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的超能动主义,似乎通过一次打击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② 因此伦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践问题就是在政治

①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28 - 129.

②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29.

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①。

因此,实际上伦纳是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系列的方法,他说这些方法是新东西,其实这些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货色:这可以说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英国的合作社运动、费边派的改良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我们并不想以此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以及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而且这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国家日益处于独立地位的时期,这种斗争方式必然会显得更有成效和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事物的真相、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明显具有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而且散布一种幻想(在有可能发生例外的条件下),认为资产阶级将容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因而认为对国家应无限尊重——这在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武装。说到底,这就是鼓吹国家主义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过去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社会主义。^②

伦纳对国家的崇拜达到何等地步,这从他对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做的评价,以及他关于解决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的观点中都可以看得出来。^③ 因为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费拨款的时候,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正确的。甚至当俄国已爆发革命时,伦纳还在他 1917 年的著作中指出,看来如果追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其

^① K. Renner, *Wege der Verwirklichung*, Berlin 1929, str. 136.

^② 还必须着重指出,伦纳,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人和社会》(*Mensch und Gesellschaft*, 1952)和《现代社会的变化》(*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3)中,清楚地看到:利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法令,还消灭不了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排除资本家并不意味着排除轮流执政和轮流剥削的国家官吏集团。伦纳认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行的不是民主自治制度,而是使技术专家和官僚具有无上的权力。

^③ “在战争爆发时,除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没有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但是人们却不公正地以谩骂口吻把这叫作社会爱国主义。那些信口谩骂的人们应当首先证明:在实践上和道义上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某种行动,在这种时刻也有可能采取国际主义的行动!”(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r. 353)

结果只能是德国的毁灭。同时波兰和其他某些民族也仍然不会得到自由,而俄国的沙皇制度则会继续取得胜利。因此,“胜利的沙皇制度会战胜俄国的一切革命尝试,可见备遭非难的谢德曼派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像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主义一样,都参加了俄国的革命”^①。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巧妙之极的玩弄。没有必要再一一列举伦纳的其他许多类似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前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进一步为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立场进行辩护的观点等等。只要着重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伦纳后来出任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内阁总理,他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图的。然而他却遭受到和所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命运:先是遭到陶尔弗斯(E. Dollfuss)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反动政权的驱除,继而又遭到法西斯党徒的驱除。

四、奥托·鲍威尔

406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鲍威尔(1882—1938)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观点也就是这个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由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鲍威尔正是从这方面对民族问题做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这一著作就已经表现出某种动摇的理论观点;正因为有这一特点,这一著作就预先提出了在以后各种事件中所采取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鲍威尔论述民族问题的那本

^① K. Renner,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r. 368.

书,虽然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但是它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却完全没有这种性质。他认为“民族问题只有用民族性格的概念才能解释”^①,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心理主义色彩,这一色彩后来在许多方面都为进一步分析问题打上了烙印。

鲍威尔分析的出发点,不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等等的共同体,以及在这种共同体中,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利益等而必然会形成的某种相对固定的性格特点,而是从结果出发,因此他首先把民族说成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民族是性格的共同体,因为从一定时期的民族的大多数同胞身上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一致的特点,因为一切民族虽然作为人来说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各个民族毕竟都各自有其一系列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民族并不是绝对的性格共同体,而只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因为同一民族的各个同胞,虽然在整个民族共有的特点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毕竟另外还各自有其个人的特点(包括地方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他们彼此区别开来”^②。

407 进而,鲍威尔指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世代相传的自然特点的自然共同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点并不是决定人们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因为人们的民族性格是由人们的命运决定的。所以民族的历史有两方面的作用:发扬光大自然特点和文化成就。“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但这种命运的共同体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自然地继承由民族共同命运形成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传递由民族命运所特别决定的文化财富。”^③

在鲍威尔给他的基本概念,即他认为对民族具有本质的影响的

^①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2.

^②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6.

^③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24 - 25.

“民族性格”下的定义中所包含的心理主义,在他试图从狭义上给这一概念下定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狭义的民族性格概念,如果除去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体质特点和精神特点的总和,那所指的就“只是志趣意向的差别,即同样的动因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对策这样的事实”^①。另一方面,鲍威尔在阐述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民族理论时,在同主张民族具有六个基本要素的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进行论战时,又表示他也不否认说明民族特点的其他一些因素。“这样我们就不是一般地罗列民族的因素,而是首先提出了一个体系:作为动因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文化创作素材的共同来源,以及共同语言,而共同语言又是共同文化的媒介,它一方面是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在产生共同的文化。”^②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如何对下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到奇怪和偶然:鲍威尔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本民族国家等问题上,把心理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却把社会学因素忽略了。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上,鲍威尔认为,这些国家中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纲领性要求应该是“民族自治,民族自决”^③。但是,在这里也表现出鲍威尔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他对那些清楚地指明在现代历史上趋向于建立各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忽略。因此,鲍威尔不是按照列宁理解的意义把自治和自决理解为国家分离和完全独立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把这理解为联邦制。他说:“可以设想的实

408

^①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111.

^②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131. 考茨基早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1907—1908)中,就已经驳斥了鲍威尔的民族定义中的这种心理主义;他直截了当地指责鲍威尔低估了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潘涅库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是民族机会主义,强调要用阶级观点来提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1913年)中,列宁在他针对罗·卢森堡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而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1914年)中,也都同样地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

^③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319.

现民族自治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把民族组织为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各个民族居住的地域,应是彼此分隔的。各民族在它们的疆界以内建立国家,独立地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调节居住在本地域内的所有人的关系,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奥地利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一个联盟的国家,由它来管理各民族的共同事务,保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①

我们还将看到,在以后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关头,鲍威尔的观点总是暴露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鲍威尔和奥地利的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总是在寻找各种困难和障碍;据他们看来,由于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必须正视和实现某些必要的中间阶段。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不是采取极端彻底的立场,即不是采取宣布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而是主张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当时民族原则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多民族的国家。虽然鲍威尔已经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现代政策已不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建立那种居领导地位的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些观点,只不过希望在联邦的范围内做某种不切实际的改善。鲍威尔以为,若是奥地利帝国完全崩溃,就意味着周围列强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失败。由于存在着这种忧虑,鲍威尔认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工人的直接目的,“不是实现民族国家,而只是在现存的国家范围内实现民族自治”^②。鲍威尔在他这本书的第532页上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拟定了在民族民主联盟国家(Nationalitätenbundesstaat)的基础上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各项纲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①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324.

^②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Marx-Studien*, II Band, Wien 1907, str. 506.

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已成为工人阶级一切理论和实践所环绕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鲍威尔又采取了在理论上处于布尔什维克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以致最后在实践上竟走向考茨基的机会主义。

对民主的崇拜,竟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受到如此的迷惑,以致他们基本上已不能正确地分辨内核和外壳。他们根本不能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根本不能像列宁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要比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更为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中的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是多数人的政权。

正当这些暴风雨般的事件迅猛发展的时候,鲍威尔写出了一本关于苏维埃专政和民主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对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提法。鲍威尔在文章的开头写道:“今天有一个大问题吸引住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今天正在进行争论的关于民主还是苏维埃专政的问题。”^①我们在下面将看到,鲍威尔给民主下的定义虽然不正确,但是他却比诸如考茨基、伦纳或伯恩斯坦等人更辩证地分析了革命途径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应该考虑到经济条件和其他情况的差别,因为它们将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手段,一般说来和就其本身说来,到底是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也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是否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必须以民主或专政作为前提。我们应该切实地提出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时代来说,真正的武器到底是民主还是专政。”^②

(410)虽然问题的提法比考茨基正确得多,但结论仍然是一样的。鲍威尔也是根据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情况严重等等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奥地利向俄国靠拢,那么这就

① O. Bauer, *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Wien 1919, str. 2.

② O. Bauer, *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Wien 1919, str. 4.

意味着同协约国发生一场新的战争,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精疲力竭的民族灭亡。因此,他总是考虑种种情况,总是存在重重顾虑,以致没有能使一个典型的革命形势(因为这里所谈的正是革命形势,而不是某种和平状态),使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总崩溃产生合乎逻辑的革命结果。鲍威尔虽然原则上并不否认苏维埃专政,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就苏维埃的形势来说,民主是取得政权和最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

我们认为,问题正在于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左右摇摆和机会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当时的形势都是极其有利于革命的。凡是想起“挽救”或“稳定”形势之类作用的做法,都是帮资产阶级的忙,而资产阶级正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起来的。资产阶级丝毫也没有陶醉于民主的幻想。它需要自由民主,也需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来当它的部长(鲍威尔就当过),但这都以使它得以恢复元气为限。一到紧要关头,资产阶级总是会极其粗暴地抛弃这种姘居关系。因此,我们对鲍威尔在陶尔弗斯攻击并粉碎社会民主党之后流亡国外时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兴衰发展过程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感到可怜和震惊,他说:“和平的和‘安适的’奥地利怎么一下子会这样了呢? 1918年旧的资产阶级王国崩溃了,当时除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备受破坏的经济、食品的极端匮乏和货币的飞速贬值(这一切的影响犹如洪水泛滥一样)之外,在这个王国的废墟上没有能够给新成立的共和国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当时在奥地利进行的巨大改革,要比它的邻国和平得多。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做到了不用暴力,而用和平的说服方法平息了、制止了那些从战壕的血泊和泥污中回到祖国的饥饿群众的愤怒情绪,并使他们在复兴国家的和平劳动中成为有用的人。在奥地利处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专政之间的时期,它是一个和平的孤岛,在它的东边和西边都在大量流血。而现在,趾高气扬的法西斯主义却制造谎言,把那些在自己的全盛时代能够如此成功地使饥饿群众采取克制的态度、采取和平的温和态度的人们,说成

是一群杀人凶犯,说他们除了给国家带来血腥灾难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①

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治家不应该抱有幻想,以为在革命形势下挽救资产阶级和平息革命情绪的行为,最后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慷慨奖赏。阶级利益毕竟是十分强烈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以致资产阶级奖赏给自己阶级敌人的只是一些无耻的嘲弄和极其下流的诽谤。

鲍威尔也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热烈的论战,他特意写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书,书中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鲍威尔理论观点的特点。鲍威尔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做了分析,并试图说明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在这里他也采取了某种中间立场。他并不否认在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也同样地不能丢掉考茨基主义的幻想:认为民主是根据平等的和自由的选举权产生的多数人的政权。对形式上多数的迷恋,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上根深蒂固,以致完全妨碍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各种事件的评价。鲍威尔也是这样,他对各种事件的评价没有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因为实际上无论在人口和选票方面暂时在形式上是否占多数,欧洲无产阶级当时已先后处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形势之下,相反,他认为俄国的发展路线必然使农民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农民是大多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等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的时候,这种专政一定会被民主所代替。“这一发展过程在最初可能是这样进行的:俄国农民逐渐学会行使苏维埃制度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从而使苏维埃制度中的各种机关为实现农民的目的服务,把那个由于农民缺乏政治积极性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苏维埃制度变成实现农民意志的工具。可是,农民的进一步兴起,最后定会使苏维埃制度丧失它的整个社会基础。因为苏维埃制度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少数人

412

^① O. Bauer, *Ustanak austrijskih radnika*, 南斯拉夫奥地利侨民救济总会 1934 年出版,第 6 页。

的专政,而这种专政只是由于农民群众处于封建的愚昧无知状态才成为可能和得到支持。只要农民本身即国内绝大多数人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一定会粉碎少数人专政的法律形式。农民政权可能暂时地采取依靠农民群众支持的恺撒主义专制形式。但是大多数人的政权,即群众的、民族的政权,其长远的法律形式应是民主。

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所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农民群众摆脱在沙皇暴政下被迫形成的无文化状态,从而为在俄国实行民主制度创造前提。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国的最后的、终结的国家形式,它将一直保持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恰恰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也只能延长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①

鲍威尔极其简单地解决了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认为其根源实质上就是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文化落后。^②

413 鲍威尔也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总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少数人的暴力统治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比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的民主;他也不懂得,贫农和小农,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必然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

因此鲍威尔会得出这样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很荒谬的看法:“工业自治制度(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的建立,不是来自专

^①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69.

^② 鲍威尔的原话如下:“只有用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能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由无产者群众本身的统治变成无产阶级少数先进人物的专制。专制的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政治民主,而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一种引起社会革命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文化落后的产物。”(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63 - 64)

政,而只能来自有计划地由政治领域向国民经济领域扩大民主。”^①好像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实现一般社会民主的任务,好像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总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毫不足怪,鲍威尔根据这些观点就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只是由社会力量因素来决定,而不是由于使用物质的暴力手段使其变得有利于某一个阶级。”^②鲍威尔仅仅是从形式上来理解民主,而不能理解民主的本质。他虽然也看到,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都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国家使用这种暴力,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法律规章得到尊重,防范少数不法分子的违犯。而这些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在他看来,不是由一个阶级的暴力决定的,而只是由各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因此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种看法,资产阶级只要在议会中占有多数,也就有权使用暴力来维护现行的法律,而无产阶级如果在革命后建立起譬如苏维埃专政,那它就不是实行民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民主的,而工人阶级的政权由于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从而就是不民主的!鲍威尔对这点也明确地做出结论说:“和其他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的基础也是由一个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用武力强迫社会接受这样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保证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力量,比它在民主制度下,即在各种社会力量因素自由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所能拥有的力量要强大……和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也是靠用暴力压制被统治阶级,即靠打内战的方法建立起来的。”^③

鲍威尔的结论也和考茨基的一样。这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内战,⁴¹⁴就要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就好像内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就好像资产阶级在有可能推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任何时候都

①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99.

②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09.

③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2.

不会发动内战。

鲍威尔观点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典型的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不同,他在理论上承认,在各主要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如果民主机关不能继续发挥作用,那么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阻止资产阶级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①

在鲍威尔看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这里的唯一缺点,唯一的但也是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他没有看到,这样较量力量,一般地说,无产阶级非打败仗不可,因为军队、警察、武器等等事先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手里。硬让无产阶级去维护议会民主,使其不受资产阶级阴谋破坏,这就是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低于历史要求、低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现代社会中所负的使命的任务。这种机会性(eventualnosti)的政策,直到今天始终只能遭到失败。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加表面圆滑和内容模糊,鲍威尔承认:即使以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也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议会就应该采取暴力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这也可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是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专政全然不同的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的专政,而是民主的专政。”^②

^①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4.

^② 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str. 113. 所有这些观点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遭到了列宁的痛斥,他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孟什维主义在德国的翻版:“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V. I. Lenjin, *Doklad o meždunarodnom položennii i osnovnyh zadačah kommunističeskogo internacionala*, 19. jula 1920, sv. 31, 1950, str. 204.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译者注])

鲍威尔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提法：通过民主的途径争取掌握政权，但要准备在资产阶级反抗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后来鲍威尔又把他的这些观点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条纲领提出来了。例如1926年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是这样公开讲的。鲍威尔在解释该党的纲领时说道：“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甚至在它已失去人民的大多数时，也不会轻易地撒手丢开政权。今天尚以民主方式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到那时候就会成为反民主的、君主专制的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持政权。我们不能上当。当我们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的时机成熟时，资产阶级就要设法破坏民主制度，建立法西斯专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防备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进行教育，为自卫做好准备。我们的新的党纲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不敢进攻民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民主的手段取得胜利。可是，如果资产阶级敢于破坏民主，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用暴力夺取政权。”^①

暴力的作用成为纯粹防御性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策略和斗争首先在于依靠议会制度和陶醉于选举的胜利。所以就毫不奇怪，每到决定性的时刻，例如在1934年奥地利出现的一些时刻，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在当时存在于奥地利的武装组织“防御同盟”（Schutzbund）的支持下也是如此。

鲍威尔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批评苏联的某些从整个国内外情况来看已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是必然性反映的措施时，也和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很好地指出了这些措施的错误。他在其论述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恐怖的专政才会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这在经济上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在这种集体农庄中劳动的质量必然很差。这种农庄只有用农业技术设备很好地装备起来，才能够使其内部得到巩固。鲍威尔把这种经济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

^① O. Bauer, *Svjetski položaj socijalizma i socijaldemokratski program*, 转引自“Radničkog jedinstva”, str. 22。

质的经济,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专政应该通过劳动群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当掌握国家生产机构的专政被劳动群众的民主所废除时,就会从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中产生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①在这部著作中鲍威尔仍然坚持工业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同工业官僚和农民进行合作。同时也重复提到他的一个主张:如果资产阶级企图用暴力手段破坏民主制度,就用暴力夺取政权。

所有这些观点多半都被宣布为“维也纳国际”即所谓的第二半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个国际正是在奥地利社会党人希法亭和鲍威尔以及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的。1920年12月7日,在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瑞士社会民主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的伯尔尼预备代表会议(1920年12月5—7日)上通过了一个告各国社会党人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基本纲领要求之一就是:“专政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要根据各国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定。如果无产阶级是以民主手段掌握了政权,那么在资产阶级反抗时,这个民主的国家政权也不得不实行专政。如果还在争夺政权的决定性阶段,民主制度就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而被破坏,那么专政就应该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的专政形式。而专政机关按照各国的情况可以是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地方自治单位(公社)或该国所固有的其他阶级组织。”^②这个宣言同样地还宣布了一条其本身也是正确的纲领:“正像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实现的一样,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各个国家

417

^① O. Bauer,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nach dem Weltkrieg*, I Bd., Wien 1931, str. 223.

^② 引自 Karl Diehl, *Ue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Jena 1922, str. 424 - 425。

是不一样的。”^①

但是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却与这些正确的观点相反,基本上是和鲍威尔理论观点中的主张相一致的。这个国际由于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动摇的态度,对俄国发生的事件采取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所以很快它的成员就发生分裂,有的加入了第三国际,有的又回到了第二国际。最后在1923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终于在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它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创造作用,认为战后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中对恢复正常生活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要求让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和经济问题的决策。于是联合政府的制度就被宣布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即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经济方面要求有一种联合劳资双方的附属组织。

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时期和深刻的分裂。在这次分裂中,旧国际的社会党人和新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人都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看得非常严重,以致使他们双方都完全忽略了那种把他们这些人全都看成是自己的阶级对立面的危险势力。由于他们的不团结和不清醒,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又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了胜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鲍威尔所设想的一种可能性被证实了。但是并没有证实,在这种形势下采取防御性的革命策略是对付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良药。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队、警察、报刊和被收买的自由报刊代理人,而且自由又是一种不负任何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反抗都必然是失败。奥地利社会党人偶尔进行的一些为时过晚的反抗,也遭到了和老老实实地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头颅放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受死一

^① Karl Diehl, *Ue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Jena 1922, str. 425. 卡·迪耳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1920年耶拿版;这本书也属于资产阶级科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客观主义论述的一类著作。关于鲍威尔,还可参见奥托·莱希特的新作:《奥托·鲍威尔》,1970年维也纳版。

样的失败。

看来这一切以及后来的一些悲剧性事件,还没有使国际社会主义受到足够的教训!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从第二国际时期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来看,俄国无疑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中期,当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时候,谁都无法预见,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国家不仅将成为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的场所,而且与它的经济和政治落后状态相反,将成为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地方。

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国刚刚从法律上解决了封建农奴制度,而直到70年代还谈不上工业的较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谈不上工人阶级的比较明显的集中。与此相反,俄国却存在一批朝气蓬勃、英勇无畏、很有理论修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N. Bjelinski)、赫尔岑(A. Hercen)、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D. I. Pisarev)、巴枯宁等人,试图即便不能在历史水平上,也至少在思想上达到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水平。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先驱者。这些人也都各自经历了由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而达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因而实际上他们获得

的成果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

但是由于条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思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空想的性质,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把“俄国村社”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种观点上。当时不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这也影响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和斗争方法的看法。

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指望通过俄国农民村社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实现。

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彼·拉甫罗夫(P. Lavrov),他曾经当过上校和军事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民粹派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拉甫罗夫的观点虽然在不能指望得到某种比较广泛的革命支持的形势下唤起了革命激情,但它是不切合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他认为,少数有觉悟的个人是历史上的主要角色,只有他们能唤起和推动群众。但是当这种“到农民群众中去”的运动遭受挫折时,1876年建立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党”很快就分裂为两派,其中“民意党”完全采取了恐怖主义的行动。俄国革命者尽管犯了恐怖主义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却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安·热里雅鲍夫(A. Željabov)、索·彼洛夫斯卡娅(Sofija Perovskaja)、维·斐格涅尔(Vera Figner)、尼·基巴利契奇(N. I. Kibalčič)、季·米哈伊洛夫(T. Mihajlov)等人的形象,将永远是人们的英雄主义的榜样。

当70年代末和80年代里民意党人还在制造密谋和进行暗杀时,资本主义却在俄国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因而历史现实本身证明了民粹派思想是没有前途的。70年代中期,在彼得堡也出现了第一批革命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示威游行,此后不久,整个俄国都被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弄得动荡不安了。俄国已经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也必然反映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上。

即使在此以前,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陌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俄译本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出得早,而且许多民粹派分子都和马克思保持着个人接触或通信联系(特别是彼·拉甫罗夫和尼·丹尼尔逊[N. F. Danielson])。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强烈的理论兴趣,必然会使他们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俄国也走着和欧洲其他国家相同的道路,社会主义面临着几乎同样的任务。这时,有一个人不仅最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也能从理论上解决俄国的问题,而且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这个人就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⁴²¹

早在70年代中期,普列汉诺夫(1856—1918)就参加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在“土地和自由党”和“土地平分社”的民粹派组织和机关刊物中工作,及至民粹派的宣传鼓动失败之后便逃往国外。普列汉诺夫在他学术活动的初期,首先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在西欧了解了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坚决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根据这些认识写出的最早的一些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必然是针对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的。随着这些著作的发表,普列汉诺夫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在进行理论活动的同时,也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列·捷依奇(L. Deutsch)、维·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瓦·伊格尼亚托夫(V. Ignjatov)(他不久就去世了)。他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通过发表理论文章、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演讲等等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俄国流亡者政治上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人物。波克罗夫斯基早就正确地写道,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最有学问、最有教养和最有天才的政论家”^①。为了顺利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时在俄国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并清算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上述著作中以及在以后写的一些著名的著作中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些著作直到今天还具有理论意义。

1895年,普列汉诺夫以恩·别尔托夫(N. Beljov)的笔名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最出色的著作之一《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当时世界文献中阐述马克思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及理论根源的一部最出色的著作。那时候,普列汉诺夫就已经大体上克服了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对哲学问题的无知。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先驱者进行扎实的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一部著作^②中专门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N. K. Mihajlovski)、尼·伊·卡烈也夫(N. J. Karejev)、谢·尼·克里文柯(S. N. Krivenk)等人的民粹派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就清楚地看出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所以没有追随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做法——把马克思归结为康德。普列汉诺夫也和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一样,无疑是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的人。但是他和所有这些人有所不同,他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点的意义,并且试图哪怕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同时,普列汉诺夫也以他的渊博的文化知识和卓越的政论才能使得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俄国一开始就具

^① M. N. Pokrovski, *Povijest Rusije*, Zagreb 1935, str. 219.

^② 一年以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唯物主义史论丛》(*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96),在这部著作中对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马克思做了分析。

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并以当时的大量科学文献作为依据。

如果说《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明显地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说,它非常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理论先驱者和他们对他的影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那么在紧接着此书之后发表的另外两篇篇幅较小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结合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又以独到的见解着重研究和解决了某些问题。第一篇文章是《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给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论历史唯物主义》写的书评。在这篇文章里,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指出,把这种或那种因素当作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常见的抽象空论。^①和因素论相反,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各种作为抽象东西的因素,而是存在着包括各种因素的社会整体。“从因素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经济等等——各从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而从现代唯物史观看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隔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这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

423

^① 普列汉诺夫写道:“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一因素的观念,是借助于抽象而产生出来的。由于抽象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具有单独的范畴形式,人的活动的各种表现——如道德、法、经济形式等——才在我们的头脑中转化为一些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似乎引起了这种活动,决定了这种活动,并表现为这种活动的最终原因。因素论一出现,就一定要发生究竟哪一个因素算是决定性因素的争论。”(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Izbran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 Moskva 1956, str. 241. [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5页。——译者注])

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①

同样地,普列汉诺夫也表述了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本性问题的深刻的辩证观点。普列汉诺夫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抱批判的态度并予以坚决驳斥,因为这些观点设想按某种理想的人类本性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得出合乎马克思观点的结论:“现代唯物主义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似乎是唯一合乎人类本性的,而一切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人性的结果。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一旦与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矛盾,就开始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抵触。”^②

424 普列汉诺夫在另外一些著作中还花费很多精力研究了自然界和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尽管有时对这些因素强调得有点过分,但他基本上对这种关系做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注意到了前人在做这种解释时几乎一贯忽略的某些因素。因此,正像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总是努力指出各种因素在人类历史生活中的综合的相互作用,并明确提出自己对种族因素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环境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间接。不过自然的影响并不消失。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之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色,这些特色可

^①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tii*, str. 266. (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94页。——译者注)。后来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是在最后才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明,就是说,他要用许多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间作用来作前提。”(*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a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I, Moskva 1957, str. 174. [参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8页。——译者注])

^②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tii*, str. 243. (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8页。——译者注)

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而完全消失。这些民族气质的特色,形成所谓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给予一种毫无疑问的影响。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本非易事,这样一来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是最先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仍然首先批驳了民粹派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的创造作用的论点,他既反对那种把主体最后归结为消极无为的东西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那种认为英雄伟人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的主观主义观点——这一点是黑格尔、鲍威尔派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和著有英雄论的卡莱尔等人所坚决主张的。普列汉诺夫也和他的先行者别林斯基一样,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着眼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②

425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经过分析,得出了一般性的论断:“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

^① G. V. Plehanov, *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tii*, str. 248. (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3—274页。——译者注)

^② G. V. Plehanov, *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sv. II, str. 330.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5页。——译者注)

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①

与普列汉诺夫同时,也迅速涌现出一代新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根据西欧的革命经验和理论经验来说明本国的情况。19世纪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从理论上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方法武器。所以,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鼓舞,这是毫不奇怪的。民粹派分子(特别是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卡烈也夫、瓦·沃龙佐夫[V. P. Voroncov])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七巨头(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司徒卢威、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柯夫)之间的理论论战,在这些年代里是沙皇俄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后来罗·卢森堡写道:“这次斗智,其中有些部分是很光辉的,并曾使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好象着了迷的样子。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长驱直入而告结束,它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历史理论已渗透了俄国的思想界了。‘合法’马克思主义那时公开地占据了俄国各大学、各杂志和经济书籍市场的地盘,从而也带来了这种地位的不利后果。十年以后,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在街道上指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主义的黑暗面时,在马克思主义乐观者的七巨头中,除了一个人是例外,没有一个是留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②

426

问题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估计方面,理论上是和普列汉诺夫,甚至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对待革命问题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的态度上,这帮人始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一点,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列宁

^① G. V. Plehanov, *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sv. II, str. 326.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0页。——译者注)。在同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伟大人物的作用规定如下:“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Izbr. fil. Proiz.*, sv. II, str. 333)

^②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str. 204. (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早在这场理论论战方兴未艾之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他们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立场,使他们很快地变成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也夫很快就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论观点,而投入了当时十分时髦的资产阶级一般哲学理论——新康德主义——的怀抱。司徒卢威最后甚至公开地主张客观唯心主义,而别尔嘉也夫在俄国唯心主义者索洛维约夫(V. S. Solovjev)的影响下最后竟滚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罗·卢森堡在上述著作中很机智地说道:“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过于彻底了。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有发展的可能时,甚至提出理论上证明,认为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①

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战,并表现出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论战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这场论战中,也和后来他在反对马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中一样,试图以独到的见解来论述和解决某些问题。^②

在哲学观点方面,普列汉诺夫特别是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继承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没有

427

^① R. Luxemburg, *Akumulacija kapitala*, str. 204. (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5页。——译者注)

^②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做了最详尽的分析的,是加·彼特罗维奇(G. Petrović)的著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zofski pogledi Plehanova*, Zagreb 1957)。在俄国的现代著作中,唯一的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是伏·阿·福米娜(V. A. Fomina)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sofskie vzgljady G. V. Plehanova*, Moskva 1955),但这本书还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和局限。

发展什么比较带有根本性的新因素。但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在他的大量论战著作和理论著作中,毕竟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例如,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而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在他比较成熟的阶段,却不断地强调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恩格斯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线,例如他认为:“哲学是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经验的综合观念的体系。简言之,哲学就是一定时代的已知的存在的综合。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出的结论,和我们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①

这个定义也和恩格斯的定义一样,今天看来有些过于狭窄,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道主义关于人的问题,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人们需要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哲学观察这一点来说,这个定义还是正确的。

在物质定义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后来也被列宁接受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②

这个物质定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公认的。

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特别坚决地主张研究辩证法,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辩证论者。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已被黑

^① G. V. Plehanov, *Filosofskaja evoljucija Marksa*; *Sočinenija*, sv. 18, str. 325.

^② G. V. Plehanov, *Materialismus militans*; *Izbranye filosofskie proizvedenija*, sv. III, Moskva 1957, str. 230 - 231.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战斗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格尔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的老问题,这就是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比俄国现代斯大林派的所有哲学家都深刻得多。他没有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而是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只看作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像静止是运动的个别情况一样,以形式逻辑的规则(思维的‘基本规律’)为依据的思维也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①

普列汉诺夫在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时,提到了特伦德伦堡(A. Trendelenburg)和宇伯威格(F. Überweg)的形式逻辑观点,并在解释由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最后断定:“因此可以再一次得出结论,辩证法没有废除形式逻辑,而只是取消了形而上学者所附加给形式逻辑的规律的绝对意义。”^②

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观点,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以及后来在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和在《战斗唯物主义》一文中,都对这一认识论问题做了说明。

虽然我们能够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找出可以解释为不可知论的表现的段落^③,但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哲学论据表明:他驳斥了不可知论,坚持了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只不过在反映论

^① G. V. Plehanov, *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ury F. Engelsa "L. Fei-erbach i konec klassičeskoj nemeckoj filosofii"*; *Izbr. fil. proiz.*, sv. III, str. 81.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4页。——译者注)

^② G. V. Plehanov, *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ury F. Engelsa "L. Fei-erbach i konec klassičeskoj nemeckoj filosofii"*; *Izbr. fil. proiz.*, sv. III, str. 83.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6—86页。——译者注)

^③ 例如在批判马萨里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一书时,普列汉诺夫针对马萨里克提出的关于一切东西,包括物质的东西和人的头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写道:“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又一次证明,这位教授先生连最起码的唯物主义概念都没有具备。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的学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一向认为这些问题是属于知识范围之外的。”(参见 *Protiv revizionizma*, Kultura, Zagreb 1953, str. 405)

中尽力摆脱素朴的实在论。例如他在和康拉德·施米特论战时,在《再论唯物主义》一文中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说空间与时间是意识的形式,说因此它们的第一个特性是主观性,这在托马斯·霍布斯就已经知道,而且现在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肯否认这点的。全部问题在于,物的某些形式或关系是否与意识的这些形式相符合。唯物主义者,不消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是肯定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承认那一位康德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斯密特先生,以天真的殷勤强使他们接受的那个糟糕的(正确些说,荒谬的)同一性。不是的,自在之物的形式和关系不会是我们看起来的那种样子,即是说,不会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被翻译过’以后我们所觉得的那种样子。我们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像象形文字;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标记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够使我们能研究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我们对它们能起作用。我重复地说,如果在客观的关系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翻译’)之间没有正确的符合,那末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不可能的。”^①

后来,在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俄译本再版时(1905年),普列汉诺夫已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这个来自谢切诺夫的术语,虽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主客观符合问题的观点。在后来的俄国哲学界,米丁(M. B. Mitin)、福米娜等人特别指责普列汉诺夫,说他因此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实际上,倒正好是这些人自己没有在思想上理解反映论,没有看到: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反映和符合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而恰好是两个互为前提的因素。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非常正确地看到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这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懂得的,他认为不能把心理的东西(反映)和物质的东西(事物)等同起来,而且也看到了认识

^① G. V. Plehanov, *Još jednom materijalizam; Protiv revizionizma*, str. 142.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再论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如此,认识毕竟是认识,尽管表面上有矛盾和不符合,人还是通过那些符合的东西认识世界。普列汉诺夫也和自己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在一定时期的列宁一样,没有能更深刻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实践问题,虽然他在区分上述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

在同德国和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进行的这些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和思想上无疑都占了上风,这不仅说明他能从总体上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说明他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极端复杂的问题上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430

上面已经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独到的解释的某些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对整个唯物史观问题的看法,要比后来在30年代批评他的人正确得多。普列汉诺夫不是御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并不因为社会学这个术语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已经通用而害怕使用这个名词。相反,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认为:“社会学要能变成科学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它能把社会人的目的的发生(社会的‘目的主义’)了解为社会过程的必然结果,而社会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行程来决定的。”^①

在实现社会学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和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为未来的一切科学的社会学提供了序论。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普列汉诺夫根据人类各个活动领域内的丰富文化和关于各种现象的大量知识,特别坚决地主张克服在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经常出现的片面性和机械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

^① G. V. Plehanov,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 fil. proiz.*, sv. III, str. 193.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11页。——译者注)

存在)。拉布里奥拉就曾指出过分析社会心理的意义,因为社会心理对于各个有关集团是各不相同的。普列汉诺夫同意他的意见,也主张要确切地规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级形式之间的基本中介。例如,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阐述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列要点:

431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地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①

虽然可以指责这个“公式”研究得不够详尽,或者说它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必须注意,普列汉诺夫所想提出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最概括地指出我们在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必须注意到的某些中介关系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特别忽略了“个别的因素”(个体、个人),而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和活动中不仅表现出社会心理或一定阶层的心理,而且也表现出自己本身的心理——一个人的心理,而个人心理给意识形态方面的创作打上了特殊的

^① G. V. Plehanov, *Osnovnye voprosy marksizma; Izbr. fil. proiz.*, sv. III, str. 179 - 180.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5—196页。——译者注)

烙印。

普列汉诺夫的很大一部分理论活动,是研究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他以独到的见解解决了在他之前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少涉及的这些领域中的若干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已经就艺术的性质和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在分析托尔斯泰(L. Tolstoj)把艺术看作是通过动作、线条、色彩等来表达感情的观点时,指出:“还有一点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认为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主要的特点。”^①

432

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地没有抛弃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现中的理性因素,从而必然会在美学领域内同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发生冲突。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康德把审美判断看作不以一切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判断的观点时,得出了一个试图把美学功利主义和美学形式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当“应用在单独的个人身上”时,他赞同康德的观点。“如果喜欢某一幅画只是由于我可以高价出售它,那么我的判断当然绝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是社会的观点出发,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对原始部落的艺术的研究证明:社会的人最初都是以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对待某些事物和现象才转向审美的观点。这给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光辉异彩。”^②

^① G. V. Plehanov, *Pisma bez adrèsa;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285.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译者注)。在同一段话中,普列汉诺夫又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我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给予它们一定的形象表现的时候。不用说,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想到和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Pisma bez adrèsa;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285.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译者注])

^②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433.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分析,一般地说是不很细致的,也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不过他并没有想以此来把美和利等同起来,而是首先想强调指出,对一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的人来说,他认为美的东西,只能是对他有利的东西,只能是在这一斗争中有意义的东西。因此,普列汉诺夫并不容许把美的领域和利的领域等同起来,他着重指出,前一个领域比后一个领域要广阔得多,美的享受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性,他得出结论说:“但是,利益毕竟是存在的;利益毕竟是美的享受的基础(请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不会觉得事物有什么美。”^①

433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恰巧没有从审美观点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从社会的人以功利为根据的审美判断向个人鉴赏的审美判断的转变的特点和基础,而后一种判断“当然是以做判断的人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的”^②。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后一方面以及对这种转变本身没有多加说明,但是在谈到前一方面时却对这个问题做了独到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运用了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材料,并联系到卡·毕歇尔(K. Bücher)的非常精彩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劳动与节奏的著作,以及格罗斯(K. Gross)的游戏应该先于劳动的理论。

尽管毕歇尔对游戏、劳动和艺术的关系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尽管他有时得出结论说:游戏来自劳动,而且艺术本身也是如此;但他的基本论断是: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则先于有用的东西的生产。因此,他就不是考虑到人的本质要素而把劳动放在注意的中心,而是把人的活动的另一些形式放在注意的中心。普列汉诺夫根据卡·冯·

^①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434.

^②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434.

登·施泰能(K. v. den Steinen)、拉采尔(F. Ratzel)、卡特林(G. Catlin)等人当时所做的最新的民族学调查,对原始民族的这些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他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种思想,即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知道原始艺术的历史”^①。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观察和研究艺术与审美现象的起源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是人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的基本论点出发,令人信服地指出,人的一切其余的极其重要的表现,都是从人的劳动和意识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中都不能具有独立的和主导的性质。

434

普列汉诺夫既然研究艺术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就必然会参加当时开展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当时已由纯粹的形式主义转向极端的唯社会学观点。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依赖于社会生活,从而认为,在人们的创作活动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独立的领域,也不存在孤立的个人,而只存在社会的个人。这个提法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是进一步分析的基础。毫不奇怪的是,当时一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首先主张对艺术做这种主要是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拉法格或者梅林,都没有更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也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尤其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

^① G. V. Plehanov, *Pisma bez adrèsa*, str. 354.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译者注)他在同一著作中对功利观点和审美观点的关系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谈的是使用价值,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标志,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但是,某些东西在原始人的眼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审美价值之后,他就专为这一价值去努力获得这些东西,而忘记了这种价值的来源,甚至连想都不想。”(*Pisma bez adrèsa*, str. 380. [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译者注])

级美学中也已经出现了用社会学观点解释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①

435

但是,泰恩(H. Taine)的一般观点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泰恩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即没有能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看作是本身也具有矛盾的一种基础;而普列汉诺夫则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从而比泰恩以及所有那些把反映论机械地搬到艺术中来的人要高明得多。普列汉诺夫在论法国戏剧和绘画的文章中写道:“第一,说艺术也和文学一样反映了生活,这虽然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不明确的思想。要想懂得艺术是怎样反映生活的,就必须懂得生活本身的机制。而在文明的民族中,阶级斗争是生活机制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有看到这种动力,只有注意到阶级斗争并研究了它的种种突变,才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说明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因为‘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反映出该社会的阶级以及阶级相互斗争史。”^②

普列汉诺夫从这种方法论出发,对“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参与社会”的问题,做了特别精辟的分析。普列汉诺夫提出一个问题:一些人对艺术的性质和意义持有一种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持有全然相反的

^① 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Za dvadeset godina*)文集的自序中特别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我认为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一件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探寻可以称之为某种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等价物的东西。”(《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见 *Umjetnost i književnost*, Beograd 1949, sv. I, str. 235)。然而必须立即指出,普列汉诺夫也清楚地看出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必要性,并把它看作是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必要的工作:“如果这种批评不懂得事情不能只限于探寻某一文艺现象的社会等价物,社会学不应该把美学关在门外,而相反应该向它敞开大门,那么这种批评在努力探寻这种社会等价物时就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质。彻底的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工作应该是:也和唯心主义批评家所做的那样,对被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评价。如果一个唯物主义批评家竟以他已经找到该作品的社会学等价物为口实而拒绝做这种评价,那么这只是说明他没有懂得他想坚持的那种观点……换句话说,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一步工作不仅没有取消进行第二步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以第二步工作作为自己的必要补充。”(*Umjetnost i književnost*, Beograd 1949, sv. I, str. 241)

^② G. V. Plehanov, *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eka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Izbr. fil. proiz.*, sv. V, str. 433.

观点,那么发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主要根据18、19世纪法国艺术和19世纪俄国艺术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①

同样地,“所谓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批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是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和多少对艺术创作真正感到兴趣的人们之间有着相互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②。

尽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仍然停留在某种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水平上,因为当时艺术本身的活动就局限在这样的框框里,所以他无法超越这一点,尽管我们今天已不能再同意这些艺术标准,因为它们过于狭窄(例如,他在分析《金发女人》一书的艺术形象时就夹杂一个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而这恰好又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自然主义观点的!)^③,但是普列汉诺夫通过上述论点和分析,毕竟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分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36

此外,如果再看到他同狄慈根主义者、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萨里克、克罗齐、李凯尔特[H. Rickert]、文德尔班、柏格森等)

① G. B. Plehanov, *Iskusstvo i opš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693.

② G. V. Plehanov, *Iskusstvo i opš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698 - 699. 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艺术观必然会是革命的。普列汉诺夫在同一篇著作中写道:“根据这一切可以十分确凿地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只要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就必然会倾向于这种观点;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了,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消失了”。(*Iskusstvo i opšestvennaja žiznj*, sv. V, str. 703)

③ 无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狭隘的现实主义观点,博得了现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高度赞赏,而他反对艺术批评有权说艺术应当做什么,必须怎样做和必须按照什么方向去做的见解,却受到了指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不能够放弃由批评来控制艺术,因为批评实际上是按照国家官僚的眼色行事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但把握什么和塑造什么,怎样把握和怎样塑造,则取决于艺术家的能力和他的自由。艺术“必须”指出按照健全理性的要求应当存在某种东西。批评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说明对艺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许多因素和关系,但绝不能规定艺术创作的界限和范围。

进行的多次辩论和论战,如果再加上他的卓越的文化史著作和他对俄国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的分析,那么就只能感到普列汉诺夫这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识渊博、作用巨大。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列宁也特别强调指出过。而且有些比较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如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阿·莫·德波林、奥·勃鲁姆(O. Blum)、阿·阿夫拉莫夫(A. Avraamov)等。

437 虽然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最有才能和最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且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但是自从1903年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派一边。和列宁相反,普列汉诺夫支持当时流传相当广泛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自发性(不是绝对的自发性)的思想,认为俄国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谴责了1905年的武装起义;而在大战初期,他也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也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领袖一样,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和历史上存在的革命时机。由于这些原因,在晚年,普列汉诺夫没有在政治上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即当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虽然他并没有理解到当时是这些理想开始变为现实的时刻。

许多革命家的命运都带有这种离奇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烙印。但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的这个时期的最伟大、最有意义和最成熟的人物之一。

不过,普列汉诺夫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属于第二国际的范围。这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其广泛的规模来说,这是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就其民主精神和党内民主来说,这是思想观点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而对科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第二国际在政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都造就了一批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充分的个性和创造性,只是因为存在着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原则和前提之。

这种广泛的规模和伟大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另一方面。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明显的缺点(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导致不坚决反对典型的机会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的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

438

由于这个弱点,由于对议会抱有幻想,以及由于没有能力对革命前夕的一些事件做出坚决的和切实的评价,结果就在历史时期的最关键的问题上——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完全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在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是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干部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积极性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表现出献身精神,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个自以为坚持马克思的原则的党,不该在革命形势面前缴械投降,更不该在革命形势下帮助资产阶级聚集力量和压制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这种时刻表现出的无能,以及没有决心以批判的态度承认这些失败,使得当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继续执行改良主义的政策,并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原则。

这样,第二国际的历史事业就终结了。但是当时有一个人,他比第二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领袖都出色,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思想才能、理论才能和革命政策的才能的惊人的统一和一致。这个天才的人物就是列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权威”都黯然失色,他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名副其实地创造了历史。

随同列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本身发展的新的特殊的阶段。

主要译名对照表

(本表中页码为外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

- Abendroth, W. 阿本德罗特,沃 270,303,304
- Adler, F. 阿德勒,弗 335,384
- Adler, M. 阿德勒,麦 315,344,384-392
- Adler, V. 阿德勒,维 383
- Akselrod, Lj. I. (Ortodoks) 阿克雪里罗得,柳·伊(奥尔托多克斯) 436
- Akselrod, P. 阿克雪里罗得,巴 350,361,421
- Allemane, J. 阿列曼,让 276
- Altenstein, K. 阿尔坦施泰因,卡 55
- Andréas, B. 安得烈阿斯,贝 145,153
- Angel, P. 昂热尔,彼 316
- Annenkov, P. V. 安年柯夫,巴·瓦 145,146
- Aristotel 亚里士多德 235
- Arndt, E. M. 阿恩特,恩·莫 72,73
- Auer, I. 奥艾尔,伊 298,314

- Auerbach, B. 奥艾尔巴赫, 倍 78, 90
 Avenarius, R. 阿芬那留斯, 理 346, 378
 Avraamov, A. 阿夫拉莫夫, 阿 436
- B**
- Babeuf, F. 巴贝夫, 弗 28, 88, 94
 Badia, G. 巴迪亚, 吉 350
 Bakunjin, M. 巴枯宁, 米 69, 90, 169, 170, 174, 214, 322, 419
 Baratono, A. 巴拉托诺, 阿 296
 Barnave, J. 巴尔纳夫, J. 27
 Barth, H. 巴尔特, 亨 323, 370
 Bauer, B. 鲍威尔, 布 43, 45, 46, 54, 55, 60, 75, 78, 95, 115, 116, 134, 145, 151, 424
 Bauer, E. 鲍威尔, 埃 54
 Bauer, H. 鲍威尔, 亨 62, 164
 Bauer, O. 鲍威尔, 奥 315, 344, 358, 375, 384, 389, 391, 399, 400, 403, 406 - 418
 Bax, B. E. 巴克斯, 贝·E 306
 Bazard, S. A. 巴扎尔, 圣·阿 94
 Bebel, A. 倍倍尔, 奥 174, 196, 213, 217, 220, 221, 269, 274, 298, 300 - 308, 313, 315, 316
 Beck, K. 贝克, 卡 71, 72
 Beer, M. 贝尔, 麦 358
 Berdjajev, N. 别尔嘉也夫, 尼 306, 426
 Bergson, H. 柏格森, 昂 286, 288, 436
 Bernstein, E. 伯恩施坦, 爱 69, 196, 221, 222, 298, 301, 303, 310 - 316, 325, 334, 335, 338, 339, 344, 351, 352, 368, 389, 409, 436
 Bismarck, O. 俾斯麦, 奥 168, 174, 213, 214, 221, 263, 291, 297, 320, 322, 324

- Bissolati, L. 比索拉蒂,列 290,305
- Bjelinski, V. G. 别林斯基,维·格 419,424,436
- Blanc, L. 勃朗,路 94,163
- Blanqui, A. 布朗基,奥 93,169,275,276
- Bloch, E. 布洛赫,恩 14,36,130
- Bloch, J. 布洛赫,约 221,253,254
- Blum, O. 勃鲁姆,奥 436
- Blumenberg, W. 勃鲁门贝尔格,威 327
- Bonnet, A. 崩纳,阿 284
- Bonomi, I. 博诺米,伊 290
- Börne, L. 白尔尼,路 42,68-71
- Boudin, L. 布丁,路 344
- Bracke, W. 白拉克,威 217,221
- Braunthal, J. 布劳恩塔尔,尤 270,305
- Bray, J. F. 布雷,约·弗 179
- Brentano, L. 布伦坦诺,路 307
- Briand, A. 白里安,阿 276,339
- Bright, J. 布莱特,约 170
- Brockschmidt, K. F. 布罗克施米特,卡·弗 168,269,304
- Brousse, P. 布鲁斯,保 276
- Bücher, K. 毕歇尔,卡 433
- Büchner, G. 毕希纳,格 53
- Büchner, L. 毕希纳,路 237,324
- Buharin, N. I. 布哈林,尼·伊 196,199,347
- Buhl, L. 布尔,路 54
- Bulgakov, S. N. 布尔加柯夫,谢·尼 356,425,426
- Buonarotti, F. 邦纳罗蒂,菲 275

C

- Cabet, E. 卡贝, 埃 91, 94
 Calderon, P. 卡德龙, 彼 321
 Calvin, J. 加尔文, 让 247
 Calwer, R. 卡尔韦尔, 理 314
 Canepa, J. 卡奈帕, J. 290
 Cantillon, R. 康替龙, 理 176
 Carlyle, Th. 卡莱尔, 托 121, 424
 Catlin, G. 卡特林, 乔 433
 Ceton, C. J. 塞东, C. J. 371
 Cieszkowski, A. 采什科夫斯基, 奥 43, 87
 Cobden, R. 科布顿, 理 170
 Cohen, H. 柯亨, 赫 307, 308
 Colding, L. 柯尔丁, 路 242
 Colin, A. 科林, 奥 93
 Considérant, V. 孔西得朗, 维 63, 94
 Cornu, A. 科尔纽, 奥 43, 49, 90
 Crespi, S. B. 克雷斯皮, S. B. 296
 Croce, B. 克罗齐, 贝 284, 295, 296, 436
 Cunow, H. 库诺夫, 亨 368 - 371, 400
 Černišeovski,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 419, 420, 436
 Černov, V. M. 切尔诺夫, 维·米 344

D

- Dan, Th(F. I. Gurvič) 唐恩, 特(费·伊·古尔维奇) 344, 361
 Danielson, N. F. 丹尼尔逊, 尼·弗 420
 Darwin, Ch. 达尔文, 查 244, 309, 328, 335
 Daudet, A. 都德, 阿 282
 Dauge, P. G. 达乌盖, 巴·格 273, 275

- David, E. 大卫,爱 310,331,339,365
- Debenjak, B. 戴贝尼亚克, B. 67
- Deborin, A. M. (A. M. Joffe) 德波林,阿·莫(阿·莫·越飞)
335,436
- Delecluze, Ch. 德勒克吕兹,沙 275
- Demetz, P. 德梅茨,彼 221
- Demokrit 德谟克利特 56,57
- Descart, R. 笛卡儿,勒 75
- Deutsch, L. 捷依奇,列 421
- Deville, G. 杰维尔,加 284,339
- Dézamy, Th. 德萨米,泰 91,94
- Diderot, D. 狄德罗,德 25,26
- Diehl, K. 迪耳,卡 416,417
- Dietzgen, E. 狄慈根,欧 270,273,275
- Dietzgen, J. 狄慈根,约 270-275,335,372
- Dingelstedt, F. 丁盖尔施泰特,弗 60
- Diodor, Sicilianac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 193
- Dolléans, E. 多兰斯,爱 289
- Dollfuss, E. 陶尔弗斯, E. 405,410
- Donald, R. M. 唐纳,拉·麦 306,339
- Draper, J. W. 德雷帕,约·威 229
- Dreyfus, A. 德雷弗斯, A. 277
- Dühring, E. 杜林,欧 220,225,227,228,231,232,235,237-
241,245,246,249,251,252,257-259,261,262,269,295
- Duncker, H. 敦克尔,亨 355
- Duncker, K. 敦克尔,凯 359
- E**
- Ebert, F. 艾伯特, F. 314,340,342,365,367,405

- Eccarius, J. G. 埃卡留斯, 约·格 164
- Echtermayer, Th. 艾希特迈耶尔, 泰 54
- Eckermann, J. P. 埃克尔曼, 约·彼 29, 303
- Eckstein, G. 埃克施坦, 古 355, 384
- Eichhorn, E. 艾希霍恩, 艾 367
- Eichorn, J. A. F. 艾希霍恩, 约·阿·弗 55
- Eisner, K. 艾斯纳, 库 310, 367
- Enfantin, B. P. 安凡丹, 巴·普 94
- Engels, F. 恩格斯, 弗 7, 13, 23 - 25, 27 - 29, 34, 35, 40, 43, 46, 49, 53, 61, 64, 66 - 78, 79, 90 - 93, 98, 100, 115 - 117, 118 - 129, 130 - 151, 153 - 174, 179, 208, 211, 214, 217, 219 - 224, 225 - 265, 269, 270, 271, 273, 274, 282, 290, 291, 292, 295, 297, 300, 302, 308, 310 - 312, 322, 324, 327, 331, 333, 334, 336, 347, 352, 368, 370, 384, 386, 421, 424, 426 - 430, 434
- Engels, M. 恩格斯, 玛 67, 69, 74
- Epikur 伊壁鸠鲁 56 - 58
- Ernst, P. 恩斯特, 保 29
- Everbeck, A. 艾韦贝克, 奥 62
- F**
- Ferré, T. 费雷, 泰 275
- Ferri, N. 费利, N. 290
- Feuerbach, L. 费尔巴哈, 路 43, 46, 47 - 49, 60, 66, 82 - 84, 90 - 92, 96, 97, 100, 101, 103, 104, 114, 123, 125, 129 - 134, 142, 143, 145, 220, 222, 225, 229, 232, 237-239, 249, 255, 256, 269, 270, 324, 387, 419, 427 - 429
- Fichte, J. G. 费希特, 约·哥 31 - 33, 35, 36, 44, 46, 80, 88, 247, 323
- Figner, V. 斐格涅尔, 维 420

- Fischer, E. 费舍, 恩 14
- Flechtheim, O. 弗列希泰姆, 奥 360, 366
- Flourans, G. 弗路朗斯, 古 275
- Fomina, V. A. 福米娜, 伏·阿 426, 429
- Förder, H. 费尔德尔, 海 161
- Fourier, Ch. 傅立叶, 沙 62, 88, 93, 94, 207, 301
- Fränkel, L. 弗伦克尔, L. 164
- Freiligrath, F. 弗莱里格拉特, 斐 60, 161
- Fribourg, E. 弗里布尔, E. 174
- Friedländer, P. 弗里德兰德, P. 376
- 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324
- Friedrich, Wilhelm I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41, 59
- Friedrich, Wilhelm IV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55, 59, 78
- Fröbel, J. 弗吕贝尔, 尤 86
- Fröhlich, P. 弗勒利希, 保 350
- Fromm, E. 弗洛姆, 埃 14
- G**
- Gabler, G. 盖伯勒, G. 43
- Gall, L. 加尔, L. 53
- Gans, E. 甘斯, 爱 54, 73
- Garaudy, R. 加罗迪, 罗 94
- Gay, P. 盖伊, 彼 315, 316
- Georgi, E. 乔治, 伊 339
- Gigot, Ph. 日果, 菲 150
- Glezerman, G. 格列则尔曼, G. 196
- Goethe, J. W. 歌德, 约·沃 29, 61, 303, 322
- Gorki, M. 高尔基, 马 321
- Gorter, H. 戈尔特, 赫 339, 371, 374, 376, 377

- Göschel, K. F. 格歇尔, K. F. 43
 Gottschalk, A. 哥特沙克, 安 160
 Gottschalk, W. 哥特沙克, 威 399
 Graeber, F. 格雷培, 弗 67, 69, 70, 71
 Graeber, W. 格雷培, 威 67, 69, 70, 71
 Gramsci, A. 葛兰西, 安 296
 Gray, J. 格雷, 约 179
 Griffuelhes, V. 格里福斯, 维 289
 Gross, K. 格罗斯, 卡 433
 Guesde, J. 盖得, 茹 275, 276
 Guillaume, J. 吉约姆, 詹 214
 Guizot, F. P. G. 基佐, 弗·比·吉 94
 Gumplovicz, L. 龚普洛维奇, 路 345, 347
 Guntern, S. 贡特尔, 萨 334
 Gustafsson, B. 古斯塔夫森, 博 316
 Gutzkow, K. 谷兹科夫, 卡 42, 68, 69, 71
- H**
- Haase, H. 哈阿兹, 胡 340
 Habermas, J. 哈贝马斯, 于 80
 Haeckel, E. 海克尔, 恩 324
 Haenisch, K. 哈恩尼施, K. 369
 Haller, C. L. V. 哈勒, 卡·路·冯 59
 Hannak, J. 汉纳克, 亚 400
 Hardenberg, K. A. 哈登堡, K. A. 41
 Hardi, K. 哈第, 凯 306
 Harkness, M. 哈克奈斯, 玛 221
 Harney, J. 哈尼, 朱 120, 151
 Haupt, G. 豪普特, 乔 270

- Haym, R. 海伊姆, R. 79
- Hebbel, F. 赫伯尔, F. 321
- Hegel, G. W. F. 黑格尔, 乔·威·弗 31 - 39, 42 - 47, 49, 54-57, 59, 66, 71 - 76, 79 - 88, 95, 97, 100, 101, 123, 125, 147, 169, 181, 220, 225, 226, 232 - 245, 247, 274, 290, 295, 307 - 312, 315, 322, 323, 328, 349, 419, 424, 427
- Heilberg, L. 海尔堡, 路 150
- Heilmann, E. 海尔曼, 恩 369
- Heine, H. 海涅, 亨 42, 60, 68, 69, 71, 117, 321
- Heine, W. 海涅, 沃 310, 314
- Heinemann, H. 海奈曼, H. 355
- Heintel, P. 海因特尔, 彼 389
- Heljfond, O. J. 海尔方德, 奥·伊 273
- Helvétius, C. A. 爱尔维修, 克·阿 25 - 28, 422
- Hengstenberg, E. W. 亨斯滕贝格, 恩·威 45, 55, 71
-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168
- Herbart, J. F. 海尔巴特, 约·弗 290
- Hercen, A. 赫尔岑, 亚 419
- Herder, J. G. 赫尔德, 约·哥 29
- Herweg, G. 海尔维格, 格 59, 64, 65, 78, 88, 90, 117
- Hess, M. 赫斯, 莫 60, 62, 78, 84, 87 - 91, 97, 100, 104, 105, 117, 118, 126
- Hillmann, G. 希尔曼, 君 59
- Hildebrand, G. 希尔德布兰德, 格 314, 339
- Hilferding, R. 希法亭, 鲁 339, 344, 347, 355, 368, 384, 392 - 400, 416
- Hinrichs, H. F. W. 辛里克斯, 海·弗·威 43, 71
- Hippel, J. 希佩尔, 雅 64

- Hobbes, Th. 霍布斯,托 428
- Höchberg, K. 赫希柏格,卡 221
- Hodgskin, Th. 霍吉斯金,托 179
- Höffken, T. 赫夫肯, T. 60
- Hofmann, W. 霍夫曼,威 270
- Höhle, T. 赫勒,托 327
- Holbach, P. 霍尔巴赫,保 25, 26, 422
- Hugo, G. 胡果,古 59
- Hugo, V. 雨果,维 282.
- Humbert - Droz, J. 洪贝尔特-德罗兹,尤 340
- Hume, D. 休谟,大 56, 233
- Huten, U. V. 胡登,乌·冯 365
- Huxley, Th. 赫胥黎,托 212
- Huysmans, C. 胡斯曼,卡 297
- Hyndeman, H. 海德门,亨 306
- I**
- Ignjatov, V. 伊格尼亚托夫,瓦 421
- Immermann, K. 伊默曼,卡 73
- Isus 耶稣 44
- J**
- Jacoby, Joel 雅科比,约艾尔 72
- Jacoby, Johann 雅科比,约翰 65, 123, 320
- Jaurès, J. 饶勒斯,让 276, 277, 285, 304, 305
- Jenssen, O. 耶恩森,奥 344
- Jogiches, L. 约吉希斯,利 350, 359, 367.
- Joka, M. 约卡,米 283
- Joule, J. 焦耳,詹 242
- Jung, G. 荣克,格 60, 61, 117

K

- Kaegi, P. 卡埃吉,保 49
- Kampffmeyer, P. 康普夫麦尔,保 298,310
- Kangrga, M. 康格尔加, M. 82
- Kant, E. 康德,伊 30,31,35,36,55,70,80-82,234,247,290,291,306,307-311,315-317,319,322,323,389,422,432
- Karejev, N. J. 卡烈也夫,尼·伊 422,425
- Karski, J. 卡尔斯基,尤 359
- Kautsky, M. 考茨基,敏 221
- Kautsky, B. 考茨基,贝 389
- Kautsky, K. 考茨基,卡 196,208,217,263,274,291,298,299,313,315,316,324,327-349,358,360,361,365,367,368,372,375,376,388,392,407,409,410,414
- Kelsen, H. 凯尔松, H. 390
- Kibalčić, N. I. 基巴利契奇,尼·I. 420
- Klopstock, F. G. 克洛普什托克,弗·哥 29
- Kloss, C. A. 克洛斯 314
- Koch, H. 科赫,汉 326
- Kol, van 科尔,万 339
- Kolb, W. 科尔布,威 339
- Kool, F. 科尔,弗 381
- Köppen, C. F. 科本,卡·弗 43,54
- Korsch, K. 柯尔施,卡 176,378
- Kotzebu, v. A. 科采布,冯·奥 67
- Kranold, A. 克兰诺德,阿 344
- Kričevski, B. 克里切夫斯基,鲍 289
- Kriege, H. 克利盖,海 151
- Krivenko, S. N. 克里文柯,谢·尼 422

- Kronenberg, M. 克朗能堡, 姆 308
- Kropotkin, P. 克鲁泡特金, 彼 335, 423
- Krupp 克虏伯 359
- Kugelmann, L. 库格曼, 路 168, 173, 210, 237
- Künne, G. 奎纳, 古 69, 71
- Kumpmann, W. 库姆普曼, 瓦 327
- L**
- Labriola, A. 拉布里奥拉, 阿 284, 289, 290
- Labriola, A. 拉布里奥拉, 安 284, 290 - 296, 422, 430
- Lademacher, H. 拉德马赫尔, 霍 90, 340
- Lafargue, P. 拉法格, 保 173, 275 - 283, 284, 290, 316, 422, 434
- Lagardelle, H. 拉葛德尔, 于 289
- Lamennais, F. 拉梅耐, 费 94
- La, Mettri, J. O. 拉美特利, 茹·奥 25
- Lange, F. A. 朗格, 弗·阿 269, 308
- Lange, P. 朗格, 普 359
- Laschitza, A. 拉席察, 安 350
- Lassalle, F. 拉萨尔, 斐 49, 167 - 169, 174, 221, 269, 283, 308, 322, 369, 401
- Laube, H. 劳贝, 亨 42
- Laufenberg, H. 劳芬贝尔格, 亨 339
- Lauth, R. 劳斯, R. 43
- Lavrov, P. 拉甫罗夫, 彼 420
- Law, J. 罗, 约 24
- Le, Lubez 勒, 吕贝 169
- Ledebour, G. 累德堡, 格 339, 340
- Legien, C. 列金, 卡 314, 365
- Lehman, A. 莱曼, 阿 164

- Leibniz, G. W. 莱布尼茨,哥·威 30
- Leichter, O. 莱希特,奥 417
- Lenjin, V. I. 列宁,弗·伊 11, 199, 259, 261, 272, 274, 275, 288, 303, 308, 335, 338, 340, 342, 345, 347, 349, 353-355, 358 - 363, 365, 367, 369, 376, 378 - 380, 384, 392, 397, 401, 407 - 409, 414, 415, 426, 427, 429, 436 - 438
- Lensch, P. 连施,保 340, 369, 400
- Leo, H. 莱奥,亨 70, 71, 75
- Leontijev, A. 列昂节夫, A. 196
- Leroux, P. 勒鲁,比 63, 94
- Leser, N. 莱泽尔,诺 389
- Leske, K. W. 列斯凯,卡·威 117, 134
- Lessing, G. E. 莱辛,哥·埃 29, 321, 322, 324
- Leukip 留基伯 56
- Leupold, H. 洛伊波德,亨 67
- Levy, P. 勒维,保 360
- Liebkecht, W. 李卜克内西,威 174, 214, 217, 220 - 222, 269, 274, 298, 300, 366
- Liebkecht, K. 李卜克内西,卡 325, 340, 359, 366, 367, 374, 405
- Liebmann, O. 李普曼, O. 307
- Lindau, R. 林道,鲁 322
- Linné, C. 林耐,卡 25
- List, F. 李斯特,弗 53
- Locke, J. 洛克,约 26, 323
- Löwith, K. 勒维特,卡 54
- Lucraft, B. 鲁克拉夫特,本 214
- Ludwig, C. F. E. 路德维希, C. F. E. 79

Lukács, G. 卢卡奇,捷 36,90,221,325-327,376
 Luther, M. 路德,马 247
 Luxemburg, R. 卢森堡,罗 14 312-316,322,325,334,340,
 341,349-367,374,407,425,426

M

Mac, Donald R. 麦克唐纳,拉 306,339
 Mach, E. 马赫,恩 335,346,378,384
 Machiavelli, N. 马基雅弗利,尼 308
 Mackey, J. H. 马凯, J. H. 54
 Mallon, B. 马隆,贝 276
 Malthus, T. R. 马尔萨斯,托·罗 122
 Mandel, E. 曼德尔,厄 14,176
 Mannesmann 曼内斯曼 359
 Mao, Ce-tung 毛泽东 23
 Marcuse, H. 马尔库塞,赫 14,36
 Martov, L. (J. O. Zederbaum) 马尔托夫,尔(尤,奥·策杰尔包
 姆) 358,416
 Marx, Jenny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的妻子) 66,222
 Marx, Jenny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的大女儿) 222
 Marx, K. 马克思,卡 7,13,23-25,27,29,34,35,37-40,43,
 46,49,53-66,67,74,78,79-117,118,121,123-125,128,129,
 130-223,225,229,231-234,237,240,241,245,246,249,252,
 253,255,257,260,263-265,269-271,273-280,282,285,287-
 289,291,295,297,300-302,306-313,317-320,322-324,326,
 328,331,333-335,344,349,351,352,356-358,368-370,380,
 383,384,386,389,392,400,401,403,408,419-424,427,430,
 434,438
 Marx, L. 马克思,劳 276

- Masaryk, T. 马萨里克,托 293,370,428,436
- Matthias, E. 马蒂亚斯,埃 344
- Mattick, P. 马提克, P. 378
- Mayer, G. 迈耶尔,古 49,67,69,123
- Mayer, R. 迈尔,罗 242
- Mc, Lelland D. 麦克利兰,大 49
- Mehring, F. 梅林,弗 49,60,167,214,221,247,248,274,315,316,320-327,328,340,355,358,359,368,374,422,434
- Menzel, W. 门采尔,沃 42
- Meyen, E. 梅因,爱 43,54,55,64,65
- Meyer, E. 迈耶尔,恩 359
- Meyer, J. 迈耶尔,尤 145
- Michel, L. 米歇尔,路 275
- Michels, R. 米歇尔,罗 289,290
- Mignet, F. 米涅,弗 94
- Mihajlov, T. 米哈伊洛夫,季 420
- Mihajlovski, N. K.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康 422,425
- Millerand, A. 米勒兰,亚 276,284
- Misch, J. 米施,于 309
- Mitin, M. B. 米丁, M. B. 429
- Moll, J. 莫尔,约 151
- Mommsen, Th. 蒙森,泰 303
- Mönke, W. 蒙克,沃 145
- Montesquieu, Ch. 孟德斯鸠,沙 26,79,247
- More, Th. 莫尔,托 328
- Morgan, L. 摩尔根,路 256,370
- Morisson, J. 莫里逊,詹 123
- Morozov, A. 莫罗佐夫, A. 196

- Morris, W. 莫里斯, 威 306
- Most, J. 莫斯特, 约 220, 383
- Müller, A. H. 弥勒, 亚·亨 59
- Mundt Th. 蒙特, 泰 42, 69
- Mussolini, B. 墨索里尼, 本 290, 305
- N**
- Naef, E. 纳伊夫欧, E. 289
- Napoleon, I 拿破仑第一 40, 41, 53, 59, 72
- Napoleon, III (L. Bonaparte) 拿破仑第三 (路, 波拿巴) 164, 174, 209
- Natorp, P. 那托尔卜, 保 308
- Nauwerk, K. 瑙威尔克, 卡 54
- Nettl, J., P. 奈特尔, J. P. 350
- Nettlau, M. 纳特劳, 麦 69
- Nietzsche, F. 尼采, 弗 54, 288
- Nieuwenhuis, D. 纽文胡斯, 多 338
- Nikolajevski, B. 尼古拉也夫斯基, 鲍 344
- Noske, G. 诺斯克, 古 339, 367
- O**
- O'Connor, F. 奥康瑙尔, 菲 263
- Oberwinder, H. 奥伯温德, 亨 383
- Odger, G. 奥哲尔, 乔 214
- Oppenheim, D. 奥本海姆, 达 43, 60
- Owen, R. 欧文, 罗 120, 128, 300
- P**
- Pannekoek, A. 潘涅库克, 安 14, 273, 316, 338, 339, 371 - 381, 407
- Pappenheim, W. 帕彭海姆, 符 69

- Parvus (A. L. Heljand) 帕尔乌斯(亚,拉·格尔方德) 339, 369, 400
- Patten, van Ph. 派顿,范·菲 259, 260
- Pašukanis, J. B. 帕舒坎尼斯,叶·布 14, 400
- Pelloutier, F. 佩路提埃, F. 284, 289
- Perovskaja, S. 彼洛夫斯卡娅,索 420
- Petrović, G. 彼特罗维奇,加 426
- Petty, W. 佩第,威 176
- Peukert, J. 波伊凯特,约 383
- Pfänder, K. 普芬德,卡 164
- Pieck, W. 皮克,威 367
- Pisarev, D. I. 皮萨列夫,德·伊 419
- Platen, A. 普拉滕,奥 72
- Plehanov, G. V. 普列汉诺夫,格·瓦 274, 308, 315, 316, 335, 350, 367, 384, 420, 421 - 438
- Plenge, J. 普伦格,约 369
- Plutarh 普鲁塔克 56
- Poggi, A. 波基,阿 296
- Pokrovski, M. N. 波克罗夫斯基,米·尼 421
- Preobraženski,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 14
- Prometej 普罗米修斯 56
- Proudhon, J. 蒲鲁东,约 63, 94, 145 - 149, 163, 169, 172, 174, 180, 183, 286, 288
- Prutz, R. E. 普鲁茨,罗·E. 60
- R**
- Rabelais, F. 拉伯雷,弗 281
- Radek, K. 拉狄克,卡 340, 376
- Radezun, G. 拉德聪,君 350

- Ranke, L. 兰克, 列 79
- Rappoport, Ch. 拉波波特, 沙 277
- Ratković, R. 拉特科维奇, 拉 389
- Ratzel, F. 拉采尔, 弗 433
- Ravesteyn, W. 拉维斯泰因, 威 371
- Raynal, G. 雷纳耳, G. 27
- Rempel, R. 雷姆佩尔, 鲁 145
- Renner, K. 伦纳, 卡 368, 369, 384, 399, 400 - 405, 409
- Ricardo, D. 李嘉图, 大 147, 148, 178, 179, 191, 202
- Rickert, H. 李凯尔特, 亨 436
- Riedel, K. 里德尔, 卡 55
- Rigot, R. 里果, 拉 275
- Ritter, G. A. 利特尔, 格·阿 270, 313, 314
- Ritter, J. 利特尔, 约 80
- Rjazanov, D. 梁赞诺夫, 达 69, 145, 167
- Roland-Holst, H. 罗兰-霍尔斯特, 罕 273, 338, 350, 371, 374, 376
- Roll, E. 罗尔, 埃 177
- Rosdolsky, R. 罗斯多尔斯基, 罗 176
- Rosenberg, W. L. 罗森堡, 威·路 264
- Rousseau, J. J. 卢梭, 让·雅 26, 79, 247
- Rudas, L. 鲁达斯, L. 376
- Ruge, A. 卢格, 阿 54, 60, 61, 64-66, 69, 73, 75, 86, 90, 91, 94, 95, 97, 110, 114, 121, 123 - 125, 145, 151
- Rühle, O. 吕勒, 奥 340, 376
- Rutenberg, A. 鲁滕堡, 阿 43, 54, 60, 65
- S**
- Saint-Simon, C. H. 圣西门, 昂 88, 93, 94

- Sand, G. 桑, 乔 150
- Savigny, F. K. 萨维尼, 弗·卡 54
- Schäffle, A. 谢夫莱, 阿 269
- Schapper, K. 沙佩尔, 卡 62, 151, 164
- Scheidemann, F. 谢德曼, 菲 314, 340, 342, 361, 365, 367, 404, 405
- Schelling, F. W. 谢林, 弗·威 32-36, 55, 74-76, 91, 92
- Scheu, A. 肖伊, 安 383
- Schiller, F. 席勒, 弗 29, 67, 321, 322
- Schippel, M. 席佩尔, 麦 314, 339
- Schleiermacher, F. 施莱艾尔马赫尔, 弗 70, 71
- Schleifstein, J. 施莱弗施坦, 约 327
- Schmidt, C. 施米特, 康 54, 221, 248, 250, 252, 253, 308, 315, 335, 428, 429
- Schmoller, G. 施穆勒, 古 307
- Schorske, C. 肖尔斯基, 卡 304
- Schramm, K. 施拉姆, 康 164, 221
- Schulze, Delitzsch H. 舒尔采, 德里奇·海 168
- Schuster, Th. 舒斯泰尔, 泰 62
- Schweizer, J. B. 施韦泽, 约·巴 174, 263, 264
- Sečenov, I. M. 谢切诺夫, 伊·米 429
- Šešić, B. 舍希奇, 波 270
- Shaw, Bernard 萧伯纳 306, 339
- Shell, K. L. 谢尔, 库·L. 389
- Singer, P. 辛格尔, 保 320
- Sismondi, J. Ch. L. 西斯蒙第, 让·沙·列 179
- Smith, A. 斯密, 亚 147, 148, 176-178
- Solovjev, V. S. 索洛维约夫, 弗·谢 426

- Sorel, G. 索列尔, 若 284 - 290, 295
- Spencer, H. 斯宾塞, 赫 291, 306, 335
- Spinoza, B. 斯宾诺莎, 巴 44, 46, 70, 87 - 89, 245, 323
- Stadhagen, A. 施塔特哈根, 阿 355
- Stahl, F. J. 施塔尔, 弗·尤 59
- Staljin, J. V. (Džugašvili) 斯大林, 约·维(朱加施维里) 23, 167, 259, 378, 380, 398, 407
- Stammler, R. 施塔姆勒, 鲁 308
- Starkenbug, H. 博尔吉乌斯, 瓦 221, 254 - 255
- Staudinger, F. 施陶丁格尔, 弗 14, 308, 316 - 320, 334, 388
- Steffens, H. 斯特芬斯, 亨 54
- Stein, K. 施泰因, k. 41
- Stein, L. v. 施泰因, 罗·v. 62
- Steinberg, H. J. 施泰因贝尔格, 汉·约 270
- Steinen, v. K. 施泰能, 冯·卡 433
- Sternberg, F. 施特恩堡, 弗 14
- Steuart, J. 斯图亚特, 詹 176
- Stirner, M. (C. Schmidt) 施蒂纳, 麦(康·施米特) 43, 54, 125, 126, 134, 145, 151
- Strauss, D. F. 施特劳斯, 大·弗 43 - 46, 70, 71, 73, 75, 78
- Ströbel, H. 施特勒贝尔, 亨 359
- Struve, P. 司徒卢威, 彼 306, 335, 336, 356, 425, 426
- Stučka, P. I. 斯图契卡, 彼·伊 14
- Stucke, H. 施图克, H. 43
- T**
- Taine, H. 泰恩, 伊 435
- Thalheimer, A. 塔尔海默, 奥 359
- Thierry, A. 梯叶里, 奥 94

- Thiers, A. 梯也尔,阿 209
- Thompson, W. 汤普逊,威 179
- Tönnies, F. 特尼斯,斐 339
- Tolain, H. L. 托伦,昂·路 174
- Tolstoj, L. 托尔斯泰,列 431
- Trendelenburg, A. 特伦德伦堡,阿 428
- Treves, K. 特雷维斯,克 290
- Trier, G. 特里尔,格 263
- Trocki, L. O. (L. Bronstein) 托洛茨基,列·达(列·勃朗施坦)
343, 363
- Tugan-Baranovski, M. I.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伊 306, 356,
425, 426
- Turati, F. 屠拉梯,菲 290, 339
- U**
- Überweg, F. 宇伯威格,弗 428
- Ullrich, H. 乌尔利希,霍 67
- Untermann, E. 翁特曼,恩 273, 274
- V**
- Vandervelde, E. 王德威尔德,艾 297, 367, 368
- Varga, E. 瓦尔加,叶 14
- Varlain, L. E. 瓦尔兰,路·欧 174, 275
- Venedey, J. 费奈迭,雅 62
- Viviani, R. 维维安尼,勒 276
- Vogt, K. 福格特,卡 167, 237
- Vollmar, G. 福尔马尔,格 308, 314, 331
- Volney, C. F. 沃尔涅, C. F. 27
- Voltaire (F. M. Arouet) 伏尔泰(弗,玛·阿鲁埃) 24, 26, 94
- Vorländer, K. 沃伦德尔,卡 308, 344, 389

- Voroncov, V. P. 沃龙佐夫, 瓦·巴 425
- W**
- Wagner, A. 瓦格纳, 阿 307
- Wagner, H. 瓦格纳, 赫 379
- Waldeck, J. 瓦尔德克, 尤 123
- Warski, A. 瓦尔斯基, 阿 350
- Webb, B. 维伯, 比 306
- Webb, S. 维伯, 悉 306
- Weidig, F. 魏迪希, F. 53
- Weil, E. 魏尔, 埃 80
- Weiss, F. 魏斯, 弗 296
- Weiss, G. 魏斯, 格 320
- Weitling, W. 魏特林, 威 62, 79, 87, 90, 91, 100, 150, 151
- Wells, H. G. 威尔斯, 赫·乔 306
- Werth, G. 维尔特, 格 60
- Weston, J. 韦斯顿, 约 169
- Westphalen, E. 威斯特华伦, 埃 150
- Westphalen, J. (Marx) 威斯特华伦, 燕(马克思) 54, 79
- Weydemyer, J. 魏德迈, 约 145, 150, 151
- Wieland, Ch. M. 维兰特, Ch. M. 29
- Wienbarg, L. 文巴尔克, 卢 42, 71
- Wigand, O. 维干德, 奥 125, 134
- Wijnkoop, D. 怀恩科普, 戴 371
- Wilbrandt, R. 维尔布兰德, R. 319
- Willich, A. 维利希, 奥 160, 164
- Windelband, W. 文德尔班, 威 30, 307, 436
- Wolff, Ch. 沃尔弗, 克 30
- Wolff, L. 沃尔弗, 鲁 169

Wolff, W. 沃尔弗,威 62,150,153,160

Woltmann, L. 沃尔特曼,路 309-310,315

Worrall, R. L. 沃雷尔, R. L. 399

Wurm, E. 武尔姆,艾 355

Z

Zasulić, V. 查苏利奇,维 350,421

Zeiler, S. 载勒尔,塞 150

Željabov, A. 热里雅鲍夫,安 420

Zetkin, C. 蔡特金,克 340,359

Zinovjev, G. E. (Radomysljski) 季诺维也夫,格·叶(拉多梅斯利斯基)340,399

Zlocisti, Th. 兹罗齐斯蒂, Th. 90

Zola, E. 左拉,爱 282